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巨人之战

汪文军 著

同心出版社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为了这位百年才出现一个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

——斯大林

1945年2月8日

“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当我发现自己外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

——丘吉尔

1945年2月8日

“这里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未曾遭受侵略的严重威胁，也还没有濒临即时的危险，他就已多半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更广阔的考虑，成为导致全世界动员起来以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锻造者。在这场战争中，总统最突出和关系最重大的成就就是租借援助。”

——斯大林

1945年2月8日

“我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心和灵魂。”

——罗斯福

1943年12月17日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主义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丘吉尔

1946年10月11日

“与你（丘吉尔）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妙不可言。”

——罗斯福

1942年2月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整整 50 周年了。每当提起这场战争，人们往往会想起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三元凶——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辛英机，同时也往往会想起美、苏、英反法西斯盟国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巨头与三元凶之间的一场大决战。从反法西斯盟国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它是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精心组织和指挥的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从美、苏、英三国关系和三巨头之间的交往关系来看，它又是三巨头之间合作与冲突的一场历史剧。总之，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三位历史巨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45 年 3 月 18 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把这场战争称为“巨人之战”。

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历史是巨人的传记”，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认为“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或指挥者，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品质、风格、情感带进历史事件中来，并在其中起作用。这样，就给历史事件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人物的印记，使每个历史事件都形成了它所特有的外观，以至当人们提起某个历史事件时，往往立刻想到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要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就某些历史事件而言，历史人物不仅对它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第 45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无疑是最重要的直接参与者，领导者和指挥者，他们的思想、个性、风格、情感影响着他们在战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进而给这场战争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不能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无疑对这场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的全部内容将表明，三巨头是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导演。

三巨头的战时活动影响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有的外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过来也影响着三巨头的历史地位。近几年，受域外某些书籍的影响，国人也喜欢为各种历史人物、事件乃至著作等等排座次，“十大×××”、“一百个×××”之类的书籍纷纷问世，至于有多少科学性和权威性，是颇值得怀疑的。不过，这类书籍倒也引发笔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若列出一张 20 世纪重要历史人物的排行榜，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该排在什么位置？显然，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三巨头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地位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罗斯福或许不大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任四届的总统，其历史地位只能主要靠“新政”来支撑，自然会单薄得多。就斯大林来说，无论是否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总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给他提供的扮演苏联最高统帅这一角色的历史机会，在是非功过的历史天秤上，其功勋的份量就会轻很多。比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丘吉尔历史地位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罗斯福照

旧是美国总统，斯大林依然是苏联领导人，他们会分别以实施新政和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作用而跻身于 20 世纪世界历史伟人之列；可是，对丘吉尔来说，若没有爆发这场战争，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英国首相，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扮演英国战时领袖这一角色的机会，他顶多只是英国历史上一个较有个性、较突出的内阁大臣、下院议员。这样的身份所能起的历支作用是有限的，这将使他艰难挤进世界历史伟人之列。

要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必须研究人的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要深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特点，必须深入研究战时盟国三巨头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本书主要叙述三巨头策划、组织和指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经过，写他们带进这场战争中来并给战争打上深深烙印的思想、个性、风格、情感，写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战时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写他们的远见卓识及成败得失。由此揭示出这三位历史巨人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出自美、苏、英三个不同的国度，彼此之间在社会经历和世界观方面各不相同，在个性和领导作风方面有很大差异。用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他们本身就是使人着迷的心理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伙伴显然不同……这三个人的遭逢是人类不同种族在狭路猝然相逢的一个缩影……”世界的整体化进程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各国首脑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交往便是世界整体化发展趋势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使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走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一个战壕里。为了打败轴心国家，也为了缔造战后和平，丘吉尔 9 次会晤罗斯福，两次访问莫斯科，三巨头两次聚会，此外他们之间还有极为频繁的通信联系。这些交往活动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

和战后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客观的历史进程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把三巨头放在一本书中，集中叙述他们的战时经历，这样既便于对他们进行比较，又能避免为每人单独立传时带来的重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是这场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写好这场战争并非易事，要写好这三位历史巨人也许更难。这场战争对三巨头的考验是极为严峻的，三巨头为赢得战争胜利所作的努力是极为艰巨的；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他们的战时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包含着真诚的合作与尖锐的冲突，他们的战时经历交织着挫折、失败、胜利和辉煌。如果用一种平淡乏味的笔调来写，将难以充分地展示出他们的这段辉煌经历。近年来，史学界中有人提出，写历史，既应对历史作一些理性分析、得出一些正确的认识，也应传达出一种历史情绪。还有人提出，写历史不应直奔主题，忽视历史过程的叙述。这些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其实，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是很讲究传达历史情绪的，司马迁的《史记》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李大钊也说过：“历史是有生命的，僵化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笔者认为，历史著作既应把作者对历史所作的理性分析和结论直接告诉读者，也可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感受历史脉搏的起伏跳动和历史大潮的汹涌澎湃。

基于这种认识，在本书中，笔者以盟国三巨头的战时活动为线索，注重对历史过程的叙述，避免直奔主题，避免下简单的结论，给读者留下思考的

余地，力求在叙述三巨头战时经历的过程中传达出一种历史情绪，让读者从中去感受人类在 50 年之前经历的那场浩劫与辉煌。

本书是根据大量史料写成的。由于引文较多，而书稿的篇幅又较大，故没有列出注释。

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徐天新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韩莉副教授，他们精心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还有一些热心的朋友，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里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笔者才疏学浅，初次尝试这种写法，深感要写好这本书有些力不从心，加之时间仓促，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

巨人之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第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

张伯伦：“我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了。”

丘吉尔：“这苦酒杯将年复一年地递到我们嘴边，让我们尝尽苦酒。”

斯大林：“这是不严肃的，……伦敦和巴黎仍然想玩牌。”

希特勒：“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久，所以，最好是现在下手。”

50 岁的希特勒

1939 年，希特勒整整 50 岁。

50 年前的 4 月 20 日，他出生在奥地利的边陲小县——瓦尔德维尔特。那地方几乎与世隔绝，其方言土语连维也纳人也很难听懂，绝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在希特勒之前，既没有出过能流芳千古的好汉，也没有出过能遗臭万年的罪人。

没想到，1889 年那里出了一个阿道夫·希特勒，50 年后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1933 年 1 月 30 日，44 岁的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6 年来，他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搅得整个欧洲和世界不得安宁。

1939 年 4 月 28 日，希特勒在德国科隆歌剧院发表演讲，列举了他执政 6 年的“丰功伟绩”：“我不但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了，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起来了。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地撕毁那长达 448 条的条约（指《凡尔赛和约》），……我把 1919 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了自己的祖国。我重新统一了日耳曼人生存的空间……”

他接着颇为自鸣得意地说：“21 年前，我是我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士兵，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完全是靠了我自己的努力。因此，我有权要求在历史上，在那些作出了伟绩的人中间占一应得的席位。”

50 岁的希特勒面色红润、身体健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思维敏捷、两眼有神、充满自信。他对许多人说过，50 岁是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50 岁过后，人就要开始衰老，体力、智力将大为减退。他把他自己的 50 岁看得很重要，把 50 岁作为他作出重大决策的关键一年。他决心在还没有完全衰老之前，尽快实现他征服欧洲和世界的野心。了解他的人，有一部分心情不安地注视着 1939 年，不知道希特勒在这一年究竟会干出什么勾当。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他是一个征服者，要统一日耳曼民族，消灭德国的犹太人，从地球上根除布尔什维主义，为日耳曼民族夺取广阔的生存空间，建立辽阔的日耳曼大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的恒河流域，因为那里是雅利安种族的发源地。

他知道，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欧洲西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国、欧洲东边斯拉夫人的苏联。要征服欧洲和世界，首先必须打败这两个国家。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1937年5月28日，68岁的内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张伯伦家族是靠制鞋和开皮货店起家的。他本人一嘴大板牙、言谈举止缺乏风度，倒有点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鞋匠。可他多年来一直是英国政府中的实权派人物。面对希特勒在欧洲的侵略扩张，他坚决主张实行绥靖政策。张伯伦这个名字，后来几乎成了绥靖政策的代名词。

1938年秋天，希特勒制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是对张伯伦的一次重大考验。

此前，希特勒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已迈出了一系列步伐：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国联裁军会议；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重新武装德国；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但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希特勒以苏台德地区的民族问题为借口，于1938年9月12日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给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德国就要采取行动。

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有互助条约。9月13日，法国内阁开了一整天的会，以寻求对策。当晚，总理达拉第决定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出面调解。

张伯伦就任首相时，最大的愿望是成为青史留名的“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很乐意承担调解使命，于9月15日飞往德国去见希特勒。

在会晤中，希特勒大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是“统治二流国家的二流戏子”，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应当存在的国家”。他威胁说，人难免一死，自己今年49岁了，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如果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就能在我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打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希特勒很会表演。大声责骂和威胁一番后，他又小声对张伯伦说，可以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解决苏台德问题。

张伯伦表示，立即回英国去商议，“然后再来见你”。

张伯伦回国后，先让英法两国政府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然后两国联合施加压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

9月22日，张伯伦兴冲冲地第二次飞往德国见希特勒，满以为大功告成。殊不知，希特勒又提出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以日耳曼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必须由德国军队立即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必须于9月28日全部撤出苏台德地区。过了一会，他又故伎重演，对张伯伦说：“为了使你满意，张伯伦先生，我愿意作出让步，把撤军日期延至10月1日，我对别人是极少这么做的。”

张伯伦答应回去再做工作。

可这一次，捷、法乃至英国政府都拒绝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为了对付希特勒的军事冒险，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全国总动员。法国宣布将履行自己对捷承担的互助义务，并宣布局部动员。英国外交部声明说，如果法国卷进去，英国将站在法国一边。

希特勒气极败坏，继续软硬兼施。9月26日，他发表讲话，说“如果10月1日，苏台德地区还没有交还给德国，我希特勒就是打进捷克去的第一个士兵。”然后又说，“这是我迫不得已在欧洲提出来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9月27日，他下令德军7个师进入德、捷边界前沿阵地。9月28日，是他要求捷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捷克斯洛伐克无意接受他的要求，为防止不

测，还下令立即征召了 100 万兵员。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其实，此时希特勒尚未作好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当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出面调解时，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他同意邀请英、法、意三国领导人来德国慕尼黑开会，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

9 月 28 日，张伯伦正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会场气氛很紧张。这时，传来了希特勒邀请他赴慕尼黑开会的消息，张伯伦如释重负，“一下子仿佛年轻了 10 岁”。他激动地说，希特勒同意推迟 24 小时动员，同意会见英法意三国领导人。议会大厅立即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议员们纷纷起立，向张伯伦鼓掌致意。

9 月 29 日，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与希特勒、法国的达拉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规定把苏台德地区移交给德国，英法将保障捷克斯洛伐克新的国界不受侵犯。9 月 30 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就这样，捷克斯洛伐克被张伯伦等人可耻地出卖了。

9 月 30 日，张伯伦又找到希特勒，将一份拟好的《英德宣言》草案交给希特勒，希望他签字。宣言的内容是，英德两国永不发生战争，用协商的方法处理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等。希特勒看后，认为它可以麻痹英国人，便毫无异议地签了字。

张伯伦满怀喜悦心情回到英国，俨然是“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站在首相府的阳台上，对欢迎他的人群挥舞着一纸《英德宣言》，喜笑颜开地对人们说，《慕尼黑协定》“乃是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再不彼此进行战争这一愿望的象征”。“我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了。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

一时间，仿佛张伯伦真的给人们带来了和平，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以各种方式对他表示敬意。荷兰人给他送来了郁金香，比利时人授予他一枚特制的“和平天使”勋章，英国各地竞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他喜欢钓鱼，人们就给他送来了很多钓鱼竿。他喜欢随身携带一把雨伞，有人便把雨伞作为他本人的象征，象圣物一样收作纪念品。

张伯伦的声望极高，却也极短暂。

希特勒压根就没有把《英德宣言》当一回事。几次会晤使他掌握了张伯伦的底细。他认为，张伯伦是个“懦夫兼低能儿”。他后来还说过，我们的敌人是些小爬虫，我在慕尼黑见识过他们。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希特勒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苏台德并非是他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这句话是用来哄骗张伯伦的。1938 年 10 月 21 日，他策划了兼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先把斯洛伐克分离出去，然后分别占领捷克残余部分和斯洛伐克。

1939 年 3 月 14 日，在希特勒的唆使下，斯洛伐克的分裂主义分子提案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当晚，希特勒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硬逼着他在“捷克立即并入德国”的协定上签了字。3 月 15 日，德国出兵占领了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3 月 16 日，希特勒宣布上述地区为“保护国”并入德国。同一天，他又应所谓独立的斯洛伐克的邀请，派兵前去“保护”。至此，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落入了希特勒手中，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人。”

张伯伦和这位第在慕尼黑为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提供的安全保障一文不

值。

斯大林对纳粹德国的态度

斯大林对纳粹德国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苏维埃俄国遭到了帝国主义战胜国的武装干涉、包围和封锁。1922年4月，战败的德国率先与苏联签订《拉巴诺条约》，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苏联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起了很大作用。从那时起，一直到30年代初，斯大林都很重视发展苏德双边关系。

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时，斯大林没有公开地发表评论，而是采取了观望态度。主观上，他希望苏德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能维持和发展下去。他注意到，1933年5月，希特勒政府批准延长苏德《拉巴诺条约》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和中性条约》，这似乎是可喜的迹象。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首次就德国法西斯问题发表了看法。当时，德国有人指责说，苏联采取了疏远德国，倒向法国和波兰的政策，并说这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斯大林对此反驳说：“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受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是不会赞成凡尔赛和约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世界由于这个条约而被卷入新的战争的漩涡。”此时，他的公开讲话还比较谨慎。

随着希特勒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称霸欧洲野心的暴露，斯大林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德国是苏联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依据这一认识，他大幅度调整了苏联的外交政策，核心是谋求建立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1933年11月16日，苏联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退出国联后，苏联却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了国联。1935年5月，苏联分别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同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最紧迫任务。

然而，斯大林谋求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由于苏联与英国、法国和波兰等国由来已久的互不信任而没有成功。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考虑到苏、法、捷三国彼此签订了互助条约，加上英法之间也有互助义务，斯大林曾建议，建立一个英、法、苏、捷反对纳粹德国的联合阵线，并制定一项对付德国的联合军事计划。他相信，四国联合起来，是可以制止希特勒的战争冒险计划的，至少可以推迟战争的爆发。

可是，英法对此并不热心。相反，张伯伦和达拉第却热衷于同希特勒作交易。他们既没有征求苏联的意见，更没有让苏联参加，就去慕尼黑与希特勒签订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这种完全无视苏联存在的做法，使斯大林感到愤怒和屈辱。更严重的是，英法相继同德国发表了带有互不侵犯性质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其用心何在？对于当时欧洲的国际形势，连英国都有人用足球赛的术语形容说，张伯伦守住了英国队的大门，把比赛引向了欧洲东部。斯大林怎么能不怀疑：英法是否要把希特勒这

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

自 20 年代初以来，斯大林最忧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当张伯伦、达拉第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慕尼黑沆瀣一气时，斯大林清醒地意识到苏联的孤立处境，意识到在希特勒对外扩张愈来愈富有爆炸性时这种孤立的危险性，英法领导人认敌为友、为虎作伥的行为，使他感到了切肤之痛。几个月后，他就此愤怒地谴责说：“人们可以这样认为，把捷克斯洛伐克几个区让给德国，是作为它保证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奖赏。”

这样一来，苏联与英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不仅没有得到消弭，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正是希特勒求之不得的。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英国、高喊带来了和平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创伤。丘吉尔就此评论说：“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被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且不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创伤。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苏俄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为此，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严厉地谴责了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他说：“正在进行战争的侵略国，从各方面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这些国家推行绥靖政策，旨在让苏联和德国“互相削弱、互相消耗”，然后由它们坐收渔人之利。针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斯大林宣布，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密切的睦邻关系。”

丘吉尔的警告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受到了英国著名的反希特勒斗士——温斯顿·丘吉尔的严厉批评。

30 年代，丘吉尔一直在野，但他密切地注视着欧洲国际局势的变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正确的判断力。1937 年 5 月张伯伦出任首相时，丘吉尔是支持他的，主要是赞赏他在繁荣英国对外贸易方面作出了成就。可是他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多持批评态度。1938 年 2 月，由于张伯伦对德国、意大利推行绥靖政策，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外交大臣艾登愤然辞职，这只会更有利于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丘吉尔为此深感不安。他一向能吃能睡，那天晚上却彻夜难眠，“充满了忧伤和恐惧的情绪”。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心沉了下去，刹那间一股绝望的暗流笼罩着我”。

丘吉尔虽然不在其位，却并非不谋其政。1938 年 8 月 31 日，他给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写信，主张英国应联合法国和苏联，一起集体向德国发出警告，提醒德国注意，德军所进行的任何侵略“会引起重大的争端”。张伯伦政府没有采纳这一主张。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张伯伦第一次去德国求见希特勒，回来后又促使英、法两国政府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丘吉尔极为愤怒。他认为，此举意味着“西方民主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9 月 22 日，他到海军部拜会他的好朋友、海军大臣达夫·库珀时，情绪非常激愤，猛烈地谴责张伯伦，在屋子里来回跺脚，急不可耐地发泄他的心头怒火。

为了阻止张伯伦政府在绥靖政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9 月 26 日，丘吉尔

登门拜访张伯伦，面陈己见，力主英、法、苏发表制止希特勒扩张、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声明，遭到张伯伦的拒绝。

9月29日，张伯伦飞往德国慕尼黑会见希特勒。丘吉尔立刻意识到，张伯伦有可能向希特勒屈服，他坐卧不安。在当天与反对党的一些领导人和下院议员共进午餐时，丘吉尔敦促大家联名致电远在慕尼黑的张伯伦，力劝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问题上不能投降。可许多人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他为此伤心落泪。

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高唱和平幻想曲，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沉浸在和平幻想中时，丘吉尔却异常清醒。在下院辩论中，他对《慕尼黑协定》和《英德宣言》作了深刻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者用手枪枪口威胁着勒索1英镑，如数给他后，他又在枪口下索取2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同意只拿1英镑17先令6便士，剩下的尾数留作保证将来采取善意的酬谢。”他严正警告说：“不要以为到此完结了，这不过是算总帐的开始，仅仅是尝尝第一口苦酒的滋味罢了。除非我们一如往昔，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次挺身而出，捍卫自由，否则，这苦酒杯将年复一年地递到我们嘴边，让我们尝尽苦酒。”

目标对准了波兰

丘吉尔的话不幸言中。希特勒的领土扩张要求，是决不会有“最后一次”的，在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又把矛头集中对准了波兰。

波兰地处中欧，西接强大的德国，东邻强大的苏联。这种与强国为邻的地理环境，给波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世纪之前，它曾3次被俄国人和德国人瓜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恢复其独立。波兰刚独立时，其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投靠英、法帝国主义列强，参加了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此后一直奉行亲英法、反苏联的外交政策。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最初推行拉拢波兰的政策，目的是离间波兰与英法的关系。1934年1月26日，波兰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到了1938年底，希特勒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已开始考虑吞并波兰的问题。1938年10月24日，德国要求波兰把但泽移交给德国，允许德国修筑穿过波兰走廊、通往德国东普鲁士的超级公路和铁路，并享有治外法权。波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占，以及1939年3月23日对立陶宛的默麦尔市的占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波兰的军事包围之势此时，希特勒再次向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对波兰构成了巨大压力。

当希特勒让张伯伦吞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杯苦酒，又把波兰这杯苦酒递到他嘴边时，张伯伦多少变得清醒了一些。此时，他已意识到，要维护波兰的安全，制止希特勒的扩张，仅靠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1939年3月18日，英国驻苏联大使西兹奉政府之命，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询问：如果德国要侵略罗马尼亚，苏联是否愿意与英法一起积极援助罗马尼亚？3月20日，英国内阁决定，促成英、法、苏、波四国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以威慑希特勒。

斯大林虽然对张伯伦、达拉第制造慕尼黑阴谋极为愤慨，但并没有妨碍他对欧洲国际局势作出冷静、理智的判断。在希特勒公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后，斯大林更确信，纳粹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仍然希望与英、法乃至波兰建立反对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德军占领布拉格的当天，苏联驻英国大使麦斯基放出风声：是战是和，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莫斯科与伦敦之间建立哪种类型的关系。

针对英国大使3月18日的询问，苏联当天作出答复：建议立即召开英、法、苏、波、罗和土耳其六国会议，讨论采取共同行动制止德国扩张问题。

张伯伦拒绝了苏联的这次建议。3月24日，他在下院说：“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将加强成立排他性的国家集团的趋势，……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的和平前途必然是有害的。”他仍然坚持英、法、苏、波四国只发表联合声明，规定遇有侵略行动发生时，四国将共同磋商。他认为，只需作出这种姿态，就能对德国产生威慑效果。

斯大林认为，这不会有多大成效。但为了促成四国协调行动，他仍然接受了英国的建议，条件是波兰必须参加。

却说波兰，在大祸即将临头之际，却不改它一贯反苏的本性。波兰外长贝克向英国表示，波兰不愿与苏联合作，只求得到英、法的安全保证。他建议，立即缔结一项秘密的英波协定，规定两国在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立即进行磋商。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却表现得目光短浅。

张伯伦也强不了多少。波兰人拒绝同苏联合作，他便迁就了波兰的主张。3月31日，他在英国下院宣布：“如果发生任何显然已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动……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全力支持波兰。他们已经给予波兰政府这种保证。4月6日，波兰外长贝克访问英国，随后发表的会谈公报说，英波双方将相互提供安全保证。法国也向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4月13日，英国又宣布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安全保证。在这一系列保证行动中，苏联又一次被撇在了一边。

张伯伦的上述举动，既惹恼了希特勒，又得罪了斯大林。

1939年4月1日，希特勒发表演说，警告英法不要利用波兰反对德国，警告波兰不要为英法火中取栗，否则，当心烫坏自己的手指。两天后，他秘密下令，制订进攻波兰的军事行动计划——代号为“白色方案”，要求德国军队到1939年8月31日时，必须作好随时入侵波兰的一切准备。4月28日，他又宣布，废除1935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缔结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5月23日，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德军高级将领们谈到了进攻波兰的计划：“根本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决定要做：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重演捷克事件。这次得打仗了。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决不能同时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如果不能肯定德波冲突不致导向同西方作战的话，那么战斗主要应针对英国和法国。”

张伯伦的上述举动，也加深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位于东欧和东南欧，与英国相距遥远，而邻近苏联。地理位置决定了苏联能比英国更有效地为它们提供援助。没有苏联的帮助，英、法是不可能有效地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而张伯伦的举动，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苏联撇开了，其目光短浅让斯大林感到震惊；其目中无人又让斯大林感到愤懑。丘吉尔和艾登立即指出，张伯伦的政策是极端愚蠢的。

迫于舆论压力，4月14日，英国政府建议苏联也向波兰、罗马尼亚提供

安全保证。第二天，英、法、苏三国开始正式谈判。这是一次决定欧洲乃至世界命运的谈判。能否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扩张，就取决于这场谈判的成败。

英法苏三国谈判

1939年4月17日，苏联政府提出了苏联的主张：英、法、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互助协定，然后三国共同保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所有东欧小国的安全。

苏联的意图在于，不仅对波兰、罗马尼亚两国提供保证，而且要对东欧所有国家提供保证。在斯大林看来，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苏联有3条路线：西北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正西面的波兰、西南面的巴尔干地区，留下任何一个缺口，对苏联都是危险的，此外，他希望英、法、苏建立真正的军事同盟，认为非此不足以制止希特勒的扩张。

然而，英法拒不对波罗的海三国提供安全保证，也不愿意同苏联讨论缔结军事协定问题。张伯伦政府虽然开始同苏联谈判，但对苏联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除了政治上、外交意图上不信任外，也不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英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认为，苏军经受不住一次有力的攻势，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争中幸存下来。英国还认为，由于苏联运输系统不完善，战时它援助波兰的能力是有限的。

苏联在谈判中提出，一旦爆发战争，苏联与英、法的军事合作，还需要东欧一些小国提供方便，例如需要波兰、罗马尼亚给苏军提供过境权，因为苏联与德国领土不接壤。由于波兰、罗马尼亚历史上与俄国积怨很深，疑虑极大，即使大难临头，也不愿意同苏联合作，拒绝给苏军提供过境权。苏联希望英国向它们施加压力。张伯伦却宁愿迁就波兰。1939年5月19日，一战时的英国老首相劳合·乔治在下院说，西方国家要同德国打仗，没有苏联支持不行。张伯伦不以为然他说：“在那时（1914年），俄国和德国有共同的边界，波兰还不存在。……这次如果让苏联直接参与，就将完全不符合某些国家的愿望。”

英法在谈判中的顽固态度，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忧虑。5月3日，也是三国谈判的微妙时刻，斯大林解除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是犹太人，憎恨德国纳粹，坚决主张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被西方认为是苏联政府中的亲英法派，此刻被解除职务，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英、法对此很关注。5月11日，法国驻苏代办问莫洛托夫：“苏联的政策会同李维诺夫在任时一样吗？”

“是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内部易人的情况更多，却并未引起特别的麻烦。……”莫洛托夫回答得很巧妙。

实际上，英、法的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多次谈话后感到，此人反德、亲英法倾向过于强烈，固执己见，值此欧洲局势可能瞬息巨变。一步不慎可能全盘皆输的微妙时刻，把苏联的安全完全寄托在与英法的合作上，在一棵树上吊死，这是不明智的。换言之，由于英法在谈判中缺乏诚意，斯大林要给苏联留条退路。

英、法、苏三国谈判到6月下旬仍无进展。6月2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英法在谈判中的态度不得不使人怀疑，它们“是确实渴望保证和平阵线的建立，还是想利用谈判这件事以及谈判本身的拖延，来达到某

种别的目的？”

两天后，英法表示愿意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承担保证义务，但又留有尾巴：当这些国家遭到间接侵略时，英法不能提供援助。何为“间接侵略”？此后，三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莫洛托夫说，英法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欺骗行为和诡辩伎俩。

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政府似乎不是在为签订极为重要的国际条约谈判，而是在市场上买波斯地毯，为每一件琐事讨价还价，每隔半小时加1个便士。他说，这是最糟糕的谈判方法。

丘吉尔在议会辩论中，批评张伯伦政府缺乏与苏联合作的诚意。他说：“如果你们准备在战争中成为俄国的盟友，……那么当现在成为它的盟友就能防止战争爆发时，你们为什么又不愿成为它的盟友呢？我弄不明白这些外交上的奥妙和拖延不决的原因。”

欧洲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迫切需要英、法、苏三国尽快建立起反德阵线。为了打破僵局，7月9日，苏联建议，在政治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同时举行军事谈判。英、法于7月25日才表示接受苏联的建议。

苏联为三国军事谈判作了认真准备，成立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团长的高级军事代表团，享有广泛的权力。

英法的举措却令人失望。8月初，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斯大林送来了参加谈判的英、法军事代表团的材料。斯大林注意到，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是一位退役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杜芒克仅是个兵团司令，其地位甚至不及英国派往波兰、土耳其的军事代表团的地位。他不禁皱起了眉头，对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说：“这是不严肃的。这些人不可能拥有应有的权力。伦敦和巴黎仍然想玩牌，我倒想看看他们是否会参加在欧洲的这场纵横捭阖。”

“不过看来谈判还是要进行。让他们把牌统统地摊出来吧。”莫洛托夫说。

“好吧，需要就需要吧。”斯大林冷冷地应了一声。

英、法军事代表团不仅级别低，而且举动也让人生疑。当时，战争的危险日益逼近，迫切需要英、法、苏尽快建立起合作关系。而英、法代表团却并不急。他们不乘飞机，而是乘一艘邮轮走海路，慢悠悠地前往苏联，直到8月11日才抵达莫斯科。张伯伦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英、法军事代表团需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协调双方的立场，拟定军事协定草案。实际上并非如此。法国代表团团长在日记中透露，一路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打乒乓球，组织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乒乓球赛。

英、法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才知道，他们竟然连签订协定的会权证书都没有。斯大林不能不怀疑：英法的诚意何在？

在谈判中，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具体详细的军事合作计划，而英、法代表团却只能泛泛而谈，既无具体明确的合作计划，更无所谓军事协定草案。苏方提出，为了在军事上能切实援助英、法，苏军需要获得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过境权，以便能同德军作战，希望英、法利用它们与波、罗两国的密切关系，帮助做到这一点，但遭到了英法的断然拒绝。军事谈判也陷入了僵局。8月17日，谈判暂时休会。

至此，斯大林已经断定，苏联与英法的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与此同时，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局势已极为恶化，苏联的安全正受到巨大威

胁。

在远东，日本的扩张对苏联已构成严重威胁。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一直在作进攻苏联的军事准备。1936年，日军挑起了33起边界冲突。1938年7月至8月，日军又在张鼓峰地区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边界冲突，被苏军击退。1939年5月，日军又在诺蒙坎地区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截至8月中旬，仗还没有打完。斯大林注意到，历史上日本人往往是趁世界其他地区局势动荡、出乱子时，就在远东加紧扩张。如果德国在西面对苏联发动战争，日本很可能同时在东边对苏联动手，那将会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可怕困境中去。斯大林不禁想起，早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布哈林就警告过德、日两国对苏联构成的威胁。“希特勒是想把我们挤到西伯利亚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想把我们西伯利亚挤出去。所以，大概需得让我们全苏联一亿六千万人统统住到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哪一座高炉上去吧。”此时，斯大林对布哈林的这段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当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谈判时，斯大林得到的情报说，英国人正在秘密地与德国人接触。他不能不想到：张伯伦之流是否会策划新的慕尼黑阴谋？他相信，张伯伦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记得1938年10月4日，法国驻苏大使库隆德尔但曾说过：“捷克斯洛伐克中立化以后，德国通向东方的道路便开通了。”如果真让张伯伦把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祸水引向了苏联，那将使苏联陷入极为可怕的灾难深渊。

在此关系到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然而，历史给他提供的选择余地是极为有限的。由于英、法明显地缺乏与苏联合作的诚意，并有可能祸水东引，斯大林不得不考虑与希特勒暂时妥协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选择，他必须慎重行事。他让人收集了有关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大量文献资料，专心致志地作了研究。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斯大林的注意力被下面这段话吸引住了：“我们……将把目光投向东方国家。我们即将……改行征服新国家的政策。今天当我们谈及欧洲的新国家时，我们只能想到俄国及其统治下的边疆。命运仿佛指出了这条道路。……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并非斯拉夫民族的治国才能结出的果实，而不过是劣等种族中的日耳曼部分建国活动的光辉典范。……我国外交政策的未来目标……应当是实行一种以获得我们德意志人民所必需的领土为主旨的东方政策。”斯大林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反复地思考着它的含义。他深信，希特勒是不会放过苏联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动手？”

斯大林还了解到，到1939年夏天，德国有陆军370万人，坦克3195辆、大炮26000门，近一半部队实现了摩托化；有空军近40万人，飞机4000多架；有海军近16万人，主要战舰107艘。无疑，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经过研究，斯大林得出如下结论：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反共产主义，同希特勒这样的人搞妥协是危险的。可是，苏军还不足以对付德军的入侵。现在，英法显然无意与苏联联合对德，甚至可能怂恿德国入侵苏联。在此国际局势危机四伏、瞬息万变之际，完全孤立是极其危险的。看来，只好暂时与希特勒这位魔鬼打交道了。

希特勒决定稳住苏联

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欧洲，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在苏、英、法三国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英国与德国在秘密接触，苏联与德国也在暗中联系。这是一种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通常，某些复杂、微妙的国际谈判，愈招摇愈不容易谈妥，愈秘密反倒愈容易谈成。1939年夏天的欧洲，公开的英、法、苏三国谈判不大可能成功，结果只能是要么英德勾结成功，要么苏德达成妥协。

对希特勒来说，征服苏联是他的既定目标，但不一定是优先目标。1939年夏天，他计划先征服波兰，如果英法介入，就掉头去打英法，在这个阶段，必须使苏联置身于战争之外。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只是个下士，但还是懂得，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同时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德军参谋部也特别提请他注意：在与英法交战时，“如果德国必须同时还要对俄国进行战争……那就很难有获胜的机会。”因此，希特勒决定先稳注苏联。进入1939年，希特勒对改善苏德关系表现出较大兴趣。2月，他下令恢复苏德贸易信贷谈判。5月初，李维诺夫被解除职务后，德国迅速作出了反应。5月16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电告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要他转告苏联，德国政府认为，苏德之间在政治、外交方面没有利害冲突，现在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第二天，德国官员又问苏联驻德使馆临时代办：为了消除苏德的互不信任，需要德国做些什么？

5月20日，莫洛托夫答复说，德国没有认真与苏联进行贸易信贷谈判，而是在耍花招。他警告说，要耍花招，最好去找别的国家。言下之意，要想改善苏德关系，请拿出实际行动来。从5月下旬到7月初，德国多次向苏联表示，德国对苏联不怀任何恶意，希望就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此时，德国之所以不断向苏联暗送秋波，意在破坏英、法、苏三国谈判。

7月28日，希特勒获悉英、法、苏将举行军事谈判，十分忧虑。第二天，德国大使舒伦堡奉命向苏联表示，德国保证“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8月3日，里宾特洛甫要求舒伦堡再次向苏联表示：“德国方面希望改善德俄关系……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

第二天，舒伦堡向柏林汇报说：“苏联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改善德苏关系，但他们以前对德国的不信任还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现在是决心要和他们订约的。当然，……他们也非常不信任英国。……如果要使苏联政府转换方向，就必须作相当的努力。”

为了拉拢苏联，德国作了“相当的努力”。8月12日，斯大林收到驻德临时代办发回的报告说：“同波兰的冲突正加速迫近，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可能在最短期间内爆发，……报界谈及我国时表现得特别有分寸……反之，在谈及英国时则挖若嘲笑，连最起码的礼貌也不顾。”

离希特勒规定的8月31日这一最后期限只剩下半个月了，苏德关系尚未“正常化”，希特勒很着急。8月15日，舒伦堡向莫洛托夫宣读了一封里宾特洛甫的“特急”电报：德国绝无侵苏意图，两国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求得完全解决，苏德关系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德国外长期期待着访问莫斯科。

莫洛托夫表示，访问需要有充分准备。言外之意，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实际上，当希特勒越发急不可待时，斯大林越觉得需要韬光养晦、冷静观察。

此时，希特勒完全被征服波兰的目标迷住了。从进军莱茵兰到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每一次冒险都成功了。他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张伯伦之流都是一些胆小鬼，英法不会为波兰而战；即使他们宣战，德国也不怕，只要稳

住了苏联，波兰便唾手可得。8月11日，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来访，表示担心战争会扩大。里宾特洛甫向他保证，英、法不会参战。他打赌说，如果英法参战，他就送给齐亚诺一套贵重的德国古代武士的盔甲；如果英法不参战，齐亚诺就送给他一幅意大利名画。

希特勒对齐亚诺说，战争用不了几天就会结束。

齐亚诺认为，冒险太大、收获太小，不值得。

希特勒说：“你是个南方人，你根本无法理解，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多么渴望伸手摸一摸波兰森林的木材啊！”

要摸到“波兰森林的木材”，当务之急是稳住苏联。8月17日，即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休会的当天，德国再次向苏联明确表示，准备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里宾特洛甫准备在18日后随时访苏，苏德谈判需要在本周内开始。

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声明，在开始政治谈判之前，应当结束两国贸易和信贷谈判。

8月19日，苏德贸易信贷谈判达成协定；苏联将向德国提供石油、木材、棉花等商品，德国给苏联贷款2亿马克，用来购买德国的工业设备。希特勒总算拿出了一点“诚意”。

当天下午，舒伦堡转达了里宾特洛甫18日发来的“特急”电报：要求苏联同意里宾特洛甫立即动身来莫斯科。舒伦堡露骨他说：“柏林担心德国与波兰发生冲突，今后的事态发展并不取决于德国。”

莫洛托夫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如果把希特勒逼急了，说不定他会狗急跳墙；既然英、法无意与苏联联合对德，只能暂时与希特勒妥协了。他当机立断，要求莫洛托夫立即转告舒伦堡：他准备在一周后，即8月26或27日接见里宾特洛甫。

此时，希特勒已经定下了战争时刻表——1939年9月1日。他意识到，苏德关系的“最后定型”无论如何不能拖到8月26日或27日。他再也坐不住了，8月20日上午，亲自给斯大林发出“特急”电报：“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无法容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危机……我再次建议您于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于星期三（8月23日）接见……”。

斯大林反复地读了几遍，用蓝色铅笔在“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下面画了一道重点线，又同莫洛托夫作了长时间研究，对有关英国正同德国秘密接触的情报的可靠性作了进一步了解，并再次听取了伏罗希洛夫关于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意识到，希特勒电报的口吻是最后通牒式的，稍有不妥，便可能引火烧身。在全面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反复权衡了利弊得失后，他决定接受希特勒的建议。8月21日，他给希特勒回电：“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前来莫斯科。”

希特勒欣喜若狂。8月22日，他对德军高级将领们说：“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决定于我，决定于我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我的政治才能。……我的存在因此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在谈到英法时，他不屑一顾地说：“在不列颠和法兰西，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没有见诸行动的人。”至于罗马尼亚，不足挂齿，土耳其人目光短浅，“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两三年后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了。……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久。所以，最好是现在下手。”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当天就与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两次会谈。他们既谈严肃的话题，也不时开一点玩笑，以增加会谈的轻松气氛。

有一次，当话题涉及到德、意、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时，斯大林虚张声势地说，只有伦敦城的一小撮商人们对此感到兴奋。

“您知道，英国有人说您不久也要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里宾特洛甫讥笑着说。

在当晚的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酒时，又不无讽刺意味地说：“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

里宾特洛甫立即给希特勒挂长途电话，汇报了条约签字的情况和斯大林的祝酒令。希特勒告诉他，“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里宾特洛甫立即向斯大林转述了这句话。斯大林听后，悄悄地朝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又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里宾特洛甫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这句话，虽是开玩笑，却话中带刺。

其实，斯大林和希特勒，谁都没有因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忘乎所以。两人心里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妥协是暂时的，如同露水夫妻，长久不了。在会谈时，里宾特洛甫曾要求在条约中写上，“苏德关系是友好的”，斯大林坚决拒绝，他说：“既然纳粹政府在6年的时间里对苏联政府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苏联政府就无法问心无愧地让苏联人民相信同德国存在着友好关系。”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希特勒曾在小范围内说：“这是同我们必须掐死的魔鬼订立的条约。”

不过，这项条约的签订，毕竟解除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和西欧各国的后顾之忧；斯大林也因此赢得了近两年的备战时间。

张伯伦本想在英、苏、德三角关系中耍花招，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使英、法大吃一惊。英、法政府立即召回了各自参加三国军事谈判的代表团，并散布谣言说，苏联同德国签订了条约，便终止了同英法的谈判。

8月26日，伏罗希诺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反驳说，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中断“并不是因为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恰恰相反，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同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谈判……已走进了死胡同。”

希特勒已无后顾之忧了，剩下的问题是，找一个入侵波兰的借口。

8月22日，他就说过：“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事后没有人会问胜利者当初讲的是不是实话。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他设计的方案是：一批波兰士兵越过边界线，进攻德国边境城市格莱维茨的德国广播电台，被德国卫队全部击毙。他说：“是否合理，不必介意。”

1939年8月31日中午，德军从监狱里拉出了10多个吸毒犯，给他们穿上了波兰军服，让他们“冲进”德国边境小城格莱维茨，“抢占”广播电台，“击毙”了数名德国职员，并用波兰语发表广播宣言，号召对德国进行战争（其实这些都是德国党卫队队员干的），最后被德国卫队全部击毙。一名官方指定的摄影师拍摄了陈放“波兰士兵”尸体的照片，刊登在翌日的德国各

大报纸上。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军出动150多万人，2000多辆坦克，2000架飞机，对波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

6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挑起了“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了”。

50岁的希特勒终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临危受命

张伯伦：“战争的可能性越大，丘吉尔进入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

丘吉尔：“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

“温斯顿回来了”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张伯伦政府立即下令英国军队实行总动员。

战争的爆发，给丘吉尔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机遇。30年代，他一直在野，一直在下院扮演着批评英国政府绥靖政策的反对派角色。事态的发展表明，他对国际局势所作的分析是精辟的，他的许多批评都切中要害，他关于纳粹德国扩张的估计不幸而言中。这样一来，他在英国社会舆论中深革众望，被英国人民看成是抵抗德国侵略扩张的英勇斗士。不过，如果不爆发战争，他很难有机会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施展他的才华，顶多只是继续在下院充当一个英明的反对派。1939年，他已经65岁，正好是退休领养老金的年龄，战争的爆发将改变他的命运。只有当战争爆发时，他在30年代的那段光荣的反对派经历，才会成为他东山再起的重要政治资本。

1939年8月中下旬，当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时，丘吉尔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他就要时来运转了。他后来回忆说：“在那段等待时间的日子里，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

当时担任首相的张伯伦也在日记中写道：“战争的可能性越大，丘吉尔进入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

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当天，张伯伦在宣布英国军队总动员时，开始酝酿改组内阁，以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他计划成立一个由6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把有能力领导抗德战争的杰出人士吸收进来，丘吉尔很自然地成为他内定的战时内阁成员之一。9月1日（星期五）下午，张伯伦找丘吉尔谈话，表示希望他入阁。丘吉尔欣然同意。

可是，英国尚未正式对德国宣战，张伯伦还犹豫不决，他还希望能在德国与波兰之间进行调停，因而不想立即对德国宣战。英国的盟国——法国也希望推迟对德国宣战，因为法国军方害怕在军队动员期间遭到德军飞机的轰炸，坚决要求政府推迟宣战时间。

9月2日，张伯伦发表了一篇讲话，调子非常悲观，以致许多人认为，他还要继续推行绥靖政策。下院议员们对政府拖延宣战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政府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立即向纳粹德国宣战。

张伯伦在宣战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使丘吉尔很忧虑。从国家利益着想，英国继续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只会是死路一条；从个人前途考虑，英国不卷入战争，几乎就断送了自己进入政府的机会。他承认，在战争爆发前夕的“最后这几个星期，我最担心的是国王陛下政府不顾自己的保证，在德国攻击波兰时畏缩不前，不敢同德国作战”。

9月2日深夜，丘吉尔给张伯伦写了一封信，对张伯伦迟迟不正式宣布请自己入阁的消息表示不安。信中说：“星期五你跟我谈过，我将成为你的

同事，而且还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可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终究不知道，在这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两天，为了使自己能顺利入阁，丘吉尔一反多年的常态，对张伯伦政府在宣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没有公开进行批评，而是保持着沉默。但是，丘吉尔个人的命运和整个英国的命运，都不允许张伯伦政府在宣战和邀请丘吉尔入阁问题上继续迟疑不决。因此，丘吉尔决定在信中威胁一下张伯伦，他说，如果在预定的9月3日中午的下院辩论开始之前，他还得不到张伯伦对他入阁的正式表态，他将在下院发表演说。言下之意，他要对政府发难了。

9月3日上午9时，英国政府向德国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停止侵略波兰，德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波兰，并限期德国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答复。两小时过去了，德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上午11时15分，张伯伦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英国与德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当天中午，英国下院就对德宣战问题举行了辩论。在辩证开始之前，张伯伦交给丘吉尔一张便条：“请在辩论结束后立刻来见我。”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将正式邀请自己入阁。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抓住了我。我觉得心地坦然……”他自然再没有必要在下院辩论中对张伯伦政府发难。

辩论结束后，张伯伦在首相办公室里接待了丘吉尔，正式告诉他，请他出任海军大臣，正式就职仪式两天后在王宫举行。

丘吉尔欣然受命。不过，他早已迫不及待了，不愿意等两天后再上任，而是立即通知海军部，他要在当天下午6时到部视事。海军部立即通知皇家海军各舰队：“温斯顿回来了。”

海军大臣

当天下午，丘吉尔按时来到海军部大楼。他对这里太熟悉了，20多年前，他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职务（1911年10月至1915年5月），当时，他还不到40岁，任职时根本不熟悉海军事务，因为他年轻时只在骑兵部队服役过。上任后，他视察过所有主要的海军基地，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型军舰，在摸清了英国海军存在的问题后，便着手推进海军舰队现代化。那时，他在英国海军中实行了两项重大改革：用15英寸口径大炮取代军舰上13.5英寸口径大炮；改军舰烧煤为烧石油。这两项改革使英国海军舰队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丘吉尔的正确预见和果断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海军已经充分作好了迎战准备。1915年3至5月，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英国海军舰队强攻达达尼尔海峡遭到惨败，丘吉尔被迫辞职，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海军部。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丘吉尔又受命担任海军大臣。他来到海军部会议室，再次坐到海军大臣的座位上主持第一次会议，百感交集。20多年前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他回忆说：“事隔25年，我重新回到了我怀着痛苦和悲伤的心情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他对与会者说，坐在这把椅子上，会再次带来某种特权与荣誉，但还有许多困难在前头，有待我们共同去克服，“先生们，请你们尽心尽力吧！”

象上次一样，他又住进了海军部大楼。在他的房间隔壁，设立了一间高

级作战室——又称地图室，室内挂有多幅地图，配备有畅通无阻的通信设施，英国海军舰队的分布、活动情况，英国商船的航行情况，都标绘在地图上，一目了然。

丘吉尔对英国海军的实力充满信心。他相信，德国海军远远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早在一战之前，他曾说过：“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这段话当时曾引起德国人的抗议。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拼命扩军备战。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把海军建设置于优先地位。现在，德国要想在海军舰队方面赶上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丘吉尔走马上任后，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立即视察了英国沿海的各舰队，发现海军各舰队保持着当年任海军大臣时严格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威武的姿态，只是当年还是一些中下级军官的人，如今已成长为皇家海军的一大批高级指挥员。让他不安的是，“唯有战舰绝大部分还是我在任期间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因此，他不敢掉以轻心。

丘吉尔喜欢打仗、喜欢冒险。孩童时代，他的功课学不好，但玩起指挥锡兵打仗的游戏来，能花样翻新、别出心裁，以致被他父亲认为没出息。他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勉强考上桑赫斯特军校，学骑兵科目。毕业后在骑兵部队服役，其间很少参加正规的战斗，担任过的最大军职是骠骑兵中尉。不过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过古巴前线、苏丹前线和南非前线，经历过几次战斗。在南非，他曾有过从被俘到成功地逃跑的冒险经历，一时间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不过他更渴望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立功受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0月，他曾致信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要求免去他的海军大臣职务，而授予他保卫荷兰城市——安特卫普——的军事指挥权。阿斯奎斯首相觉得他的这一想法很荒唐，其他内阁成员们也都觉得好笑。

1915年9月和11月，他又一再要求辞去不管部大臣职务，要求阿斯奎斯首相授予他陆军少将军衔和指挥一个军的权力，把他派往法国前线。这一次，阿斯奎斯首相同意他辞职，但认为，以他原有的骠骑兵中尉军衔的资历，是不配获得陆军少将军衔的。于是，仅授予他陆军少校军衔，把他派往正在法国前线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个营见习。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乐于上前线去打仗，也不愿当内阁大臣。他在见习期满后，于1915年12月中旬被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第6营营长。让他遗憾不已的是，在他任职期间（1915年12月至1916年4月），该营没有参加什么战斗，使他没有获得指挥全营官兵冲锋陷阵的机会。

现在，他又回到了英国海军大臣的岗位上，可以全盘指挥英国海军了。可是，最初战争给他带来的不是胜利和荣誉，而是挫折。1939年9月14日，皇家海军的“无畏号”航空母舰被德国鱼雷击沉，舰上约500名官兵丧生。这一消息使丘吉尔非常震惊，他又想起了一战时的许多忧伤往事。“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间隔中两度经历这样可怕的航程。没有一个人象我一样感受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他向下院汇报了这次海战情况。由于他的汇报思路清晰、措词有力、充满了胜利信心，更由于他上任不久，下院没有追究他的个人责任。

1939年10月中旬，英国海军的“皇家橡树号”战舰又被德国潜艇击沉，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786名官兵丧生。丘吉尔再次逃避了这场灾难的个人责

任。反对党——工党——在海军事务方面的发言人亚历山大是他的朋友，没有利用这件事对他发难。甚至有些人还在下院为他辩护。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说：“在我看来，我确信全体海军将士都同意这种意见，即如果这位高贵的先生在战前几个月就任海军大臣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也有人不以为然。掌玺大臣霍尔说，丘吉尔是靠“贿赂亚历山大”，而逃避了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联想到丘吉尔此前常常在下院对政府发难，霍尔说：“如果海军大臣是另外一个人，而丘吉尔处在反对派位置上，那又会怎样呢？”的确，那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形。不过，幸好海军大臣是丘吉尔而不是别人。

英国海军虽然遭受了上述挫折，但在总体实力上，仍然比德国海军占有很大优势。1939年12月17日，英国海军的两艘巡洋舰，在一艘新西兰巡洋舰的配合下，在南大西洋海域击沉了一艘德国战舰，整个英国都为之振奋。当那两艘英国巡洋舰返回母港时，受到了隆重欢迎，英国国王为全体官兵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授勋仪式，作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亦得意洋洋。

1940年2月中旬，英国海军的“科塞克号”驱逐舰冒险闯入中立国挪威领海，从一艘德国军舰上救出了被俘的299名英国士兵。这次行动又为丘吉尔增添了光彩。

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英法虽然对德国宣战，但在大陆上，实际上宣而不战，整个西线处于“无战事”的奇怪局面。唯有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海军主动出击，展开了一些战斗行动，才使英国的对德宣战不致于完全流于空话，多少为英国挽回了一点面子。

张伯伦政府陷入危机

张伯伦推行绥靖，不仅没有象他吹嘘的那样给英国人民带来和平，反而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开了绿灯，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如此，战争初期，英国人民、下院议员们，暂时还没有想追究他的责任。毕竟，由于西线无战事，英国的利益尚未遭受重大损失，张伯伦得以勉强保持他的首相职务。

然而，西线这种不战不和的奇怪战争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一旦英国的利益遭受战争的重大打击，或英军在战场上遇到重大挫折，必然会引发对张伯伦政府的强烈不满，进而追究他战前对纳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罪责，新帐老帐一起算。那时，张伯伦再想保住首相职务就很难了。

1940年4月至5月，英国远征军在挪威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便成为引发张伯伦政府危机的一根导火线。

希特勒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就需要大量的工业原料，炼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尤其不可缺少。可德国铁矿石很少，它所需要的铁矿石主要靠从北欧的瑞典进口。德国钢铁大王蒂森，曾扶持过希特勒上台，战争爆发时已与希特勒不和，乔居法国。他说，如果没有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必败无疑。英法政府觉得，蒂森言之有理，便决定切断德国铁矿石的供应线。

从瑞典到德国的主要运输线有两条：一是经波罗的海的运输线，但在冬天，波罗的海会封冻。另一条是先经铁路把铁矿石运往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再从那里经海路运往德国。1940年3月28日，英法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要求瑞典停止向德国运送铁矿石，并决定在挪威沿海布雷，派远

征军在挪威登陆，以切断经挪威通往德国的运输线。4月5日，英法正式向挪威递交照会，宣布准备在其领海布雷。

希特勒对北欧局势十分敏感。早在4月2日，他已命令德军作好占领丹麦和挪威的准备。4月8日，英法开始在挪威领海布雷，两国远征军在挪威的登陆行动也即将开始。殊不知，德国军队抢先一步，在挪威各主要港口登陆，同时入侵丹麦。英法远征军与德军在挪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这是英法宣战后，两国军队在西线进行的一次较重要的军事行动，颇为引人注目。可是，英法远征军却遭受重大挫折，4月底，被迫从挪威中部撤退。5月初，因远征挪威的军事行动受挫，英国国内笼罩着沮丧的情绪。反对党首先发难，要求下院就政府的战争政策与措施举行辩论。

1940年5月7日，英国下院开始举行辩论。张伯伦首先发言，为英军远征挪威失利加以辩护、遭到议员们的嘲笑。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对张伯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愤怒的谴责。张伯伦在4月5日说的一句话——“希特勒错过了时机”——成为议员们讥讽的话柄。下院辩论很快转变成为对张伯伦政府的信任危机。

老资格的保守党议员利奥波德·艾默里已经对张伯伦完全失去了信心。5月8日，他在下院辩论中用手指着张伯伦，引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在1653年解散长期国会时曾经说的一句名言，要求张伯伦下台：“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开吧！”此言一出，欢呼声立刻响彻了下院会议大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英国首相、著名的政治家劳合·乔治也作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言。他说：“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劳合·乔治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这句话说得很尖刻，却也一针见血。

反对党工党要求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张伯伦被迫接受挑战。当时，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下院占有绝对多数的议席。他呼吁保守党议员们忠于他，支持他，然而，那些曾经支持他推行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议员们，有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张伯伦政府软弱无能，不愿继续支持他。在投票中，有60名保守党议员弃权，30名保守党议员倒向反对党一边，对张伯伦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结果，支持张伯伦政府的议会多数，从以前的超过反对票200多票下降到只有81票。

在这次下院辩论中，丘吉尔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战前，他曾多次在下院猛烈地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可此时，他加入了战时内阁，担任了海军大臣，成为张伯伦政府的核心成员。这意味着政府政策的任何失误，他都有一份责任。因此，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议会讲坛上、在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批评政府政策的那个丘吉尔了，而是张伯伦政府政策的维护者。他非常注意在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等方面，与张伯伦及其领导的保守党主流派合作。这既是‘他的身份使然，也是他增加政治资本的需要，由于30年代他在保守党内长期扮演了一种反对派角色，处于一种孤立地位，现在，他要想在保守党政府中站稳脚，以便再高升一步，就必须赢得保守党多数的支持。

丘吉尔不仅自己停止了对张伯伦等慕尼黑分子的谴责，而且禁止他的家人发表对张伯伦政府的不恭敬言论。有一次，他请一个美国记者吃饭时，他的一个孩子说了一些对张伯伦不敬的玩笑话，他立刻板着脸，严肃地指出：“如果你们想对我的上司发表侮辱性意见，就请退席。现在，我们已经团结一致共同从事一项巨大事业，我不愿再听到对首相说出这类语言。”

如果说丘吉尔作为张伯伦政府的核心成员，对政府的任何政策都负集体责任的话，那么对英军远征挪威的失利，他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是这次军事行动最积极的鼓吹者和策划者。在5月7—8日的下院辩论中，他尽力为张伯伦政府辩护，强调他自己对远征挪威失利应负的责任，表现出一种丢车保帅的气概，同时强烈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战争中来，把所有健壮的马匹都套上轭具”。

然而，由于丘吉尔战前在纳粹德国扩张问题上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入阁以来，在提高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指挥英国海军迎战德国海军的战斗等方面表现突出，公众舆论及反对党议员们都无意追究他的责任，倒是有人替他辩护，有人对他主动充当张伯伦的挡箭牌表示懊丧。劳合·乔治在发言中指出：“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丘吉尔立即表示，他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全部责任。这时，劳合·乔治警告他，不要为了掩护张伯伦和他的同伙，“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

这样一来，当张伯伦在下院几乎成为众矢之的时，丘吉尔的威信却几乎没有受到损害，公众仍然对他很尊敬，下院继续对他保持信任。

当仁不让

下院的信任投票对张伯伦是一个巨大打击。虽然他不甘心轻易让出首相宝座，但在这场严酷的战争面前，仅靠81票的微弱多数，由他领导的保守党继续单独执政，是不足以应付战争局势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往各党派共同承担起战时领导国家的责任。可张伯伦心里很清楚，反对党肯定不会加入以他为首的多党联合政府。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他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仅靠81票的多数继续单独执政，二是象劳合·乔治说的那样，由张伯伦牺牲自己的首相职务，建立多党联合政府。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在认清了这种形势后，张伯伦开始酝酿继任人选问题。由于保守党在下院占有多数席位，首相一职自然应由保守党人担任。作为保守党领袖和现任首相的张伯伦，有权向国王推荐继承人，对于决定由谁接任首相有着较重要的影响。

张伯伦会推荐谁呢？4月初，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测验的问题是：“如果张伯伦先生退休，你愿意谁接替他当首相？”结果，艾登获得的支持率为28%，丘吉尔为25%，哈利法克斯为7%，还有一些人支持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和自由党领导人劳合·乔治。张伯伦自然不会考虑反对党领导人。在3位保守党成员中，虽然艾登获得的支持率最高，但在张伯伦看来，他还太年轻，不堪重任。至于在丘吉尔和哈里法克斯之间该选择谁，让张伯伦颇费脑筋。

丘吉尔阅历丰富、能力很强、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善于激发公众的斗

志，振奋民心。30年代，在轴心国家扩张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正确判断力。自出任海军大臣后，大约每月发表一次广播讲话，影响进一步扩大。他指挥英国海军袭击德国战舰和潜艇，小有战绩，让英国公众感到振奋。至于远征挪威失利，人们更多地把帐算到张伯伦的头上，而不愿找丘吉尔的麻烦。可是，张伯伦内心里不情愿推荐丘吉尔作他的继承人。30年代，他们长期不和，战争爆发后，张伯伦请丘吉尔入阁，实属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在性格、气质方面的差别很大。此外，丘吉尔在保守党内仍然缺乏群众基础。

比较而言，张伯伦更喜欢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他看来，哈利法克斯虽然在能力、威望方面都不及丘吉尔，但有一个很大优点：长期追随自己，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立场观点一致，比较听话；此外，在张伯伦领导的保守党内，他的群众基础也比丘吉尔更广泛。由他接任首相，作为保守党领袖的张伯伦，可以继续对战时内阁保持较大的影响。

当时，有些反对党领导人和丘吉尔的一些朋友也都认为，丘吉尔不宜担任首相。工党领导人记得，30年代，在印度宪政问题上，哈利法克斯的观点比丘吉尔的观点更可取。另有人认为，丘吉尔在政治上缺乏判断力。艾登对他能否胜任首相一职表示怀疑。

张伯伦想支持哈利法克斯，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以丘吉尔的活动能力，在这个问题上若不取得他的谅解和支持，哈利法克斯即使当了首相，也驾驭不了丘吉尔，难以有效地行使职权。他决定在5月9日下午找他们二人和保守党议会领袖戴维·马杰森商量继任人选问题，实际上希望丘吉尔和马杰森当面表态支持哈利法克斯。

当天，丘吉尔与自治领事务大臣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时，谈到了下午张伯伦要召见一事。金斯利·伍德一直追随张伯伦，对他忠心耿耿，但此刻却认为，张伯伦不宜于继续担任首相，丘吉尔是最合适的继任人选。他抛开个人感情因素，从国家大局考虑，主张由丘吉尔接任首相。为此，他献给丘吉尔一条计策：当张伯伦要你们3人表态时，你要保持沉默，以示反对由哈利法克斯接任首相。

那天下午，张伯伦召见丘吉尔等3人，对他们说，战争形势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力所不及，准备辞职，希望大家表态，他应向国王推荐谁接任首相？说完后看着马杰森，希望他提名哈利法克斯接任。马杰森早已意识到，这是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一场竞争，他很狡猾，拒绝当面在二人之间作出选择，沉默不语。

以往在这种场合，丘吉尔会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次，他接受了金斯利·伍德的建议，一反常态，一言不发。

哈利法克斯早已看出，丘、马二人不支持自己接任首相。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仅有张伯伦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主动打退堂鼓。他借口说，他是上院议员，在下院没有席位，在目前战争非常时期，担任首相有所不便。

丘吉尔立刻意识到，哈利法克斯主动退出竞争后，首相一职将落在自己头上，不禁暗自窃喜。

可张伯伦并不甘心轻易把首相职务让给丘吉尔。第二天（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形势急转直下。张伯伦想以形势危急为理由继续执政。金斯利·伍德直言相劝：新的战争危机，更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张伯伦这才最终下决心辞职。但他仍然希望由哈利法克斯接任首相，

又派人去做工作。哈利法克斯早已心灰意懒，无意接任。

当天下午5时，工党领导人艾德礼打电话给张伯伦，表示在目前危机面前，工党准备参加联合政府，但条件是“政府要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位新首相应得到全国的信赖。”

张伯伦完全清楚艾德礼的暗示，他决定不再犹豫，立即辞职。下午6时左右，他来到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同时建议国王授权丘吉尔组阁。

丘吉尔立即被召进王宫。国王打量了他一会，问道：“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来吧？”丘吉尔心里很清楚这次召见的原因，却假装糊涂，顺着国王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国王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丘吉尔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随后，丘吉尔立即与反对党领导人商讨组织联合政府问题，直到5月11日凌晨3时才上床休息。这时，他心中不禁涌出一种新的使命感，觉得他自己好象正在与命运同行，而他过去的全部生活，都只不过是为此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所做的一种准备罢了。

对于他这次之所以能临危受命，一位英国社会活动家评论说：“丘吉尔无论遭到何种挫折与失败，始终是一个强者，他善于鼓舞民众并且毫不妥协地敌视德国人。”一位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在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当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卓越才能。”英国历史学家梅德利科特却说：“丘吉尔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而且也是狡猾、博学多才的）领导人，一个对其恶毒而成功的对手们以牙还牙的斗士。”

丘吉尔自己却是这样解释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6年中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

那天晚上，丘吉尔睡得特别香甜。他回忆说：“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既往不咎

1940年5月中旬，严峻的战争形势要求英国成立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在这一点上，各党派都取得了共识。

丘吉尔曾长期在政府各部门任职，先后担任过许多内阁大臣职务，如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和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部大臣、财政大臣等。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所说，“除了外交大臣之外，他差不多什么职务都任过。”因而，他有着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在受命组阁的当天晚上，他立即邀请反对党——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商讨组织联合政府问题。

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对张伯伦很反感，却愿意参加以丘吉尔为首的多党联合政府。30年代，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处于独立的反对派地位，与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主流派的矛盾分歧，比他与工党和自由党的分歧更大。他的远见卓识，领导才能、坚定信心，亦赢得了工党领导人的信任。在组阁中，丘吉尔面临的最大麻烦来自保守党内部。当时，保守党在下院占有绝大多数议

席，其总数比其他各党派之和还多 120 余席。张伯伦虽辞去了首相职务，但仍然是保守党领袖。哈利法克斯在党内也有相当势力，虽然越来越多的保守党议员对以张伯伦为首的绥靖派领导人不满，但另一方面，忠于党的领袖是保守党的传统。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在保守党内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相反，30 年代，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而与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处于对立地位。战争爆发后，他虽然已加入了张伯伦政府，并注意与保守党主流派保持一致，但并没有在保守党内建立起牢固的权力基础。对于他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大多数保守党议员们反应冷淡。这就是说，他虽然已受命组阁，但权力基础并不稳定。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得到保守党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就难以有效地领导政府；而要赢得保守党绝大多数议员们的拥护和支持，眼下首先必须争取党内实权派领导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合作与支持。另外，丘吉尔认为，这些人虽然推行过绥靖政策，但并不等于不爱国，“他们长期担任政府要职所磨炼出来的才智及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目前这个特殊时刻，对国家及联合政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此，丘吉尔决定，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留在由 5 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张伯伦担任枢密大臣兼下院领袖，哈利法克斯继续担任外交大臣。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同意上述安排。可是，工党方面提出了异议。艾德礼告诉丘吉尔，由张伯伦任下院领袖，工党不容易工作，很难保证与政府协调一致。他提出，在联合政府中，担任下院领袖的必须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有鉴如此，丘吉尔便把这一意见坦率地转告了张伯伦。张伯伦表示，同意不担任下院领袖，这一职务便由丘吉尔兼任。

可是，工党中还有一部分议员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等绥靖派人物继续留在战时内阁中十分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新的联合政府应排除所有绥靖分子参加，理由是这些人推行绥靖政策，备战不力，给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主张涉及的不仅仅是张、哈二人，而是牵涉到一批人，如果采纳这一主张，在联合政府中担任大臣的保守党人至少有 1/3 将辞职。

丘吉尔表现得比较冷静，对所谓推行绥靖政策及备战不力的责任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是不合适的，正式的责任在当时的政府，而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工党和自由党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多少有一定责任。在 30 年代的这段历史中，最清白的是丘吉尔本人。因此，他觉得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对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再说，如果采纳上述主张，势必影响全国的团结抗战。他坚决抵制了上述要求，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见解：“如果谁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

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些有过绥靖经历的内阁大臣，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其中张伯伦的情况尤为典型。

张伯伦不仅是推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是 1940 年 5 月阻止丘吉尔任首相的主要人物。但在最后时刻，他毕竟还是推荐了丘吉尔。丘吉尔受命组阁后，张伯伦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保守党领袖地位在战时内阁中刁难丘吉尔，而是以抗击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大局为重，支持、配合丘吉尔做好工作。不久他身患癌症，于 1940 年 7 月份动了一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但仍然克尽职守，直到丘吉尔劝他病休，才离开工作岗位。9 月他因病辞去了一切公职，便推荐丘吉尔任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回忆说，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对于张伯伦先生的忠诚以及所有我内阁的同僚们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效率，我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过。”

1940年11月9日，张伯伦病故。该如何给象他这样的一位人物盖棺定论呢？显然，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张伯伦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推行绥靖政策，制造慕尼黑阴谋。然而，盖棺之时，对死者的悼念则不宜讲过只宜摆功，这大概是一条中外通行的准则。11月12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颇具特色的悼念讲话，恰当地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亦反映了丘吉尔本人独特的历史功过观。他说：“上天没有赋予人类在很大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忍受。在一个时期，人们似乎做得对，在另一个时期看来，似乎又做错了。然后，过了几年，……以往一切又事过境迁，显得迥然不同。对事物的评价有了新的价值尺度，历史……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在丘吉尔看来，人类历史认识活动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们很难用某一个固定的功利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一个人的唯一向导，就是他的良心；他追忆往事时，唯一的盾牌是他的行为正直和诚实。……只要我们举起这面盾牌，就不管命运怎样捉弄我们，我们都可永远在光荣的行列中前进”。在这里，丘吉尔定下的评价张伯伦的价值尺度是，是否凭良心办事，只看动机，不问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

丘吉尔说：“不管历史对这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可能说些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我们确信，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十分诚实地按照他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运用他那巨大的能力和权力，竭力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涂炭生灵的可怕的战争中把世界拯救出来。……他……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你的‘英国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

显然，丘吉尔的这番话，不能代替历史对张伯伦的盖棺定论，但对正在全面抗敌中的英国来说，这样评价张伯伦是比较合适的，它的基调在于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英国政府各部门中，有国王任命的大臣60到70位，许多大臣的地位并不重要。为了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工作效率，有效地组织、指挥反法西斯战争，丘吉尔根据此前的惯例和舆论的一致意见，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他们是：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掌玺大臣艾德礼、枢密大臣张伯伦、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和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丘吉尔认为，战争的全部责任将落在这5人身上，如果英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处死的就只是他们5人”。

战时内阁在协助丘吉尔领导指挥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方面起了较重要的作用。丘吉尔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及时同战时内阁商量，他签发的所有重要的电报、有关战争的重要文件，都由战时内阁成员事先传阅，一切重大问题都提交战时内阁讨论。战时内阁几乎替丘吉尔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他能集中精力处理战争和外交问题。

为了确保自己对战时内阁的有效领导和对战争的全盘指挥，丘吉尔从受命组阁时开始，就注意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国王的批准下，他还兼任第一财政大臣和新设立的国防大臣，其权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加上他总是态度坚决，善于坚持己见，盛气凌人，他的意见几乎总能得到战时内阁会议的通过而很少被否定。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人（指战

时内阁成员)都怕首相。我也怕……”丘吉尔自己承认,“我想做的所有事情,经过阁员的明智讨论之后,总能按我的意见得到通过。”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有一次,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军需大臣利特尔顿就某个问题提出了建议,丘吉尔听后大发雷霆。他说:“在我的一生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国王的老臣竟会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可是,与会的其他人都支持利特尔顿,丘吉尔无奈,只好说:“简言之,我们一致通过了军需大臣的愚蠢建议。”

由于丘吉尔的权力越来越大,英国战时内阁和下院逐渐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现实:由丘吉尔全盘组织和指挥战争。丘吉尔亲自主持和监督参谋长委员会,同该委员会一起担负起指挥战争的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丘吉尔的工作方式与罗斯福、斯大林有所不同。他不太倾向于单纯地作决定、下命令,而是主张用书面的形式处理公务。这是他工作方式的一大特点。他知道,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事后看起来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还是愿意这么做。他认为,“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发表意见和愿望,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1940年7月19日,他通知政府和军方各部门:“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在国际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战时的决策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书面记录,从而为他战后撰写具体而详尽的战争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丘吉尔走马上任后,英国政府各部门的面貌为之一变,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最初,哈利法克斯对丘吉尔的工作能力表示怀疑,在日记中提到丘吉尔时写道:“我很少遇到过有人在知识方面比他具有更出奇的缺陷,或者在工作时会比他更冲动,这样能秩序井然地工作吗?”可是,事实使他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他后来又写道:“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的军政各部门开始紧张而有秩序地运转起来了。

1940年5月13日,英国下院召开特别会议,以丘吉尔为首的新政府班子第一次在下院亮相。在下院占多数的保守党议员们一开始就给丘吉尔一个下马威:当张伯伦步入议会大厅时,全体保守党议员起立,鼓掌向他致意,而当丘吉尔进来时,会场里则是死一般的沉寂。好在丘吉尔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对此并不介意。此时,德国军队在西线正迅速地向比利时和法国境内推进,英国人民对以丘吉尔为首的新政府寄予厚望。丘吉尔不愧是杰出的演说家,当天他在议会发表的施政演说果然不同凡响。他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

利；……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他表示，“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这篇施政演说，立刻振奋了下院议员和英国人民的信心。下院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的结果是：381 票支持，零票反对。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章 修改《中立法》

罗斯福：“过去几天内欧洲事态的发展表明，我们需要修改《中立法》”。

孤立主义者：修改《中立法》是“奔向战争征途的第一步”，“反对把美国母亲的儿子们送往欧洲战场。”

“战争终于来了”

华盛顿。1939年9月1日凌晨之时30分（华盛顿时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早已进入梦乡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抓起听筒，里面传来了美国驻法国大使比尔·布利特的声音：“总统先生，托尼·比德尔（美国驻波兰大使）刚从华沙来电话，他说德国军队已经入侵波兰，战斗激烈。他还说，华沙上空已有德国轰炸机。接着电话就断线了……”

“啊，比尔，战争终于来了。上帝保佑我们吧！”罗斯福说完后，放下话筒，油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助理海军部长时的情景。那时，他经常在深更半夜接到一些有关战争情况的电话。此时此刻，他觉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他让随身侍从阿瑟·普雷蒂曼帮他穿上毛线衣，又吩咐说：“叫哈西特先生马上到这儿来。”

比尔·哈西特是白宫新闻秘书，他不知出了什么事，赤着脚，穿着睡衣冲进了总统卧室。罗斯福把战争爆发的消息告诉他，吩咐说：“立即通知报界。”

接着，罗斯福又迅速地与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尔斯、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一一通了电话。

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罗斯福并不完全感到突然。8月初，各种迹象已经表明，德国与波兰之间将会爆发战争。他接到报告说：“德国将于8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如果他们想动干戈的话，几乎可以不必再作任何准备就能发动攻击，”当时，他凭直觉猜测，战争有可能将在9月10日爆发。

他决心作出最大的努力，以阻止战争爆发。1939年8月4日，他给苏联领导人捎去口信，希望苏联同英法的谈判取得成功，达成协议，而不要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条约。他说，苏联同德国签订条约，并不能真正使苏联避免战争，而只是把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推迟到法国战败之后。8月中旬，他得知希特勒准备向苏联提出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非常不安。为了影响苏联的抉择，在美国驻苏大使职务空缺了一年多之后，罗斯福任命L·施但哈特为驻苏大使，让他给苏联领导人带去一封信，希望苏联不要接受德国的建议。然而，他的这一番努力没有奏效。8月22日（美国时间），传来了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谁都明白，这意味着希特勒消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德国入侵波兰已迫在眉睫。

可是，罗斯福决定为阻止战争爆发作最后一番努力。8月23日，他致电意大利国王维克多·爱麦虞埃，希望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出面设法阻止战争爆发。第二天，他又直接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伊格纳西·莫斯切斯基发出呼吁，希望波德之间立刻通过谈判、仲裁或调解的办法消除分歧。他表示，如果德波双方同意彼此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他愿意出面充当调停人。波兰总

统作出了积极响应，希特勒却对此置之不理。为了“‘恳求德国人发慈悲’——在1914年无人这么干过”，罗斯福又于8月25日再一次致电希特勒说，波兰愿意接受直接谈判或调停，“如果你和帝国政府同意已为波兰人所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的话，无数生灵尚可得救……”，他希望希特勒能在最后一刻良心萌发，结果仍然是杳无回音。

事实上，罗斯福的一些阁僚早已认为，总统的这一番努力是不会有成效的。在他们看来，给意大利国王发电报纯粹是多此一举，因为在意大利，国王并无实权，一切都是墨索里尼说了算数。助理国务卿伯利在评论罗斯福的这番努力时说：“这些电报的效果，差不多就象一个人给丈母娘送的情人节礼物一样，这种作法带有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天真劲儿。”

眼看着就要爆发战争，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加以制止。罗斯福只能等待着事态的自然发展，心情焦灼不安。

现在，战争终于爆发了。罗斯福在通知了政府中的几位核心成员后，打开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似乎比平时显得要紧张一些，播出的几乎全是与战争有关的消息，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清晨，他进一步接到了有关战争的详细报告：德国空军正在残暴地轰炸波兰的和平城市，大批的妇女、儿童、老人惨遭杀害。如果德军继续打下去，英国和法国有可能根据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向德国宣战。那样一来，战争将会扩大。

罗斯福越来越感到不安。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发出了一份照会：“对平民的残忍空袭……使人类的良心猛烈颤抖……我紧急呼吁，凡是可能参与敌对行动的各国政府要公开表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让自己的武装部队空袭和平居民……我请求立即作出答复。”

然而，没有人答复他。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战争一旦爆发，就将遵循它自身的逻辑而发展。

战争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对身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来说，就更是如此。9月1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要下决心使美国避免卷入这场战争。这既是他的真诚愿望，也是因为受战前美国国会通过的《中立法》的限制，他除了让美国保持中立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中立法》的通过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国际局势空前地恶化了。1933年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时，日本军队已侵占了中国东北，希特勒刚刚在德国上台。那几年，德国和日本正逐步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美国却在孤立主义泥淖中越陷越深。

自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丹尔赛和约》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愚蠢的举动。2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一直拖欠美国的战债不还，给美国人一种忘恩负义的感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对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感，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年，美国读书月会推出一本名叫《死亡商人》的书，宣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美国的银行家和军火商为了牟取暴利，破坏了美国的中立，把美国拖进了战争。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引起了普遍强烈的反响。

在这种氛围下，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银行家、军火制造商与美国卷入一战的关系。调查的结果表明，《死亡商人》一书的主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虽然如此，调查中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仍然助长了一种普遍情绪——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美国在耗费了大量鲜血和金钱后，既未能使世界获得民主，也未能使世界获得和平，美国连借出去的战债也收不回来。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美国公众的耳边又回响起他们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忠告：少管欧洲人的那些混帐事！

随着这股孤立主义思潮的泛滥，罗斯福政府的外交主动权受到很大掣肘。1933年5月，他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对侵略国家实行武器禁运，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把这一提案修改为对交战双方都实行武器禁运，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撤回提案。1935年初，他又提出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国会批准，反而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对浪潮，反对派攻击他企图把美国引向另一次战争。

当德、意、日对外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时，美国却在孤立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5年3月16日，德国突破《凡尔赛和约》限制，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时，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如何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的中立法案。这年夏天，当日本加紧向中国的华北地区扩张时，美国国会于8月31日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规定在总统正式宣布存在战争状态后，美国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1936年2月，国会又通过了《中立法》修正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1937年5月1日，国会第三次通过了关于《中立法》的补充规定：美国与交战国的非军事贸易、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即用现金购买美国商品，用它们自己的交通工具运走，此外还禁止美国公民搭乘交战国的船只旅行。

其实，罗斯福执政初期，既不希望世界重新爆发新的大战，也不希望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当德国开始重新武装、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他一再申明，美国首先谋求的是避免战争。1936年8月14日，他在纽约肖托夸夏季讲学中心作题为《我痛恨战争》的演讲，情绪激动而真诚地说：“我曾目睹战争。我曾目睹陆战和海战。我曾目睹伤员流出的鲜血。我曾目睹毒气受害者咳嗽不止。我曾目睹死难者横尸于泥泞之中。我曾目睹城市被毁。……我曾目睹儿童挨饿，我曾目睹母亲和妻子的忧伤。我痛恨战争。我花了无数的时间，还将花去无数的时间来考虑并计划如何使我国避免战争。”

那几年，他的当务之急是推行新政、振兴经济，使美国摆脱经济大危机的困难。他的精力几乎都用到这方面去了。大量的新政立法，需要国会批准，鉴于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强大，他也不得不在外交上采取低姿态，以免开罪国会，影响新政大业。

1935年10月，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宣布实施《中立法》，对交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1936年8月，美国又宣布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翌年1月，宣布对西班牙实行武器禁运。罗斯福政府的这种政策，客观上帮助了意大利侵略者和西班牙叛军。

“隔离”演说

1936年10月25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柏林—罗马轴心协定”。一个月后，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7月7日，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北非的扩张威胁到英法的利益，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则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华的利益。大约从这时起，罗斯福已经意识到，除非采取措施制止德、意、日三国的扩张，否则它们将会瓜分世界。

那一阵子，罗斯福为了摸准美国人的思想脉搏，经常向来白宫作客的人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援助荷兰和英国？”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必。让他们去！”

罗斯福又会进一步问：“我们要不要保卫菲律宾？”

这时，既有人说“要”，也有人说“不要”。罗斯福相信，即使那些说“不要”的人，在看到日军占领美国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时，也许会改变主意的。罗斯福还会继续问：“如果日本人想占领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大多数客人都发愣，显得有些震惊；即使那些回答“我们不应该去打仗”的人，并非理直气壮。显然，绝大多数来客意识到，日本人称霸亚太地区，对美国并不是一件好事。罗斯福希望美国人逐渐摆脱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认清世界局势正日趋紧张，孤立主义对美国并非良策。1937年10月5日，他来到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一次反孤立主义演讲。他告诫美国人民，当前国际上的恐怖统治和无法无天已经“发展到严重威胁文明基础的地步”，“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但是，仅仅通过孤立和中立是达不到目的的”。他说，当人类的瘟疫开始蔓延时，居民区的人民同意并协力把温疫患者进行隔离。因而他建议采用“检疫隔离”的方式来阻止“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蔓延”。他还说，“必须奋力维护和平，美国痛恨战争，美国希望和平。因此，美国要积极致力于寻求和平。”

罗斯福本希望通过这次演讲，使美国人逐渐地觉醒过来，哪知道，这次演讲却象捅了马蜂窝一样，孤立主义势力向他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报上的评论，私人来信都骂他是战争贩子。《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他企图象当年威尔逊把美国拖入一战那样，把美国拖进新的战争。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威胁说要对罗斯福提出弹劾。罗斯福收到的大量来函来电中，有一封电报这样说道：“如果你‘痛恨’战争，请勿发表此种鼓动战争的言论。”

“隔离”演说是罗斯福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他没有料到反对之声势是如此强大。他立刻由向孤立主义的进攻转为守势，绝口不提“隔离”主张了。后来，他对密友塞缪尔·罗森曼大发感慨：“当你正试图带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的飞机击沉了停泊在中国长江中的美国炮舰“帕夸”号和两艘美国油船，2名美国水兵和1名侨民被打死，另有11人受重伤。这一事件发生后，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非常担心事态会扩大。他想起了大约40年前的“缅因号”事件。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斗舰“缅因号”在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的哈瓦那港被水雷炸沉，美国利用这一事件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格鲁捏着一把汗，以为这一次美国又要向日本宣战了。然而，受孤立主义掣肘的罗斯福政府，根本无意把事情闹大，更无意乘机对日本宣战。在日本就这一事件作了所谓解释和道歉后，危机便结束了。

进入 1938 年，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直接干涉西班牙内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引起了美国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和团体的愤怒。1 月初，国会复会时，一批爱好和平的团体指责美国现行的《中立法》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毫无助益，他们要求国会废除 1937 年 5 月通过的《中立法》，制订一项新的灵活的《中立法》，以便对侵略者实行歧视性禁运。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同情和支持。1938 年 1、5、8 月，参议员奈等人先后 3 次向参议院提出，取消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实行“现购自运”原则。罗斯福却表示，政府不能接受这一主张。他宣称，这样做会改变美国严守中立的政策，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他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施加影响，促使它否决了上述提案。

需要修改《中立法》

1938 年 9 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达到高潮，欧洲各有关国家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军事动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罗斯福深为不安，决定为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作出努力。9 月 26 日凌晨 1 时 13 分，他向德、英、法、捷等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们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危机。9 月 27 日下午，他又致电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希望他出面促成各方继续进行谈判。随后，他又直接向希特勒发出呼吁，希望他继续同其他国家谈判，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9 月 28 日，希特勒决定邀请英、法、意三国领导人举行慕尼黑会议。当罗斯福得知英国首相张伯伦决定接受邀请时，立即打电报给张伯伦，称他是“大好人”。当传来英法德意四国达成《慕尼黑协定》的消息时，罗斯福如释重负。

然而，这种虚幻的安全感持续时间不长。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对罗斯福说，希特勒一心要征服世界，绝不会以攫取捷克为满足。驻法大使布利特从巴黎报告说，法国总理达拉第预测，在 6 个月内，德国将提出新的领土要求。给罗斯福印象最深刻的，是英国保守党议员、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以“苦酒”作比喻，发表的那一番讲话。丘吉尔认为，这一次仅仅是“第一口苦酒”，民主国家若不奋起反击，希特勒的这苦酒杯还将年复一年地递到我们嘴边。果然，1938 年 10 月 9 日，希特勒又宣布加强德国西部的防御工事，造成新的紧张气氛。罗斯福很快意识到，慕尼黑会议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危险，它只是战争威胁中的一个插曲，民主国家若不面对现实、重整军备，就会尝尽希特勒制造的一杯杯苦酒。

1938 年 10 月 11 日，罗斯福宣布，将增加 3 亿美元的国防经费。10 月 14 日，他又对报界宣布说，他可能再次要求国会增加 5 亿美元的国防经费。11 月 14 日，他在政府会议上表示，希望尽快使美国具有年产 1 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他说：“我曾致函希特勒，敦促他坐下来谈判，但现在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引以为荣。”“那或许在眼下拯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但却可能在日后导致更多的生灵涂炭……。假如我们早在今年夏天就已拥有 5000 架飞机，假如我们马上就具有年产 1 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希特勒就不敢坚持他以往的立场。”

此时，罗斯福已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对美国安全来说，大西洋这道天然屏障的可靠性正日益下降，美国的命运与欧亚大陆的命运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已得知，德国拥有 2000 架航程达 3300 英里的飞机，可以直接从非洲西海岸飞临美洲各国。

1938年11月，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鉴于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鉴于科学发展对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我们国家同这个我们居住的大陆……相关的整个方针都不得不改变。”“任何可能发生的攻击，已迫在眉睫，而5年前，20年前或50年前则不是这样的。”为此，他要求美国军方把美国的国家军事计划转变为整个西半球的防御计划。

1938年3月，奥地利已被德国吞并。慕尼黑会议之后，到1939年初，眼看捷克斯洛伐克又将被德国肢解。这时，罗斯福对西班牙的命运越来越关注，他不愿意再看到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沦为德国的附庸国。他很清楚，对西班牙共和国最有力的支援，莫过于撤销对它的武器禁运，为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可是，《中立法》设置了巨大障碍，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必须修改《中立法》。

1939年1月4日，他在国会作国情咨文报告时指出：“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试图审慎地制定《中立法》的时候，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就可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合理——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援助。我们自卫的本能提醒我们：这类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这时，西班牙内战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支持共和派和主张支持叛军的势力都很强大。美国国会为了避免麻烦，决定暂停审议修改《中立法》和对西班牙禁运法案。罗斯福无能为力。1939年4月3日，西班牙叛军攻陷马德里，共和国被推翻，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罗斯福无可奈何，便仿效英、法，承认了佛朗哥政权。

在此之前，罗斯福于1939年3月7日对记者们说，过去的3年中，《中立法》对和平事业没有作出什么贡献，相反，它却同和平事业背道而驰。

1939年3月中旬，法西斯德国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促使罗斯福决心尽快修改《中立法》。3月16日，他对参议员汤姆·康纳利说：“假如德国人侵犯一个国家并宣布战争，而我们仍然实施中立法案，那就站到了希特勒一边。如果我们能够解除武器禁运，情况就不致于这么糟”。第二天，他对报界说，“过去几天内欧洲事态的发展表明，我们需要修改中立法。”

“老板，你的票数不够”

1939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敦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了一项《中立法》修正案，它取消了强制性的武器禁运，规定所有的贸易按“现购自运”原则进行。如果这项修正案得到国会批准，就可以保证，一旦战争爆发，英法能利用它们强大的海军优势控制大西洋航道，从美国购得武器和其他商品。这比1937年通过的《中立法》自然是一大进步。

可是，罗斯福对这项修正案并不满意。他认为，它虽然有利于英法，却不利于远东的中国，因为中国既无充足的现金购买，也没有强大的商船自己运输，更没有强大的海军为其护航，相反，它可能更有利于日本。3月28日，他给国务院的赫尔和韦尔斯写信说：“现购自运的办法用于大西洋将是十分正确的，而用于太平洋则是完全错误的。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深信不疑。现存的《中立法》应该完全彻底地予以废止，而不是需要再搞别的法案去代替它。”

然而，皮特曼参议员回答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连“现购自运”的方案都未必能通过，想完全废止现行《中立法》断乎不能。罗斯福无可奈何，只好退而求其次，争取国会先通过皮特曼提出的《中立法》修正案。

此时，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希特勒在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波兰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得到了英、法提供的安全保证。希特勒气急败坏，于1939年4月1日发表了富有威胁性的讲话。英法紧张不安，秘密地提醒美国注意：德国随时可能发动进攻。4月7日，意大利又侵占了阿尔巴尼亚。这时，布利特又从巴黎报告说，法国外交部长博内“要求我通知我国政府，‘现在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很难预料第一次攻击将在什么地方爆发……。但是，很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决计要发动突然袭击；现在，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和地点问题了。”

罗斯福比以往更迫切地感到需要修改（最好是废除）《中立法》。在4月8日、11日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上和4月14日的泛美日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美国需要丢开那张“不参与战争的保证书”——《中立法》，挺身而出，并和英法结盟。4月15日，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出保证，至少在10年内不进攻和入侵他列举的31个国家及其属地。结果却招来希特勒的一番挖苦嘲讽。他把罗斯福大肆奚落了一番，说罗斯福的要求是“对世界平静乃至和平的攻击”，他让罗斯福等所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扪心自问，美洲有多少国家被血腥征服，至今仍在那些民主国家的控制之下。

此后，罗斯福断定，对付希特勒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修改《中立法》，给英国和法国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

此时，美国国会议员中，在修改《中立法》问题上，有不少人赞成，也有不少人反对，还有不少人犹豫不决。国务卿赫尔不禁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位学校董事会董事考一位名叫汤米的小学生的数学才能：“汤米，如果羊圈里有16只羊，有一只跳出栏杆跑了，还剩下几只？”汤米回答说：“一只不剩”。董事说：“哦，我看你对数学一窍不通吧！”汤米又说：“问题是你对羊一窍不通！”言下之意，如果有一只羊跑了，其余的羊也会跟着跑掉。赫尔觉得，在修改《中立法》问题上，罗斯福政府对国会中的“一群羊”会跟着“领头羊”朝哪个方向“跳”，没有多大把握。

为了做好“领头羊”的工作，罗斯福在白宫悄悄地会见了一些摇摆不定的国会议员，5月19日又同众议院领袖们开会。5月27日，赫尔国务卿又写了一封分别致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公开信。此外，罗斯福还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做了一项政治交易：1939年春，皮特曼曾敦促政府提高对白银矿业的补贴，以减少西部各州的失业现象，当时，罗斯福拒绝了这一建议。现在，皮特曼表示，在罗斯福采纳他的白银政策之前，他拒绝向由他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修改《中立法》议案。如果该委员会不通过这项议案，就无法把它提交到参议院表决。罗斯福只好对他让步，同意提高国内的白银价格，皮特曼则答应帮助总统使《中立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1939年7月11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罗斯福提出的修改《中立法》议案举行表决，结果以12票反对、11票赞成否决了罗斯福的要求。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罗斯福恼羞成怒，对财政部长摩根索说：“我愿拿我的老本打赌，……当希特勒一觉醒来，得知发生的事时，意大利和德国的兵营里就会欢喜若狂。我想我们真应当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为奥斯汀、范登堡、洛奇和塔夫脱等参议员（反对修改《中立法》者）在柏林竖立铜像，并授予字

党徽。”他还想公开地发泄他的愤怒，国务卿赫尔劝他要克制，小不忍则乱大谋。

罗斯福克制住了。可几天之后，赫尔自己却克制不住了。

7月18日，罗斯福再次召见一些有影响而又顽固的参议员，几乎是乞求性地说：“我连最后一发子弹都打出去了，现在我得在弹带上取出一发来。”他希望这些议员们支持政府关于修改《中立法》的议案。然而，这些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却无动于衷。博拉参议员还声称：“我相信，近期内不会爆发战争。德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

赫尔表示，博拉的话是不准确的，从国务院获得的情报来看，他预计，战争可能在夏末爆发。

博拉却态度粗暴地说，国务院的情报不足为凭，我有我个人的情报来源，“我的情报比国务院的更为可靠”。

赫尔一贯涵养很深，加之资历很老，年龄很大，因而很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博拉闭眼不看事实的说法早已使他气愤至极，博拉关于国务院的情报不可靠的说法，被他视为是对他这位国务卿个人的侮辱。他感到难以克制，眼中噙着泪水，几乎不能继续参加会议。

副总统加纳问大家：修改中立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在场的参议员们几乎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加纳便对罗斯福说：“老板，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的票数不够。”

罗斯福和赫尔始终忘不了这一幕。稍后，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再次发生国际危机，“我实际上毫无权力使美国作出努力，以防止一切战争的爆发。”

于是，罗斯福拖着《中立法》这副沉重的枷锁，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舞台。

《中立法》的修改

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决心使美国避免卷入战争，但同时也不希望保持绝对的中立。1939年9月3日，他发表“炉边谈话”，对美国公众说：“我们这个国家将是一个中立国家，但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是中立者，也有考虑事实的权利；即使是中立者，也不应该要求他闭上眼睛，昧着良心……我希望美国能避免这场战争。我相信它能避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再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尽一切努力。”

这时，关于举国上下盛传着美国军队将被派往欧洲战场的谣言，孤立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因战争爆发而有所收敛。罗斯福感到，必须正式宣布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他同时也感到，无论是从道义上讲，还是从美国根本利益考虑，美国都应该援助英国和法国。为了让英法把在美国订购的一批军火及时运走，他决定推迟几天发表中立宣言。直到9月5日，美国才正式宣布保持中立。

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推进之迅速。其“闪电战”对波兰打击之沉重，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战争爆发仅一周，波兰的失败已成定局。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狂妄叫嚣，摧毁波兰后，德军将迅速地对英法实施粉碎性空袭。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提醒政府说，如果不修改《中立法》，势必导致盟国的迅速失败。驻英国大使肯尼迪亦报告说：“英国人因美国必须实施旧的《中

立法》而引起之意气沮丧，无法用言词表达”。

英法若迅速败降，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鉴于局势的严重性，罗斯福认为，修改《中立法》已刻不容缓，无论如何不能等到1940年1月召开例行国会会议时再审议。9月13日，他宣布于9月21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审议修改《中立法》问题。

美国国会以及公众舆论，在是否应修改《中立法》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对抗。赞成修改的人组成了“立即支援盟邦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战争的爆发也使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们同意撤销武器禁运，赞成制定以现购自运为原则的新《中立法》。反对者组织了“美国绝不参战运动”，在库格林神父、查尔斯·林白上校和参议员博拉、范登堡等孤立主义者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中立法》运动，仅3天之内，国会办公室就收到了1万多份函电。另有一些参议员们在一天之内共收到了4000多份信函。

专栏作家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过去曾向罗斯福提供过不少准确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次，他又长途跋涉2000英里，走遍南部和中西部8个州作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对是否应修改《中立法》，赞成与反对两派势均力敌；人们普遍认为，英法德之间正在打一场“假战争”；另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总统正在打欧战这张牌，目的是赢得1940年的总统大选。

形势不容乐观，罗斯福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顺利地实现修改《中立法》，他采取了如下策略：把两党合作和使国家避免战争定为争取修改《中立法》的基调。他安排杰出的共和党人阿尔夫·兰登、亨利·史汀生和《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行人弗兰克·诺克斯上校同孤立主义者论战，邀请他们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参加白宫的一些会议。在公开场合，他反复声明，决心使美国避免战争。

9月21日，他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各政党各派系在和平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修改《中立法》将更有利于美国避免战争。他说：旧的《中立法》不禁止出售“半成品的战争工具”，当此类物资由美国船只运往交战国时，就肯定会危及我们的中立和安全。如果废止武器禁运、按现购自运原则出售所有物资，再加上禁止美国商船和公民进入交战区、禁止向交战国提供战时贷款，就能最有效地保障美国安全，使我们避免战争。为了给那些动摇不定的国会议员吃一颗定心丸，他强调说：“我们的法案必须以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为指导——使美国避免这场战争。”

为了避免使公众产生修改《中立法》是使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步的印象，罗斯福处处谨慎小心。他暂时抵制了大力扩充美军的合理要求，抵制了加速工业动员的合理建议，暂时中止了在经济财政方面的战备工作，并尽力制止一切关于战争的言论。当英国自治领——加拿大总督希望秘密访问华盛顿时，罗斯福和赫尔断然加以拒绝，要他等国国会就修改《中立法》表决之后再谈。罗斯福在回信中解释说：“我真是如履薄冰啊。当我值此已向国会提出咨文和修改《中立法》的问题获得通过大有希望时，我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人也不见，什么意见也不听。”

尽管如此，反对修改《中立法》的呼声仍然很高。国会收到的反对修改《中立法》的信件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孤立主义势力继续在全国大造声势，散布恐怖性的言论，广播电台成为他们经常利用的宣传工具。

他们把废止武器禁运说成是“奔向战争征途的第一步，亦即美国的子弟奔向欧洲战争征途的第一步”，有人在演讲时，捶胸顿足地叫嚷：“反对把美国母亲的儿子们送往欧洲战场。”

对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煽动，罗斯福给予了坚决抨击。他反复声明，政府丝毫无意把美国的子弟送往欧洲去打仗。他还鼓励他的支持者，共和党人艾伦·怀特等人组织了全国性、非党派的“修改中立法争取和平委员会”，宣传废除武器禁运是维护美国和平环境的最好办法。

为了防止反对派议员在国会节外生枝，阻挠通过修改中立法议案，罗斯福让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加纳要求参议院领袖们一言不发，避免同反对派议员辩论，同时却把每天开会时间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以防反对派议员搞马拉松式的演讲和辩论。他还亲自出面，成功地阻止了一些人用其他问题来干扰这次国会特别会议。10月27日，即参议院表决的当天，加纳向他汇报说，修改《中立法》议案可能以超过必要票数20到40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罗斯福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要求他的支持者们继续做游说工作。

10月27日，参议院以63票对30票通过了修改《中立法》议案。6天以后，众议院以243票对181票的绝对多数也通过了修改《中立法》议案。11月4日，罗斯福签署了新的《中立法》。新《中立法》取消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条款，规定了“现购自运”原则，即允许交战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武器，用它们本国的船只运输；还规定由总统确认世界战争的作战区和禁止美国船只进入的区域。

表面上，新《中立法》对英、法、德及其他交战国一视同仁，实质上并非如此。德国的海军力量远远不及英法，大西洋上的制海权掌握在英法手中，德国即使有现金向美国购买，也无法自行运输。丘吉尔说：“由于只有英国和法国才拥有制海权，因而只要他们有美元现金，就能自由自在地运输。”事实上，罗斯福费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国会修改《中立法》，就是要为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帮助。

第四章 东方战线

希特勒：“当我们在西方达到目的之后，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进攻俄国。”。

斯大林：“芬兰战争的一个结果对苏联军队进行重新组织……”
东方战线的构筑完成，将使德军进攻苏联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四次瓜分波兰

1939年9月1日凌晨2时，斯大林接到报告说：前一天，波兰军人冲进德国边境小城格莱维茨，抢占广播电台，击毙了数名德国职员，用波兰语号召对德国进行战争……。斯大林一眼便认走：这是希特勒为入侵波兰制造的借口。

清晨，斯大林果然又接到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的电话：“德国国防军已入侵波兰。”

随后，他又收到了更详细的报告。他突然想起了不久前莫洛托夫与波兰驻苏大使的谈话。当时，苏联希望签订波苏互助条约，以共同对付德国，可波兰人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波兰大使说：“波兰认为不可能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是由于波方实际上无法向苏联提供援助……”。斯大林很清楚，波兰大使的这番话是委婉的借口，波兰政府根本无意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根本不希望苏联向波兰提供安全保障，苏联同英法的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波兰人从中作梗，坚持拒给苏军提供过境权。以贝克上校为代表的波兰领导人，对波兰军队的实力、对英国给波兰提供的安全保障，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加上历史上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使他们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得目光短浅，不重视改善波苏关系，而是舍近求远，一味地求助于英国和法国。现在，大祸终于降临到了波兰的头上。怪谁呢？斯大林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波兰人咎由自取。

斯大林认为，波兰军队远远不是德军的对手，波兰最终必然会投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波兰毕竟有3400万人口，100万军队，其军事装备也比较先进，斯大林相信，更希望波兰能抵抗一段时间，大量地消耗德军的实力。

然而，德军在波兰进展神速，希特勒第一次向世人显示了德军闪电战的巨大威力。战争爆发后，波兰的绝大部分飞机都在地面上被摧毁了，通讯联络系统也被摧毁了，波兰各防区的军队遭到德军的分割包围。9月5日，波兰政府被迫决定撤出首都华沙。第二天，波军被迫下达了总退却的命令。9月8日，德军已经抵达华沙郊区，波兰的沦亡指日可待。

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宣而不战，西线依然无战事。事实上，由于德军闪电战的强大威力，即使英、法宣战后立即在西线采取军事行动，对波兰来说，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挽救不了波兰失败的命运。

德军在波兰的迅速推进，有些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同时也把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了他的面前：苏联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战争爆发前夕，苏德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还签订了一项《秘密附加议定书》，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其中规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立陶宛北部边界为界线，界线以北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立陶宛属于德国的势

力范围；在波兰，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散河一线为界，界线以东属苏联的势力范围，界线以西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东南欧，苏联提请德国注意它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利益，德国表示，在政治上，它对这一地区完全不感兴趣。

德军入侵波兰后，从9月3日起，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多次催促苏联，根据上述协定，派军队进入波兰东部。

最初，斯大林采取了观望态度。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出兵波兰，而是什么时候出兵，以什么理由出兵。斯大林对历史相当熟悉。他知道，当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就是取道波兰开始的，现在，苏军一定要堵住德军入侵苏联的这条通道，为此，出兵波兰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波兰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斯大林也清楚，历史上，沙皇俄国曾3次同普鲁士瓜分波兰。一百多年来，波兰人一直恨俄国人，这大概也是他们拒绝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拒绝让苏军过境的历史原因。这次再出兵波兰，等于是同德国人第四次瓜分波兰，必须谨慎行事，找一个适当的借口。

9月5日，莫洛托夫正式答复德国；苏联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兵波兰，但这一时机现在尚未成熟，操之过急会有损于苏联的利益，希望德军遵守秘密协定划定的瓜分波兰的分界线。

9月8日，德军抵达华沙郊区后，里宾特洛甫又发来急电：战事进展神速，出乎预料，德国希望知道苏联的军事意图。第二天，莫洛托夫又搪塞了一下：苏联将在最近几天内采取行动。

实际上，斯大林还在等待时机。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指责为侵略者，他不想在波兰抵抗彻底崩溃之前动手，但又不能等到波兰军队正式宣布停战后再动手，那样就师出无名了。他希望，苏联红军最好是在波兰首都华沙陷落之后、波兰政府宣布停战投降之前出兵波兰，理由是：当波兰瓦解时，苏联有责任援救波兰东部受到德军威胁的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还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它的领土分别由沙皇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获得独立。独立后的波兰立即参与了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21年3月，苏俄同波兰签订里加条约，规定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分成两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其余部分留在苏俄境内。斯大林认为，里加条约是在苏军失利的条件下签订的，并不公正，在目前波兰面临瓦解的形势下，苏联出兵波兰的最好理由，是援救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使他们与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重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苏联可以作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解放者出兵波兰。

9月14日，莫洛托夫问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德军何时可以攻陷华沙？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这一问题回电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就可以占领华沙，欢迎苏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希望苏联尽早确定出兵波兰的时间。

9月16日，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舒伦堡，宣布苏联即将出兵波兰，也许在明后天，苏联将提出以下出兵的理由：由于波兰已趋于瓦解，第三国可能会乘机浑水摸鱼，苏联有责任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

舒伦堡一听就明白，苏联是想以防范德国作为其出兵波兰的借口。他表示不能接受。

9月17日下午2时，斯大林亲自接见舒伦堡，告诉他说，苏军将于下午6时起越过苏波边界，并表示，同意修改苏军出兵波兰的缘由的提法。随后，

莫洛托夫在广播讲话中说：“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在何处。波兰人民被他们倒霉的领导人交由命运任意摆布……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同胞和白俄罗斯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红军总指挥部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天，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东部。波兰军队腹背受敌，更是难以招架。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波兰政府被迫逃离本国，几经辗转，最后流亡伦敦。9月28日，德军占领华沙。

苏军进入波兰后，一周之内向西推进了250—350公里，大致抵达了苏德在波兰划定的分界线，而德军已经越过分界线，占领了原划定给苏联的部分地区。这时，斯大林并不想固守苏德秘密附加议定书规定的界线，而是想把分界线以东波兰民族聚居的地区划给德国。他懂得如下道理：波兰人丧失独立后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为恢复独立坚持不懈地斗争，那么就让希特勒去背这个包袱吧，苏联只需要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不过，把这条原已划定的分界线向东移动后，应让希特勒为此给苏联提供报酬：把原划给德国势力范围的立陶宛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在斯大林看来，就对苏联的安全而言，立陶宛比整个华沙省和卢布林省的地位更重要。9月25日，斯大林会见德国大使舒伦堡时，提出了这一建议。

9月27日下午6时，里宾特洛甫再次飞抵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第二天，双方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规定把波兰民族居住的地区划归德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苏联。新的秘密议定书规定：立陶宛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如愿以偿。1939年11月1日和2日，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分别并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波兰第四次被瓜分了，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有了共同边界。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斯大林看来，历史上西方列强入侵苏联有3条主要通道：正西面经过波兰，西北部经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南面经过巴尔干地区。苏军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只是巩固了苏联正西面的边境安全。为了巩固、加强苏联西北边境的安全，必须调整苏联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与芬兰的关系。

说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芬兰，斯大林的心情是复杂的。十月革命之前，它们都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十月革命胜利后，它们才先后获得独立。而它们的独立，与斯大林有着直接关系。

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革命导师列宁清楚地认识到：要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健康地发展，必须很好地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大约在1912年前后，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俄国的民族问题上存在着混乱思想，必须加以澄清。鉴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列宁把从理论上阐述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的任务，交给了出身于格鲁吉亚族、精通高加索地区民族事务的斯大林。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举行党代表大会，由于列宁的坚持，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2月份，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民族问题时说：“我们找到了一位出色的格鲁吉亚人（指斯大林—引注），他已经答应在收集了所有奥

地利和其他方面的材料以后为《启蒙》杂志写一篇长文章。我们要重视这件事。”

1912年底至1913年1月，斯大林住在维尔纳，集中精力撰写了列宁所说的“长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主张：每个被压迫民族都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甚至有权自由地脱离俄国，组成独立国家，解决俄国境内民族问题的办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篇文章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此时，斯大林才33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让斯大林担任了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并着手按照《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的主张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1917年11月2日（俄历），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指出：“俄国各民族有自由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分离组成独立的国家”。

1917年11月27日，斯大林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他代表苏俄政府宣布：“芬兰人民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安排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不应该对芬兰人民实行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这一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917年12月31日，苏俄政府通过了《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决定》。

芬兰脱离苏俄而独立时，政权落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攻击上述政策为“出卖”俄国，是对小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毫无意义的让步。1918年1月4日，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芬兰独立的情形表明，实际上苏俄政府把自由交给了芬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交给芬兰人民，不是交给芬兰无产阶级的代表。”芬兰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从俄国社会主义者手里取得了独立。”他认为，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在于芬兰社会民主党人“优柔寡断和令人不解的怯懦”。虽然出现了这种结局，他认为，苏俄政府也不应背弃自己承认芬兰独立的诺言，不应放弃民族自决原则。他的主张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然而，在俄国境内，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要求脱离苏俄而独立，尤其是马克兰的中央拉达，不仅要求独立，而且奉行反对苏俄和乌克兰苏维埃的政策，给苏俄政府提供了教训。斯大林在民族自决原则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1918年1月18日，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1918年12月份，苏俄政府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又承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脱离苏俄而独立。然而，1919年初，当苏维埃俄国受到协约国包围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苏维埃政权也被颠覆，协约国和德国占领者在这三个国家扶持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这三个国家便追随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参与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1920年，苏维埃俄国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年的2、7、8月，苏俄先后同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订了和约。

30年代末，随着法西斯德国对外侵略扩张活动的加剧，斯大林感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有可能再次成为德国入侵苏联的跳板。这三个国家自身是无力抵御德国入侵的，正因为如此，战前爆发之前，苏联在与英法的谈判中，坚持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可是，英法拒绝了苏联的这一建议，这也是导致苏、英、法三国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

希特勒在入侵波兰之前，为了暂时稳住苏联，满足了苏联的要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规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立陶宛却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入侵波兰和苏军进入波兰东部后，斯大林希望德国把立陶宛让给苏联，苏联宁愿把波兰东部的领土让出一部分给德国，希特勒也同意了。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满足了苏联的愿望。在希特勒看来，通过这些让步换取苏联的暂时中立是值得的，无论德国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怎么划分，德国最终是要征服东欧、征服苏联的。

苏联并不满足于德国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意识到，仅靠与德国的秘密条约，是不足以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变成保卫苏联西北边境的安全屏障的，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为此，苏联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建议，分别与它们签订互助条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接受了苏联的建议。1939年9月28日、10月5日和10月10日，苏联分别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根据条约，苏联获得了在这些国家驻军和修建军事设施等权利。这对于巩固苏联西北边境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苏芬战争

位于苏联西北部的列宁格勒，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十月革命的摇篮，苏联巨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然而，它离苏芬边界只有32公里，若敌国军舰进入芬兰湾，它便处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天下太平时，倒也无须多虑。当法西斯德国到处侵略扩张时，斯大林不得不为列宁格勒的安全担忧。

为了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御，使苏芬边界线离列宁格勒的距离远一些，1938年，苏联曾向芬兰提出，希望能租借芬兰边境地区的一些领土，希望苏芬两国就签订互助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然而，芬兰虽然是十月革命后脱离苏俄而独立的，可对苏联似乎并无好感，在苏德之间，明显地更重视发展同德国的关系，因而拒绝了苏联的上述要求。

1939年3月，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租借芬兰湾内一些对列宁格勒防御极为重要的芬兰岛屿，再次遭到了芬兰拒绝。德国入侵波兰后，列宁格勒的防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1939年10月5日，苏联又一次建议苏芬双方就租借领土问题举行谈判。芬兰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两国于10月11日开始谈判。苏联建议两国签订互助条约，芬兰表示不感兴趣；苏联希望芬兰把靠近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土租给苏联，遭到芬兰拒绝；苏联建议用自己5523平方公里的领土交换芬兰2761平方公里的领土，即用整整多于芬兰一倍的领土来进行交换，芬兰人并不动心。总之，芬兰人寸土不让，斯大林无可奈何，谈判毫无进展。

然而，斯大林不会就此罢休，他决不会置列宁格勒的安全于不顾，芬兰人既然敬酒不吃，就给他们吃罚酒。他觉得，历史似乎在同他开一种恶意的玩笑：当年是他本人宣布允许芬兰脱离苏俄而独立的，如今，他又决定向芬兰宣战。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声明，废除苏芬两国1932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11月30日，苏军向芬兰发动了进攻，从而爆发了一场苏芬战争，又称“冬季战争。”

在斯大林看来，以实力强大的苏军，收拾小小的芬兰，无异于囊中探物。因而，他下令，在莫斯科由参加共产国际的芬兰共产党代表成立以奥·维·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等苏军打败芬兰军队后，由这个政府取代芬兰的现政府。12月2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同库西宁签订了《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

可是，在战争初期，芬兰军队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顽强抵抗，阻止了苏军的进攻，直到年底，依然坚守着著名的“曼纳兴防线”。苏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西方各国舆论普遍站在芬兰人一边，反苏情绪强烈，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12月14日，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与芬兰订有互助条约的英法甚至准备向苏联宣战，15万远征军整装待发。美国也准备向芬兰提供大规模援助。对于苏军进攻受挫，英法等国都公开地幸灾乐祸，而德国人也暗自窃喜。

苏军进攻受挫，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使他感到震惊和耻辱。他恼羞成怒，几次把制定作战计划的麦烈茨科夫将军召回莫斯科训话，又任命铁木辛哥元帅为前线总指挥，命令重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采取坚决的步骤”，突破曼纳兴防线，打败芬兰军队。

苏军精心地准备了一个月，于1940年2月11日，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重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以惨重伤亡为代价，突破了芬兰的“曼纳兴防线”。芬兰军队顶不住了，1940年3月8日被迫求和。3月12日，苏芬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规定苏芬之间的边界向北移动约150公里，苏联占领了芬兰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它原来要求租借的芬兰领土规定了租借条件，原来要求交换的芬兰领土划归了苏联，但苏联原先答应给芬兰的领土却一字未提。斯大林果然让芬兰人尝到了“罚酒”的味道。不过，他放弃了推翻芬兰现政府，由库西宁回芬兰组织新政府的计划。

苏芬边界的变动，使列宁格勒的防御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军队大清洗的后果

列宁格勒的防御条件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苏芬战争暴露出了苏军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不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军队在苏芬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苏联复杂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约从2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就完全掌握了苏联军权。那时，苏军实力很弱，而苏联却处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在斯大林看来，苏联随时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危险，要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于是，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很快。1933年，苏联的陆、海军军费开支为14.3亿卢布，到1940年增加到568亿卢布。1934年，苏军兵力有94万人，到1938年，超过了420万人。到30年代后半期，苏军实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

斯大林为苏军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几乎每天都要抽几个小时用于研究、考虑军队建设问题。他非常重视军队的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军队干部必须懂专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给他们优厚的待遇。

然而，在30年代后期的肃反过程中，苏联红军成为斯大林肃反的重要对象，其实力遭到巨大削弱。

斯大林认为，象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内部一样，苏联军队中也存在着反对他的强大势力。他决心肃清军队中一切可能的反对派和不可靠的因素。1937年6月，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代表的8名高级将领被处决，从而开始了军队中的肃反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的高级将领首当其冲。据统计，截止到1940年，苏军各军区司令员全部撤换，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更换了90%，军、师级指挥员和参谋长更换了90%。5名元帅中有3人、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有13人、85名军级干部中有57人、196名师级干部中有110人、406名旅级干部中有220人都被清洗掉了。由于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中共有约3万多名军官遭到清洗，军队干部队伍几乎完全被毁了。

到了1939年，斯大林已经意识到，苏军建设中，充实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重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于是，许多年轻、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官得到突击提拔，同时，军队中的肃反活动开始降温。1939年6月，他收到的一份报告说，苏军各军区仍有大量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案件，其中莫斯科军区有800起、北高加索军区有700起、哈尔科夫军区有500起、西伯利亚军区有400起。此时，在战争危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斯大林比较慎重，下令再次复查，以便“发现错误和诬陷”。此后，军队中的肃反势头才逐渐减弱。

3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斯大林对苏联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担忧，他不仅意识到苏军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素质很低，还认识到苏联的军事思想严重地落后于时代，依然过于相信内战中的经验，对现代战争缺乏系统、科学的研究。为此，他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为首，检查陆、海军的建设工作。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深入研究现代战争中有效使用军队问题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大量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干部充斥部队使得情况更加严重。

为了缓解军队干部奇缺的矛盾，斯大林指示，增加现有军事院校在校学员的人数，并迅速地建立新的军事学校。根据这一指示，仅1940年，苏联新建军事学校42所、军事院校的系几乎增加了1倍，同时还举办了大量的培训少尉级干部的短训班。

可是，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损失太严重了，难以在短期内弥补。可以用短训班的形式尽快培养出一大批连、排级指挥员，可是，军长、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之类的高级将领，是不可能靠短训班培养出来的。

整顿军队

苏芬战争初期苏军进攻严重受挫，使斯大林既蒙受了巨大耻辱，也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苏联红军建设中潜藏着的巨大危险。他下决心大力整顿军队。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他曾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在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中，苏联军队表现得非常涣散松懈，仗打得很糟；芬兰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对苏联军队进行重新组织……”

1940年4月14日至17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联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对苏芬战争作了系统深入的总结。苏军各部门领导人、高级将领参加了这次总结会议。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作了题为《同芬兰战争的教训》的总结报告，其中谈到了苏军最初失利的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应承担的责任。他说：“应该说，无论是我——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还是列宁洛勒军区司令部，起

初都完全想象不到这次战争的全部特点和困难。……芬兰军队组织得不错，他们针对当地条件和任务进行了武装和训练，作战机动、抵抗顽强、纪律严明。”在谈到苏军最初进攻受挫的原因时，他说，事先侦察没有搞好、军队技术装备落后、兵团的组织臃肿、部队冬季着装和伙食很差都是造成进攻失利的因素，而归根到底是缺乏合格的优秀的指挥员，“许多高级将领都不怎么行。总军事委员会不得不撤换许多高级指挥员和参谋长……”

在总结报告中，伏罗希洛夫没有忘记歌颂斯大林几句：“红军比较迅速地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从战争一开始直到胜利结束，斯大林同志负起了实际上领导这场战争的责任”。他的本意是歌颂斯大林，可这句话产生的实际后果是：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斯大林也应负责。斯大林有口难言、好不恼火。这一次，伏罗希洛夫拍到马腿上去了。

其实，苏军在最初进攻中受挫，斯大林的确应负一部分责任。苏军初期进攻受挫的重要原因是轻敌，当时军队将领们的轻敌思想与斯大林有直接关系。苏芬战争爆发之前，苏军杰出的将领，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曾警告说，如果对芬兰军队实力估计不足，将会很危险。可斯大林听不进这句忠告，他干脆不让以沙波什尼科夫为首的总参谋部制订作战计划，而把这一任务直接交给列宁格勒军区。结果，沙波什尼科夫的话不幸言中。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的总结会议，自然不能总结斯大林的责任。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应当“痛斥对内战经验的崇拜，它使我们总是处于落后状态。……我们的指挥人员中存在着内战参加者称霸的情况，这些人不可能让年轻干部有晋升的机会。”他号召军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要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结会议在作出的结论中指出：在芬兰取得的胜利，使苏军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高牺牲。苏军的武器、部队的编制、训练工作、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进。

随后，苏军建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恢复了军衔制和军事指挥员一长制，政治委员从属于军事指挥员；开办了大量的军官短训班；肃反中已被判刑的4000多名军官被重新召回部队服役，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罗特米斯特罗夫和托尔布欣等一批杰出将领，他们后来成了苏军元帅。一年半之前曾解散了坦克军，1940年6月6日又决定重新建立机械化军。

此外，斯大林为了改变军队中“内战参加者称霸的情况”，改变苏军“对内战经验的崇拜”，作出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撤换了苏军两个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伏罗希洛夫被解除了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由铁木辛哥接替他。这项人事变动是斯大林重振苏军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从个人关系看，伏罗希洛夫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关系始于内战时期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中。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是一个受人爱戴、赤胆忠心的人。可是从3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又逐渐意识到，他的这位老战友过分相信内战中的经验，墨守成规，对现代化战争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应有的敏锐和重视。斯大林曾多次批评过他，但收效不大。斯大林认为，苏芬战争初期的失利与他有很大关系。有一次，斯大林对朱可夫谈起伏罗希诺夫时说：“他当时夸下海口、拍着胸脯，坚定地表示，‘要以三倍的打击来回报，一切都挺好，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准备好了，斯大林同志！’可结果……”斯大林显然对他已失去了信心，不过，对他的这位老战友还算比较客气，在解除了他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后，任命他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明升暗

降。

此外，斯大林还解除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军人，早在1903年就在沙俄军队中当上了军官。不过，他并不守旧，而是视野开阔、思维敏锐，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对军队中总参谋部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20年代撰写了《军队的大脑》一书，对军队中总参谋部的建设等问题作了精辟阐述，对苏军建设有很大指导意义，该书成为斯大林案头必备的军事理论著作之一，他为人谦虚宽厚、尊重部下、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是一位典型的儒将，是苏军中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列宁逝世后，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中，斯大林崇敬的人为数很少，沙波什尼科夫便是其中之一。苏芬战争爆发之前，他就敲过警钟，希望苏联不要轻敌。严格地说，他对苏军在战争初期受挫是不应负责任的。斯大林之所以决定解除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苏芬战争后的形势需要更换苏军的整个领导班子；二是沙波什尼科夫年龄大、健康状况不佳，难以适应总参谋长职务应承担的具体繁重的工作；三是斯大林决心提拔年轻人。不过，斯大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帅也没有采取一撤了之的简单做法，而是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现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自芬兰战争以来，军事领导工作已经作了彻底的变动”。此外，斯大林仍然很珍惜他的军事才华，继续保留了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以便让他发挥余热。

接替沙波什尼科夫出任总参谋长的是麦列茨科夫。他是一个粗暴、草率的军人，与前任的工作作风完全不同。事实表明，这一次，斯大林没有看准。

“红军”与“蓝军”

为了提高苏军的战斗力，让各级指挥员获得指挥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苏军加强了训练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0年12月进行的那次演习。

这次演习的第一阶段，是在莫斯科召开军事会议，探讨军事理论问题，制定演习方案。然后转入第二阶段：在野外进行大规模的对抗性军事演习，把军事理论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去。这次演习是按照德军进攻苏联的假想进行的。“蓝军”是假想中的德军，由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大将指挥。“红军”是假想中的苏军，由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指挥。野外演习分两场，第一场由“红军”进攻“蓝军”，第二场由“蓝军”进攻“红军”。

这次演习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野外演习结束后，又在莫斯科集中进行讲评和总结。第一次讲评结束后，各军区司令员们正准备离开莫斯科时，突然于1941年1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进行第二次讲评和总结。斯大林亲临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政府成员们以及所有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

苏军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作总结报告。他说，在第一场演习中，“红军”60—65个师的兵力，成功地突破了“蓝军”55个师的防线。斯大林表示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按一般的军事常识，进攻一方的兵力优势这么小，是难以突破对方防线的。麦列茨科夫解释说，演习是按照苏军野战条例进行的，在起草苏军野战条例时，我们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即我们的一个师比德军的一个师要强大得多，在发生遭遇战时，无疑能打败德军；在防御时，我军一个师能打退德军两三个师的冲击；在进攻时，我军一个半师能攻克德军一个

师的防御阵地。

对这种主观主义式的解释，斯大林很不以为然。当麦列茨科夫开始讲述第二场演习时，斯大林用挖苦的口气问：“唔，这一次谁胜了呢？可能‘红军’又胜了吧？”

麦列茨科夫听出斯大林话中带刺，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在军事演习中，不会出现明确的胜负，讲评人只是估量一下双方的行动是否正确。可是，与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们很好奇，很想知道胜负如何。实际结果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代表德军的“蓝军”占有巨大优势。在演习中，尽管一些现场调度员们出于对德军的仇恨和对苏联红军的热爱，人为地给“蓝军”的前进增加了一些障碍，“蓝军”仍然前进迅速，比“红军”明显地占有优势。

接着，斯大林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红军”和“蓝军”指挥官巴甫洛夫、朱可夫的汇报。斯大林听完了朱可夫的汇报后，困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蓝军”如此强大？为什么在事先制订的计划之外，“蓝军”增加了大量兵力？

朱可夫回答说：这些兵力符合德国的潜力，是建立在实际计算基础之上的。他在指挥“蓝军”进攻之前，不是从苏军野战条例的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进攻计划。他站在德国人的角度，对苏联边境地区的地形、环境、军队防线作了深入研究，然后选择进攻“红军”的突破口，展开进攻行动，结果“蓝军”的推进极为迅速。半年后，德军进攻苏联时，一部分攻势恰恰就是朱可夫的“蓝军”在演习中展开攻势的地段。德军将领们作出的决策与朱可夫在演习中作出的决策几乎不谋而合。

斯大林在讲评的最后作了总结。通过这次演习和讲评，他进一步看清了苏联红军中存在的问题。他的讲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他说：“可能，在条例的宣传材料中，应该写上我们一个师在遭遇战中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师。而在进攻中，一个半师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这些人的圈子里，在未来的方面军司令员们和集团军司令员们面前，就必须讲讲实际的能力是怎样的。”

在这次演习讲评中，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给斯大林留下了很差的印象，而“蓝军”指挥官朱可夫的指挥和讲评，再一次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个国家的军队中，总参谋长一职至关重要，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斯大林决定解除麦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朱可夫接替他。

朱可夫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从士兵一步步晋升为大将的（后来又成为元帅）。他机智勇敢，在任何危险局势下能保持沉着镇静，对战局的发展成竹在胸。在1939年5—9月对日军作战的诺蒙坎战斗中，他临危受命，打败了日军，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和指挥才能，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深受斯大林赏识，斯大林亲自向他表示祝贺。随后，朱可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6月晋升为大将，出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当时还不满44岁。

1941年2月1日，斯大林召见朱可夫，向他宣布说，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朱可夫鉴于自己长期担任野战军指挥官，毫无做参谋工作的经验，最初希望斯大林收回成命。斯大林表示，这项任命已经决定了，没有再商量的余地。朱可夫便欣然受命。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胆启用朱可夫，是斯大林战时在用人方面最成功的决策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于斯大林来说，朱可夫之重要，就象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

对于罗斯福之重要一样。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和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的具体负责下，苏联的战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苏军的战斗实力正在迅速提高。

东方战线

当斯大林为重振苏军日夜操劳时，1940年夏天，战争发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重大变化。

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后，斯大林一度认为，法国有强大的陆军和著名马其诺防线，英国有强大的海军，即使它们最终会失败，也应该能坚持抵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希特勒的闪电战虽然对波兰很有效，但对英法就未必如此。1940年春，英、法、比、荷等国的军队装备精良、数量上超过德军。大多数军事专家也都预言，西线的战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在斯大林看来，英法等国抵抗德军的时间愈长，对苏联就愈有利，因为那会使苏联备战的时间更充足。

然而，斯大林象很多军事专家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能力，过低地估计了德国“闪电战”的打击力量。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很快就突破了荷兰、比利时和英法盟军的防线，不到40天，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战败投降，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差一点被德军围歼，最后丢盔弃甲、逃回英国。至此，除苏联和孤悬海外的英国，整个欧洲几乎都落入了轴心国家手中。

战局的这种巨大变化，使斯大林感到震惊。表面上，苏联给德国发去了贺电，祝贺德军在西线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法国等国出人意料地迅速败降，使苏联面临的形势变得更危险了。德军在西线获胜后，会不会掉转头来进攻苏联呢？斯大林想起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的一段话：“德国……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待法兰西的毁灭，即我们的人民终于能在另一个方向进行扩张了。……当我们在西方达到目的之后，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进攻俄国。”

斯大林意识到，战争的危險突然一下子离苏联很近了，为此，他一方面将重振苏军的工作抓得更紧，另一方面决定采取新措施，加强苏联西部边境的防御。

1939年9—10月，苏联虽然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但在实施条约的有关内容时，遇到了一系列具体障碍。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苏军进驻各国的人数、时间、租用土地、修建军事设施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刁难苏联，致使互助条约的有关内容迟迟得不到具体落实。随着德国势力在欧洲的空前膨胀，这些国家中一贯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政府，遇到合适的时机突然倒向德国一边反对苏联，并不是不可能的。若出现这种局面，就会使苏联西北地区受到巨大威胁。

如前所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十月革命后脱离苏俄而独立的，它们的独立是当时苏俄政府奉行列宁和斯大林本人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的结果。1939年9月至10月，苏联同这三个国家签订互助条约时，斯大林还无意过多地干预它们的内政，更无意改变它们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可是，鉴于法国败降后德军调头向东入侵苏联的可能性突然增大，鉴于波罗的海沿

岸三国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的不合作态度，乃至倒向德国一边的可能性，为了防患于未然，斯大林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重新吞并它们。为了苏联的安全这一根本利益，只好让民族自决原则之类的东西见鬼去吧。

于是，斯大林派了三员干将到上述三个国家：日丹诺夫到爱沙尼亚、维辛斯基到拉脱维亚、捷卡诺佐夫到立陶宛。他们的任务是，策划推翻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由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作好加入苏联的准备。

1940年6月中旬，苏联政府向上述三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它们忠实地履行同苏联签订的瓦助条约规定的义务，允许苏联增加在各国的驻军、允许苏军在各国内自由通行。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三国都接受了苏联的要求。随后在斯大林派去的三员干将的策划下，6月17—21日，三国相继改组内阁，成立了新政府。7月14—15日，三国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宣布恢复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加入苏联。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满足三国的要求，同意它们加入苏联，成为苏联三个新的加盟共和国。于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脱离了原苏俄独立20多年后，又合并到苏联中来了。近几百年来，俄罗斯同它周边许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倒有点象中国古代一部名著中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使斯大林对苏联西北边境地区的防御放心多了。

巴尔干地区历史上也是西方列强入侵苏俄的一条重要通道，斯大林在加强苏联正西面和西北面边境防线的同时，也很重视加强苏联西南边境的防御。早在1939年9月20日，苏联就表示，希望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遭到保加利亚的拒绝。1940年11月，苏联再次向保加利亚提出这一建议。此时，保加利亚已决心站在轴心国一边，再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苏联同保加利亚领土不接壤，影响保加利亚外交政策的能力有限，对罗马尼亚就不同了。苏罗边界相邻，一直有领土纠纷。1918年，罗马尼亚从苏俄手中夺走了比萨拉比亚。现在，斯大林从加强苏联西南边境防御角度考虑，决定向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照会罗马尼亚，指责罗奉行反苏政策，威胁着苏联西南边界的安全，表示苏联决不能容忍罗马尼亚强行霸占比萨拉比亚，要求罗把这一地区归还给苏联，并把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以作为对罗霸占比萨拉比亚22年的赔偿。

面对苏联的巨大压力，罗马尼亚第二天就表示愿意同苏联进行友好协商。苏联以罗方没有明确承诺“归还”和“移交”上述两个地区为理由，又向罗发出最后通牒：限定自6月28日起，4天之内，罗马尼亚军队撤出上述两个地区。小小的罗马尼亚无可奈何，于6月28日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两天后，苏联军队占领了上述两个地区。一个月后，比萨拉比亚被并入了苏联的摩尔多瓦加盟共和国，北布科维纳被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1941年春，罗马尼亚倒向了法西斯德国一边。

从1939年9月17日出兵波兰东部到1940年8月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苏联在二战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其西部各邻国获得了领土46.6万平方公里，使其西部国境线向西移动了200—300公里。斯大林构筑的这条新国境线，因其位于欧洲东部，史称“东方战线”。斯大林认为，东方战线的构筑完成，使德军进攻苏联时，不得不从战略上对德军不利的边界线上开始，从而使苏联的西线防御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这对巩固苏联边界的安全有重大意义。至于这种通过强占邻国领土用来构筑本国安全防线的做法是否符

合国际法或道义什么的，是否有什么消极影响，后人会怎么评价等等，他暂时顾不了考虑那么多。英、法、美、德、意、日，哪一个大国不是拼命地在世界上抢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要地和商品市场？！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弱肉强食。

第五章 五飞法兰西

雷诺：目前法国已经为盟国共同事业牺牲了一切……法国无力继续抵抗……

丘吉尔：“必须请朋友们战斗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无论如何，英国都要继续战斗。”

德军在西线的全面进攻

1940年5月15日，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还在酣睡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迷迷糊糊地抓起听筒，里面传来了法国总理雷诺悲哀的声音：“我们被打败了。”

丘吉尔没有回答。雷诺以为他没听懂，又用英语重复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不会败得这么快吧？”丘吉尔说。德军在西线的进攻5月10日才开始。

雷诺继续说：“在色当附近，战线被突破了；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大批涌了进来。”

丘吉尔还是不相信，战争刚刚打了五六天，就已经分出了胜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告诉他，敌人在五六天的进攻后，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给，那时就是英法反攻的机会。

可是，雷诺又重复说了一遍：“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丘吉尔决定到法国去一趟，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法两国就开始了军事方面的合作。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9年9月12日召开了英法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不久又设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全面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两国签订的“雷诺—西蒙协定”规定，战争费用由法国负担1/3，英国负担2/3。1939年10月，英国向法国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受法军司令、英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统一指挥；同时法国海军则接受英国海军部的统一指挥。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为迎战德军，英法盟军于5月12日开进了法国北面的比利时。可是，5月14日，德军7个装甲师出人意料地越过阿登高原和默兹河，突破了法军的色当防线。色当——这个在法国历史上像丧钟一样倒楣的名字——再次成为报刊广播的头条新闻。德军突破色当防线后，长驱直入，北面英法盟军的后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5月15日清晨6时，法国国防部长达拉第给总理雷诺打电话：“我们的军队正在瓦解……这一仗输定了。”雷诺随后要通了丘吉尔的电话。

当天下午，丘吉尔在英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等人的陪同下，飞往巴黎。他们一下飞机，立即感到周围笼罩着绝望的气氛。迎接他们的官员说，过不了几天，德军就会攻进巴黎。他们来到法国政府所在地，发现法国政府各部门因担心德军占领巴黎，已经开始在院子里焚烧文件档案。丘吉尔见到雷诺、达拉第和法国战时内阁秘书博杜安等人时，注意到他们每张脸上都是痛不欲生的沮丧表情。

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向丘吉尔汇报了极为严峻的战况：德军正迅速地向亚眠和阿拉斯推进，从那里，他们可能奔向沿海，或扑向巴黎；德军机械化部队打开了一条东西走向的缺口，实际上将英法盟军切为南北两半，北面

的盟军大概必须撤回来。

丘吉尔问：“现在，我的将军，你准备什么时候，在哪儿进行反击——从北面还是南面？”

甘末林垂头丧气地说，他已没有进行反攻的力量。

“战略预备队在哪里？”丘吉尔又问。

甘末林沮丧地耸了一下肩膀：“根本没有。”

丘吉尔愣住了，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绝没有想到，一个要防守500公里战线的司令官，竟然没有给自己准备大批机动力量。

屋里陷入了一阵沉默。窗外，法国外交部的院子里，焚烧档案文件的火堆冒着滚滚黑烟。丘吉尔意识到，法国政府已在准备撤出巴黎。

丘吉尔百思不得其解：法国不是有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吗？它应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节约军队，使大批部队留作后备队的呀？可眼前的现实是，法军总司令没有后备部队。那么马其诺防线是干什么用的？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吃惊的事情之一。”

甘末林请求丘吉尔向法国增派空军战斗机中队。丘吉尔立即同伦敦联系，要求英国战时内阁马上开会，讨论再向法国增派6个战斗机中队（先前已经派出了4个中队）。他意识到，这会使保卫英国的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首先救法国要紧。当晚11时30分，英国战时内阁复电丘吉尔。同意他的要求。丘吉尔从英国大使馆立即赶往雷诺的官邸。他让雷诺派人请来了达拉第，向他们传达了英国内阁的决定，又同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战争的前景，直到凌晨2时左右才返回大使馆。第二天早晨，他乘飞机回国，结束了他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法国之行。

德军扑向沿海

丘吉尔走后，雷诺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改组，免去了达拉第的国防部长职务，由他自己兼任。他还说服一战中保卫凡尔登的法国英雄、84岁的老将贝当元帅出任副总理。法国人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就会想起法军在1918年的胜利。雷诺还免去了甘末林的法军总司令职务，任命一战中的法国英雄、福煦元帅的得力助手、73岁的魏刚将军接替，雷诺显然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希望他们能重演法军1918年的胜利。

可是，战局并未好转。5月14日，荷兰军队宣布投降。德军在法国境内的进攻目标，首先指向了英吉利海峡沿岸。位于北面的英法盟军和比利时军队，同法国后方的联系面临着被完全切断的危险。由于德军进展神速，打乱了盟军的指挥系统，加上法军总司令易人造成的混乱，包括英国远征军在内的许多部队，一连几天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德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

由戈特将军率领的英国远征军，被阻隔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不惜任何代价，杀开一条南下的出路；二是退守敦刻尔克，以便从海上撤回回国。可是，这两条出路都有很大的冒险性。一是戈特将军对他的兵力能否打通南下之路表示怀疑；二是退守敦刻尔克会遭到敌机空袭，造成很大伤亡，从海上撤退势必丧失宝贵的重武器。在远征军进退两难之际，丘吉尔决定再次前往法国。

5月22日，丘吉尔第二次飞到巴黎。由于德军进攻方向首先指向了沿海，

巴黎暂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丘吉尔在雷诺的陪同下，前往万森城堡会见了新任法军总司令魏刚。魏刚向他们概述了新制订的一项作战计划：北面的法国第一军和英国远征军向南突围，索姆河南部的法国其余部队向北推进，形成对德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丘吉尔感到，除了赞成这一计划外，别无其他选择。他在英国大使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飞回伦敦。

在法国时，丘吉尔曾私下对雷诺抱怨说，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曾一连4天没有接到法国上司的任何命令；甚至魏刚接任总司令后，也花了3天时间才作出决定，他说，更换最高统帅是正确的，但由此产生的拖延却是不幸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

魏刚的计划也没有奏效。5月25日，北面英法盟军和比利时军队与外界的陆上交通线全部被切断，比利时军队的防线被突破，国王利奥波德准备投降；英国远征军的反攻被德军击退，向南方突围的希望化为泡影。

戈特将军感到，唯一的退路就是朝海边的敦刻尔克撤退。第二天，他制订了向海岸撤退的计划。当天傍晚，英国海军部决定实施代号为“发动机”的行动计划——让被围困的英法盟军从海上撤往英国。5月27日，英国陆军部通知戈特，他的任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部队撤回英国。

5月28日，比利时军队投降，几十万英法盟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附近不到60平方英里的地带，随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丘吉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局瞬息万变，几十万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既想插手，又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几天，他明显地不思饮食，曾心烦意乱地对伊斯梅将军说：“我感到身体有病了。”5月26日是星期天，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做礼拜，心神不宁地坐在唱诗班座位上，感觉中，仿佛周围的教徒们胸中积存着忧虑和恐惧——为敦刻尔克的将士们担忧，为英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在为英法将士们、为英国虔诚地祈祷。在他经历的无数次礼拜中，这是最令他难忘的一次。

5月28日，他在下院办公室召集除战时内阁成员之外的所有内阁级大臣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战况，坦率地说明了英法盟军的危险处境，然后表示：“当然，无论在敦刻尔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听到这里，内阁大臣们再也忍不住了，许多人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丘吉尔身边，拍着他的背，喊叫着，坚定地表示：宁愿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也不愿屈膝投降。丘吉尔立刻感觉到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

到5月30日，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已达12万多人，而法军只有6千人。丘吉尔立即向负责撤退工作的英军将领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部队，否则将对英法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为了避免误会，商讨下一步的对策，5月31日，丘吉尔第三次飞往巴黎，参加英法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陪同前往的有副首相艾德礼、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等。法方出席会议的有总理雷诺、副总理贝当元帅、总司令魏刚将军以及达尔朗海军上将。会议决定：远征挪威的英法军队撤出挪威；鉴于意大利蠢蠢欲动，一旦它参战，就对它实行海、空联合打击。

在会上，丘吉尔详细解释了敦刻尔克撤退中，法军为什么没有能按同英军大体相等的人数撤退的原因。法方表示理解，达尔朗海军上将还指示防守

敦刻尔克滩头阵地的法军，在最后撤退时，让英国军队先上船，丘吉尔立刻插话说，英军决不能先上船，而应同法军按大体相等的人数撤退，携手并行，英军要担当后卫。法国总理雷诺很受感动。丘吉尔一行于第二天早晨回国。当英法盟军在敦刻尔克随时可能全军覆灭时，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下令德军装甲部队停止迫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二战史上一直是个谜），给英法盟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从5月26日开始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到6月4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英法盟军虽然几乎丢弃了全部重型武器，但总共约有33.8万多人撤到了英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可惜最后一条船开走之后，4万多名担当后卫的法国官兵被俘。

6月4日下午2时23分，英国海军部在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发电机”计划顺利完成。这是战争史上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大撤退。

丘吉尔意识到，如果对这次大撤退缺乏正确的认识，就会影响英国人民的士气和抵抗纳粹德国的信心。当天他在英国下院发表了重要演说。他说：“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他以富有战斗力的语言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第四次飞往法国

法国的战局继续令人忧虑，丘吉尔决心援助法国。事实上，他早就意识到英法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决心对法国承担义不容辞的援助义务。1940年5月16日，他在给战时内阁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拒绝他们的要求，并因此导致他们垮台，将成为不光彩的事。”敦刻尔克撤退完毕之前，他已下令从其他英国部队重新组建英国远征军，尽快开往法国。

可是，法国人的表现让他很失望。甘末林将军在德军进攻一周之内就失去了胜利信心；魏刚将军也充满了悲观情绪；许多法国集团军将领，都没有给丘吉尔留下好印象；如今在贝当元帅身上，看到的也是失败主义形象；雷诺总理也信心动摇。丘吉尔热爱法国，他多么希望法国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啊！6月6日上午，他打电话给驻法国的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问道：“法国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计划？”“如果法国人的防线（新防线）被突破，他们怎么办？布列塔尼计划中有什么安排吗？有没有其他预备方案？”斯皮尔斯感到，丘吉尔对法国充满着忧虑，对法军将领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在失望之中，丘吉尔也看到了一线希望。

法国陆军准将戴高乐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很明确：尽可能在法国本土坚持战斗，一旦法国沦陷，转移到法兰西帝国（北非殖民地）继续战斗；无论对英国有多大不满，必须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雷诺同意他的观点，6月上旬，把他从前线召回，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6月9日派他飞往英国，一方面表明法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进一步争取英国空军的支援。

丘吉尔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表情冷峻的戴高乐，显然同法国其他将领不同。他隐约记得，1938年3月，雷诺曾向他提起过戴高乐，那时还只是上校，写过一本有关装甲战的军事著作，引起了一阵争论。他还知道，前不久在法国北部的战斗中，传来的几乎都是失败的消息，唯独戴高乐指挥的坦克纵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战绩，英国的《泰晤士报》把他夸奖了一番。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虽然在具体军事问题上有分歧，但彼此都有好感。丘吉尔觉得，戴高乐头脑冷静，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根本不去想停战或战败的问题，只谈如何继续战斗。戴高乐认为，丘吉尔充满自信、有丰富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充满热情、生性果断、乐于承担风险，“很适合指路和引导”。

就在他们会面后的第二天（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从背后向法国捅了一刀。墨索里尼向反对意大利参战的人说：“为了跟胜利者同桌而坐，我得让1000人死掉。”在此之前（6月5日），德军集中了124个师的兵力，编成3个集团军群，兵分3路，向法国腹地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法国政府已撤出了巴黎，并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法军总司令部迁到了奥尔良东南的布里亚尔。到处都流传着即将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谣言。失败主义情绪正在法国政府和军队中迅速地蔓延。

6月11日，丘吉尔乘飞机直接飞抵布里亚尔，他笑着走下飞机，显出对战争很有信心的样子。可是，迎接他的那位法军上校却脸色阴沉，颇为冷淡。丘吉尔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丘吉尔一行被送到一座别墅，晚上7时，同法国军政领导人正式举行会谈。魏刚要求英国大力支援法国，把英国所有的战斗机中队立即派往法国作战。他说：“这里是决定点，现在是决定性时刻，因此，把任何一个空军中

队留在英国都是错误的。”

丘吉尔立即反驳：“这是不是决定点，现在也不是决定性时刻。那个时刻将要到来，那就是希特勒动用他的空军向大不列颠大举进犯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制空权，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海上交通畅通无阻（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将替你们赢回一切。”他表示，为了保卫英国，无论发生什么事，英国本土必须保留 25 个战斗机中队。

当丘吉尔主张以游击战争对付入侵的德军时，法国人告诉他，由于老百姓大批地外逃，公路上难民拥挤不堪，常常遭到德军飞机的扫射；政府和军事机构在不断崩溃，部长们相互之间及其同所属部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官员在撤退路途中，只能靠零零碎碎地收听一些新闻公报，了解战局的最新变化。魏刚将军无法控制自己的悲观情绪，不禁信口表示，法国或许将不得不要求停战。

“那是政治问题！”总理雷诺立刻喝阻他。显然，魏刚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说到了涉及英法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

魏刚的话让丘吉尔大吃一惊，但他很镇定地说：“如果法国在苦难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为了我们而有所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打下去！”

魏刚说，即使法军能够牵制住德军 100 个师，“他们也可拿出另外 100 个师来进攻和征服你们。那时你们又怎么办？”丘吉尔表示，自己不是军事专家，不能说出具体办法，但他的顾问们认为，应付德国入侵英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半路尽量淹死他们，对余下的人，他们一爬上岸，就敲他们的脑袋。魏刚苦笑了一下：“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你们有一道很好的反坦克屏障。”他指的是英吉利海峡。

这时，丘吉尔感到很内疚，觉得英国在对德国的地面作战中未能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让 9/10 的屠杀和 99% 的损失都落在了法国身上。他默默地告诫自己，只要有可能，就一定尽力帮助法国。晚上 10 时左右，法方安排了一次夜餐。餐桌上的气氛仍然十分亲切、友好。刚开始不久，在法国指挥英国空军的巴拉特中将打来电话说，法国南部地方当局反对英国轰炸机起飞去轰炸意大利，理由是那会招来对法国南部的报复。雷诺立即下令，不得阻止轰炸机起飞。但那天夜里，机场附近的老百姓仍然拖来各种车辆堆放在跑道上，以致轰炸机无法起飞。

用餐时，雷诺坐在丘吉尔的左边，而有意安排决心抵抗到底的戴高乐坐在丘吉尔的右边。戴高乐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谈话加强了我对他的意志的信心，而在他离开时一定感到，尽管戴高乐没有必要的手段，决心却同样坚定。”事实上，丘吉尔第二天向英国战时内阁汇报时说：“戴高乐将军……年轻而又精力充沛，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丘吉尔一行返航时，险些被德国的战斗机发现。当时，两架德国战斗机在丘吉尔座机的下面正向海上的渔船开火，幸好这些纳粹飞行员没有顾得上向上看。

英国将继续战斗

6 月 12 日下午，法国内阁举行会议，魏刚和贝当主张立即请求停战。雷诺则主张在北非继续战斗。还有几个人犹豫不决。雷诺最后建议，请丘吉尔

第二天再来法国一趟，听听他的意见。大家都同意。

原来，英法盟国最高委员会曾于1940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在未经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英、法都不得与敌国单独进行谈判、停战或媾和。

6月13日上午，丘吉尔应邀第五次飞往法国。此时，法国政府已撤退到了图尔。上午11时，丘吉尔乘坐“火烈鸟”式飞机，在12架飓风式战斗机的护卫下飞往图尔。他们发现，图尔机场上到处是巨大的弹坑。飞机安全着陆后，法方竟没有派人到机场迎接他们。丘吉尔不禁感到，局势肯定是大大的不妙了。他们一行向机场指挥官借了一辆值班车，直奔法国政府总部的所在地。可到达后才发现，那里没有一个重要人物。

这时已临近下午2时了，奔波了几个小时后，他们早饿了，可法方竟没有人为他们安排午餐，更谈不上设宴接风洗尘。丘吉尔一行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肚子问题。堂堂英国首相竟弄得如此狼狈。他们开车穿过难民拥挤的街道，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咖啡馆，可已经关门了，经一番解释，店主才开门，给他们弄了一顿午饭。正在吃饭时，法国内阁秘书博杜安找来了。饭后回到政府总部，内务部长已在那等候他们，不久雷诺总理也赶来了。

雷诺向丘吉尔介绍说，法国内阁大多数人不同意停战，但如果巴黎沦陷，就很难说了。取胜的唯一希望是美国立即参战。他已于6月10日给罗斯福总统去函，还将再写一封言词更为恳切的信。除非罗斯福明确承诺立即提供援助，否则法国将不再继续战斗。

他接着说，法国政府没有忘记不单独同敌人谈判、停战或请和的承诺，但是目前法国已经为盟国共同事业牺牲了一切，它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这是可怕的事实。如果英国不能理解或不承认法国无力继续抵抗，那将使法国政府和人民感到震惊……。

丘吉尔回答说：“我完全理解法国已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也并不低估法国深重的忧患。马上就该轮到英国了，……我们必须战斗，……因此必须请朋友们战斗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他说，等到美国作出承诺就好了。他最后表示，“无论如何，英国都要继续战斗。……不战胜毋宁死。”

雷诺说，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它有权单独媾和，英国是否承认这一点呢？

丘吉尔一直热爱法国，雷诺的话让他感到痛心。他说，“在提出决定性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听听罗斯福的意见。”最后，他噙着眼泪说，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非难和互相指责上，但这并不等于说英国同意与3月28日协定相违背的行为。法国的事业永远是我们所珍视的，“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法国就会恢复它的尊严和伟大。”（几年后，丘吉尔尽力履行他的这一承诺，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此乃后话）

雷诺同意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新的呼吁，并答应，法国要坚持到知道他的最后呼吁的结果为止。

丘吉尔一行于当天下午飞回英国。晚上10时15分，他向英国战时内阁作了汇报。不久，罗斯福针对雷诺6月10日信件的回电来了，内容令人鼓舞。可是第二天，罗斯福又追来了一封电报，说他不同意公开发表他头一天致雷诺的电报。雷诺很失望。当天（6月14日），德军开进法国首都巴黎。法国政府从图尔继续向波尔多方向南撤。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又派遣了一支大约 15 万人的远征军赴法国作战。6 月 14 日夜，远征军司令布鲁克将军打电话给丘吉尔，要求他下令撤回英国远征军。15 日，英方通知法国，英国远征军不再接受法国第 10 集团军的统一指挥。

6 月 15 日晚，雷诺正式向英国提出，要求解除法国在英法协定中承担的义务，并暗示，如果英国拒绝，他就辞职。此时，法国退出战争已是大势所趋。现在，丘吉尔最担心的是法国海军舰队落入纳粹德国手中。早在 6 月 11 日同法国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时，他曾专门单独同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谈过这个问题，希望不要让法国舰队落到希特勒手中，达尔朗当时庄严地作出了承诺，6 月 16 日，英国战时内阁作出决定，在法国舰队尽速驶往英国各港口的条件下，英国同意法国寻求停战。法国政府内部，雷诺总理虽然倾向于把政府迁往北非，继续战斗，但他的地位已很脆弱。以贝当元帅、魏刚将军为首的主降派，已占上风。

英法合并计划

在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一关键时刻，戴高乐将军挺身而出，并获得了丘吉尔的大力支持。

在第五次赴法同法国领导人会谈时，丘吉尔对雷诺已感到失望，更不用说贝当、魏刚之流了，他不相信，历史上曾经出过贞德、拿破仑、克里孟梭等伟大人物的法兰西，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希特勒的淫威之下。会谈中间休息时，他在花园中曾想起过戴高乐，便问斯皮尔斯将军，戴高乐其人如何？斯皮尔斯说，他敢肯定，戴高乐“绝对坚定”。丘吉尔走进庭院时，正好看见戴高乐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不禁用法语低声说：“应运而生的人”。他凭直觉、凭经验意识到，戴高乐堪当重任，当别人惊慌失措时，唯独戴高乐不动声色、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实际上，那两天，戴高乐心绪很乱。德军已兵临城下，而法国政府和军队的要人们都在谈论单独停战和投降问题，自己乃区区一陆军准将，刚提拔不久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是无回天的。他很痛苦，也在考虑辞职。这时，法国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来看望他，劝他不要辞职，芒代尔说：“一场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将军，你将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你有一个有利条件——你是我们当中一个保全了名声的人。不要想别的，只去考虑应当为法兰西做些什么，而你目前的地位可能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便利”。戴高乐被他说服了，决定留在政府中。

6 月 14 日，德军进入巴黎，法国政府继续南撤。戴高乐在挤满难民的道路上，经过艰难跋涉，于傍晚赶到了波尔多，立即找到雷诺总理，义正辞严地说：“3 天来，我发现我们正在迅速地向投降的方向滑去……我曾为你尽过微薄之力，但那是为了战争。我不会屈从于停战协定。如果你呆在这儿，就会被失败情绪所吞没。我们必须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你决心下定没有？”

“下定了！”雷诺说。

“那样的话，我本人必须到伦敦去，争取英国人帮助我们执行运输计划。我明天就走。我们在哪儿会合呢？”

“在阿尔及尔。”

戴高乐连夜乘车前往布列塔尼。6 月 15 日到布雷斯特乘“米兰”号驱逐舰前往英国。他问舰长：“你愿意在英国国旗下战斗吗？”舰长摇了摇头，

以示否定。戴高乐由法兰西的苦难命运，想到那天芒代尔说的话，最后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他又对舰长问了一句含义隐晦的话：“你觉得戴高乐将军这些日子的命运令人羡慕吗？”舰长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感到莫名其妙。

6月16日黎明时分，戴高乐抵达伦敦。不久，法国驻英国负责经济事务的代表让·莫内和驻英大使科尔班来找他，向他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头一天晚，雷诺总理已向英国正式提出，允许法国寻求停战。让·莫内和科尔班说，为了阻止法国停战，支持雷诺继续抵抗，他们已经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让英法两国合并。

戴高乐立即看出，这件事关系重大，两国合并决非易事。但他也意识到，此时此刻，由英国政府向法国提出这项建议，将是一种团结合作的表示，有可能加强雷诺总理的地位，对阻止法国停战有实际意义。

莫内和科尔班说，这项计划首先必须争取英国政府的同意，这只有将军您能从丘吉尔先生那儿争取到。已经安排好您们共进午餐。那将是最好的机会——当然前提是您赞成我们的计划。

戴高乐答应，乐于一试。

中午，丘吉尔、戴高乐、莫内、科尔班等人共进午餐。戴高乐决定采取激将法，他首先对丘吉尔说，为了保证法国舰队不让敌人夺走，就要使法国不退出战争。可我必须告诉您，您在图尔的态度，对我来说是个令人不快的意外。您似乎并不重视我们的联盟。您的容忍正中法国那些主张投降的人的下怀。

他看了看丘吉尔，然后话锋一转，接着说，为了给雷诺先生以必要的支持，使他的政府能够继续作战，必须采取某些引人注目的行动，我认为，就英法两国永久合并发表宣言，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丘吉尔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对我说过这事，这可是件很大的事情。”

戴高乐说，是的，而且实行起来要很长时间，但是，姿态是可以立即做出的。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您不应该忽视任何可能支持法国和维护联盟的事情。他还建议丘吉尔第二天赴法国会见雷诺。

丘吉尔接受了戴高乐的意见。

为了支持雷诺，阻止法国政府寻求停战，戴高乐立即给雷诺挂电话，通报了他与丘吉尔会谈的情况。雷诺很受鼓舞，要求他敦促英国战时内阁批准两国合并计划。

下午，丘吉尔、戴高乐以及科尔班一起来到唐宁街10号。丘吉尔主持召开战时内阁会议，戴高乐在隔壁房间等候消息。

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竭力鼓吹英法合并计划。他说，我最初的直觉本来是反对这种想法的，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决不可让人指责我们缺乏想象力。显然，发表某种引人注目的声明，对于法国之继续抗战是必要的，不可轻率地搁置这一计划。

隔壁房间的戴高乐心急如焚，不到下午4时，他又给雷诺挂电话。法国内阁将于下午5时开会，就是否继续战斗问题作出决定，如果5时之前能收到英国赞成宣布两国合并的答复，他就能在会上坚持继续战斗的立场。戴高乐立即把这一情况转告英国战时内阁。

英国战时内阁经丘吉尔煽动一番，在讨论了几点修改意见后，批准了英法合并的宣言草案，并同意丘吉尔第二天前往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会见雷诺。丘吉尔率战时内阁全体成员来到隔壁戴高乐的房间，他们喊道：“我们

都同意了！”

戴高乐立即给雷诺挂电话，把会议通过的合并宣言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

“这非常重要！我将在就要召开的会议上利用这份文件。”雷诺说。

丘吉尔接过话筒：“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具体影响，要抓住这一点！”听了雷诺表示赞同的答复后，他又说：“那么明天见！”

随后，戴高乐告诉丘吉尔，他刚刚下了一道命令，让从美国运载武器开往波尔多的法国轮船，改航驶向英国港口停靠，以防万一法国讲和后武器落入敌人手中。接着，他要求丘吉尔把所有的英国战斗机中队派往法国，去参加法国的最后一战。

丘吉尔表示，这不可能，已经没有打最后一仗的可能了。

戴高乐起身告辞，一言未发，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过身来，用英语说：“我认为您是对的。”

从戴高乐冷静、沉着的举止中，丘吉尔越发感到：“这才是法兰西的卫士。”

随后，戴高乐立即乘飞机，于当晚9时30分飞回法国政府所在地波尔多。迎接他的两位同事告诉他：雷诺已经辞职了，贝当元帅受命组织新政府，贝当肯定会要求停战，一切全完了。

这消息如五雷轰顶，使戴高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和丘吉尔的努力前功尽弃了。

他马上作出决定：“天一亮就离开。”

当晚，他找到雷诺，发现辞职后的雷诺，倒象如释重负一样轻松。戴高乐告诉他，为了从长计议，自己准备前往英国。雷诺让人从秘密基金中取出10万法郎送给他。

随后，戴高乐来到英国驻法大使坎贝尔勋爵的寓所，说明了自己的打算。丘吉尔驻法国的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表示，自己也要回国，正好可以同戴高乐一道走。

将近午夜时分，斯皮尔斯给丘吉尔挂电话说，戴高乐在法国的安全已成问题。丘吉尔指示，要妥善安排戴高乐离开法国。

第二天（6月17日）上午7时，戴高乐又找到斯皮尔斯将军，他们就如何离开法国作了精心安排。

然后，戴高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安排了几个下午的约会，又在拉丰将军的办公室里会见了法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上午10时左右，他乘车前往机场，为斯皮尔斯将军回国送行。在机场，他们握手告别。当飞机开始移动时，戴高乐突然一个箭步，冲进飞机，砰的一声，机舱门给关住了，飞机滑行了一会，腾空而去。在场的法国警察和官员们无不目瞪口呆。这一幕，正是戴高乐为防止贝当政府阻止他出境，和斯皮尔斯精心策划的。

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起

6月16日傍晚，丘吉尔根据下午战时内阁会议的决定，准备启程前往法国会晤雷诺。这一次他计划先乘火车到南安普敦，然后从那里转乘巡洋舰，

预计 17 日中午就可以到达会晤地点——法国的康加尔诺。一列专车在滑铁卢车站等着他和随行人员。丘吉尔与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登上了火车。按计划，火车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南安普敦。

预定的开车时间已经过了，火车仍未启动。丘吉尔正在纳闷，他的私人秘书从唐宁街气喘吁吁地赶来，送来了坎贝尔大使从波尔多发回的最新消息：“法国已出现内阁危机。……午夜时分可望获得消息。此刻看来，预定明日举行的会晤已无可能。”

丘吉尔心情沉重地回到了首相官邸。预定的第六次法国之行夭折了。

到 6 月 17 日上午，丘吉尔已确信，法国必降无疑了。这使他内心里很痛苦。他很早就产生了热爱法国的感情。9 岁那年，父亲带他到法国旅游。有一天，他们父子俩一道乘车经过协和广场，9 岁的丘吉尔注意到，广场上有些纪念碑用布盖住了，便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对他说：“那些是代表法国各省的纪念碑，其中有两个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在上次战争中被德国人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法国人很不高兴，希望有一天能夺回来。”当时，小小的丘吉尔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们能夺回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终于夺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可是现在，法国又沦于德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丘吉尔不相信，有着优秀灿烂文化、历史上民族英雄层出不穷的法兰西，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纳粹德国的统治！

当丘吉尔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漫游时，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来见他。丘吉尔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他们都确信，贝当政府会投降德国。戴高乐请丘吉尔允许他借用英国广播公司，发出抵抗的呼声。丘吉尔同意了。

6 月 17 日，贝当政府宣布：必须停止战争。英国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们，一时跟不上丘吉尔的思路。6 月 18 日上午，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战时内阁决定，禁止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很着急。他的朋友斯皮尔斯将军立即找到丘吉尔，再次取得了他的明确支持，然后又去说服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终于使他们改变了态度。

当晚 6 时，戴高乐将军利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投身到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去，他说，“不管发生何事，法国抵抗运动的烈火决不能，也不会熄灭！”

从此，戴高乐将军举起了“自由法国运动”这面抵抗斗争的光辉旗帜。当时，他的事业异常艰难。他对第一批响应者说，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军队。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我们是白手起家……。当时，他的总部里面，仅有几张桌椅。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大力支持。没有丘吉尔的支持，戴高乐的努力也许是枉费心机。戴高乐自己后来承认：“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又能干什么呢？是他立即向我伸出救援之手丘吉尔后来也一直为当时看准了戴高乐、帮助了戴高乐而感到欣慰、自豪。最令他难忘的是 1940 年 6 月 13 日，在法国图尔，他凭直觉认定戴高乐是法兰西“应运而生的人”。在以后多年中，丘吉尔一想到那一时刻就会热泪盈眶。

第六章 最光辉的时刻

希特勒：“不能想象英国还有什么人当真相信能获得胜利。……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理由。”

丘吉尔：“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他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者，……

宁愿血染他们的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

英国也会投降吗？

1940年6月17日，法国贝当政府公开宣布：必须停止战争。从此，在反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整个欧洲只剩下一个英国在孤军作战。

“英国也会投降吗？”世界各国人民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英国、注视着英国首相丘吉尔。

6月18日，丘吉尔再次以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回答了人们的疑问：“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在已宣告结束。我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存亡系于此战。我们英国人自身的生存以及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帝国是否能维系久远，也取决于这场战争。……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这样勇敢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丘吉尔告诉英国人民：“我们完全应该提高警惕，加倍努力，但却丝毫没有恐慌或畏惧的理由。”他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先胜后败的经验，对人们说，法国战败仅仅是这场战争的开端，而不是战争的最终结局。谁笑在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奥兰事件

法国败降后，英国成为希特勒征服的下一个目标。而要入侵英国，却并非易事。英吉利海峡是保护英国的一道天然屏障。自近代以来，虽然欧洲大陆战火不断，而英国却没有遭到任何大陆国家的入侵。当年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北非，面对英吉利海峡，却只能望海兴叹。如今，虽说纳粹德国的总体军事实力强于英国，但它的海军却远远不及英国；而要入侵英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不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是很难成功的。纳粹德国虽很强大，但主要是一个陆上强国，一旦战场从大陆移向海洋，英国人就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不过，丘吉尔心中有一个巨大的隐忧：投降后的法国，其海军舰队会落入希特勒手中吗？法国可是世界第四海军强国，如果其海军舰队倒向轴心国家海军舰队一边，英国的海军优势将不复存在，英伦三岛可就危在旦夕了。丘吉尔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在法国要求英国允许它寻求停战时，他曾表示，宁愿同意让法国人退出英法联盟、退出战争，也不愿让法国海军舰队落入德国手中。

法国海军舰队完全控制在其海军司令达尔朗上将手中。此人经营法国海军达10年之久，治军有方，使法国海军舰队变得空前强大，从而也使他本人在法国海军中享有绝对权威，法国海军舰队的任何舰艇，对他无不唯命是从。

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了，法国海军舰队就会站在反轴心国家一边。

可是，达尔朗政治上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对外既仇视德国人，也痛恨英国人。1939年12月，他曾访问英国，丘吉尔当时还是海军大臣，接待过他。在英国海军部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达尔朗竟对英国人说，他的曾祖父是在181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与英国海军作战时阵亡的。丘吉尔当时便断定，达尔朗恨英国。

法国投降之前，丘吉尔曾做过达尔朗的工作。6月11日他在布里阿尔同法国军政领导人会谈时，曾单独语重心长地对达尔朗说：“达尔朗，你千万别让他们（德国人）拿到法国的舰队啊！”

“绝不会那样，那是违背我们海军的传统和荣誉的。”达尔朗信誓旦旦。

随后，当法国希望英国允许它退出战争时，英国战时内阁提出的唯一前提条件是：法国海军舰队尽速驶往英国各港口。6月17日，即法国宣布退出战争的当天，达尔朗还向英国人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舰队绝不会落入德国人之手。他甚至一度表示，他已决心发布命令，让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或美国或法国殖民地港口。可到了6月18日下午，他告诉英国的乔治将军，他已改变了主意。问他为什么？答曰：“我现在是海军部长了。”他当上了贝当政府的海军部长，便开始站在贝当政府的立场上考虑法国海军舰队的去留问题。

希特勒也很重视法国海军舰队，宁愿放宽法国投降的条件，也不愿让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6月18日，他对墨索里尼说，如果法国舰队开往英国，将大大加强英国的力量，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对法国作一些让步，或者至少作出某种保证。在6月22日签订的法德停战协定中，规定法国舰队除了保卫法国殖民利益而留置一部分外，其余应一律“在指定的港口集中，并在德国和意大利监督下复员和解除武装。”停泊在法国港口废置不用。希特勒保证：

“德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庄严地宣布，它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而且，德国政府还庄严而明确地宣布，在签订和约的时候，他们无意对法国舰队提出任何要求。”

可是，希特勒一向轻诺寡信，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信誉低得不能再低了，他的保证能值几分钱？在丘吉尔看来，希特勒随时可能以任何借口废除法德停战协定，夺取法国海军舰队。对此，丘吉尔决定，要不惜任何牺牲，甘冒任何风险、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绝对不让法国舰队落入敌人手中，基督教文明的熏陶，使他懂得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原则：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英国军方制订了“晋炮”作战计划：凡是英国海军能接近的法国海军舰队，都同时夺取、控制或有效地予以摧毁。

1940年7月1日，丘吉尔下令：“晋炮”作战计划定于7月3日黎明实施。

7月3日黎明，停泊在英国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港的所有法国舰艇，都被英国军队出其不意地夺获。在这一过程中，英军有2人被打死、法军有1人被打死。

与此同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司令戈德弗鲁瓦与英国舰队司令坎宁安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戈氏率领的法国分舰队保持中立。从而避免了流血冲突。

在达喀尔，法国战列舰“黎歇留”号遭到英国航空母舰的攻击，受到重

创。

停泊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航空母舰和两艘轻巡洋舰，经谈判后与美国达成协议，解除了武装。

在地中海西部奥兰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军港，发生了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这里停泊着法国两艘最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一些重要舰只。7月2日晚，丘吉尔致电在附近海域的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萨默维尔中将，命令他解决法国舰队，“我们对你完全信任，相信你会毫不留情地执行这一任务。”萨默维尔先派人去同当地的法国舰队司令谈判，法国舰队司令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英国舰队便攻击法国舰队。法国舰队除一艘战列巡洋舰逃走外，其余的不是被击沉，就是遭重创，法国水兵1300人丧命。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兰事件”。

希特勒夺取法国舰队用来进攻英国的潜在危险消除了。可丘吉尔却有些良心不安。毕竟半个月前，英法还是盟友。这样对待昨日的盟友，似乎有点心狠手辣。他为不得不这样做而痛心。他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决策，在我的一生参与的决策中，只有这个决策最违背天性、最使人感到痛苦。……法国人就在昨天还是我们的亲爱的盟友，我们对于法国的不幸寄予的同情是十分真挚的。另一方面，这是一桩有关国家的生存和我们事业的存续的大事。这是一场希腊式的悲剧。”

假如事先把达尔朗争取过来了，这场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达尔朗也会有更好的结局。丘吉尔不禁对达尔朗的人生命运生出感慨。

法国败降时，达尔朗在法国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是戴高乐望尘莫及的。丘吉尔认为，他只要离开法国，便可以摆脱德国人，成为德国控制不到的法兰西所有一切权益的主人，而不致于象戴高乐出亡英国时那样，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整个法国海军舰队都会追随他，整个法兰西帝国会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会成为法国抵抗斗争众望所归的领袖，英国和美国就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他而不是戴高乐，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成为“法国的解放者”，荣誉和权力便唾手可得。可是，他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在投靠纳粹德国的贝当政府中求得一官半职，最后落得一个横死（1942年12月被人暗杀）的下场，留下千古罪名。

丘吉尔感慨地说：“人类自私自利的打算是多么徒然无益啊！我们还很少见到比达尔朗更能说明这一点的实例。”

奥兰事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让丘吉尔难以忘怀。法国土伦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两户农家各有一个儿子在英国海军袭击奥兰的法国舰队时被打死了。在安葬他们时，两家都要求：把法国国旗和英国国旗并覆在棺材上。人们以尊敬的心情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丘吉尔对此感慨地说：“纯朴的人们领会事物的精神是这样达到了崇高的境界。”

奥兰事件发生后，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丘吉尔并不太在乎。他倒是担心戴高乐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戴高乐最初获悉奥兰事件的消息时，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英国佬”。作为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尤其是一个法国军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骂过之后，冷静一想，觉得丘吉尔也是出于无奈。当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来探听虚实时，他已经恢复了平静。他说，从英国的角度看，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他能理解；不过，自己是法国人，还需要从法国的角度考虑。他说，他正在考虑是继续在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还是从此隐居起来。

几天后，戴高乐选择了在英国继续领导抵抗斗争，并发表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向前看。他说，对于奥兰事件，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会感到悲痛与愤怒，他要求英国人不要把这次袭击行动渲染为一次胜利，“那样认为既不公正也不恰当，”他号召法国同胞们“从归根结底最为重要的角度深刻地考虑整个问题，也就是说，从我们国家最终获得解放的角度考虑整个问题”。他说：“毫无疑问，敌人在原则上和出于客观需要都会把舰队用来进攻英国或我们的帝国。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些舰只最好还是摧毁。”他呼吁英法两国人民加强团结、并肩战斗。

戴高乐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让丘吉尔深受感动，也使他更坚定了支持戴高乐的决心。

奥兰事件使全世界更看清了丘吉尔和英国人民同纳粹德国斗争到底的决心。

民族自信心

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比较复杂。年轻时，他到过英国，对英国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尤其是强大的皇家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提醒他的将领们，英国人毕竟也是雅利安人。他崇拜的英雄人物之一，就是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939年5月23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英国人的本性是骄傲、勇敢、顽强、坚韧的，而且是天生的组织家。……他们爱好冒险，而且有着北欧人种固有的胆略。……英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大国。”

希特勒自己怕海。在他的心目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大陆而非海洋。他有一次说：“我在陆地上是英雄，但在水上却是懦夫。”他像俾斯麦一样，不太重视海外殖民地，虽然有时也大谈如何瓜分英帝国，但多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对瓜分英帝国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要夺取的生存空间在欧洲大陆，在东方。他希望英国人向海外扩张，但请把大陆留给德国，不要妨碍德国在东方的行动自由。在《我的奋斗》中，他流露出要同英国结盟的想法。在进攻波兰时，他希望英国不要插手。他简直不理解：东欧与英国有什么利害关系？英国有什么理由干预德国在东欧的行动自由？

早在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在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第一次公开地表示，德国希望同英国和平谈判。法国迅速败降，使他信心倍增。他相信，英国人一定会求和。一直到7月初，他都在等待着英国人求和的消息，而根本没有制订进攻英国的计划。7月1日，他说：“不能想象英国还有什么人当真相信能获得胜利。”

可是，他等来的不是英国求和的消息，而是英国攻击、夺取法国海军舰队，表示战斗到底的决心。他大失所望，失望中认为，英国之所以不愿投降，关键是丘吉尔从中作梗。7月19日，他发表演讲，企图挑拨丘吉尔与英国人民大众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从英国只听到一个呼声：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这些政客说，即使英国灭亡了，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进行战争。”他说，英国人民是去不了加拿大的，大概只有那些热衷于继续打下去的绅士才去得了。

他攻击丘吉尔说，“那个嗜血成性的半瓶子醋艺术爱好者”永远不会遭到应有的惩罚。因为英国沦陷时，他会跑到加拿大去。“丘吉尔真幸运！英国人民真倒霉！”他威胁说，如果再打下去，伟大的大英帝国将遭到毁灭，

应该拿出理智来。“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理由”。

英国人民并没有受这种挑拨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不等政府表态或授意，就在广播电台上回敬了希特勒一个坚定的“不”字。

7月20日，丘吉尔指示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对德国代办的和谈试探，不得作出任何答复。他说，德国的和谈建议，“不是和平，而是要英国放弃它参战的种种目的”。英国战时内阁决定，由外交大臣发表广播讲话，拒绝德国的和谈建议。7月22日，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广播讲话中说：“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8月31日，丘吉尔指示外交部，答复试图促成和谈的瑞典国王，英国参加和谈的前提条件是：德国用行动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对英国和英帝国作出有效的安全保证。

实际上，丘吉尔和英国政府都无意同希特勒和谈。和谈问题，“当时谁也不认为值得纳入内阁的议事日程，甚至在最秘密和私下会谈里也从来没有人提过”。

有人提出，万一战败时，是否可以考虑把英国海军舰队调往美国？丘吉尔回答：“目前考虑最后的事态并不见得十分明智。我对于我们保卫这个岛屿的能力具有坚强的信念。”

为了以防万一，英帝国各自治领政府纷纷来电，要求王室、至少是两位年轻的王子，立即迁往安全地点，使英国王室不致因英国沦陷而有中断之虞。伊丽莎白王后回答说：“两位王子没有我，不能离开；我没有国王，不能离开；而国王，当然决不会离开。”

很多人不理解：丘吉尔为什么如此充满信心？

丘吉尔的信心，来自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规律的认识：战争初期取胜并不等于能赢得最终胜利；也来自英国军方的信心和英帝国各自治领全力支持的坚定立场；同时，更来自于他的民族自信心。他说，有些外国人并不了解不列颠民族的气质，“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他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者，……宁愿血染他们的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

他的信心还来自对英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他说：“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许多国家中的高明的谋略家，大多不理解海上入侵的问题和我们空军的质量”，“在德国，陆军的威望高”，“在英国，不论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对海上的事情是彻底了解的”，熟悉海洋，“不仅鼓舞我们的水兵，而且也鼓舞整个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沉着应付入侵的威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不列颠空战开始

丘吉尔的反应，使希特勒恨之入骨。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命令所有的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大字标题新闻：《丘吉尔的回答——卑劣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

希特勒已经意识到，再不能坐等丘吉尔来求和了，必须作好入侵英国的准备。7月16日，他下达了“第16号指令”；制订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要求到8月中旬，完成入侵英国的一切准备工作。

不久，德国陆海空三军将领都认为，不可能如期完成准备工作，7月底，

希特勒同意以 9 月 15 日作为入侵英国的最后日期，此前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因为再往后推，气候条件就不允许了。希特勒和德国军方认识到，能否按时作好入侵准备，关键取决于能否打败英国空军，取得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取得制空权，是取得制海权的前提条件。8 月 1 日，他下达了对英国进行海空作战的“第 17 号指令”：“德国空军应尽快以其所有的力量打败英国空军。”

丘吉尔及英国军方也在琢磨德国入侵问题。英国军方经过对月光、潮汐、气候等因素的综合分析，认为“对敌人最为有利的时机是在 9 月 15 日至 30 日之间”。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估计竟与德国“海狮计划”不谋而合。

丘吉尔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德国是否会或是否能入侵和征服英国，他是这样看的：入侵英国首先需要强大的海军。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英国海军的实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海军大臣时，他就曾说过，即使英国的全部陆军开赴法国，海军也能保证担负防卫本土的责任，击退敌人的入侵或大规模袭击，把侵略者歼灭在路途中。

他还考虑到了一战后空军迅速发展的影响，认识到，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可以控制多佛尔海峡。在空军力量对比方面，他根据法兰西之战中空战情况得出结论：在英国领空和领海上，英国空军能够击败德国空军；若果真如此，皇家海军可以继续掌握制海权。此时，丘吉尔与希特勒，或者说英、德两国军方又得出了一个不谋而合的认识：一切都取决于空战、取决于对制空权的争夺。7 月 10 日，德国飞机对英国进行了第一次猛烈的空袭，这一天通常被视为不列颠空战的开始。从这一天到大约 8 月 18 日，是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企图引蛇出洞，把英国飞机吸引到英国南部海岸上空和英吉利海峡上空来决战。8 月 15 日，进行了这一阶段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 500 英里的战线上，进行了 5 次大的战斗，德方共损失飞机 76 架，英国损失了 34 架。德国消灭英国空军的目的未能实现。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元帅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轻视了对英国雷达站的袭击。

大约从 8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是空战的第二阶段。德国企图通过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设施，进而消灭皇家空军，同时通过对伦敦的大规模轰炸迫使英国屈服。这是空战最激烈最紧张的阶段。

在 8 月的最后一周和 9 月的第一周，德国空军利用数量上的优势，集中轰炸英国南部沿岸机场，进而寻找消灭英国空军的作战机会，取得了重大战果。英国南部的 5 个前线战斗机场遭到巨大破坏，空军的整个通讯系统几乎被摧毁。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英国被摧毁或受重创的战斗机达 446 架，更严重的是，皇家空军飞行员有 103 人丧生、128 人受重伤，几乎占全部飞行员的 1/4。如果这一趋势再持续几周，制空权就会牢牢地掌握在德国空军手中。

这时，戈林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从 9 月 7 日起，放弃对英国南部海岸机场的轰炸，重点转向轰炸伦敦；并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戈林这次犯错误，颇有点讽刺意味。

原来，在 8 月 23 日，德国空军奉命轰炸伦敦郊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时，偏离目标，轰炸的是伦敦市中心，炸毁了一些房屋、炸死了若干平民。

英国人决定报复，于 8 月 25、28 日两次空袭德国首都柏林，虽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不大，但影响却不小。原来，戈林曾向柏林市民吹牛：保证德国的领空得到最可靠的保护，任何外国轰炸机都无法飞到柏林。因此，

当英国人来轰炸时，柏林人大吃一惊。英国轰炸机在丢炸弹时，还丢下传单，揭露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残暴统治。这样一来，希特勒恼羞成怒。9月4日，他叫嚣：“如果英国空军投下2000、3000或4000公斤炸弹，我就会在一夜之间回敬他们1.5万、1.8万、2万、3万、4万公斤或更多的炸弹，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

希特勒又没有放过谩骂丘吉尔的机会。他说：德国有8500万人，万众一心，难道会怕那个荒谬透顶、滑稽可笑、愚蠢无能的战地记者丘吉尔先生吗？“丘吉尔先生的胡言乱语……对德国人民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胡言乱语充其量不过使他们发笑而已。”

戈林元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报复欲望了，9月7日，他下令由集中轰炸英国南部机场设施改为集中轰炸伦敦，当晚就派出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空袭伦敦。从9月7日到11月3日，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57个夜晚，平均每夜约有200架飞机轰炸伦敦。

伦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牺牲。然而，英国皇家空军则因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挫败“海狮计划”

9月15日至30日，是英国军方估计的最有利于德军入侵的时机，丘吉尔很紧张。9月11日，他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不过，他并不知道，德国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8月30日，德国海军参谋部向希特勒报告说，“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不能在9月15日如期完成，希特勒根据他们的要求，决定将进攻日期推迟到9月21日，而且要求提前10天，即9月11日发出预备命令。9月10日，德国海军参谋部再次报告，由于天气一直很坏，加上英国的反轰炸，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虽然海军到9月21日可以完成必要的准备，但空军却不能掌握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这是进攻英国的前提条件。因此，9月11日，希特勒又把发出预备命令的时间推迟了3天，把最早的入侵日期改为9月24日，并要求尽快夺取制空权。

丘吉尔特别关注这场不列颠空战，在8—9月份，他通常每周抽出两个下午，亲临遭空袭最严重的地方视察，而且一直想亲眼观看空战情况。

9月15日，是个星期日。天气似乎对敌人白天空袭有利。丘吉尔偕夫人又来到了皇家空军第十一大队指挥部。迎接他们的指挥官帕克少将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

过了约1刻钟，指挥部接到报告：40多架敌机正朝英国飞来，随后又飞来了更多的敌机。皇家空军第十一大队所属的25个战斗机中队，迅速作好了迎战准备。这次让丘吉尔赶上了。

不久，一场激烈的空战开始了。指挥部里，座标员们忙忙碌碌，不停地移动各种座标。帕克少将站在一个传令官后面，及时下达各种指令，显得焦灼不安。丘吉尔就坐在传令官的旁边。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丘吉尔问。

“一个也没有。”帕克说。

丘吉尔紧张不安地注视着。

战斗结束后，帕克说：“首相，我感到高兴的是，您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当然，在最后20分钟，情报来得太多，使我们感到应付不了。您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

丘吉尔急于得知战果，可统计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便鼓励说，看来这次空战打得很好。

“我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多。”帕克说，“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

直到晚上，丘吉尔才得到战报：英军击落敌机183架，而损失飞机还不到40架（战后准确的资料表明，这次战斗中，德国实际损失飞机为56架。这并非英国空军故意夸大战果，而是统计方法不科学所致）。

就在当天晚上，英国皇家空军派出轰炸机，对欧洲西海岸被德军占领的许多港口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德军聚积的准备用来入侵英国的大量舰艇船舶。

9月17日，丘吉尔在议会讲话时，热情洋溢地赞颂了皇家空军飞行员，又留下了一句妙语：“星期日的战斗，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队历次战斗中成绩最辉煌、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可惜他当时不知道，就在当天，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推迟实施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9月15日不失为不列颠之战的关键一天。”

最光辉的时刻

德国虽然暂时推迟了实施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对英国的空袭并没有停止。从1940年10月份起，不列颠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空军对伦敦和其他城市狂轰滥炸，企图摧毁英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伦敦，成为德国空军轰炸的重点目标。

一天午餐后，丘吉尔正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在首相府谈公事，突然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立即赶去。原来是一颗威力很大的炸弹爆炸了。周围有二三十幢小型住宅被毁坏。当丘吉尔看到，人们在一大片瓦砾堆中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时，百感交集。人们见首相来了，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有人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丘吉尔的名字——“温斯顿”的昵称），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泪喇地一下流出来了，并失声痛哭。

一位老太太对陪同丘吉尔的伊斯梅将军说：“你们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您看这儿。”人们把丘吉尔领到废墟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

“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人们愤怒地喊道。

丘吉尔答应要替他们报仇。9月19日，他在致军方领导人的信中说：“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有人从道德和技术角度考虑，

反对报复，丘吉尔不以为然。10月16日，他再次指示军方领导人：“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

纳粹德国空军也对英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11月14日夜，德国空军出动了近500架轰炸机。对英国城市考文垂，从黄昏一直炸到天亮，共投下了600多吨烈性炸弹和好几千颗燃烧弹。考文垂中心区完全被夷为平地，400多人被炸死。德国宣传工具称之为“考文垂化。”

丘吉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了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可怜的人类啊！”

在英国遭到狂轰滥炸的那段日子里，丘吉尔经常到遭轰炸的地方视察灾情，慰问老百姓，帮他们解决困难、鼓舞他们的斗志。

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小饭店遭轰炸后变成了一堆瓦砾，幸好人没有受伤。饭店的男女主人、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泪流满面。丘吉尔不禁担忧起来：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在乘车返回的路上，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凡因敌人轰炸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财政大臣对此有顾虑，丘吉尔却要求坚决执行。两周内，一项战争保险方案制定出来了。他对议会解释说，当我看到我们没有竭力使被敌人轰炸造成的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

1940年11月19日至22日，德国空军接连3次轰炸工业城市伯明翰，近800人被炸死，2000多人被炸伤，造成巨大破坏。一两天后，丘吉尔赶去视察。那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路过一地点时，一位少女跑过来，把一盒丘吉尔爱抽的雪前烟扔进汽车。丘吉尔立即下令停车，走下车去。少女对他说：“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

丘吉尔深受感动，以首相身份亲吻了她的额头。他不难想象，那盒烟会花掉她两三个英镑。

丘吉尔不仅为军事战略、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操劳，也时常留心战争中别人不大注意的细微末节，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发现，只要空袭警报一响，人们都无一例外地钻地下室、防空洞，而有时飞来的敌机只有五、六架，有时甚至只有1架，而且往往还没有飞临伦敦上空。钻一趟地下室、防空洞，有时来回要折腾1个多小时，给工厂和机关工作造成很大混乱，对此，他提出，改进报警办法，把警报分为预备和紧急两种，预备警报响时，任何人不应中止日常工作，只有听到紧急警报时，才应立即躲避空袭。这项改进办法，对尽可能保持各部门正常的工作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在纳粹德国的空袭中，伦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一天傍晚，丘吉尔动身外出视察，在路途中，空袭警报响了。他看到，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一些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着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秋雾夹着蒙蒙细雨笼罩着伦敦。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丘吉尔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着折磨和苦难，他内心里一阵悲痛。

但是，作为英国首相，从全局考虑，他又表示，“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空袭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因为在他看来，伦敦就好象一头

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也照样能生存下去。他懂得，轰炸大城市，受“收益递减”规律支配。不久，很多炸弹都落在了已被炸毁的废墟上，很多地区已经再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伦敦人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顽强的毅力继续抗争，这时，许多人都为自己是伦敦人感到自豪，以致许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体会一下伦敦人的自豪感。结果，给市政管理带来不便，政府不得不出面阻止这种趋势。

丘吉尔为伦敦人感到骄傲。有关方面为了确保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已经制定了把政府机关迁出伦敦的周密计划。可是，丘吉尔从法国政府事先放弃巴黎的消极影响中吸取了教训，坚持留在伦敦。战争期间，他同夫人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伦敦经过加固的政府“新楼”里。

在英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丘吉尔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患难与共，使英国人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也使他的个人威望空前提高。1940年8月初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他获得的支持率高达88%，远远超过他的前任张伯伦。

9月份，张伯伦因病辞去了一切公职，保守党一致推举丘吉尔继任该党领袖。当他步入党代会会议大厅时，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0月12日，希特勒正式决定，把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推迟到1941年春天（1941年7月，他再次决定把这项计划推迟到1942年春季。1942年2月，他被迫同意把这项计划完全“搁起来”）。

这是英国最光辉的时刻，也是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

第七章 走向非中立

罗斯福：“如果你保持同我本人接触，并把你希望让我知道任何事情通报给我，我将无比欢迎。”

丘吉尔：“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圣经》的启示

1939年圣诞节前夕，白宫。

在寂静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办公桌上有几张报纸，上面充满着轰炸和激战的消息。烟灰缸上的雪前冒着青烟，一部《圣经》打开着，露出了“以赛亚先知”部分：“你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你们的城市成为灰烬，你们眼看着外族人……摧毁你们的产业。”罗斯福看到这里，思绪又转移到眼前的这场战争上来了。波兰灭亡后，这场战争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可理解，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奇怪局面。

罗斯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改中立法，是为了给英法输出武器开方便之门。可中立法修改之后，英、法向美国订购的军火不仅没有急剧增加，反而出人意料地急剧减少了。由于西线无战事，英、法两国认为，战争将拖3年之久，他们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生产所需要的武器，无须向美国购买。此外，罗斯福知道，美国1934年通过的约翰逊法规定，禁止向拖欠一战债款的国家贷款，中立法又不准向交战国贷款。这两条都适用于英、法，它们得不到美国贷款，更舍不得用黄金现钞从美国进口武器。

可是，美国驻英、法大使肯尼迪和布利特多次发回警告：英、法远远不是德国的对手，除非美国在1940年能供应英法1万架飞机，否则，英法就会败北。

另外，苏联的动向也越来越让人忧虑。9月中旬，他们先是伙同德国瓜分了波兰，随后又于11月30日进攻芬兰，轰炸芬兰的一些不设防城市。罗斯福对此非常愤怒，一度考虑同莫斯科断交，后因担心这会进一步把苏联推向德国怀抱才作罢。但他还是公开谴责了苏联的行为：“美国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浩劫芬兰的行为，不仅感到震惊，而且非常愤慨。”

罗斯福的目光又转向了《圣经》，上面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来吧，我们来解决彼此间的问题——上帝说——虽然你们的罪污殷红，我却要使你们像雪一样洁白。”

这时，他仿佛受到早期基督徒的某种启示，油然而生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要为和平而不懈地努力。于是，他提笔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当我想起以赛亚也是在这种时候第一次预言基督降生时，不由得心潮澎湃。在他降生前的几个世纪，世界的局势同现在很相象。那时同现在一样，到处烈火熊熊，人们就在被他们自己点燃的烈火照亮的危险道路上匍匐前进。然而，那时就已经预言耶稣的复活，总有一天要解放囚徒，侵略者必将被他们自己点燃的大火烧死，举剑宣战的人定将死于剑下己……现在，还没有一位精神领袖。公民领袖能够提出如何结束破坏、如何开始新的建设的具体计划。然而这一天无疑是会到来的。……”

12月23日，他把这封信寄给了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二世和美国的一些宗

教领袖。12月末，白宫宣布，总统委任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迈·泰勒为自己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全国都感到震惊。美国自1868年取消驻梵蒂冈代表以来，同天主教首脑一直没有正式关系。

这是罗斯福和平行动的一部分。

1940年1月3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向全国保证，他希望避免战争。“我们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促成一种能减轻世界危难的和平”。不过，他又说：“我希望在我们美国人中鸵鸟式的人物少一些。鸵鸟把头钻进沙里对它的生命并没有好处。”

西线仍然无战事。罗斯福决定进行一番争取和平的尝试。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任何可能性——不管它是多么遥远，多么渺茫——都不应被忽视。”

1940年2月9日，他宣布：将派韦尔斯出访欧洲，表面说，这次出访“仅仅是向总统和国务卿提供有关欧洲当前局势的情况”，实际上是去寻求实现某种公正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之所以不挑明这一点，是因为英国首相张伯伦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曾警告说，如果公开承认为谋求和平而努力，可能会有损于英法的士气。在罗斯福看来，一旦密谋和平的尝试成功，将会大大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

3月底，韦尔斯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回到华盛顿，立即向罗斯福作了汇报。他说，在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会晤时，墨索里尼“大部分时间闭着眼睛，……你几乎可以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是冷冰冰的，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两小时，立场很顽固：在德国粉碎英法毁灭德国的企图之前，决无持久和平可言。法国人认为，不大可能进行和谈，只有打下去，使希特勒倒台，才能实现和平。英国人根本不相信能同柏林谈判。

韦尔斯最后说：“目前，没有丝毫为谋求持久和平而使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韦尔斯一向头脑冷静，很有理智。罗斯福很器重他，知道他说话总是留有余地。既然连他都这样认为，罗斯福则确信和谈无望了。其实，几个月来，他自己也一直认为，除非美国给英、法提供慷慨援助，否则，英法就会完蛋。

罗斯福看重丘吉尔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又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战，奇怪战争的局面结束了。

最初，罗斯福像斯大林一样，认为英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法国有最强大的陆军，它们能顶住德国的进攻，希特勒的闪电战虽在波兰见效，对英法就未必了。而苏联将在东线拖住德军。德国人民将会厌战，揭竿而起，推翻希特勒的统治。那时，和平将会到来，美国无须参战。

5月14日下午，美国驻法国大使比尔·布利特从巴黎打来电话。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罗斯福焦急地问。

“一切都知道。我不敢在电话里跟您说。不过我已经给您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布利特又补充一句，“请仔细研读。”

“那当然。”

接着，布利特突然说了一些笑话，其中插上这么一句：“但是老板，你

对我说的话一个字也别相信！您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骗子。”

罗斯福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布利特又谈起了倒逆书写法，“老板，一切都是反的。”

“我懂了，比尔。”

国务院把布利特的密电送来了，上面说：德国人被撵了回去；法国的战斗力、参谋部的工作以及士气都没有问题；通向巴黎的道路坚不可摧；如果德国人进来，准会坠入陷阱。

罗斯福又读了一遍，想起布利特刚才说的话，知道他的本意是：法国的战斗力、参谋部的工作以及士气都已土崩瓦解，在德军和巴黎之间不存在任何阻隔，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长驱直入。

罗斯福深感不安。

不过，5月10日，从西欧也传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

30年代，丘吉尔一直在野，罗斯福与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相反，与张伯伦的交往却比较多。那时，内维尔·张伯伦被认为是英国政府中“最能干和最有实力”的人，并以深刻了解“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而闻名。1937年5月，他继鲍德温之后出任英国首相，最大的愿望是成为青史留名的“伟大的和平缔造者”。罗斯福很重视他的见解，1937年6月，邀请他访问美国，共商维护世界和平大计，被张伯伦委婉地拒绝了。罗斯福逐渐感到，这位英国首相不怎么愿意为和平卖力。

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1938年初，罗斯福和韦尔斯商量。准备召集各国政府的外交使节来白宫。共商维护和平大计。他很重视这次行动，认为这是呼吁美国人民支持政府维护和平努力的一种手段，也是向欧亚独裁者显示美国对他们扩张行为严重关注的一次机会。他希望这项行动事先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1月11日，他向张伯伦通报了他的想法，希望张伯伦给予“真诚赞助和全力支持”。张伯伦再次借故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说，如果墨索里尼愿意恢复英、意友好关系，英国就准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罗斯福大失所望。1月17日，他电告张伯伦，表示反对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说这将鼓励日本人进一步侵略中国，还将加强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将会损害英美关系，同时，他还决定，暂缓考虑邀请各国使节来白宫共商大计的计画，并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更加持怀疑态度。

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初期，罗斯福根据来自各方面信息认为，张伯伦同法国人说一套，同德国人说另一套，而同美国驻英大使说的是第三套。他对赫尔等人说，张伯伦“很狡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信赖，他现在不惜任何代价耍英国的老一套和平把戏，9月16日，张伯伦第一次飞往德国同希特勒会谈时，罗斯福说，张伯伦不借任何代价谋求和平，英、法将把捷克斯洛伐克抛弃给德国侵略者，而在这次国际暴行之后，他们就要“洗刷他们的犹太·伊斯卡里奥之手的血迹。”（耶稣的12信徒之一，是他把耶稣出卖了）。

当时，他不相信张伯伦的办法会奏效。他对英国驻美大使林赛说，如果张伯伦的政策奏效的话，自己将是第一个向他祝贺的人。随后几天，当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拒绝希特勒的要求，战争一触即发时，罗斯福也很紧张，担心战争爆发。后来，当希特勒同意谈判，张伯伦于9月28日接受第三次赴德邀请，准备促成危机和解时，罗斯福果然打电报，称张伯伦为“大好人”。可

是，这种好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那时，罗斯福还没有同丘吉尔直接打交道，但丘吉尔关于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许多演讲，他是知道的。印象较深的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丘吉尔的那番“苦酒”论。当时，丘吉尔严肃地警告说：“不要以为到此完结了，这不过是算总帐的开始，仅仅是尝尝第一口苦酒的滋味罢了。除非我们一如往昔。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次挺身而出，捍卫自由，否则，这苦酒杯将年复一年地递到我们嘴边，让我们尝尽苦酒。”事实证明这番话是正确的。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远见卓识不得不膺眼。1939年初，罗斯福采取了一些重振军备的措施，结果美国国内谣言四起，说他把莱茵河作为美国防御边界，弄得他很被动。丘吉尔却托人捎来口信表示赞赏，他说：“美国所干的最妙的一招，就是继续不停地击鼓助威，对独裁者们一直厉声斥责。”这些话让罗斯福感到振奋。

大战爆发后，罗斯福对丘吉尔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十分高兴。1939年9月11日，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除祝贺他就任英国海军大臣外，还表示愿意与他建立秘密的通信联系：“如果你保持同我本人接触，并把你希望让我知道任何事情通报给我，我将无比欢迎。”丘吉尔立即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信未署名“海军人员”。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富有历史意义的信函往来。当丘吉尔就任首相后，便改署名为“前海军人员”，罗斯福也乐意这样称呼他。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系，一直保持到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给罗斯福发出函电约950份，收到的回函约有800份。

随着信函往来的增多，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在丘吉尔出任首相后，英、美之间的很多重大事情，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函电来处理的。丘吉尔回忆说：“这样做，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

丘吉尔很注意，不把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纳入他与美国总统通信的讨论之列。他说，“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加倍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唇亡齿寒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任首相后给罗斯福写了第一封信。他希望保持他们之间通信的非正式性质，“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他介绍了西线的战况，希望美国积极地干预这场战争：“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希望罗斯福宣布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即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英国。

罗斯福回电说，乐意继续保持私人通信联系。对于丘吉尔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他将给予最善意的考虑。

这时，荷兰军队已经投降，英法盟军显然抵抗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德

军进展迅速，法国危在旦夕。罗斯福不仅担心法国，更为英国担心。他最担忧的是英法都战败投降后，它们的强大海军落入德国人手中，被用来进攻美国。

丘吉尔为了争取美国的积极支援，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5月20日，他致电罗斯福，表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都决不投降。”但是，如果英国现政府垮台，继任者是否会屈服于德国，甚至拿唯一的筹码——皇家海军舰队——同德国人讨价还价，那就很难说了。

罗斯福并没有把这类话当作危言耸听。那几天，他深刻地认识到，英法与美国，犹如唇齿相依，唇亡必致齿寒。问题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们，美国的老百姓，并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必须继续开导他们。

5月16日，他对国会议员们说：“在帆船可以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运行时，大西洋和太平洋曾经是相当可靠的防御屏障。甚至在那个时代，敌人也曾在实际上有可能通过突然袭击焚烧过我们的国会大厦。后来，蒸汽发动的舰队和护舰船队在大洋中每小时航行15或20英里时，两大洋也还曾有助于我们的防务。

“但是，航空这一新的因素使得可能进攻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00乃至300英里。

“此外，航空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可以使用较近的基地对美洲大陆发动攻击。……”

因此，“美国人民必须完全改变保卫国家的概念，这已是明摆着的现实。”

罗斯福充满激情的呼吁，加上法国的命运令人忧虑，使30年代对增加国防经费十分吝啬的美国国会，突然变得慷慨大方起来。5月16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增加军费11.8亿美元，两周后，国会批准拨款15亿美元。不久，为了加强海军航空兵实力，罗斯福又要求国会拨款1亿美元，国会立即批准。5月31日，罗斯福再次对国会说：“过去两周内事态的发展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要求进一步扩大军备计划。”国会花了不到4周时间讨论，又增拨国防经费17亿美元，并同意把美国陆军正规军从28万人扩大到37.5万人。

6月4日，英国成功地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广播公司已预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将于这天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午餐后，罗斯福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打开短波收音机，收听丘吉尔的讲话。

一会儿，收音机里响起了英国议会塔楼上敲响的钟声，紧接着，传来了丘吉尔洪亮的声音。罗斯福感到，他的语调坚定有力，讲话振奋人心，在谈到英国军民在这次大撤退中的英勇表现时，充满了自豪；在谈到英国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时，声音铿锵有力，给人一种坚不可摧、宁死不屈的深刻印象。丘吉尔最后说：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英伦三岛被敌人征服——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指美国）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罗斯福心潮起伏，深深地为丘吉尔的演讲所打动。他默默地表示，放心吧，朋友，新世界一定会挺身而出。

痛斥墨索里尼

罗斯福认为，保卫美国安全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对英法的援助。1940年5月下旬，他要求美国军方向他报告，看有什么武器可以拨给英国和法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立刻命令检查美国军械与军火储备情况，得知尚有一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制造的武器还封存着。罗斯福立即下令把它们售予英国。

马歇尔批准开列的第一批清单包括50万支步枪、每支枪附子弹250发，900门75毫米的大炮、附带100万发炮弹，8万挺机枪以及其他军人。为了避开中立法设置的障碍，政府把这批军用物资先卖给一家私人公司，然后再转售给英国和法国。罗斯福要求保证迅速交货，“要日以继夜地督促，直到把物资装上船为止”。

军械署署长韦森少将奉命直接督办此事。从6月3日起，所有武器开始包装。周末，600多辆载重货车满载军火驶向新泽西州的陆军码头，从那里立即装上驳船，沿河而下运往格雷夫森德湾。6月11日，12艘英国商船驶进该湾，从驳船上启货装舱。7月中旬，这批武器平安地运到了英国，及时地装备了因敦刻尔克撤退而武器奇缺的英国军队。罗斯福雪中送炭，使丘吉尔深受鼓舞。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在现在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表明了美国的信义和领袖气概，从它自己的军火中拿出这么多的武器来帮助一个在许多人看来已被打败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收获，而且，无论是敌人或是朋友，在对于入侵英国的所有估计上也把这件事看作一个重要因素。”

希特勒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跃跃欲试，企图趁火打劫。丘吉尔和法国总理雷诺极为忧虑，他们请罗斯福出面，帮助制止意大利对法国宣战。罗斯福使出了浑身解数。

其实，早在1940年4月底，罗斯福就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函，暗示如果意大利参战，美国将加以干涉。5月中旬，他再次向墨索里尼发出了呼吁，软硬兼施。一方面说，“伟大的意大利人民把你称为他们的领袖，你有能力防止战火蔓延，使它不殃及地中海地区的两亿生灵”。另一方面，又不无威胁他说：“万一战火燃遍全球，就将失去各国首脑的控制，任何人……都无法向自己或人民预言其后果。”

可是，此时的墨索里尼却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他回答说：“意大利现在已同德国结盟，并将继续保持结盟，在欧洲的命运处于危难之际，意大利不能袖手旁观。”

5月底，罗斯福再一次警告墨索里尼说，意大利的干预可能迫使美洲国家参战，美国也必然会重新加强武装，并加倍向英法提供军备。

此时，墨索里尼已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

6月10日下午4时45分，意大利宣布对英国和法国宣战。意大利军队32个师立即向法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法军腹背受敌，更是难以招架。

当时，罗斯福正准备去弗吉尼亚大学演讲，讲稿早已拟好。消息传来时，他怒不可遏。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把演讲稿又修改了一遍，加了一些新内容，随后，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说：“1940年6月10日这一天，手持匕首的人从背后对他的邻居捅了一刀。”“我们美国将举国一致，奉行两项明确的、同时并举的方针。我们将向抵抗暴力者提供我们的物质资源，同时，我们将调节和加速这些资源的利用，使我们自己在美国也可以得到装备和训

练，以适应任何紧急状况和一切国际上的需要。”

演讲后罗斯福回到白宫，霍普金斯说：“您真把墨索里尼痛骂了一顿。”

“可不是嘛！”罗斯福兴奋他说。“马上就要选举了，这有点危险吗？”麦金太尔有点不安，“韦尔斯认为，您应该把提到匕首的那句话删掉。”

“我根本不在乎，只有这次，我对邪恶行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罗斯福觉得，对墨索里尼这样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小人，非痛骂一顿不可。

“我认为老板真了不起！”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一本正经地说。

罗斯福发表上述演讲时，伦敦时间已是午夜时分。丘吉尔和一部分将领在海军部作战室收听了罗斯福的演讲。当听到有匕首的那句话时，屋子里爆发出了一阵痛快的叫喊声。平时演说很讲究遣词造句的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演讲，总统充满了激情，演讲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信息。丘吉尔心情难以平静，虽已是第二天凌晨，他仍然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昨天晚上我们都收听了您的演说，您的宣言的伟大远见，加强了我们的信念。您关于美国将给予斗争中的盟国以物质援助的声明，对于……盟国是一种有力的鼓舞。……我和我的同僚对您……的种种努力，谨表衷心的感谢！”

丘吉尔的迫切要求

1940年5月15日、6月11日和18日，丘吉尔接连3次致电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把40至50艘一战时建造的旧驱逐舰借给英国使用。并强调此举对英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6月28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又致电罗斯福，亲自提出同样请求。罗斯福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

法国败降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英国步法国后尘，投降德国。直到7月3日奥兰事件发生，英国海军一举夺取或摧毁法国舰队，美国人才看清了丘吉尔战斗到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可随后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英国人能顶住希特勒的闪电战吗？多数人对持怀疑态度。法国的魏刚将军曾预言：“不出3个星期，英国人就会像一只小鸡一样被德国人拧断脖子。”民意测验表明，6月底，仅有1/3的美国人认为英国能取胜。罗斯福本人也说过，英国劫后余生的机会仅有1/3。

既然如此，很多人认为，向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是不明智的。万一英国沦陷，这些军火就会落入德国人手中，反而会被用来进攻美国。法国投降后，赞成援助英国的美国人，在3周内减少了10%。

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重视加强美国自身的防务。为了防止罗斯福总统不顾一切去援助英国，6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沃尔什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任何一项军用物资，除非经陆军参谋长或海军作战部长证明它们对美国全然无用，否则均不得转让给外国。

更要命的是，恰好在前几天，有人曾质问：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浪费纳税人的钱，保养那些一战时的旧驱逐舰？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当时证明说：它们对美国防务具有潜在价值。现在，再要重新证明它们“对美国全然无用”，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在转让驱逐舰问题上，罗斯福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法律障碍。

与此同时，他却越来越担心英国败降后，皇家海军舰队的未来，一如当初丘吉尔担心法国海军舰队的未来一样。他想从丘吉尔那里了解：万一德国入侵英国成功，皇家海军舰队怎么办？他希望丘吉尔能保证，到时候皇家海军舰队开往美国海域。

丘吉尔回答得很干脆：皇家海军舰队将誓死战斗，决不投降！

丘吉尔深知，美国的舆论氛围、决策层的顾虑，加上国会的修正案，不利于罗斯福作出向英国转让驱逐舰的决定。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罗斯福但陈利害关系。6月24日和28日，他分别致电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和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要求他们逮住机会向罗斯福转达这样一个信息：丘吉尔本人决不投降，但不能保证未来的英国政府不投降；如果英国（实际上是丘吉尔）被美国抛弃，便可能出现吉斯林式的政府向希特勒求和，英国人民会怨恨美国对他们的苦难袖手旁观，皇家海军舰队也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丘吉尔说的这些话，既是实际情况，显然也是对罗斯福的一种要挟。

罗斯福很为难。国会通过的沃尔什修正案，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一筹莫展。主观上，他愿意把那些旧驱逐舰给英国人，可客观上的障碍太大了。他绞尽脑汁，一度考虑：把美国的驱逐舰卖给加拿大，加拿大将它们用于西半球的防御，从而腾出加拿大自己的驱逐舰给英国。可仔细一想，又觉得这种调包计委实不太高明。

7月底，丘吉尔再次致函罗斯福，言词极为恳切（用语言打动人心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已经到了极急迫的时候，请您让我们获得我们以前要求的驱逐舰、汽艇和飞艇。……整个战争的命运可能取决于这个小而容易弥补的因素……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您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罗斯福的情绪被丘吉尔感染了，他对同事们说：“英国的生死存亡……很可能取决于能否得到这些驱逐舰。”8月2日，他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一当务之急。有人建议，用美国的驱逐舰换取英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这样，斯塔克便可以向国会证明，这项交易从总体上看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的国防。罗斯福接受了这项建议，并补充说，英国还必须公开保证，一旦战败，其海军舰队将开往美国海域。

丘吉尔意识到，这是一次不等价交换：美国的驱逐舰“既陈旧而且效能又低”，而英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对美国有巨大的战略好处。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德军即将入侵的严峻现实，使英国迫切需要这批驱逐舰，而那些基地“只是对美国才有战略价值”，况且英国目前也无力防守它们。此外，他比一般人看得更远：“美国将50艘驱逐舰移交英国，这就肯定构成一种非中立行为。……使美国更接近英国，同时更接近战争。”它将“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从长远来看，这对英国更有利。不过，大英帝国的尊严，使他“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出卖基地”。

此外，他也不愿意就英国海军舰队的未来作出公开保证。因为这种保证等于公开向人们暗示英国会战败，这将严重打击英国军民的士气，动摇军心民心。他一直严禁英国政府和军方谈论英国战败的善后问题，认为只有鼓足勇气、背水一战，才有求生的希望。

对罗斯福来说，更难办的是国内的障碍。各种迹象表明，国会可能不支持这笔交易。再说，如果按正常的程序把议案提交国会，国会来一番马拉松式的辩论，可能会耽误英国的大事；一旦国会否决，将会严重打击英国人

的士气。他想先争取国会中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支持，便给沃尔什参议员写了一封信，言词极为恳切，可沃尔什不为所动。

转让驱逐舰

在万般无奈之际，8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几位著名律师的一封公开信，论证说，在当前的立法条件下，总统可以避开国会来处理转让驱逐舰问题。在别无其他良策的情况下，罗斯福决定冒险一试。

8月13日，他未经国会授权，正式通知丘吉尔，美国有可能立即以至少50艘驱逐舰、20艘鱼雷艇和10架新式飞机来装备英国，条件是把英国在西半球的一批军事基地卖给或以99年为期租给美国，丘吉尔就英国海军舰队的未来不公开地作出保证。罗斯福意识到这样做所冒的政治风险。国会可能“大喊大叫”，反对者可能攻击自己是“战争贩子”、“独裁者”，还可能危及自己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的努力。可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他说，英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拖延援助“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我没有权力单从作为总统候选人或获取选票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政治”。

丘吉尔了解罗斯福所冒的政治风险，对他表示“无限感激”。但仍然不想就英国海军舰队的未来作出那怕是不公开的保证。他提醒罗斯福，切记要避免挫伤英国人民高昂的战斗情绪。此外，他赞成租借而非买卖的方式。显然，他不想背上“出卖英帝国领土”这个骂名。

对罗、丘二人来说，都面临着如何向本国人民解释这笔交易、赢得本国人民支持的问题。对此，二人都从对于自己有利的角度，把这笔交易提到了本国公众面前。8月16日，罗斯福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说，为了维护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美国需要取得英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他暗示说，美国会拿出某种东西作为交换，至于拿什么东西，他装糊涂，说不知道。这样一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即将达成的协议首先是从美国安全出发的。

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说，英国政府准备把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作为防范纳粹进攻的堡垒，而不需要美国付出任何代价：“此中并没有任何转移主权的问题，……对我们的好处并不少于对他们的好处……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物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么作。”

两人都避而不提美国向英国转让驱逐舰，以免两国公众把基地与驱逐舰联系起来，看成是一笔交易。丘吉尔意识到，尤其是英国公众，会激烈地反对以英帝国领土交换美国驱逐舰的交易。其实，驱逐舰才是问题的关键和起因。

丘吉尔本人从内心希望，英美双方不要把这次互助行动看成是一笔交易。一则是因为美国驱逐舰与英国的基地价值并不相等；二则是考虑到，英美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肩负重任，彼此合作、援助至关重要，若从一开始就给双方的互助行动打上太浓的商业交易色彩，对双方都不利，8月22日，他致函罗斯福总统说：“在我们之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如合同、讨价还价或售卖这一类的事情。”英国向美国提供基地，“完全不以你的驱逐舰和其他援助为条件……我们是患难中的两个朋友，彼此应竭尽所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情愿提供上述设施而不要任何代价。”即使美国不能向英国提供驱逐舰，英国仍然向美国租让基地。他说，把二者看成是一种交易很不妥当，甚至是

危险的。”一旦接受了这种概念，双方的人民就要对所给予和所取得的斤斤计较”，就会在货币的基础上计算得失。总之，他希望英美两国确立一种无私援助、不计得失的非交易的观念。从客观上看，当时美强英弱，在双方的物资援助中，无疑美国付出多，英国付出少，树立不计得失的非交易观念，于英国更有利。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看，树立非交易的互助观念，对盟国互相合作、打败法西斯是极为必要的。几个月后美国通过的《租借法案》，便是这种非交易互助观念的典范。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也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可是，对罗斯福来说，沃尔什修正案使他不可能把驱逐舰无偿地送给英国，而只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使美国军方能向国会证明，此举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美国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也就是说，罗斯福只有把转让驱逐舰与获取军事基地作为一笔交易，才能在国会议员面前说得通。

为了弥合双方的分歧，有人建议，英国把它在西半球 8 个军事基地中的 2 个——纽芬兰和百慕大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而以其余 6 个基地作为交换美国驱逐舰的条件。罗斯福采纳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勉强同意了上述建议，但又强调，在英国向美国提供了基地后，美国把驱逐舰等军用物资给英国，“不是补偿或照顾我们，而是承认我们为美国的安全尽了力”。可见直到最后，丘吉尔仍然像倔犟的秋菊一样，坚持要讨一个合适的“说法”。

1940 年 9 月 2 日，英美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 50 艘驱逐舰，英国则把它在西半球的 8 个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为期 99 年，免除租金。丘吉尔保证英国舰队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凿沉或投降。

9 月 5 日，丘吉尔用谨慎的措辞把这一消息通报给了下院。他强调说：“当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时，就最好听其自然，不再究问。”

美国人对这项协议普遍表示欢迎，他们深信因转让 50 艘陈旧的驱逐舰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一家报纸称那些英国军事基地为“我国东面的钢铁堤防”。

美国的 50 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后，从实际效果来看，对改善英国海上防务的实际价值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大，那么重要。由于需要维修，到 1940 年底，它们中实际只有 9 艘服役。但这项协议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它使美国摆脱了中立地位，进入了非交战状态，与英国的联系更紧密了，与战争离得更近了。

第八章 竞选连任

威尔基：“选举罗斯福，就意味着把你们的亲人送进坟墓。”

罗斯福：“我保证，你们的孩子们决不会被送到国外去打仗。”

司芬克斯之谜

1939 年底，华盛顿。

在新闻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年会聚餐会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用纸絮的司芬克斯像，似乎正在让那些消息灵通的记者们猜谜。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个纸扎的司芬克斯微笑着的嘴里，衔着一个长长的罗斯福式的烟嘴——它意味着这次有待记者们揭穿的谜面是：在 1940 年的美国大选年，罗斯福是否将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

在 1939 年底，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但在美国历史上，从开国元勋华盛顿，到前任总统胡佛，没有一个总统连任超过两届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在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中，无论是有雄才大略之辈，还是政绩卓著者，都没有试图打破这个传统。罗斯福是否准、备对这一传统进行挑战呢？

他已经连任两届。通常，人们往往只看到美国总统的权力、地位、待遇和荣耀，却很难想象美国总统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辛劳、紧张。罗斯福以病残之躯，在白宫已经干了 7 年，充分地领受了当总统的酸甜苦辣。几年的白宫生涯，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而未来的战争，势必使美国总统承担起更繁重的责任。罗斯福已经感到有些疲倦了，他一度希望，在第二届任期届满后，退下去过一种宁静的退休生活。事实上，他早已在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准备：他在家乡海德公园内，正在修建图书馆和一幢山顶小别墅——“梦庐”，预计 1940 年可以竣工。他想退休后回到那里去撰写回忆录，过一种闲适宁静的生活。

1940 年初，当有人提出希望他第三次连任总统时，他说：“不成，不成，我真的干不了啦！我得拐过这个弯去，我需要休息。我想回海德公园老家。我要去照顾我的树木。我要让农场有收益。我得赶紧修好我那山顶的小楼。我想写历史。不成，我真的干不了。”

罗斯福比较看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相信，在他干满两届后，无论人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仅凭他在美国一手推行的新政，就足以使他在美国历史上占有较重要的一席之地。而谋求第三次连任，面临着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这一传统的巨大障碍，可能性很小。退一步说，即使当选了，国会也必然处处与自己为难，何不现在就急流勇退？

可是，1940 年，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亚各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德意日轴心国家侵略的巨大威胁。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由谁来当美国总统，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遭到轴心国家的侵略和奴役，可美国仍然受到孤立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这场世界大战，对美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供了大好时机。显然，这样一个特殊时刻的美国总统职务，对罗斯福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力。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罗斯福惯于给自己的行动留出可进可退的两种选择。当形势对自己有利时，便果断地出击，一旦形势于己不利时，又可以突然撤退而无后顾之忧，他善于随机应变，而不喜欢提前几年或甚至几个月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然后坚持不变。有时，他像狡猾的狐狸一样，故意弄乱其来踪去迹，让别人莫辨其真实意图。对 1940 年是否要谋取第三次连任，他最初采取的也是这种态度。

在 1940 年大选活动到来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尽量回避谈论第三次连任问题。他的得力干将、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认为，值此战乱之际，唯有罗斯福能驾驭美国和世界局势，他为罗斯福第三次连任到处奔走。可罗斯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既不鼓励，又不制止。罗斯福的内心活动，很少有人摸得透，即使是他最信赖的心腹顾问、得力干将，也未必能摸清他的内心想法（也许霍普金斯有点例外）。在 1939 年 9 月大战爆发之前，有关他是否会谋求第三次连任的问题，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战争爆发后，罗斯福以战争为理由，宣布在白宫暂时停止一切涉及他个人的政治议论。每当一些好奇的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谋求第三次连任时，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请免开尊口。为他操刀捉笔的舍伍德说，要想知道罗斯福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终于下定决心争取第三次连任，“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权威性的解答的。……可靠的说法只是：如果当时不出现国际危机，他就不可能参加竞选”。

后院起火

连任总统不得超过两届的传统，是罗斯福第三次竞选遇到的一个巨大障碍。反对他谋求第三次连任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他的家人和政府成员。

在战时盟国三巨头中，罗斯福夫妇的关系较特别。年轻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仪表堂堂、英俊潇洒，而埃莉诺·罗斯福却长得较丑。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富兰克林注意到，一直没有人请埃莉诺跳舞，便走上前去主动邀请她。当时，他很可能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这一对外表相距很大的年轻人就这样慢慢地相爱了。因为埃莉诺长得不漂亮，罗斯福的母亲一直不喜欢这个儿媳妇。结婚后，罗斯福感情不专一。有一天，埃莉诺发现他同他的女秘书有暧昧关系，感到很绝望，本想解除婚约，可 20 世纪初的美国，离婚还不像后来那样普遍随便，道德舆论的压力还比较大。经过冷静考虑，他们没有选择离婚。夫妻关系虽然维持下来了，但夫妻感情却受到了巨大伤害，再也没有完全复好如初。虽然在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以及在他同疾病——小儿麻痹症——作斗争的过程中，埃莉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他们的夫妻感情却始终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各种原因，埃莉诺也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早在 20 年代，就是民主党内十分活跃的领导成员之一，1924 年任民主党妇女小组委员会主席。

1933 年，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埃莉诺自然成为第一夫人，可夫妻感情中的阴影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当时的白宫门卫韦斯特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单独地呆在一个房间里。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分居生活。”

在政治问题上，埃莉诺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并非一味地扮演第一夫人角色、夫唱妇随。她认为，应遵循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历史传统，

反对罗斯福谋求第三次连任。罗斯福曾问她，她希望看到谁任下届总统。埃莉诺说，希望看到国务卿、民主党内的元老人物科德尔·赫尔任总统。1924年，赫尔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时，曾提名埃莉诺任妇女小组委员会主席。自此之后，埃莉诺一直支持他。埃莉诺还说，若赫尔不行，还可以推荐詹姆斯·法利作为总统候选人，因为法利为罗斯福的前两次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又是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总之，埃莉诺反对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

此外，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在政治上也一直同父亲唱对台戏。早在新政初期，埃利奥特就曾为强烈反对罗斯福新政的赫斯特报系工作。后来，他转到电台当评论员，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攻击罗斯福的新政政策。来自儿子的攻击，比一般政敌的攻击更让罗斯福感到伤心。现在，埃利奥特又像他妈妈一样，反对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而公开支持罗斯福的政敌、副总统加纳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让做父亲的罗斯福很痛心。

除了家人之外，民主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在罗斯福第二届任期内，民主党内就有许多人存在着担心他搞独裁的心理。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打破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传统，许多人明确表示，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民主党内，现任副总统加纳、国务卿赫尔、邮政管理局局长法利，都想在1940年竞选总统，更是特别起劲地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

加纳现年71岁，身体结实，代表南方各州的利益，虽然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却反对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在罗斯福即将任满两届时，他迫不急待地想在1940年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国务卿赫尔是民主党内的元老，68岁，为人谨慎、稳重、彬彬有礼。他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来日不长，希望在1940年参加总统竞选。与加纳和赫尔相比，法利要年轻得多，只有51岁，与罗斯福是老乡（来自同一个州），虽然也想在1940年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也愿意退而求其次：当副总统。因为他毕竟还比较年轻，来日方长。他为罗斯福的前两次竞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坚决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如果罗斯福再一次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法利连做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了。因为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能来自同一个州。

1939年至1940年初，加纳、赫尔、法利在民主党内患通一气，一致表示，反对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罗斯福本人，而是出于维护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原则——总统不得连任三届。罗斯福要想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必须首先克服来自民主党内的反对意见。

各个击破

直到1940年初，在是否参加总统竞选问题上，罗斯福对自己的真实意图一直秘而不宣，即使是他最知己的心腹顾问、朋友，也不知他到底打什么主意。在罗斯福的同事和朋友中，霍普金斯是他最知己的心腹顾问。1940年1月22日，霍普金斯曾对人说，他完全有把握地认为，罗斯福会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可到了4月下旬，他又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直到这时，罗斯福还不愿为获得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开始活动，也不希望他的任何朋友为他开展活动。

然而，密切注视着罗斯福政治动向的人认为，大约从1940年5月中旬起，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罗斯福已经作出了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的最后决定。法利说过，自1940年5月17日以后，他才开始相信，罗斯福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民主党内的其他一些政治家也有同感。联系到欧洲战局的变化，人们认为，是希特勒在西线发动的强大攻势，促使罗斯福下决心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的。

一旦决心已定，罗斯福便开始同他的政敌进行较量。在党内和国内政治斗争中，他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久经炮火的考验，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民主党内那几个蠢蠢欲动的人，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加纳是现任副总统，如果罗斯福不参加角逐，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中，他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不过，作为现任副总统，要在民主党内获得提名，获得现任总统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他与罗斯福之间，曾有过一段关系融洽的时期，但早已成为过去。他们之间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平时很少接触，只是在内阁开会时偶尔见面。到1940年初，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几乎全部断绝，罗斯福甚至不希望加纳出席内阁会议。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支持加纳当总统的，即使自己不参加竞选，他也不会支持加纳。他私下对有些人暗示说，他宁可背弃民主党的原则，也不支持加纳竞选总统。当加纳为在民主党内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碰得头破血流时，罗斯福非常高兴。

罗斯福对法利的态度有所不同。法利长期追随他，曾负责他的前两次竞选活动，操办得很出色。罗斯福对他不忍心下手太狠，而是请芒德兰大主教出面当说客，劝法利这次不要出来竞选总统。可法利认为，罗斯福已连任两届，不应破坏美国的政治传统，谋求第三次连任，而应自觉地退下去。

对待国务卿赫尔，罗斯福采取的手法又有所不同。赫尔虽然很想当总统，但却深知，如果没有罗斯福的支持，他这个现任国务卿几乎不能在民主党内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不像加纳、法利那样锋芒毕露，四处活动，在民主党内，支持他的人也很少，以至最后。他若想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几乎完全有赖于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多次对他说过，希望他来接班。这一半是策略，一半是真心话。如果罗斯福不参加竞选，很可能支持赫尔。

显然，在民主党内的这场竞选中，罗斯福占有明显的优势。

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1940年7月15日在芝加哥召开。把会场选在芝加哥，是罗斯福的主意。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凯利是他的朋友、忠实的追随者。会议在芝加哥召开，便于凯利尽地主之宜，作出一些有利于罗斯福的安排。

霍普金斯主动地承担了为罗斯福组织竞选的任务。自1940年5月10日起，他就住进了白宫。白宫内从前的林肯办公室，成为霍普金斯的卧室。霍普金斯本人逐渐成为罗斯福最信赖的心腹顾问。6月20日，他又陪罗斯福到海德公园小住4天，不久便前往芝加哥，为罗斯福获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名开展活动。

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加纳远远不是罗斯福的对手，几经较量后，败在罗斯福的手下。

7月3日，罗斯福又邀请赫尔共进午餐，向他表示，自己准备谋求第三次连任。赫尔十分惊讶，清醒地意识到，失去了罗斯福的支持，自己根本就没有希望在民主党内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罗斯福就这样很轻巧地把赫尔打发出局了。

剩下的主要对手是吉姆·法利。他是来自爱尔兰移民的天主教徒，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天主教徒当选总统的先例。法利多年来掌管民主党领导机构，积累了一些政治资本。他对这次竞选充满了信心，其他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最担心的是罗斯福再次参加角逐。可是，罗斯福一直未向他透露真实想法，在天主教徒是否有资格竞选总统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暧昧。7月初，法利找到罗斯福，想弄清罗斯福到底是否准备参加竞选，并加以劝阻。

“吉姆，我不打算竞选了，我准备这样通知代表大会。”罗斯福一本正经他说。实际上他是在耍滑头，他指望法利劝他竞选，这句话只是他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法利自然十分了解罗斯福的这种把戏，便直截了当他说：“如果你说得明确的话，大会就不会提你的名。”接着，法利又简明扼要地申述了他反对总统三次连任的理由。

“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呢？”罗斯福问。

“我就发表一个声明说，如果提了我的名，我不参加竞选，如果选举了我，我不就职。”

“吉姆，如果提名和竞选我都获得成功，在目前这样的局势下，我不能拒绝宣誓就职，即使我知道30天后我会一命呜呼。”罗斯福说完后，身子往后一靠，手指夹着一支香烟，其神色表明，他说这番活是很认真的。

法利后悔自己对这位老乡的政治意图及决心了解得太晚了，以至没有多少时间去组织反击。现在，只有等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裁决了。

“我们需要罗斯福”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支持罗斯福竞选连任的人一致要求罗斯福到代表大会上去露一下面，以便争取更多代表的支持，罗斯福拒绝了这一建议。当支持者们向他请示：应如何对付法利集团？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大会应自行决定一切，他将接受大会的裁决。实际上，他考虑到，鉴于谋求第三次连任的特殊性，他希望这次提名是民主党向他自动发出的真心诚意的召唤。

7月15日（星期一）上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体育馆举行。大会主席吉姆·法利主持大会，芝加哥市长凯利致开幕词。与会的代表们及旁听者大多神情沮丧。在这战乱之际，人们对应该推选谁做总统候选人心中无数。第二天，会议仍然开得毫无生气。代表们的演讲尽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会场上人来人往，喧闹嘈杂。伊克斯等几个人密谋策划，准备操纵大会提名罗斯福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霍普金斯为此通过电话向罗斯福请示。罗斯福不同意这样做，坚持大会按预定的议程开下去。

7月16日晚上，大会常任主席、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向大会发表演说，与会的代表们依旧是无精打采。当巴克利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接着，巴克利宣读了罗斯福写给大会的一封信。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今天没有，也从未有过任何愿望或意图，想在明年1月之后继续担任总统，或任何其他政府职务。……我所有的朋友也都知道，这是纯粹的事实，毫无虚假。我要求向大会传达这一纯粹而毫无虚假的事实。”

巴克利接着说，罗斯福总统“以十分肯切和真挚的心情表示：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完全有自由投票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这就是美国总统要我转达给你们的话。”

巴克利说完后，全场震惊，一片沉默。与会的代表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突然，会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四周的扩音器里传出了一阵雷鸣般的呼声：“我们需要罗斯福！”……

会场上出现了骚动，有些代表举起他们的州旗，开始在会场中的过道上游行，扩音器仍在不停地呼唤：“大家需要罗斯福！”加入游行行列的代表越来越多，“美国需要罗斯福！”“全世界需要罗斯福！”的喊声此伏彼起、震耳欲聋。骚动、游行和叫喊声整整持续了53分钟。

当时，会场上绝大多数代表并不知道，扩音器里传出的呼声，并非是会场上代表们的呼声的回响，而是来自会场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原来，凯利市长为了给罗斯福造声势，指示手下人在大会会场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预先安装好了话筒和扬声器，安排了一些人，每当大会上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这些人便嘴唇对着话筒，大声呼喊需要罗斯福之类的口号，通过扩音器传给大会会场，给与会的代表们以一种错觉，以为这种呼喊声就来自会场。事后，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有人称之为“来自阴沟的声音”。

大会紧接着于7月17日举行投票，罗斯福获946票、法利获72票、加纳获61票、泰丁斯获9票、赫尔获5票，罗斯福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可是，他在挑选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时，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此时，加纳早已不在罗斯福的考虑之列了。罗斯福最初看中了赫尔，可赫尔不愿接受这一提名。随后，罗斯福又选中了农业部长华莱士。可是，民主党领袖们，以及罗斯福的很多支持者，都反对提名华莱士做副总统候选人。大会高涨的情绪急转直下，像伊克斯之类追随罗斯福鞍前马后，想当副总统的人，都垂头丧气。

罗斯福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幸好在大会召开之前，他的夫人已转变了态度，支持他第三次竞选连任。这时，罗斯福请埃莉诺到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活动一番，运用她在民主党内的影响和第一夫人的身份，争取使罗斯福提名的华莱士获得大会通过。他告诉埃莉诺，如果大会推选出来的副总统候选人不是华莱士，他将拒绝接受，甚至自己也将不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

埃莉诺风尘扑扑地赶往大会会场，发现儿子埃利奥特还在继续同他父亲罗斯福作对，支持罗斯福不喜欢的人做副总统候选人。埃莉诺告诉他，除非选出华莱士，否则你父亲就不会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埃利奥特感到震惊，答应不再同父亲唱对台戏了。

埃莉诺来到大会会场，向与会的代表们发表讲话。她渐渐地使代表们明白：一个将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祖国的总统，有权要求与他共事的人必须是他觉得可以信任、而且适合于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即必要时有资格继任总统。她自始至终没有提华莱士的名字，但与会的代表们心里都很清楚，埃莉诺支持她丈夫提名的华莱士。

当大会就副总统候选人投票表决时，在白宫的罗斯福一直在收听来自会场的实况报道。会场上相互扯皮、喧闹不已的局面激怒了他，他当即起草了一份演说稿，表示要拒绝接受总统候选提名。他打电话给远在芝加哥的霍普金斯，要求他立即向大会宣读他的这一声明。霍普金斯急得要命。幸好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华莱士赢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罗斯福得知这一结果后，立即赶往芝加哥的大会会场，向与会代表们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他说：

“今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感到大家宁愿让我现在对你们讲话、而不愿等到明天。……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两种矛盾的心理之中：一方面，我个人深切希望退休；另一方面，良心却又不允许我这么做。……作为三军统帅，我曾号召千千万万的男女去报效祖国。而当全国人民也要求我尽个人的职责为祖国效劳的时候，们心自问：我有权拒绝吗？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希望从1941年1月开始，过称心如意的退休生活。可是今天，一切私人的计划、一切私人生活的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被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险所否定了，只有人民才能召唤他们自己的总统。如果人民向我发出了这样的召唤，我愿以最简单的言词向你们表示，我将在上帝的保佑下，继续为你们贡献出我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力量。”

竞选老手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得早一些。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杜威、塔夫脱等著名的孤立主义者，还有国际主义者威尔基。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撰文，大肆嘲讽了杜威、塔夫脱的孤立主义立场。他说：“18个月来，共和党一直处在梦游状态，根本没有制定什么方针。一年半前，人们告诉这些政客，战争正在到来，他们却把这个警告说成是‘耸人听闻’，是‘贩卖战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塔夫脱和杜威先生对局势有什么预见，在政府之前对加强国防力量提出过一项建议。塔夫脱先生和杜威先生在这危急关头的几个月中所作的演说，相比之下，使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倒成了一个目光远大而坚强的政治家了。”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经过6轮投票，威尔基最终击败了塔夫脱和杜威，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原因之一在于，塔夫脱、杜威等人极端保守的孤立主义立场，愈来愈不合时宜；而威尔基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色彩的共和党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认为欧洲国际局势的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密切关系。罗斯福感到，威尔基获得提名，是“国家之福”，因为这项提名使随后两党总统候选的竞选避免了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争，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外交政策的方针都将是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而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

不过，罗斯福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从竞选的角度考虑，威尔基是一个难以对付的重量级的对手。此人生长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过书、当过律师、当过兵、经过商，身材高大、阅历丰富、喜欢说笑、富有魅力、温文尔雅、见闻广博、能说会写。1933年罗斯福任总统时，威尔基则出任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政策。他经常给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在全国有相当的知名度。

在1940年大选中，威尔基本来可以抓住罗斯福破坏美国的政治传统、谋求第三次连任大做文章，这一点对罗斯福很不利。可是，威尔基对这次大选信心十足，甚至有点狂妄自负，还在被提名之前，就向罗斯福发出挑战，表示要与民主党内最有实力的对手一决雌雄，叫喊说：“把你们的主帅请出来！”“让我们这次来真正较量一下！”这样一来，当罗斯福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总统时，人们只是认为他是在接受威尔基的挑战，而没有过多地计较他违反了不得连任三届总统的传统。

罗斯福是竞选老手，政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早在1940年6月18日，

他就使出了非常高明的一招：吸收两名杰出的共和党人参加政府，亨利·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出任海军部长。这两人在共和党内都有较大影响，史汀生曾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过陆军部长和国务卿，诺克斯在1936年大选中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们虽然都反对罗斯福新政，但都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把他们从共和党中挖过来，大大加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这项任命选择在1940年6月18日宣布，亦是恰到好处。国际上，正值法国宣布退出战争、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在国内，正值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费城召开的前夕。这项任命引起了共和党人的极大愤慨，他们扬言要把两个叛徒开除出党，大骂罗斯福从事“肮脏的政治”。通过这项任命，罗斯福为他的政府树立了一种在战乱时期，以国家利益为重，排除党派偏见的公正形象。

显然，罗斯福比威尔基要精明得多。可以说在“预赛”时，罗斯福就占了上风，两人分别获得两党提名后，决赛正式开始。

8月中旬，威尔基在他的家乡印第安纳州发表了接受总统竞选提名的演说，他再一次下战书，要求同罗斯福较量。罗斯福却暂时不想出场应战。他采取的竞选策略是，对一般的竞选活动，不屑亲自出马。他认为，当此战争危机加剧之际，自己作为现任总统，最好的竞选方式，是让公众看到，总统正一门心思为美国的安全、为军国大事日夜操劳。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就曾表示：“我不会有时间或兴趣去作抽象的政治辩论。但是，我对歪曲事实的情况，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将非常乐意提请全国注意。”这就是说，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竞选活动。

威尔基却迫不急待地开始了竞选活动。他周游全国，到处发表演讲，有时一天演讲几场，嗓子都哑了。他抓不住罗斯福大的把柄，就攻击罗斯福骄傲自大。可当时，美国公众已经习惯于总统的这种自信。对罗斯福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威尔基只是泛泛地加以攻击，而他自己却提不出一套富有创见的有吸引力的施政纲领，于是，便只好向选民们保证：“我会按照现政府的政策办事，而且只会办得更好。”这样的竞选演讲，对选民是没有吸引力的。共和党内的有些人对他大失所望，送给他一个绰号：“照此办理”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老奸巨滑的罗斯福却利用他作为三军统帅的身份，到处视察军营、兵工厂、出席军舰下水典礼、检阅军事演习。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都是以总统、三军统帅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以竞选人的身份出现，甚至对竞选活动只字不提。新闻记者对总统的这些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一段时间，报刊杂志上，几乎每天都有罗斯福参观视察各类军事单位的照片，那些照片往往以大炮、或坦克、或军舰为背景。这一切，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是，罗斯福正在拼命地工作，正忙于军国大事。

8月20日，有记者问罗斯福：“您什么时候开始同威尔基辩论？”罗斯福回答得很巧妙：“我是美国一亿三千万人民和他们政府的总统，而目前的世界局势又如此紧张，显然我不可能去搞这类的政治活动。”这样一来，威尔基在全国各地的竞选活动，暂时成了一种没有对手反响的独角戏。当他一再给罗斯福下战书，要求一决雌雄时，人们却看到，罗斯福总统正忙于国防、正为美国的安全做具体实际的工作，日夜操劳。于是，更多的人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支持罗斯福。就这样，天性温和的威尔基，被老练的罗斯福弄得心情紧张，几乎忍无可忍了。

从竞选态势上看，威尔基处在进攻地位，罗斯福处于防守地位，但从策

略和效果上看，威尔基的进攻往往击不中要害；而罗斯福的防守反击却手段高明。比如威尔基攻击罗斯福是绥靖分子、“他就是不幸的慕尼黑会议的教父”，却空口无凭。罗斯福在驳斥这种攻击时，拿出一份《纽约时报》，上面刊登的一篇从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回的报道说：轴心国家希望罗斯福竞选失败。罗斯福把这则报道念给记者们听，然后狡黠地对他们说：“我不过摘引报刊的话给你们听听罢了。”

五次竞选演说

威尔基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改变竞选策略，利用美国人民害怕战争的心理，把罗斯福说成是一名战争贩子。他说：罗斯福“保证我们的孩子不参加外国的战争的诺言，是不算数的”，“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快要登上运输舰了。”威尔基抓住这个话题大做文章，力求使美国人民相信：如果罗斯福再度当选，必然会把美国拖入战争。

与此同时，威尔基的竞选班子花大量金钱拉拢新闻媒体，让它们为威尔基说好话，而肆意攻击罗斯福。由于共和党人的这番努力，新闻界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威尔基，反对罗斯福的情绪渐趋强烈，很多报刊经常用通栏大字标题、社论、漫画吹捧威尔基，相反却减少甚至扣发对罗斯福有利的新闻报道。此外，共和党人还攻击罗斯福以权谋私。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在部队服役，被授予上尉军衔，共和党人便攻击说，这是罗斯福以权谋私的结果。在一些城市的街头，竖起了不少的漫画广告，漫画的内容是有关埃利奥特当上尉的事，标题为：“爸爸，我要当上尉！”

威尔基的这番努力，倒也很见效。民意测验表明，1940年9月份，罗斯福还大大地领先于威尔基，到了10月份，威尔基却赶上来了，似乎还有超过之势。这一变化使罗斯福的竞选班子很不安，许多支持罗斯福的人也开始担心，信件、电报像雪片般飞到白宫，敦促罗斯福挺身而出，迎接挑战。一些民主党的地方领导人甚至呼吁说，总统不要再摆世界级政治家的臭架子，而应亲自出马，开展竞选活动。

威尔基的攻击使罗斯福亦深感愤怒，而威尔基即将迎头赶上的势头亦多少有些让罗斯福感到不安。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在大选的最后两周，公开发表5次竞选演说。到了10月18日，他对伊克斯说：“我要大干一场了！”

10月23日，罗斯福来到费城，作了第一次竞选演讲。他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时而温和、时而讥讽、时而严肃瞪目、时而放声大笑，完全像一个表演大师一样。演讲不时地激起听众欢声雷动。演讲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国，又征服了不少听众。在这次演讲中，他始终未提威尔基的名字，仿佛对手不屑一顾。不久，威尔基又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有些听众发现，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发抖。

10月28日，罗斯福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作了第二次竞选演讲。这次演讲不太成功，不过罗斯福随口说出的3个共和党众议员的名字：“马丁、巴顿跟菲什”，显得音调富有节奏而又和谐，为演讲增色不少。在以后的演讲中，当罗斯福一提到马丁时，听众就大声应和：“还有巴顿跟菲什。”

罗斯福出场后，大选的局势迅速改观。威尔基迎头赶上的势头立刻被遏制住了，许多共和党人都为威尔基担忧。一些老练的政客给他出主意：集中

火力，攻击罗斯福好战，吓唬美国公众，选举罗斯福就意味着把他们的亲人送进坟墓。威尔基内心里意识，这样攻击罗斯福有些言过其实、不道德，但为了当总统，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主意（事后，他坦率地承认说：“在为竞选奔走演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难免言过其实。”）

威尔基在竞选中大肆煽动战争恐惧，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全国上下，恐战情绪迅速蔓延，一些保险公司通知客户：罗斯福当选后，他们的保险单就会贬值。有人警告医生：如果罗斯福当选，医疗卫生事业就会实行社会化。一家银行刊登启事：本行全体董事及职员都将投票支持威尔基。全国各地的公众给罗斯福发来了大量的函电，基本意思是：总统先生，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向美国母亲们庄严保证，决不会派她们的儿子去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10月底，罗斯福来到新英格，准备发表第三次演讲。演讲之前，他到查尔斯河畔看望儿子约翰，附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大学生扯出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我们要威尔基！”他们还继续拿埃利奥特受军衔的事取笑，大声喊道：“爸爸，我不要当上尉！”

罗斯福受到了很大压力。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广场作了第三次竞选演讲。他说：“我向你们做母亲和父亲的人们再一次作出保证，我以前已经说过这话了，但我要再三他讲、反复他讲：你们的孩子们决不会被送到国外去打仗”（美国参战后，一些孤立主义者经常引用这句话来嘲笑罗斯福）。

罗斯福在发表第四次竞选演讲之前，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为共和党人说话的文章，作者出于对共和党的爱护，告诫一些共和党人不要把话讲过了头，否则只会给共和党帮倒忙。文章引用了费城一位法官的话作例子。那位法官说：“拥护罗斯福总统的人，除了他的家属外，都是些穷光蛋，他们的年薪还不到1200美元。其实，他们连这点收入也是不配得到的。”当时，为罗斯福撰写演说稿的霍普金斯、舍伍德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种“穷光蛋”几乎占美国全部人口的一半。11月1日，罗斯福在布鲁克林发表第四次竞选演说时，一方面大讲新政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抓住“穷光蛋”问题大做文章：“好一个‘1200美元也不配挣得的穷光蛋’，这句话道出了共和党领导集团的真实感情！……共和党内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就是要直接挑起阶级仇恨和阶级蔑视，其用心十分恶毒，而且是反爱国主义的——对此，共和党的领袖们能够予以否认吗？朋友们，这正是我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要反对的东西，我决不停止我的战斗。”（后来的投票表明，美国的“穷光蛋”们几乎都站到了罗斯福一边）

11月2日，罗斯福在克利夫兰发表了最后一次竞选演说。为了保证这次演讲成功，罗森曼、舍伍德等人通宵达旦地起草、修改演说稿。11月2日（星期六）午餐后，罗斯福又与他们一道，花了6个小时对讲稿作最后的修改润色。当天晚上，他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大礼堂里，对4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广播电台同时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罗斯福越讲越激动，礼堂里的听众欢声雷动。罗斯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谈到了连任三届的问题。他说，等下一个4年过去后，“将由另一个人来担任总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听众们狂呼：“不！不！”罗斯福很敏感地意识到，由于是实况转播，这种呼声传出去，他的政敌将攻击他想当终身总统。他赶紧用嘴巴贴着话筒，继续演讲，而不让听众的呼声传出去。他说：“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风暴正在凶猛地袭击世界，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我们要忠诚地支持我们的同胞，直到我们达到前方光明、安全的立足点。”

竞选活动至此便结束了，选举将在 1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1940 年 11 月 5 日）进行。在选举日到来的头一天晚上，罗斯福按自己过去的惯例，发表了一篇不带党派和竞选色彩的广播讲话，大意不外乎是重申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对美国团结一致的展望，并号召全体选民积极参加投票。像以前一样，这时的讲话充满着宗教般的虔诚色彩。一些政敌常常攻击说，罗斯福的宗教感情是虚伪的。而一些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的宗教感情是真诚的，人们可以在其他任何问题上同他开玩笑，但宗教和他的家庭问题却是例外。在他 11 月 4 日晚上的广播讲话中，有一段话是他 40 年前当学生时读过的一段祈祷文：“愿上帝的恩泽使我国人民正直勤奋，富于智慧，品行端正，把我们从暴力、争端与混乱中拯救出来，从骄横、傲慢和一切罪恶中拯救出来，保护我们的自由权利，把我们这个由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而聚居在一起的人民结成团结的整体。”

当天晚上，共和党人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一封致美国母亲们的公开信。他们并没有像罗斯福那样超脱竞选活动，而是要抓紧最后的时机开展竞选。信中说：“如果你们的孩子将在欧洲的某个战场上战死……在他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喊着‘妈妈！妈妈！’时，不要责备把你们的孩子送上战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要责备你们自己，因为是你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又送回了白宫！”这段录音的语调低沉凄厉，人们听后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天，近 5000 万美国选民参加了投票。罗斯福获 2724 多万张选票，449 张选举人票。威尔基获 2230 多万选票，82 张选举人票。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成功。他在继推行新政、打破了美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传统之后，又成功地冲破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传统。

事后的分析表明，在罗斯福的支持者中，有 11% 的人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紧张才投票支持他的；而在威尔基的支持者中，仅有 2% 的人因为他要使国家避免战争而投他的票。民意测验还表明，假如没有战争，支持威尔基的人将达到 48.7%，而支持罗斯福的人只会有 42.3%。显然可以说：罗斯福是因为战争才决定打破传统、谋求第三次竞选连任的；也是因为战争，才使他第三次竞选连任得以成功；而三连任竞选成功，则使他能够为打赢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更卓越的贡献。

第九章 貌合神离

丘吉尔：“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这里击溃我们，他大概就要掉首东进。”

斯大林：“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冬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

希特勒：“斯大林真是精明狡猾……必须尽快地迫使俄国屈膝投降……”

“别刺激德国人”

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的反应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斯大林认为，英法尽管对波兰承担了安全保证义务，但不会为了波兰而与纳粹德国开战。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既出乎希特勒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

然而，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英法宣战后，却按兵不动，宣而不战，西线并没有真扫“起来。有人称之为“假战争”，亦有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斯大林不禁生出疑虑：英法宣而不战，难道仅仅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他们对波兰履行了保证义务，还是另有企图？1939年10月18日，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发回报告：“在法国官方以及接近政府的人士中……仍然希望苏联同德国能够打起来。”5天后，苏联驻德国大使麦斯基也报告说，英国的慕尼黑分子没有放弃下面的想法：“英国和法国无论如何会同德国和好，而且最终会把希特勒推向东方去反对苏联。”

真是帝国主义亡苏之心不死啊！

斯大林下决心不让英法绥靖分子的阴谋得逞。为此，最重要的是苏联要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刺激希特勒，不给他提供进攻苏联的任何借口。现在，斯大林更坚定了这一想法。

事实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对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苏联的反应一直比较谨慎。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于9月17日宣布保持中立，对德国侵略波兰的行为不置可否，不仅如此，而且根据事先与德国达成的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在德国的一再要求下，出兵波兰东部。9月2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来访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第二天，双方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划定了瓜分波兰后两国新的边界线，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了英、法头上，声明指出，苏德两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向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这一切，连同战争爆发前夕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揭开了苏德关系新的一页，为两国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跟上，需要适应国际形势迅速而巨大的变化。

当务之急是调整苏联宣传舆论工作的方针。反德的调子不能再唱了，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谴责该停止了，对苏联人民和各国工人阶级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教育已经过时了。一切应以不刺激希特勒、不损害苏德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为转移。

1939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大家知道，例如‘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以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具有新的含义了。……现在如果就欧洲各个巨大列强来说，德国成了一个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你们看，角色已经变了。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

这篇讲话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或者说是按斯大林定下的调子来讲的，第二天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11月29日，斯大林本人在回答《真理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不是德国攻打法国和英国，而是法国和英国攻打德国，它们应对当前的战争负责。”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讲话，为苏联在战争初期新形势下的宣传舆论工作定下了新的基调。“法西斯主义”一词暂时从苏联的政治用语中消失了。

有一天，苏联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梅赫利斯向斯大林汇报军队的思想工作。斯大林听完汇报后指示：“别刺激德国人。”他解释说：“《红星报》（苏联军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要同他们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梅赫利斯用笔迅速地记下了斯大林的指示，第二天，立即发布训令，规定“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此前，苏军在进行射击训练时，高喊的口号是：“向法西斯射击！”现在，也改换了。

苏德经贸谈判

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苏德两国的经济关系开始迅速发展。

德国有先进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而苏联则有丰富的粮食、石油和其他工业原料。1939年9月28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对斯大林许诺说，德国将向苏联朋友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斯大林知道德国在许多方面比苏联先进，也很重视发展与德国的经济和军事交往。他派了许多军事代表团、采购团去德国。这些代表团在德国到处参观、访问、洽谈项目，打听了解各种情况。德国觉得他们“过分好奇”，什么都问、什么都打听，就像一战刚结束的那几年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们一样。为此，戈林等德国纳粹头目多次向苏联报怨过。

不久，苏德双方开始了经济贸易谈判，最初，谈判并不顺利。虽然两国在经济上有互补性，但双方都在加紧扩军备战，在工业原料、机器设备、军事装备等方面的需求也有相互抵触的一面。苏联答应向德国出口100万吨粮食、90万吨石油、10万吨棉花等商品，但不愿向德国出口铁和铬。苏联要求

得到两艘巡洋舰的船体、1艘训练舰、最新式的鱼雷和水雷、飞机和防空设备——都是德国先进的军事装备，德国也非常需要它们，更何况德国并不希望看到苏军迅速地强大起来。

在经济贸易谈判过程中，莫洛托夫指责德国人飞机定价太高。里宾特洛甫则认为苏联的需求太大，主张削减1/2到2/3。他对苏联大使说：“不应忘记德国正在打仗。”

希特勒不太关心苏德经济贸易谈判的细节。在他看来，苏德之间的合作也好，友好也罢，都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toward 苏联发动进攻。

斯大林却不然。他强调说，苏德经济谈判不仅仅是一个签订通常的商务条约的问题，而且还是相互援助的问题。莫洛托夫说得更明确，苏德签订经济协定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亲自参加了部分谈判。他对谈判中细节问题了解之详尽、准确，甚至让德国代表感到吃惊。

谈判碰到了许多障碍。直到1940年初，仍没有达成协议。苏联在苏芬战争初期进攻受挫后，在苏德经贸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1940年2月3日，里宾特洛甫就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致电斯大林说，是德国打败了波兰，苏联才实现了占领波兰东部的愿望，这是德国对苏联友好的重要表示，因而，德国有理由在工业原料等问题上得到苏联的帮助。他建议本着这种精神来处理两国经贸谈判中的一些障碍。

斯大林对谈判进行了干预。1940年2月11日，苏德签订了商贸条约。苏联向德国提供的原料比原计划的要多，并答应向德国提供铁矿石，德国谈判代表施努尔认为，从经济观点看，苏联答应供给德国的东西比应该供给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有些是以牺牲苏联自己的需要为代价的。

苏联的许多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德国答应向苏联提供装甲钢板、锅炉管、潜望镜、水雷、鱼雷、音响设备、坦克、飞机、各种弹药、引擎、石油工业设备、机车等，其中许多属军事装备或与军事工业有关的设备。

貌合神离

在二战爆发初期，希特勒为了全力以赴地对付波兰、英国和法国，也采取了尽量稳住苏联、不刺激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建立东方战线时，希特勒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其实，1939年7月7日，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按照条约，德国有义务援助它们。可是，在1939年9月至10月，苏联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签订互助条约，强行把它们纳入苏联的“东方战线”体系中时，希特勒没有履行他的条约义务，而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1939年末，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联，英法还大吵大叫，准备对苏联宣战、派军队援助芬兰，它们操纵国际联盟，把苏联开除了，使苏联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苏军最初的进攻受挫后，英、法、美等国公开对苏联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让斯大林非常难堪。

希特勒却很狡猾。其实，对苏军进攻受挫，他内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由此看到了苏联红军的实力是如此的低下，从而使他更加坚定了日后进攻苏联的信心。不过，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拒绝向芬兰提供援助，还劝告瑞典不要援助芬兰。他下令撤走停靠在芬兰附近的德国军舰。这一切都是

出于一个目的，暂时不要得罪斯大林。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当时，正值苏军在苏芬战争中出师不利、苏联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联。而希特勒却发去一封贺电：“约瑟夫·斯大林先生：在您60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并为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您健康长寿！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前程似锦！”

此时此刻，希特勒的贺电对斯大林多少是一种安慰。他立即回电，对德国元首的祝贺表示感谢，并说，“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由鲜血凝聚结成的，因而是永久的和坚固的。”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他们都是在演戏给对方看。194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的这场“和亲”戏还远没有到收场的时候。

1940年3月28日，希特勒突然邀请斯大林访问德国。里宾特洛甫在给驻苏大使的邀请电中说：“元首对于能在柏林欢迎斯大林不仅感到特别高兴，而且他务必要使斯大林受到与其地位和重要性相称的接待。元首将给予他在这种场合所要求的一切荣典。”

此时，斯大林根本无意访问德国，甚至也不想让莫洛托夫代劳。不过，他一直在捉摸：希特勒发出邀请，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4月初，斯大林获悉，德国即将对挪威发动进攻。5月10日上午，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求见莫洛托夫，通报说，德国准备进攻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莫洛托夫表示，感谢德国大使向他通报这个消息，苏联理解德国必须反抗英法的攻击，以保护自己，同时也毫不怀疑德军将获得成功。

斯大林这才恍然大悟；希特勒发出邀请，是为了稳住苏联，以便他在西线动手。他密切地注视着德军在西线的进攻。他认为，法国是公认的世界陆军强国，有举世闻名的马其诺防线作屏障，加上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的援助，应该是能够顶住德军攻势的；即使最终会失败，战争也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会给苏联带来更长的备战时间。因为无论如何，希特勒在与英法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是不会进攻苏联的。

然而，西线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希特勒的“闪电战”再次显示出了巨大威力。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很快就投降了，6月14日，德军占领法国首都巴黎。西线战争爆发后不到40天，法国就投降了。这一结果使斯大林极为震惊，也使他对德国军队的强大实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此时此刻，他更坚信：决不应刺激希特勒，不给他以任何进攻苏联的借口。6月18日，莫洛托夫奉命约见舒伦堡，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军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丘吉尔出的难题

1940年夏天，丘吉尔给斯大林出了一道小小的难题。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从对付纳粹德国的战略全局考虑，他试图改善英苏关系，便决定派一贯主张英苏友好的克里普斯爵士出任驻苏大使。斯大林同意接受这一任命，但也意识到，此事若处理不当，会让希特勒怀疑苏联正在向英国靠拢——这是应绝对避免的。苏联政府很快就这一任命向德国大使作了解释。5月29日，舒伦堡向柏林汇报说：“克里普斯出使苏联，没有使人忐忑不安的理由，因为没有理由怀疑苏联政

府对我们的忠诚态度。”

丘吉尔决定派克里普斯出使苏联时，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英、苏、德三角关系的现状，决非易事。但同时也认识到，苏德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而要战胜德国，仅靠英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战争爆发之前，张伯伦政府推行愚蠢的政策，拒绝与苏联联合对德，结果把苏联推向了德国的怀抱。现在，他要纠正这一错误、愚蠢的政策。虽然眼下改善英苏关系的希望很渺茫，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改善英苏关系，“需要有耐心”。

1940年6月25日，他第一次主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话说得既坦率又很有分寸：“从地理上看，我们两国位于欧洲的两端，再从政治制度来看，可以说我们两国代表着极不相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实不会妨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中达成和解与互利。”

“必须承认，在过去（诚然是在最近的过去）我们的关系由于相互猜疑而受到危害。去年8月，苏联政府决定，为了苏联的利益，应该终止与我们的谈判而与德国结成密切的关系。因此德国几乎是在成为我国的敌人的同时成了贵国的朋友。”

“但是从那时起便发生了一种新的因素，使我敢于设想，我们两国都愿意重新建立以前的联系，……目前摆在全欧洲（我们两国也包括在内）面前的问题就是欧洲的国家 and 人民对于德国在大陆建立霸权的形势将如何反应。”

信中还说，英苏两国位于欧洲两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两国能够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好地抵抗德国的霸权”。英国政府致力于两个目的：使自己免遭纳粹政权的统治；把欧洲其余国家从德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信的最后说：“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建立霸权是否威胁苏联的利益，这只有待苏联自己来判断，如果威胁的话，应该用什么最好的办法来保卫，也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已感觉到，欧洲（实际是全世界）目前经历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因此，我认为应将英国政府感受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你坦白陈述。”

这是战时盟国三巨头大量通信中较有特色的一封信，它是在法国败降、英国孤军作战、苏德正处得火热的特殊时刻，就欧洲严峻的局势和英、苏微妙的关系，写的一封很重要的颇有水平的信。丘吉尔没有回避英、苏两国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与战前的相互隔阂，而是正视现实，就欧洲局势与英苏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既向斯大林晓之以利害，话又说得很委婉，很有分寸，充分显示出作者很强的驾驭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丘吉尔为建立英苏反德联合阵线所作的最初尝试。

7月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英国新任驻苏大使克里普斯，看到了丘吉尔的来信。这是他自1939年9月会见里宾特洛甫后，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节，因而显得引人注目，不过，在会谈中，斯大林说话小心谨慎。克里普斯谈到苏联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的利益，他不置可否；克里普斯谈到德国对苏联利益的威胁，斯大林对此加以否认。总之，他要避免给希特勒留下苏联正在同英国接近的印象。

会见过后，斯大林还指示，把这次会谈的记录副本送一份给德国大使，当然这份副本是否经过加工润色，只有斯大林心里清楚。德国大使收到副本后，用特急电报发往柏林。里宾特洛甫对苏方的这一举动表示高兴。他从记

录副本中看到，英国政府认为德国正力图称霸欧洲，威胁着英、苏两国的根本利益，主张英苏应就防御德国问题加强协商，寻求重建欧洲均势的办法。斯大林答复说，他看不出存在着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他曾观察过德国的政策，并且清楚了解德国的一些主要政治家，没有发现他们有鲸吞欧洲的任何欲望。此外，他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把这样一份会谈记录副本送给德国人，无疑是要向德国表明他斯大林对维护和发展苏德友好关系的诚意。斯大林就以这种方式处理了丘吉尔给他出的这道小小的难题。战前，斯大林曾诚心诚意要与英、法建立反德的集体安全体系，遭到了张伯伦政府的粗暴拒绝，使他被迫与希特勒这位魔鬼做交易。如今，英国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才意识到英苏联合对德的重要性，可此时，再想把斯大林从希特勒怀抱中拉出来，即使丘吉尔再有诚意，也决不会轻易成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珍惜；等你懂得珍惜她（它）时，往往却不容易得到。于是，生活中便有很多人人生悲剧，世界上便有很多历史悲剧。

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

斯大林虽然处处小心谨慎，却并没有、也不可能防止苏德关系的逐渐恶化。

法国败降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遭到严重挫败，德军既不能掌握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更不能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无从实施。他在搁置这一计划的同时，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东方的苏联。

从1940年下半年起，德国采取了一系列使苏德关系复杂化、逐渐恶化的举动。8月，德国与芬兰达成协议，9月德军进驻芬兰。9月22日，德军又开进了罗马尼亚的战略要地和油田，10月12日，一个大型的德国军事代表团进驻罗马尼亚。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条约。此外，德国还在向保加利亚施加压力。这一切不能不使人想到：希特勒是否已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

与此同时，苏德双边关系也在恶化。德国经常借故延期向苏联供应设备。1940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1周年之际，苏联大张旗鼓地搞了一番庆祝纪念活动，而德国却毫无表示，仿佛把这个条约完全遗忘了一样。此时，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发回的报告，越来越多地充满着不祥之兆。

德国人的举动，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不满和忧虑。

10月1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致函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根据元首的意见，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采取一项长远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它们的利益，看来是它们的历史使命。”为此，他邀请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访问柏林，他自己也愿意再次来莫斯科，而且准备与日本、意大利特使一起来。

斯大林根本无意与德、意、日“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它们的利益”，也不相信这种骗人的花招。不过，值此苏德关系微妙的时刻，让莫洛托夫往柏林跑一趟还是有必要的。10月22日，他答复说：他原则上不反对里宾特洛甫的建议，但不愿仓促行事，同意派莫洛托夫去柏林，也愿意在莫斯科再次

会见里宾特洛甫，但不希望马上同日本人和意大利人会谈。这意思很明确：苏联只关心苏德双边关系，而无意参与所谓瓜分世界的行动。其实，德国此时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瓜分世界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麻痹苏联，以掩盖其进攻苏联的准备活动。

1940年11月12日清晨，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列抵达柏林的安加利特车站。当时正下着蒙蒙细雨，苏德关系也像这天气一样，被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德国最高当局批准，安加利特火车站站台上悬挂着苏联的镰刀斧头红旗。当时，苏联的国歌采用的是《国际歌》，很多德国人都会唱。有关当局担心演奏这首乐曲时会有很多德国人跟着唱，决定不奏苏联国歌，改奏通常的迎宾曲。

当天，莫洛托夫首先与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会谈。1年之前，他们曾在莫斯科两次正面较量过，彼此都很了解。里宾特洛甫长期追随希特勒，学会了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莫洛托夫则更像斯大林，说话简练、准确，经常板着脸孔，只是偶尔微笑一下，显得不亢不卑。

里氏大谈德、意、日、苏四国应如何瓜分英帝国的遗产。他说，英国已经打败，至于它承认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为了瓜分英帝国，德、意、日三国的战略都已转向了南方，希望苏联也转向南方，取得通往海洋的出海口。

“你说的是指哪一个海洋？”莫氏冷冰冰地问了一句。

里氏说，指波斯湾和印度洋。接着又谈起欢迎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等问题。

莫洛托夫说话不多，仅限于提一些问题，更多地是用心听对手说话。他要把精力留着更重要的对手——希特勒。

当天下午，苏联代表团前往德国总理府，与希特勒会谈。希特勒见到他们时，首先行纳粹举手礼，然后无精打采地同苏方人员一一握手。握手时，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对方的眼睛，让苏方许多人感到不自在。这是他长期以来观察他的手下人是否忠诚于他养成的习惯。他认为，在死盯住对方眼睛时，有时能看出对方对你是忠诚还是憎恨，“盯住一个人的眼睛看一个人，都不能发现他有问题，这个人就值得信赖”。

在会谈中，希特勒从英国即将陷落，大英帝国即将崩溃，讲到如何瓜分它的遗产，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最后才说，他希望听听苏方的意见。

莫洛托夫说，苏联更关心德国出兵芬兰、进军巴尔干以及是否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问：德国派军事代表团到罗马尼亚去干什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关内容是否还适用于芬兰？德国的欧洲新秩序和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究竟指什么？所谓“大东亚”的边界划到哪里？三国同盟与日本的“大东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德军在芬兰边境修筑工事？

这番连珠炮似的诘问，使希特勒措手不及。他的译员回忆说，很少有人这样对他说话。要是以往，他早就会大动肝火。这次，他却表现得较有耐心。不过，他的解答模棱两可，甚至是答非所问。

当晚，莫洛托夫立即将会谈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指示说，瓜分大英帝国遗产问题不切实，应不予理会；芬兰边境出现德军的问题更重要，是存亡攸关的大事，应抓住不放。

第二天会谈，莫洛托夫一开始就提出德军驻扎在芬兰的问题。希特勒拼命地把话题往瓜分英帝国领土上引。莫洛托夫说，元首的这些话，我已不止听过一遍了，现在我要求回答：德军进驻芬兰的目的何在？

希特勒被逼得没有退路，便解释说，德军进驻芬兰，一是为了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英国的进攻。

莫洛托夫指责德国的这一行动违背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时，里宾特洛甫出来打圆场。希特勒又大谈瓜分英帝国“破了产的家当”。

莫洛托夫立场坚定，又提出与苏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罗马尼亚问题；德国向罗马尼亚提供安全保证是否针对苏联？

希特勒对此加以否认。会谈仍然是各唱各的调。

那天晚上，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里宾特洛甫等人出席。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里，墙壁上悬挂着列宁的半身像。莫洛托夫一改会谈时的冷峻，显得格格外随和、热情。他提议为希特勒干杯，里宾特洛甫正举杯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随后是隆隆的高射炮射击声和轰炸机在上空的嗡嗡响声。轰炸震得大使馆的玻璃窗颤抖起来。人们纷纷地逃向防空洞，里宾特洛甫陪着莫洛托夫钻进了附近德国外交部的地下防空洞。

莫洛托夫乘机奚落说：“如果说英国已被打败，我们为什么还要钻防空洞呢？是谁在这儿扔炸弹？”里宾特洛甫很尴尬，便吩咐副官送上咖啡……

这次空袭是丘吉尔首相特意安排的。他后来回忆说：“事先我们就听说了这次会谈，我们虽然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但也不愿完全置身事外。”于是安排了这次空袭，以便让苏德双方及时注意到英国的存在。

在防空洞里，两位外长继续举行了会谈。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协定草案，向莫洛托夫宣读起来。协定草案的实质是要把德、意、日三国同盟变成四国同盟，拉苏联入伙。其中规定四国“尊重彼此的自然势力范围”，不参加或支持“针对四国之一的”任何大国集团，彼此之间的任何争执要“和睦地”解决。他接着宣读了秘密议定书，其中阐明了四国的“领土要求”，规定苏联的要求是“集中于苏联国土以南，在印度洋的方向。”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对这样的协定和秘密议定书不感兴趣。他说，“纸面的协定对苏联来说是不够的；它必须坚持使它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证。”

里宾特洛甫很失望，他说，苏联关心的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英国轰炸机还在继续对柏林实行密集轰炸。直到深夜警报解除后，莫洛托夫等人才离开德国外交部防空洞。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11月14日清晨，苏联代表团乘专列离开柏林回国。火车一离开车站，站台上悬挂的苏联国旗立刻被扯下来，扔到了一边。苏德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了。

希特勒的蛛丝马迹

莫洛托夫访问归来，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看法对斯大林有很大影响，因为斯大林在国际事务方面比较相信他。此时，斯大林仍然坚信：“只要不去招惹希特勒，他是不会进攻的。”

为了不给希特勒以进攻苏联的借口，苏联决定接受德国的要求，参加德、意、日、苏四国条约。11月26日，莫洛托夫把苏联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很高的要价：德军必须从芬兰撤走；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以保证苏联在黑海海峡的安全；德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波斯湾——阿拉伯地区的领土要求；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北部开采煤和石油的权

利。

对此，德国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一直保持沉默。

其实，希特勒早已作出了进攻苏联的决定。还在 11 月 12 日，即莫洛托夫到达柏林的当天，他在下达的第 18 号指令中说：“旨在阐明俄国近期立场的政治谈判即将开始。不管谈判的结局如何，务必继续进行已经拟定的一切东进的准备工作，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指示，一俟我批准战役计划要点后即行下达。”

针对苏联参加四国条约提出的条件，希特勒对他的高级军事将领说：“斯大林真是精明狡猾，他要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讹诈能手。德国的胜利已经是俄国所不能容忍的了。

因此：必须尽快地迫使俄国屈膝投降……”

1940 年 12 月 18 日，希特勒下达了著名的第 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该指令要求：“即使对英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武装部队也必须做好准备，以使用速决战击溃苏俄。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用的兵力……空军必须尽一切力量配合这次东线战役……海军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对英国作战。……战备工作将于 1941 年 5 月 15 日前结束。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

1941 年 1 月初，希特勒对德军高级将领们阐述了为什么在彻底打败英国之前要先进攻俄国的理由：“如果美国和俄国参加对德战争，情况将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出现这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消除了俄国的威胁，我们就能无限期地对英国进行战争。如果俄国垮台，日本就可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一点则意味着美国所受的威胁增加了。”

“巴巴罗萨计划”是纳粹德国的最高军事机密，斯大林自然无从知晓。不过，德军在为实施这项计划作准备时，不免会露出蛛丝马迹。

1941 年初，斯大林掌握的许多情报表明，德军正在向东线大量集结。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他决定直接向希特勒把这件事捅穿，便致电希特勒说：“这种情报使我们吃惊，并且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们打仗。”希特勒为了欺骗斯大林，回电解释说：“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不是针对苏联的。我打算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我以一国元首的人格担保。”他说，德国中西部的领土遭到了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因此他不得不把大量的部队调往东部。德国驻苏大使馆武官也对苏方解释说，德军在东线集结是为了逃避英国的轰炸，得到休整。斯大林对这种解释似乎信以为真。

为了摸清苏联边境地区的防御状况，从 1941 年初开始，德军飞机经常深入苏联领空侦察。斯大林为了不给希特勒以发动侵苏战争的借口，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这种入侵行为。苏联空军偶尔将入侵的德国飞机迫降，而斯大林总是下令连人带机归还德国。这样一来，德国人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41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21 日，德军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达 180 次，有时甚至深入苏联境内达 400 英里。苏联提抗议，德国不予理睬。苏联不敢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担心被希特勒视为挑衅行为。有一次，苏联边防军击落了一架入侵的德国侦察机，两名飞行员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击落飞机的“肇

这一进攻苏联的计划，是以 12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菲特烈·巴巴罗萨（1152—1190 年在位）的名字命名的。此君曾侵略东欧、南欧等地，在第三次十字军东侵途中溺死。

事者”，并指示向德国道歉。

为了便于进攻苏联，希特勒决定首先控制巴尔干地区。1940年11月23日，罗马尼亚签订了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的议定书，倒向了轴心国一边。到1941年2月，在罗马尼亚境内，已集结了德军68万多人。与此同时，德军还控制了保加利亚境内的战略要地。3月1日，保加利亚宣布加入三国同盟条约。

巴尔干是西方列强入侵苏联的重要通道，德军向巴尔干的集结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他曾提醒德国大使舒伦堡，苏联把巴尔干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对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苏联不能不关心。可是，希特勒对此置若罔闻。苏德双方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一番较量。

1941年3月15日，希特勒迫使南斯拉夫加入了三国条约。第二天，南斯拉夫发生政变，推翻了亲德政府。希特勒恼羞成怒，下令德军随时作好入侵准备。南新政府向苏联求援，斯大林同意支持南斯拉夫，4月5日，苏南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闻讯后，怒不可遏。他对部下说，他被南斯拉夫人可耻地出卖了，他决不能容忍这种叛卖行为。为了杀一儆百，4月6日，他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惩罚行动计划”。30万德军扑向了南斯拉夫，德军飞机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3天3夜，1.7万人被炸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城市被夷成了平地，南斯拉夫被肢解了。

斯大林蒙受了屈辱，希特勒获得了一种报复后的快感，不过，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惩罚南斯拉夫，他决定：“巴巴罗萨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最多为4个星期。”4月30日，他重新规定了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日期：1941年6月22日。半年后，当德军抵达莫斯科城下，因苏军顽强抵抗和风雪严寒困扰而无法攻下莫斯科时，德军将领们不禁想到，假若不推迟“巴巴罗萨计划”，而是按原订的5月15日开始实施，该有多好啊！这时，他们才痛苦地意识到，希特勒为了惩罚南斯拉夫，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后人曾就此评论说：“为了对一个胆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小的巴尔干国家发泄个人的怒气而推迟对俄国的进攻，这可能是希特勒一生中导致最大灾难的一个决定。”

斯大林委屈求全

斯大林没有料到，希特勒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反应如此强烈。为了不给他以进攻苏联的借口，斯大林只好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仅如此，他还要继续致力于改善苏德关系。4月13日，即德国入侵南斯拉夫1周后，斯大林去火车站欢送日本外相松冈时，专门找到德国大使舒伦堡，用手搂着他的肩膀，恳切地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地维持我们的友谊。”过了一会，他又对德国代理武官克莱斯上校说：“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朋方。”

舒伦堡觉得，斯大林似乎没有把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蒙受的屈辱放在心上。

5月6日，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工作。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苏德关系已相当紧张，斯大林要亲自掌管政府，以应付危局。德国驻苏大使和海军武官都认为，这一举措意味着斯大林要亲自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苏德友好关系。舒伦堡说：“他希望以个人的努力，不使苏联与德国发生冲突。”

为了改善苏德关系，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时，比利时、挪威、希腊、南斯拉夫已被德国占领，为了表示苏联承认这种占领，斯大林下令把这些国家的驻苏使节驱逐出境，关闭它们的驻苏使馆。伊拉克政府正与纳粹德国打得火热，斯大林下令苏联承认这一政府。德国没有按计划如期向苏联出口机器设备，苏联对德国在粮食和原料方面的需求，却是有求必应。他还要求苏联报刊，严禁刊登反德言论。德国大使舒伦堡对此心领神会。5月12日，他向柏林汇报说：斯大林采取上述举措，“为的是缓和苏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为未来创造更良好的气氛。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本人一向主张苏德之间应建立友好关系。”

其实，斯大林已经确信，苏德之间，最终将不免一战。他之所以对希特勒如此低声下气，乃是迫不得已。他很清楚，苏联的战备状况很不理想。到1941年夏天，将近75%的军事指挥员和70%的军队政工干部任职尚不满1年，绝大多数是苏芬战争之后开办的各种军事短训班培养出来的。他们缺乏长期带兵打仗的经验，业务能力不强、军事素质较差。1941年5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为了鼓舞大家的信心，他说，到1941年初，苏军有300个师，其中1/3为机械化部队。可是，还有许多详情他没有说，也不便于说出来，比如，这300个师中，几乎有1/4以上是刚刚组建起来的，还有1/4处于组建阶段。这些内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还说到，局势很严峻，不能排除德国人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而红军还不够强大，不能轻易地粉碎德国的进攻。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冬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几乎肯定会在1942年爆发。从现在起到8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德国会进攻苏联吗？

德国为了掩盖其进攻苏联的真实意图，于1941年上半年首先向苏联发动了一场情报战争。1941年2月15日，德军总参谋长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指令”，即故意制造德军在东线集结、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然后对苏联人解释说，这是为了迷惑英国，是“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实际上，德国人想通过这种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的情报，来迷惑苏联。

1941年春天，随着德军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占领，以及德军在巴尔干和波兰境内的大量集结，整个欧洲在纷纷议论：“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苏德即将进行军事摊牌”……。有关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地流入斯大林手中。斯大林的判断力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

斯大林得到的情报来自各种渠道。在来自外国提供的情报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提供的情报。早在1940年6月27日，丘吉尔曾说过：“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这里击溃我们，他大概就要掉首东进。”当时，这还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上，直到1941年3月，他还不相信苏德战争迫在眉睫。英国陆海空三军情报委员会在1941年4月还认为，希特勒1941年的主要目标是击败英国，为此不会马上在东线开辟另一条战线。5月23日，该委员会还认为，苏德之间有可能达成协定。

丘吉尔并不满足于该委员会“集体智慧”的结论，而宁愿亲自阅读原始

材料，自己作出判断。3月底，他从一份材料上看到德军装甲部队在巴尔干往返调动的情况，眼睛突然一亮，感到“好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东欧的局面”。他断定，希特勒将于5月至6月份进攻苏联。他立即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谈到他的判断及依据。

更多的情报来自苏联自己各情报机构。1941年3月20日，苏军情报部长戈利科夫将军提供的情报说，德军正在边境地带大规模集结。5月初，苏联驻柏林海军武官送回的情报说：战争迫在眉睫。不过，戈利科夫和海军司令员本人都对上述情报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从3月份开始，整个柏林都盛传德国准备进攻苏联，而且还传出了具体的日期：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苏联大使馆每次都及时向国内作了汇报。

可是，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战争都没有爆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军方领导人都认为，在1941年，可以避免战争。日丹诺夫说，德国正忙于对英国作战，无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然而，令人不安的情报越来越多。5月底，基辅特别军区情报处处长报告说：德军新的坦克、炮兵和步兵正源源不断地向边境地区集结。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部情报处处长报告说：“德军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5月25日以来，进行得更为紧张……”5月18日这一关过去后，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和英国驻苏联大使以及苏联最杰出的情报人员左尔格都提供了同样的新情报：战争将于6月22日爆发。欧洲各国，仍在继续盛传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

这类情报之多、之详尽，有关的传闻之盛、之普遍，使斯大林坐卧不安。他的判断力从未经受过如此巨大严峻的考验：

——丘吉尔等英国人的话可信吗？是否有离间苏德关系的企图？

——德军在东线的大量集结，到底是像德国人解释的那样，为了迷惑英国？还是为了准备进攻苏联？

——最初的情报说，战争会在4月6日、4月20日爆发，后来又说会在5月18日爆发，结果都被证明不可靠。现在又说会在6月22日爆发，会不会又不可靠？

——希特勒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进攻之前，事先都提出了一系列的领土要求，发出了危机的信号；而迄今，他没有向苏联提出任何这类要求，苏联也没有得罪他，进攻苏联，岂不是师出无名？

——两线同时作战，历来是兵家之大忌。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现在，英国尚未战败，希特勒怎么敢发动对苏战争，使德国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呢？

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会如此地没有理智。他仍然认为，1941年，有可能避免战争，“看来，明年5月冲突将不可避免”。他以自己的理智去衡量希特勒，忘记了希特勒是一个疯子般的战争狂人，因而就会免不了判断失误。

面对德军在苏德边境沿线大量集结这一事实和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大量传闻，斯大林决不会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他决定以友好的语气，公开地向德国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德国对此加以澄清。

6月14日，苏联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近一段时期，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附近，准备发动进攻’，……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唐的，但鉴于它们仍在不断地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士认为，有必要授权

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说，从苏联掌握的材料来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如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声明呼吁德国同苏联就改善双边关系举行谈判。

斯大林认为，只要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好办了。苏联可以把谈判拖上到 1 个半月，等夏天一过，进入秋天，希特勒就不敢发动战争，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战争推迟到 1942 年。

然而，德国对塔斯社声明保持沉默，毫无反应，没有一家德国报纸刊登塔斯社声明。实际上，此时，离希特勒定下的进攻苏联的时间——6 月 22 日——只差 1 个星期，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可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可是，斯大林还蒙在鼓里，还在痴心地等待着德国对塔斯社声明的答复。为了不刺激希特勒，他不顾红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坚决拒绝让苏联西部边境各军区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因为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各国军队实行总动员，给对方以刺激，最终打起来了。他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决不给希特勒提供进攻苏联的任何借口。（历史并非总是使人明智，有时也会使人走入历史的误区）

塔斯社 6 月 14 日的声明，不仅没有使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谣言得到澄清、没有能诱使德国同苏联谈判，反而麻痹了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希特勒制定的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已经开始了倒数计时，斯大林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他对塔斯社声明的答复斯大林避战的愿望太强烈了！

第十章 “巴巴罗萨”

希特勒：“今天今年最后一次伟大决战的开始。……这次打击将在入冬之前消灭敌（苏）军。”

斯大林：“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

……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朱可夫：“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

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18日，苏德边境地区。

一名德军士兵喝醉了酒，揍了一位军官，害怕被枪毙，偷偷越过边界，逃到了苏联境内。他交待说，战争不久就要爆发，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将在苏德边界全线发动进攻。讲完后，他发现苏联军官持怀疑态度，又补充说：“到了6月22日早晨5时，你们如果觉得我欺骗了你们，枪毙我好了。”

苏军一名集团军司令员对塔斯社6月14日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纯属无稽之谈”的声明还记忆犹新，认为那位德军士兵的话不足为凭，没有继续向上级汇报。

6月21日晚上10时，德军中一名捷克共产党员也越境逃到苏联这边，报告说，德军计划翌日凌晨3时发动对苏战争。这一情报通过各级指挥系统，一直上报到了斯大林那里。

斯大林在办公室踱来踱去，铁木辛哥、朱可夫、瓦杜丁等军方领导人注视着他。过了一会，斯大林开口说：“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

“不。我们认为这个逃兵说的是真话。”军方领导人说。

“我们该怎么办？”斯大林问。

屋里沉默了一会。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说：“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各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说。可他还是同意下达这项命令，但强调：“命令要简短，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军区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

6月22日零时30分，苏联下达了让西部边境备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命令。可已经太晚了，部队要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不是两三个小时可以完成的。

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军大炮开始对苏方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飞机开始对苏联境内的机场及其他军事设施进行猛烈的轰炸。凌晨4时，德军170个师，兵分三路，在长达1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

德军开始空袭后，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汇报了德军的空袭和炮击情况。

斯大林沉默不语。他无法接受战争已经降临这个残酷的现实，这对他的打击太沉重了。

朱可夫有好一会没有听见他的回答，只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又反复问道：“斯大林同志，您听见我说的话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喂，斯大林同

志……”

“你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来。”斯大林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

他放下话筒，在桌旁一动不动地站了足有1分钟，然后瞟了一眼那座老式的落地钟，时针刚刚越过6月22日凌晨4时。

4时30分，政治局委员们和几位军方领导人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坐在办公桌旁，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没有同进来的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吩咐说：“应当立即给德国大使馆打个电话。”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立即出去同德国大使馆联系。德国大使馆答复说，舒伦堡大使紧急求见。

过了好一会，莫洛托夫回到了斯大林办公室，用沙哑的嗓音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大使通知我们，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

屋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目光都转向了斯大林。

斯大林坐在椅子上，脸色愈发苍白、呼吸急促、一言不发，没有人能想象到他受到了多大的打击。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过了一会，朱可夫打破沉默，建议命令边境各军区部队对敌人进行猛烈的还击，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铁木辛哥补充说。

“下命令吧！”斯大林开口说。

几位军方领导人离去了，政治局委员们仍然留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等待着前线的战报，大家都很少说话。斯大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

几个月来，为了避免苏德之间爆发战争，他含垢忍辱、委曲求全，并且相信可以避免战争。可结果，战争还是降临到了苏联头上。他深感震惊，心中极为忐忑不安。问题不仅仅是避战的努力全功尽弃，关键是苏军还没有作好迎战的准备。他一直希望战争能拖到1942年爆发……有人提出，由谁把战争的消息告诉人民？大家都望着斯大林——他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理所当然应当由他来告诉人民，动员人民起来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入侵。

可是，斯大林拒绝了。他提出，由莫洛托夫负责这项工作。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拒绝。

22日清晨7时15分，斯大林授权铁木辛哥等人签发第2号命令，号召各军区部队向入侵之敌发动进攻，将敌人歼灭在边境地区。

这道命令完全不切合实际。清晨8时，苏军总参谋部查明了战况：德军的空袭使苏军的许多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飞机尚未起飞就被德军摧毁了，德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许多城市、铁路枢纽、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作好一级战斗准备、甚至根本没有接到战斗命令，就被仓促卷入了战争。前线各部队的有线通讯设施遭到严重摧毁，而当时边境地区大部分部队尚无无线通讯设备，命令无法迅速传达。德军装甲摩托化部队，正对苏军迅速地实施纵深穿插分割围歼，大部分苏军正在混乱地撤退。

斯大林迅速地采取了新措施，除中亚、外贝加尔和远东3个军区外，其余所有的军区都实行了动员。

6月22日下午1时左右，斯大林打电话给总参谋朱可夫说，鉴于前线司令员缺乏作战经验、陷于慌乱，政治局决定派他到西南方面军去担任统帅部代表，还有其他人到别的方面军去。“在目前这样关键时刻，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朱可夫有些担心。

“把瓦杜丁留下吧。请你抓紧时间，我这里好歹可以对付。”斯大林有些不耐烦。

朱可夫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后，立即飞往基辅。

22日黄昏，第1副总参谋长瓦杜丁中将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起草了总军事委员会第3号命令。斯大林仔细修改后，要求按惯例，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3人签发。深夜，瓦杜丁立即与正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朱可夫取得了联系，首先向他作了汇报。他说，截止目前，总参谋部仍然无法获得前线的准确消息，“关于敌人突入我国深度的消息，矛盾百出。……只知道西方方面军航空兵受到极大损失。”接着说到了第3号命令。

“是个什么命令？”朱可夫问。

“这个命令要求我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

朱可夫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下定必要的决心，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问题已经决定下来。”瓦杜丁的意思是，这是斯大林的决定。

“好吧，签上我的名字吧。”朱可夫说。

不久，第3号命令下达给前线各部队，但完全没法执行——该命令完全脱离实际。

领袖的声音

从6月23日起，前线不断地传来苏军惨败、溃退的消息，有些消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瓦杜丁报告说，德军坦克纵队已逼近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时，斯大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逼近明斯克？你怕是搞错了吧？你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

“不是。我没有搞错，斯大林同志，”瓦杜丁低声回答，“西方方面军的战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

随后几天，前线传来的消息无不让人失望、震惊，难以置信。斯大林简直不理解：五六天内，怎么会让德军深入苏联境内150—200公里？这仗是怎么打的？

6月26日，他给尚在西南方面军指挥部的朱可夫打电话：“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了明斯克。我不明白巴甫洛夫（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引注）是怎么啦。……你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

当天深夜，朱可夫飞回莫斯科。下飞机后，直奔斯大林办公室。铁木辛哥和瓦杜丁已在那里。朱可夫注意到，斯大林面容消瘦、脸色苍白、眼泡发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斯大林说。

“我需要40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朱可夫回答。

朱可夫分析了战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都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

可是，苏军的败退仍在继续。6月28日，德军攻占了明斯克。第二天，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统帅部，对西部战线的局势表示强烈不

满，大发雷霆。

为了扭转败局，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6月30日，他免去了库兹涅佐夫上将的西北方面军司令员职务，任命索边尼科夫少将接替。同一天，还把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从前线召回莫斯科，免去了他的职务。不久又把他和西方方面军其他一些将领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统统被枪毙。他们成了苏军初期大溃败的替罪羊。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受命亲自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它将全面统辖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是苏联战时的最高战略指挥部，享有巨大的权力，斯大林任主席，实际上由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

这些措施仍然没有能扭转败局。德军坦克纵队不顾自己的步兵没有跟上，实施纵深穿插，对苏军发动猛烈的楔形攻势，使越来越多的苏军陷入了德军的包围之中。德军参谋长哈尔德在军事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14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虽然哈尔德把话说得太乐观了一点，可斯大林面临的形势的确非常悲观。仗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到底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军队需要回答！人民需要回答！莫洛托夫毕竟是二流人物，仅他出面讲话是不够的。此时此刻，人民更需要听到领袖的声音。自战争爆发后对公众一直保持沉默的斯大林决定，在7月3日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斯大林对这次讲话极为重视，对讲稿作了反复修改。经过精心准备，这篇讲话与他以往讲话的风格大不相同。他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种亲切的称呼，立刻抓住了苏联军民的心。他接着解释说：“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170个师已经开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

斯大林懂得，此时此刻，只有高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有效地动员苏联人民保家卫国，进行宁死不屈的英勇战斗。他回顾了拿破仑入侵俄国惨败的历史，指出希特勒并不比过去的拿破仑更强大，现在，苏联人民像1812年一样，打的是一场“民族爱国主义的战争”。他号召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对不得不暂时让敌人占领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

这次讲话极大地振奋了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人们仿佛又听到了当年列宁提出的著名口号：“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之中。

斯大林担任的职务越来越多，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除了要考虑决定紧迫的军事战略问题外，还要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等等。严峻的战争形势，客观上需要他实行更强有力的领导，就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不过，比较而言，他比丘吉尔的权力更大。他原本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战争爆发后，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担任了拥有极大权力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当苏军统帅部最终改组成为最高统帅部时，他又成为最高统帅。他以不同的名义签署各种文件，但在讲话和下命令时，人们有时很难判断他究竟是以哪种身份出现的。在盟国三巨头中，斯大林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卫国战争的成败胜负更多地取决于他

的领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斯大林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他每天工作 16—18 小时，体形更消瘦了，面色苍白，眼睛里常常充满了血丝。巨大的战争压力，也使他变得比以往更容易发脾气了。

严峻的考验

7 月上旬，斯大林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和消息作出判断：德军的进攻是围绕三个方向展开的。西北方向的目标是列宁格勒、西部方向是冲着莫斯科而来的、西南方向的目标是基辅。他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改组苏军的指挥系统，在方面军的基础上成立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三个指挥部，以便协调各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有效地迎击三路敌军。可是，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经常越过方向指挥部，直接指挥各方面军。方向指挥部的设置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后来都撤销了。

7、8 月份，苏军仍在继续溃退。战争爆发仅两周多的时间，西北战线的苏军后退了 450 公里。虽然撤换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也无济于事。索边尼科夫走马上任后，并未能挽回败局，仅一个半月又被解除了职务。

局势最严重的是西方战线。7 月初的战报显示，西方方面军的 44 个师中，已有 24 个师被彻底击溃，其余 20 个师损失了 30—90% 的人员和装备。到 7 月 10 日，这条战线的苏军后退了 450—500 公里。

西南战线的局势稍好一些，但苏军也后退了 300—350 公里。

开战仅 3 周，苏军损失了 3500 架飞机和一半以上的燃料弹药仓库，近 30 个师实际上被消灭，另有 70 个师损失了 50% 以上的官兵。

苏军以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结果是：德军损失了 15 万官兵、950 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最令人欣慰的是，红军主力并没有被消灭，苏联并没有象法国那样屈膝投降、而是仍然在顽强抵抗。这既打破了希特勒的计划，也大大出乎英美军方人士的意料之外。

为了粉碎德军的进攻，斯大林很重视宣传鼓动工作，他提出：“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法西斯恶棍是可以被击败，也应当被击败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同样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苏联军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登战绩卓著的英雄的名单。

7 月中旬，德军围攻通往莫斯科的战略要地——斯摩棱斯克，战斗异常激烈。朱可夫回忆说，由于关系到莫斯科的安全，“斯摩棱斯克会战在 1941 年夏季各次战役中占有重要地位”。7 月底，斯摩棱斯克危在旦夕。斯大林焦虑不安，命令朱可夫和具体负责这次会战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去见他。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发现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在场。斯大林穿着旧上衣，手里拿着未点燃的烟斗——这是他心情不好的征兆。朱可夫一看便知道，今天大事不妙。

果然，斯大林开口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接替他，你们有什么意见？”

铁木辛哥耷拉着脑袋，没有说话。他能说些什么呢？他也是 20 多天前才临

危受命，接收西方方面军这副乱摊子的。

朱可夫非常了解他的这位老上级。他说，频繁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有严重影响，铁木辛哥元帅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已尽了一切努力、任何别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他，此时撤换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当的。

政治局委员中，也有人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不以为然，但慑于他的权威，不敢明言。朱可夫带头后，老资格的加里宁附和说：“我倒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

斯大林点燃了烟斗，缓慢地吸了吸，扫视了在场的其他人，问道：“也许，我们可以同意朱可夫的意见？”

“您说得对，斯大林同志。铁木辛哥还可以胜任。”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斯大林收回成命，铁木辛哥立即返回前线。不过，斯摩棱斯克还是没能守住，于8月5日沦陷了。斯大林大发雷霆。

看来，靠撤换方面军司令员并非良策，必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斯大林记得，20多年前，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曾经常向前线派出中央特命全权代表，去检查、核实、收集详细情报，这种办法行之有效。斯大林自己曾多次承担这种任务，包括参与组织指挥保卫察里津战役。他决定，吸取这一做法的长处，进一步加以完善：挑选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指挥员，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派往最重要的战线。他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对战役的实施负起全部责任，必须每天向最高统帅——即他本人——口头或书面汇报情况，遇有重要情况的判断或建议，必须书面汇报。如果某位代表在24小时内没有向他汇报，他会亲自打电话质问：“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有一次，马林科夫被派到朱可夫负责的战线，没有向他汇报情况。斯大林把朱、马二人叫到最高统帅部直问：马林科夫同志，你为什么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振振有词。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还有一次，他打电报严厉申斥华西列夫斯基：“现在已经是8月17日3时30分，而你还没有把8月16日的作战总结和你对于形势的估计报送大本营。……你缺乏纪律性，常常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责任。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有哪怕一次忘记你对大本营的责任，你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从前线召回。”其实他冤枉了华西列夫斯基，华氏已送出了例行的报告，只是没有及时送到斯大林手中。

通过这种向前线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办法，斯大林能及时、全面、准确和深入地掌握前线的动向，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指挥。

战争期间，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次数最多、战绩最卓著的要数朱可夫了。在苏军高级将领中，在斯大林面前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也要数朱可夫。

苏德战争爆发时，朱可夫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总参谋长。斯大林对他很器重。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派他到斯大林本人认为最重要的西南战线。6月26日，西方战线情况危急时，又急忙召他回来出谋献策。7月下旬，朱可夫与总参谋部其他成员对战局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决定向斯大林紧急汇报。7月29日，他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接见。

“你来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立即赶到斯大林办公室，把自己带去的地图摊在桌上，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总的局势，分析了德军的动向和苏军的危险处境。

斯大林立即警觉起来，“你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

“不！不是这样，半个月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8个精锐师加强莫斯科的防御。”朱可夫又补充说，“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迷惑不解地望着朱可夫。

朱可夫意识到，主动放弃基辅，对斯大林乃至所有苏联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但自己是总参谋长，不能感情用事，而有责任向最高统帅说出自己和总参谋部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基辅不得不放弃”。

斯大林一听，火冒三丈：“真是胡说八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可不是软柿子。他也不甘示弱：“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

屋里陷入了尴尬的沉寂。

这一次，倒是斯大林先冷静下来了。他说：“请你冷静些！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没有你我们也能行。……你先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

大约半小时后，斯大林又把朱可夫召来，宣布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接着又安慰说，你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想让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你愿意到哪里？”

朱可夫余怒未息，表示干什么都行。

“冷静些，冷静些！”斯大林决定任命朱可夫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接受任命，准备告辞。斯大林希望能消除他的不满情绪，笑着说：“再坐一会，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

他们一起坐下来喝茶，却无话可说。朱可夫仍然有委屈情绪，还犯着倔脾气。其实，斯大林这回对他算是够客气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更不用说像朱可夫这样发脾气。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下边的人，无不对他唯唯诺诺。斯大林自己偶尔也觉得这不正常。有一次，他很不耐烦地对两名负责人说：“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这一次，他之所以对朱可夫如此宽容客气，一方面可能是欣赏他敢于坦率直言的个性，但更可能是珍惜他的军事才干。若是对一个才华平庸的人，斯大林也许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保卫列宁格勒

苏军英勇顽强的抵抗，给德军以沉重打击。在苏德战争头两个月，德国陆军在苏联战场上损失约40万人，而1941年6月至12月，德军在其他战场上总共损失才约9000人。8月中下旬，希特勒被迫放弃了南、北、中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的战略，而把主力集中在南、北两路，企图先拿下基辅和列宁格

勒，在9月中旬雨季来临之前夺取顿涅茨盆地，占领乌克兰粮仓、顿巴斯煤矿和高加索的油田，然后从南北两路合围莫斯科。

从9月上旬起，苏联西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临着巨大压力。9月9日，德军占领了距列宁格勒125英里的提赫文，列宁格勒危在旦夕。

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摇篮，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能否守住对整个苏德战争将产生重大影响。斯大林焦急万分，决定派朱可夫去挽救危局。

当时，朱可夫负责的战线形势也较紧张。但他知道，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他略微考虑了一下，回电说：“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1个小时。”

当晚，朱可夫赶回莫斯科，直奔斯大林住处。政治局委员们都在座。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1个小时。”

斯大林看了看手表，说道：“1小时零5分钟。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说完又转身去看地图，大家都默不作声，朱可夫也无心吃东西。

斯大林转身向朱可夫介绍了列宁格勒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说完后又去看地图。

过了一会，他又转向朱可夫问：“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斯大林并不知道希特勒已作出暂停中路方向进攻的决策。

朱可夫认为，德军中央集团军伤亡很大，如果德军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未必能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

斯大林点了点头，又问起了朱可夫负责的战线，朱可夫汇报了15分钟。斯大林一边听，一边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几笔。然后，他对朱可夫说：“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朱可夫大感意外，但表示乐于从命。

“这就很好。”斯大林提醒说，飞机要通过战区上空，要注意安全，为了安全起见，“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朱可夫请求准许他带两三位助手去。斯大林表示同意：“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

9月10日，朱可夫飞往列宁格勒前夕，斯大林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复列宁格勒的防御，为此不必顾忌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他最后语重心长他说：“我们是信任你的。”此刻，他把挽救列宁格勒危局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爱将身上。

当天，朱可夫带了两位助手飞抵列宁格勒。此时，列宁格勒已危在旦夕，德军正从四面八方列宁格勒逼近，切断了该城通往外地的所有陆上交通线，它与外界的联系仅靠拉多加湖上的运输线和空中航线勉强维持，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开始考虑一旦城市失守应采取的善后措施。

朱可夫不愧是久经战火考验的杰出指挥员，短短3天之内，就把列宁格勒的防线重新组织起来了。苏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抵抗，粉碎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9月底，德军向列宁格勒实施的总突击战遭到失败。10月初，德军被迫转入防御，准备过冬，并把部分军队抽调到中路去进攻莫斯科，苏军防线趋于稳定。此后，这条防线一直维持到1943年1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列宁格勒始终掌握在苏联军民手中。

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朱可夫再次显示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一向治

军严厉，这一次形势又特别严峻，加之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对一些渎职的官兵更是毫不留情。有时，他大动肝火，不免伤害一些人的感情。9月16日，他我方面军工兵主任贝切夫斯基了解环城公路防线的情况，当贝氏回答问题不明确时，朱可夫一拳头擂在桌子上火冒三丈他说：“没问你把透明图交给了哪个人。我关心的是另一码事儿：你是否知道集团军司令员了解这条防线的情形？你懂俄语吗？”“你讲话经过大脑思考没有？”“倘若安东诺夫的师今天夜里不能占据环城公路的防线，德国人就会冲进来，这个你明白吗？那时候，我就把你拉到斯莫尔尼宫前面，像枪毙叛徒那样枪毙你！”

贝切夫斯基走出去，一肚子委屈情绪。比较了解朱可夫的第42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见状，开玩笑说：“挨训啦，主任？别瞎生气了，主任！你还算走运，他还说过要把我跟军事委员一起绞死哩！”

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也是列宁格勒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别的不说，仅修筑防御工事一项即可可见一斑。据统计，在城市周围和市内，一共挖了93英里长的防坦克壕、崖壁和断崖，设置了125英里长的铁丝网，挖了7179条步兵班堑壕和389英里长的交通壕。平均每天约有4.5万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工作是由妇女们完成的，而且是在忍饥挨饿的条件下完成的。

一次，费久宁斯基将军去视察妇女们挖工事，他想让那些正在干活的妇女们放松一下，就大声笑着对她们说：“你们挖得不错嘛，姑娘们，很好！”

一位中年妇女，身穿一件旧外套，伸直了疲惫的身子，拄着铁锹，毫无笑容他说：“我们挖得不错，可是你们打得不好。你们让德国人一直打到列宁格勒城下啦！”

费久宁斯基将军哭笑不得。他不得不承认这位妇女说得很对，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想换个话题，便问：“你的丈夫在哪儿？”

那位妇女的回答再次让他哭笑不得。“不知在哪个地方，跟你们在一起往后退呗！”说完后又开始干起活来。

这段小小的插曲，让费久宁斯基将军久久不能忘怀。

丢失基辅

苏军守住了列宁格勒，却没有能守住基辅。

9月7—8日，德军制定了歼灭基辅——第聂伯河——迭斯纳河地区的苏军，夺取基辅的作战计划。为此，德军的南方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参加了这次会战，其坦克纵队进展迅速。至9月9日，德军合围基辅之势已露端倪。

早在9月7日，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就向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员布琼尼元帅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报告了他面临的危急局势。斯大林得知后，把他狠狠地刺了一顿。对斯大林来说，任何有关主动放弃基辅的想法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月前，朱可夫曾为此挨过申斥，并丢掉了总参谋长职务。现在，斯大林仍然不改初衷。他责备基尔波诺斯想逃跑。最后他勉强同意西南方面军可以撤到迭斯纳河一线，但一定要守住基辅。

9月9日，斯大林同朱可夫谈话时，也谈到了西南战线。朱可夫认为，除列宁格勒外，最危险的地段就是西南方面军的防线。他仍然坚持一个月之前提出的主张：把基辅周围一带的苏军撤到第聂伯河东岸。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老问题。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朱可夫恳切他说。

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

9月11日，西南方向总指挥部请求最高统帅部批准基辅地区的苏军向东撤退。斯大林坚决予以拒绝。他命令说：“未经最高统帅部许可，不得放弃基辅。”两天后，他解除了西南方向指挥部司令员布琼尼元帅的职务，把铁木辛哥元帅从西方方向调到了西南方向接替布琼尼。同一天，他还把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狠狠训了一顿。

斯大林的固执己见，给苏联西南方面军招来了灭顶之灾。9月16日，德军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率领的南北两路坦克纵队，在苏军后方的洛赫维策会师。苏军的4个集团军、约60万人陷入了重围。9月17日，斯大林才清醒过来，被迫同意西南方面军与敌人脱离接触，向东撤退，但为时已晚。从9月16—26日，被围困在“基辅大包围圈”内的苏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只有15万人冲出包围圈，其余45万人（另一说法是60万人）被俘，基辅也丢失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等4名将军阵亡。苏军还损失1700门大炮。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斯大林心情极为沮丧。

不过，从战略全局看，基辅战役的进行，耽误了德军在冬季开始之前攻下莫斯科的计划。

“台风”刮向莫斯科

1941年10月初，希特勒集中了德军180万人、19000门火炮、1700辆坦克，在第二航空群的支援下，发动了以占领莫斯科为目标的强大攻势——代号为“台风”作战计划。

10月2日，希特勒发表动员讲话。他极其狂妄他说：“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伟大决战的开始，展开最后一次巨大打击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次打击将在入冬之前消灭敌军。”苏联通过无线电截听到了他的讲话，斯大林极为忧虑。斯摩棱斯克会战的失败，60万苏军在基辅被围歼、列宁格勒遭围困，……这一连串的重大挫折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在莫斯科会战中再出现一次重大挫折，后果将不堪设想。

德军开始进攻后，进展较快，成功地突破了保卫莫斯科的苏军西方方面军的防线。10月5日，斯大林打电话给远在列宁格勒的朱可夫，要求他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

10月6日，因列宁格勒战局变化，朱可夫未能按时起飞。直到10月7日黄昏，他才飞抵莫斯科。迎接他的斯大林卫队长说，最高统帅生病，呆在住所里，朱可夫直接去见他。

斯大林正患着流行性感冒，一脸疲惫的神色。那一阵子，他接连几天几夜没有离开办公室，每天只在隔壁小休息室里打吨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工作。他不像罗斯福那样超脱，事无巨细，什么都管，大到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小到坦克、大炮乃至钦丝网等作战物资的分配，他都要亲自参与或过问。

他向到来的朱可夫点头示意，然后指着地图介绍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

告。”他要求朱可夫立即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了解情况，随时向他报告。

朱可夫立即动身去寻找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他来到普罗特瓦河畔，他的故乡离这里不太远。他 11 岁时，妈妈送他到莫斯科科学皮货手艺，那时，他走遍了这一带。此刻，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想起了他的故乡和还在故乡的母亲、姐姐和 4 个外甥。他们现在怎样？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又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查出他们是朱可夫大将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他很担心，想乘车回家一趟，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时间不允许。3 天后，他派人把亲属接到了莫斯科。两星期后，德军占领了他的家乡。

朱可夫终于找到了布琼尼，两人就战局问题交换了意见。朱可夫决定，由布琼尼去方面军司令部向斯大林汇报，自己继续去尤赫诺夫地区。

在苏军放弃的美登城，朱可夫发现一位老太太在一片废墟中寻找着什么，问她时，她什么也不说。一位妇女泪流满面地走过来告诉朱可夫：她已经发疯了。前天，德军飞机来轰炸，老太太正在井边打水，她的几个孙子在屋子内，炸弹落在她家的屋顶上，几个孙子被埋在了废墟底下……朱可夫再一次激起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可他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妇女。

10 月 8 日，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两天后，他又接到另一份通知：任命他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被搞懵了。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告诉他，执行后一个命令，因为国防委员会最新决定：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把它合并到西方方面军中去。

斯大林也打电话给朱可夫：“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好！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

10 月中旬，德军第 3、4 两个坦克兵团在维亚济马地区会师，苏军 4 个兵团陷入包围。斯大林非常担心他们重蹈基辅会战的覆辙，立即下令突围。苏军伤亡很大，一部分突围成功。10 月 15 日，德军突破苏军的莫扎伊斯克防线，莫斯科面临被攻占的危险，局势非常紧张。公共汽车和出租车都被部队征用了，市民们出门只好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行走。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外交使团，要他们随苏联政府撤离莫斯科。有关斯大林已撤离首都的谣言广为流传，人心惶惶，有些不法分子开始搞打砸抢活动，10 月 16 日至 18 日，形势危急达到了顶点。

10 月 17 日夜里，斯大林把国防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军方领导人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商讨撤离莫斯科问题。经过讨论，决定发布命令：立即撤退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在各大企业埋上地雷，一旦莫斯科失守时予以炸毁，政府机关迁往古比雪夫、总参谋部迁往阿尔扎马斯。

贝利亚在会上说，已经为斯大林迁出莫斯科作好了一切准备。

斯大林一言未发。他觉得，只要军队、人民知道自己还在莫斯科，就会信心倍增。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留在莫斯科（与丘吉尔坚持留在伦敦，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有异曲同工之妙）。莫斯科军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深受鼓舞。

10 月 19 日，莫斯科实行戒严，德军的进攻有所减慢，莫斯科的秩序才有所恢复。

10月份，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向前推进了200—250公里。由于苏军顽强抵抗，希特勒原订10月中旬占领莫斯科的企图没有得逞，到10月底，德军的攻势已大为削弱。

11月7日，是传统的十月革命节，每年的这一天，苏联都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在1941年11月这个特殊岁月，是否照常举行阅兵式呢？10月底至11月初，斯大林一直在考虑此事。作为苏军统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深知，此刻照常举行阅兵式，对打击纳粹德国的嚣张气焰，鼓舞苏联军民的士气，坚定苏联人民和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信心，都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可此刻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战争形势是否允许苏联举行阅兵式呢？斯大林心里没底。

11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最高统帅部，问道：“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德军能够、而且肯定将企图进行破坏。为了防止敌人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

听了朱可夫这一番话，斯大林坚定了举行阅兵式的决心。他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交待说：“阅兵时，如有德国飞机冲过防线进行轰炸，要迅速清除死者和伤员，但阅兵必须进行到底。让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纪录片，尽快复制后分送全国各地放映……报刊要更广泛地报道阅兵式。我将在庆祝大会上作报告，在阅兵式上讲话。……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这很冒险！当然在国内外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反响。”莫洛托夫的话模棱两可。

“那就这么决定了。”斯大林又转向贝利亚：“你去作必要的安排吧！”

11月6日，在莫斯科的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斯大林发表了重要讲话。自苏德战争爆发后，他本人便注意从俄国历史上的伟大统帅们身上汲取胜利的信念，他下令在他的办公室墙壁上，除原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肖像外，再挂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肖像。他也很注意以俄国历史上的民族精英来激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增强他们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心。在这次庆祝大会上，他说：“纳粹德国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柯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闪电战已经在俄国失败……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入侵我们祖国的所有德国人……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对德国占领者决不留情！”

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斯大林再次发表讲话，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发苏联军民的抵抗斗志。他说，你们是在为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而战，敌人正逼近古俄国的母亲、苏俄的首都——莫斯科的大门。“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他接着又说出了一长串姓名）……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这是一次独特的阅兵式，一支支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从红场、从列宁墓前列队通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然后直接开赴炮火连天的莫斯科前线。

阅兵式的成功举行和斯大林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给苏联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希特勒气急败坏，英美盟国人民拍手称快。

莫斯科大反攻

11月13日，斯大林不顾朱可夫的反对，坚持让西方方面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突击，可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11月15日，德军集中强大兵力，向保卫莫斯科的加里宁方面军所属第30集团军阵地发起进攻，从而开始了进攻莫斯科战役的第二阶段。11月16日清晨，德军突破了第三十集团军的防线。16日至18日，德军企图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开路，强行冲击莫斯科。在几个不同的地段，德军已推进到了离莫斯科20英里以内的地区，在某些地方，甚至距莫斯科城只有20公里。莫斯科已遥遥在望——通过一架高倍双筒望远镜，他们已能够望见莫斯科高层建筑屋顶。莫斯科西北区的市民，已能清晰地听到炮击声。

斯大林异常不安，又拨通了朱可夫的电话。此前，关于战局发展演变的可能性，他已经多次地询问过朱可夫，而这一次问话的语气、用词却格外不同：“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朱可夫的回答仍然像往常一样坚定明确：“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朱可夫对战局的估计常常是正确的。斯大林的心情轻松了一些，便说：“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很不错。你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将在11月底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我们还没有。”

11月27日，苏军发动了一次迅猛的反突击，在韦尼奥夫方向，迫使德军后退了10—15公里。两天后，苏军夺回了罗斯托夫。德军古德里安将军后来回忆说：“我们倒霉的日子始于罗斯托夫，那是一个灾祸将临的预兆。”

11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在军事日记中写道，东线德军从1941年6月22日到11月26日，共有24658名军官和718454名士兵阵亡、受伤或失踪。东线德军缺员34万人，步兵兵力已消耗了一半。

事实上，由于苏联红军的顽强抵抗，加之气候严寒等原因，到11月底，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

11月29日，朱可夫请求斯大林允许他呈报他的西方方面军在部分战线实施有限度的反攻计划，斯大林同意上报。第二天，朱可夫的计划呈送上去后，斯大林立即批准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整个莫斯科战线作了全盘考虑，正在与最高统帅部其他成员一起，策划实施一次比朱可夫计划的规模要大得多的反攻。11月30日拂晓前，他打电话问朱可夫，对于在整个方面军战线上实施一次反攻有何意见？朱可夫说，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发动这样大规模的反攻。

斯大林立即安排补充兵员和装备，当晚，又要求加里宁方面军集中强大兵力，作好配合西方方面军大反攻的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将军有些犹豫不决，斯大林命令他必须按时转入反攻，并派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前往督战。

此外，斯大林还要求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也按时转入反攻。

这样一来，朱可夫最初提出的有限度的反攻计划，经斯大林帷幄运筹，演变成为莫斯科大反攻计划。这是苏军在战争初期防御战过程中实施的一次重大反攻行动。斯大林对这次反攻极为重视，希望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12月4日，他再次打电话给朱可夫：“除去已经给了你们的，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表示，还需要空中支援和坦克。

斯大林说：“现在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航空兵可以。请你同总参谋部接洽一下，我立刻打电话去。”这时，他把整个莫斯科战线的反攻计划告诉了朱可夫：“请注意，我们已下令，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转入反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在叶利齐地区转入进攻。”

朱可夫喜出望外，没想到他最初要求的有限反攻，已变成了三个方面军协同配合的战略大反攻。

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首先开始反攻。12月6日，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一部的大反攻也开始了。苏军的三个方面军进展迅速，打得德军措手不及。12月14日，苏军解放克林。经过10天战斗，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向前推进了130公里，其他部队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遭到沉重打击。

12月13日，苏联宣布，德军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经失败。希特勒一气之下，于12月19日解除了冯·勃劳希契元帅的陆军总司令职务。12月25日，苏军对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使这支大战爆发以来在欧洲东西战场上骄横一时的德军精锐坦克兵团遭到惨重损失。希特勒气急败坏，于第二天解除了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职务。

从12月6日到25日，在莫斯科大反攻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阵亡和被俘约30万人，并被迫从莫斯科城下向西后退100—250公里，莫斯科受到的威胁解除了，德军统帅部早已制定好的攻克莫斯科的庆祝仪式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了。

这是二战爆发以来，德国军队第一次遭受的重大失败。事物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既然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第三次了。正因为如此，这第一次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大，它使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增强了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信心。

在经历了半年接连不断的后退、溃败乃至几乎令人绝望的惨败之后，斯大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第十一章 “非正式婚姻”

霍普金斯：“我来此地是为了设法充当两位主要歌星之间的牵线人。”

罗斯福：“在这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英国幸而有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一位卓越的伟大领导人。”

丘吉尔：“我们在患难中及时得到您们这样非常应急的援助，整个英帝国谨向您和美国人民祝福。”

“朋友们，英国破产了”

1940年9—10月，丘吉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决定推迟实施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根据英吉利海峡愈来愈恶劣的气候，他和英国军方不难作出判断：9月份过后，德军渡海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此后，丘吉尔面临的是另一个性质大不相同的难题：经济拮据。

英国参战时，有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战争初期，又赚了大约20亿美元的外汇。为了进行战争，英国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军火。美国实行“现购自运”原则，英国从美国进口军火时，必须付现款。战争初期，英国担心自己储备的美充耗尽，在从美国进口军火等商品时，精打细算，可进口可不进口的东西，尽量不进口。有人感叹说：“我们好像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

当西线处于“奇怪战争”阶段时，这种节约开支的办法勉强能行得通。当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后，前线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急剧增加，必须通过扩大从美国进口来弥补英国自己生产供应之不足。丘吉尔认为，在面临德军随时可能入侵英国之际，过分担心美元告罄的后果，是错误的节约方法。他的想法很简单：凡是该进口的物资。尽量进口，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留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

截至1940年11月，英国一直遵守“现购自运”原则。为从美国进口各种物资，它向美国支付了45亿多美元的现款，卖掉从英国私人手中征购来的3.3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只剩下大约20亿美元了，其中大部分是不能立刻变卖的海外投资。即使它卖掉了全部的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资产，也付不清已经订购的货款的一半，况且战局的发展使它对美国各种物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有人提议，征用老百姓手中的金银首饰，用以支付美国的货款，丘吉尔反对这种做法。他相信英国人民会为国家分忧，但认为这种靠征集“结婚戒指和其他金首饰”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刺伤美国人的感情，仿佛英国故意“使美国人丢脸”。另一方面，丘吉尔也反对削减从美国的进口。他认为，“归根到底，最大的节约就是缩短战争”。

那么究竟怎么办呢？“现购自运”原则是罗斯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美国国会批准的，英国是没有办法让美国国会放弃这一原则的，至少在1940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40年11月，罗斯福在大选获胜后，在援助英国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他建议美国制造商船，租给英国，以确保英国的海上运输不致中断；他指示司法部长，设法克服法律上的障碍，以便向英国出售飞机、出租船舶；他还指示把新生产的军火的一半分配给英国。不

过，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英国已拿不出钱来租、更拿不出钱来买美国的各种物资了。

1940年11月中旬，英国驻美国大使洛西恩回国述职，向丘吉尔建议：罗斯福已经赢得了大选胜利，正在考虑援助英国的最佳途径，首相应该给他写一封信，全面陈述英国的艰难处境。丘吉尔觉得洛西恩言之有理，要解决英国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必须在罗斯福身上打主意。他立即开始考虑这件事。为了引起罗斯福对这封信的重视，11月16日，他先同罗斯福打了个招呼，通报说，自己正在给总统写一封长信。信写好后，又交给有关方面审核，交给战时内阁讨论，以便集思广益。

洛西恩大使返回美国，于11月2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将英国的财政困难公诸于众。他形象他说：“是啊，朋友们，英国破产了，现在希望你们给一点钱！”

英国“破产”的消息立即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罗斯福为此感到不安，11月23日，他接见洛西恩，表示希望英国在进一步要求援助之前，先清点一下它在西半球拥有的财产。此时，罗斯福最初并不完全相信英国已经“破产”，而认为“他们还有很多钱”，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英国迟早会有拿不出钱来支付进口的时候，为了援助英国，必须冲破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约翰逊法》和规定“现购自运”原则的《中立法》造成的障碍。

然而，要突破这些法律障碍，谈何容易！不久前的大选和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公众仍然强烈反对美国卷入战争。这些法案就是为此而制定的。罗斯福虽说已赢得了大选胜利，但仍然感到，必须防止人们产生这种印象：总统正像当年威尔逊那样把国家引向战争。《约翰逊法》和《中立法》，是美国公众，尤其是孤立主义者最敏感的带有爆炸性的问题，最好还是暂时别去触动它们，援助英国，必须另辟蹊径。

浇水皮带管

1940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在几个心腹顾问的陪同下，乘巡洋舰出海，白宫宣布，总统此次外出，旨在视察最近从英国租来的几个军事基地，总统的顾问们认为，总统是为了休息，去海上钓鱼、散心、晒太阳，罗斯福自己对记者们说：“我们去圣诞岛购买圣诞明信片，去复活岛购买过复活节用的蛋糕。”

其实，他这次出海的主要目的，是要养精蓄锐，以便安安静静、集中精力、深入仔细地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援助英国。

一路上，罗斯福还在盼望丘吉尔半个月之前就说过的一封信，为什么这封信还没有寄来？丘吉尔首相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呢？巡洋舰经过美国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时，罗斯福买了许多古巴雪前。在经过英纳海峡时，他又按着名作家海明威说的方法，垂钓了半天，可没有钓到一条鱼。

12月9日，一架飞机终于送来了丘吉尔的长信。在信中，丘吉尔谈到了英国在1940年如何孤军作战，幸亏有美国鼎力相助，才挽回了颓势；他还展望了即将来临的1941年，英国将会遇到商船减少、运输力量不足的巨大危险。此外，他详细陈述了英国遇到的财政困难：“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借任何必要的牺牲

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英国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可以出售的资财被剥夺得一千二净，以致在我们用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自己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一的。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的利益的。”这些话说得既坦率而又让人感动。

丘吉尔在信中重申：英国愿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同时也相信，美国会支持英国的事业，满足英国的迫切需要。至于美国应该如何在经济上支援英国，丘吉尔一反惯例，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实际上，他也没有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罗斯福被丘吉尔的来信深深地打动了，下决心要“支持英国的事业”。可他苦无良策。过去遇到类似问题，通常有两种解决办法：或无偿赠送军用物资，或者提供巨额战争贷款。罗斯福意识到，美国公众舆论，尤其是国会，不会赞成任何一种办法。他本人也不希望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战时留下战债，战后没完没了地扯皮，破坏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

那两天，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躺椅上，反复地阅读丘吉尔的来信，冥思苦索、绞尽脑汁。他没有找任何顾问商量，包括心腹顾问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也很了解罗斯福的脾性，每当他看来在休养、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常常是在积聚精力，思考重大问题。每当这时，霍普金斯决不去打扰他，以免打断他的思路。霍普金斯倒是在想，丘吉尔究竟给总统写了一些什么？他萌发了想见见丘吉尔的念头。后来，在一个傍晚，罗斯福突然向他透露了一切。霍普金斯凭着自己追随罗斯福多年的经验断定：总统已经成竹在胸。

12月16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注意到，他晒黑了，精神却更饱满。罗斯福故弄玄虚：“今天我认为没有啥特别新闻。”他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讲了一些趣闻轶事，似乎漫无边际，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重要战争是因为缺钱而被打败的”，有人建议给英国提供贷款，有人主张无偿地给它提供军火。这些都是陈词滥调。我们想尝试一种崭新的东西，“我认为，应把这个荒谬的、老牌的美元标记取消”，代之以君子协定：让英国人在有利于美国防务的基础上使用他们所需要的美国的东西，战后我们照样把这些东西拿回来，物归原主。

“好吧，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假定我们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有一节花园浇水用的皮带管。如果他能拿我的皮带管接到他家的水龙头上，我就可以帮助他扑灭把火。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不会在救人之前就对他说：‘老兄。这条皮带管我花了15美元，你得给我15美元才能用。’不！不能这样做！我不要那15块美元——我只要他在把火扑灭后，把我的皮带管还给我就是了。”

罗斯福丰富的想象力、生动贴切、深入浅出的比喻，让记者们惊讶不已、目瞪口呆。按他的设想，美国把各种物资租借给英国，消耗掉的就算是美国对反法西斯共同事业的贡献；战争打完后用剩下的，归还给美国——这真是一个绝招，既不是无偿援助、又无须提供贷款；既慷慨大方地支援了英国，又不致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当了傻瓜；既不违反《约翰逊法》，又突破了“现购自运”原则的死框框，可以达到援助英国的目的，又不给孤立主义者以攻击的把柄。这一招真绝！

12月29日，罗斯福又发表了一次“炉边谈话”。他说：“我们必须尽

快把足够数量的武器给他们（指英国）送去，才能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避免别人不得不忍受的战争悲痛和苦难”，“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至此，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罗斯福找到了一个美国所能扮演的最合适的角色。

这次谈话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白宫收到的公众来信中，99%是表示拥护的。民意测验也表明，80%的人支持总统的政策，只有12%的人表示反对。61%的人表示，为了援助英国，可以不惜冒战争风险。

罗斯福作出的这些反应，使英国首相丘吉尔喜不自禁。他打心眼里感谢罗斯福，12月30日，致函罗斯福，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同时敦促罗斯福，希望尽快让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尽快付诸实施。

霍普金斯访英

1940年圣诞节期间，罗斯福还在进一步琢磨丘吉尔那封长信中提出的问题。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对霍普金斯说：“倘若我和丘吉尔能坐在一起谈谈，这方面好多问题都能解决。”他与丘吉尔神交已久，很想见见面。

“什么东西阻止你呢？”霍普金斯问。

“咳！此事不能马上商妥。他们没有大使在这儿，我们的大使也不在那儿。”原来，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于12月12日在华盛顿病逝，美国驻英国大使肯尼迪则辞职回国，两国都还没有来得及向对方派出新大使。

霍普金斯灵机一动，望着总统说：“总统先生、我到那儿走一趟，怎么样？”自从那次在巡洋舰上看见罗斯福完全被丘吉尔的来信吸引住后，霍普金斯就萌发了要见识丘吉尔的念头。

罗斯福拒绝了他的要求，新年将至，要做的工作很多，他需要霍普金斯留在身边予以协助。霍普金斯见丘吉尔的愿望很强烈，他找到对罗斯福有影响力的总统秘书利亨特小姐和大法官弗兰克福特，请他（她）们出面为自己说情，罗斯福还是不答应。霍普金斯便断了这个念头。

1941年1月3日上午，霍普金斯突然接到通知说，罗斯福总统同意他访问英国。他想，一定是总统又在同自己开玩笑，并没有把这个通知当真，后经证实，罗斯福确实同意他出访英国。霍普金斯喜出望外，两天之后，便动身飞往英国。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里，粗略地谈到了政府准备向国会提交租借法案的想法。1月10日，《租借法案》正式提交给美国国会讨论。它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可以向总统本人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

霍普金斯动身赴英国后不久，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也准备访问英国。罗斯福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希望威尔基的访问，将会有助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们赞成通过《租借法案》。威尔基出访前夕，来白宫面见罗斯福。罗斯福听说自己的这位从前的竞争对手要来，赶紧让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堆放一些文件。办事人员有些不解：“总统先生，您要哪一种？”

“哦！随便什么，只要给我一叠，散开在办公桌上就行了。这样，当威尔基来时，我将显得忙得不可开交。”

威尔基后来听说此事时，感叹道：“那够典型的了！”

霍普金斯赴英时，罗斯福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霍普金斯先生是我的

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对此人寄以最大的信赖。”最初，丘吉尔根本不知道霍普金斯是何许人也，当他从部下那里得知霍普金斯与罗斯福的密切关系、在白宫的地位及其来头后，便派秘书布雷肯到机场迎接，同时下令把遭轰炸后残存的红地毯统统铺开迎接他。

布雷肯来到机场，看见乘客们都下了飞机，却怎么也找不到霍普金斯。他走上飞机，才发现霍普金斯仍然坐在座位上，一脸痛苦的表情，好像生病了。原来，霍氏身体状况很差，而那时，没有从美国直达英国的航班，霍氏一路上辗转了5天，累得解安全带的力气也没有了。

初到伦敦，霍普金斯首先会见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驻英记者爱德华·默罗。大战爆发时，正是他通过无线电，把战争的实况消息传回了美国。当时，霍氏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默罗发回的实况报道。每当收音机里传来默罗的声音：“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是伦敦……”，霍普金斯像许许多多的听众一样，注意力立刻被吸引到了战火纷飞的英国和欧洲。

见到这位著名的记者时，霍普金斯非常高兴。在谈到自己此次访问英国的使命时，他打了一个比喻：“我想你可以说我来此地是为了设法充当两位主要歌星之间的牵线人。”

霍普金斯动身赴英之前，已有很多人向他介绍过丘吉尔的情况。有人说，丘吉尔权力很大，同英国内阁中的大臣们交谈，简直是浪费时间，应该集中精力同丘吉尔谈，因为“丘吉尔就等于英国战时内阁，其他人无关紧要”。还有人说，丘吉尔不喜欢美国和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已经意识到，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很自负，如果他们真的合不来，必然影响英美两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合作。此次访英，一是了解英国坚持抗战的详情，同时也是要仔细了解丘吉尔这个人。

在同丘吉尔第一次会晤时，霍普金斯说，总统迫切希望能在4月份会见首相。丘吉尔表示，他也很想会晤总统，越快越好。霍又说：“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要共同打赢这场战争”，他派我来是要告诉首相，他将全力以赴地支持您。接着，霍又坦率地问，有人说首相不喜欢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对此该作何解释？

丘吉尔否认说，决无此事，这完全是美国前驻英大使肯尼迪散布的谣言。霍相信了这一解释，因为他了解肯尼迪，那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后裔（后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与罗斯福有矛盾，也不喜欢英国，已被罗斯福解除了大使职务。霍氏随后向罗斯福汇报时说：“我认为，说丘吉尔既不喜欢你，又不喜欢美国，这句话是不真实的——说这种话真是毫无意义。”

在随后的参观访问中，英国人民同仇敌忾、决心抗战到底的大无畏勇气，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给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丘吉尔本人。自第一次见面后，他就对丘吉尔产生了好感。在英国访问的最初两周，他几乎每天都同丘吉尔呆在一起，对丘吉尔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丘吉尔的言谈举止、情感性格、工作方法，都深深地吸引了他。英国国王同他谈起丘吉尔时曾说，假如丘吉尔万一发生意外，英国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霍普金斯逐渐意识到，在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丘吉尔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以替代的。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函电中，从多方面谈到了丘吉尔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您的‘前海军人员’现在不仅仅是首相，而且也是战略方面以及作战中一切带有根本性问题上的指挥官。”“丘吉尔在各方面都正在强有力地领导着这个国家，并且举国上下都支持他。”“从政府这个词的一切涵义来说，丘吉尔就是政府本身。……在这里，他是您所需要并与之充分取得一致意见的独一无二的人。”……霍普金斯几乎被丘吉尔迷住了；而他的汇报又几乎迷住了罗斯福，使他更渴望早日会见丘吉尔，同时感到，霍氏此行不虚。霍氏原定访问两周，期满后却想延长，罗斯福同意了，针对霍的身体状况，他关切他说，“一定要设法睡好觉”。霍氏对此很受感动。1月30日，是罗斯福的生日，往年每逢此时，他总要出席罗斯福的生日宴会，今年不能出席了，他便致函罗斯福说，到时候，他一定在伦敦举杯，遥祝总统健康长寿。

丘吉尔陪同霍普金斯到处视察参观，每到一处，便介绍说，这是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并频繁地让霍氏亮相，发表讲话，藉此鼓舞英国军民的士气。身体虚弱的霍普金斯，被接连不断的这类活动折腾得精疲力竭，有时想回避，却总是被丘吉尔“拖”出来。不过，霍氏精神很愉快。在一次即兴讲话中，他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将跟随着，即使是天涯海角。”这句话立即传遍了整个英国，被英国人视为“美国将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保证——霍氏对此始料未及。一位英国内阁大臣后来说，当英国人民在患难中孤军作战时，霍普金斯带来的精神鼓励比美国提供的驱逐舰更重要。

在这次访问之后，霍普金斯成了为英国争取美援的一个重要的说客，他不断地敦促罗斯福，向英国“提供一切我们所能给的援助”。此外，通过这次访问，他发现，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很多方面都大不相同：罗好静，在他周围，很少有喧闹的情况，丘却毫不在乎别人在周围吵吵嚷嚷；罗很少熬夜，除非是竞选，或偶尔打扑克来劲了，丘则经常在深夜工作；罗酒量有限，很少贪杯，丘则是海量，常喜欢畅怀豪饮；丘感情外露，喜笑怒骂溢于言表，在公众面前失声痛哭，亦不足为奇，罗则城府很深，藏而不露，有泪不轻弹……。另一方面，他们亦有不少共同之点，如意志坚强、坚韧不拔、智力过人、自负自尊……。

《租借法案》

1941年2月中旬，霍普金斯结束了在英国的访问。由于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回国：经中立国葡萄牙的里斯本、葡属西部非洲、再到南美的巴西，然后向北经加勒比海——绕了这么一大圈之后，才回到华盛顿。

“你和丘吉尔相处得怎样？”罗斯福迫不急待地问。

“就像这样”，霍普金斯交叉着他的10根手指说。他还说，英美两国首脑应在某个地方会晤。罗斯福表示赞成。

霍普金斯带回了丘吉尔送的纪念品——一瓶药丸。丘吉尔曾对他说，这药特别能振奋精神，他自己常服用。罗斯福下令对药丸的成份进行分析检测。海军医疗中心分析检测后认为：药丸是由对人体既没有很大坏处，也没有很大好处的物质混合而成的。

霍普金斯汇报说，由于在1940年大选中，威尔基曾攻击说，罗斯福当选，美国就会在1941年春参战，许多英国人都信以为真，相信美国会在1941年“5.1”之前参战。

罗斯福苦笑了一下，美国参战还早着哩。不过，他更加坚定了全力以赴地援助英国的决心，当务之急是促成国会尽快通过《租借法案》。

孤立主义者仍然强烈反对通过《租借法案》。参议员惠勒散布谣言说，通过这项法案，将使每4个美国青年中1人葬身沙场。罗斯福反驳说，惠勒的话，是“人们听到过的最虚假、最卑怯、最不爱国的言论”。他让支持援助英国的人到国会游说，争取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此时，丘吉尔也表现得很聪明。为了促成美国国会早日通过《租借法案》，他发表了一篇配合罗斯福行动的广播讲话，明确表示，英国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美国派军队参战，“给我们工具，我们将会完成这项任务”。

1941年2月8日，《租借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是，参议院在进行辩论时，有人试图限制总统的权力，不允许总统使用美国海军运送租借物资。罗斯福表示，他可以定期向国会报告实施《租借法案》的具体措施，但坚持认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权使用海军为商船护航。

3月8日，参议院以60对31票的多数通过了《租借法案》，接着众议院于3月11日，以317对71票的多数，通过了参议院对该法案的修正案。罗斯福兴奋他说：“这项法案最终结束了我国国内的所有姑息企图……”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感激说：“我们在患难中及时得到您们这样非常应急的援助，整个英帝国谨向您和美国人民祝福。”罗斯福亦称赞丘吉尔处变不惊、临危不屈，他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英国幸好有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一位卓越的伟大领导人。”

《租借法案》通过后，英美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局面马上为之改观。3月底，美国国会为实施《租借法案》，首次拨款70亿美元。美国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美国正按罗斯福所设想的那样，开始积极地扮演着“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这一极为重要的角色。

对付“狼群”

《租借法案》的通过，为美国向英国提供大量物资援助扫清了道路，而要想使这种援助变成现实，还必须有大量的海上运输工具——商船。当时，英国非常缺乏商船。

希特勒暂时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后，改变战略：派潜艇在海上袭击英国商船，企图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困死英国。德国海军上将、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发明了“狼群”战术：由多艘潜艇协作，从不同方向攻击敌方军舰或商船，而且通常在夜间进行。因此，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确保有足够的运输商船，成为保卫英国的关键。

1940年冬至1941年春，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航线上连战皆捷，使英国损失了大量商船。1941年1月，英国损失的船舶总吨位达32万吨，2月份达40.2万吨，3月份达到了53.7万吨，其中3月15、16日两天就损失了8万吨，4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65.4万吨，5月份达到了50万吨，6月份43.1万吨。英国的造船能力远远不足以弥补它的损失。丘吉尔非常忧虑，他对庞德海军上将说：“我们必须把这件事的重要性提到最高度，超出所有其他事项之上。我要将它称之为‘大西洋战役’”，它同不列颠之战一样，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

最初，英国政府每周公布一次损失船舶的数字。后来，由于损失太大，

为了不影响英国军民的士气，4月14日，丘吉尔断然决定，“应自即日起停止公布每周船舶的沉没数字”，改为每月公布一次，为此，不要怕被人指责为隐瞒不报。他说：“我们就是要隐瞒。”

丘吉尔意识到，仅靠英国自己，既无法为英国商船提供足够的军舰护航，也无法迅速地弥补船舶沉没的损失，要取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还必须求助于美国。事实上，早在1940年12月写给罗斯福的那封长信中，他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局面，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1年整个战争的进展取决于船舶以及远涉重洋——特别是大西洋——的运输力量”，英国“最迫切的需要……一个是增加对付袭击的海军力量；一个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商船数目。”

1941年1月，美国军方领导人告诉罗斯福总统：要想让英国取得胜利，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英国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航线）的安全。后来，陆军部长史汀生又对罗斯福说过：如果不以武力遏制德国的潜艇，那么向英国供应物资，就如同往漏澡盆里灌水一样。

最初，罗斯福因竭尽全力争取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不想把德国潜艇袭击商船的问题扯进来。《租借法案》通过后，他开始采取措施。首先，同意在美国船坞修理英国船只，下令把10艘快艇移交给英国海军，以供其护航，同时让美国商船在红海为英军运送物资。4月3日，他又批准从太平洋舰队中抽调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等舰艇到大西洋，以便在必要时执行护航计划。第二天，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表示“不胜感激”，同时继续叫苦不迭。他说：就在昨天，又有4艘英国船只被击沉，“我们已经被弄得精疲力尽、顾此失彼。”

4月10日，罗斯福作出决定：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使之延伸到西经25°。在美国海军的巡逻区内，一旦发现德国潜艇，立即通知英国海军的护航舰队。罗斯福暂时只想走到这一步，暂时还不想直接护航，因为两天之前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公众以50%比41%的多数反对美国海军直接参加护航。

此时，丘吉尔对罗斯福仅仅决定扩大美国海军的巡逻区已感到很不满足，他不仅要求美国海军直接参与护航，更要求美国直接参战。他说：“挽救局势的唯一办法是美国作为参战国立即同我们联合作战。”尽管两个月前，他曾公开表示，英国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美国参战，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争取让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所作的一种姿态，如果信以为真，那就大天真了。

4月中旬，美国军方也认为，美国应尽快参战，“目的是不致丧失英伦列岛”。军方还要求把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艇调往大西洋，以便参加护航。

罗斯福颇感为难。他比一般人考虑得更多：继续抽调太平洋舰队，会不会诱发日本南进？尤其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再说美国公众的多数仍然不赞成把国家引向战争的边缘，除非发生某种戏剧性事件，使他们改变看法。

到了1941年5月中旬，罗斯福还是决定把太平洋舰队1/4的舰艇调往大西洋。5月27日，他又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他对一位众议员说：“你们是想使国家继续享有自由而毫不含糊地采取甚至不借开枪的行动呢？还是为了不牺牲一个美国人的生命而甘心受奴役？”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他并没有让美国马上宣战。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

只有 51% 的人赞成美国在近期内参战。罗斯福感到，如果发生轴心国家对美国挑衅的严重事件，就能使美国公众支持政府的参战决策。此时，他迫切希望德国制造事端，把美国拖进战争。可是，希特勒也很精明，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德国海军对美国扩大巡逻范围很不满，要求允许派潜艇到美国沿海活动，必要时袭击美国舰船。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指示德国海军，要避免采取针对美国的挑衅行动。由于希特勒小心谨慎，不给罗斯福提供借口，罗斯福便无可奈何。

大西洋会议

1941 年 7 月中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第二次飞往英国，任务之一，是了解英国使用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的情况，因为美国有人指责说，英国不是把租借物资用于战争，而用于恢复其出口贸易。另外一个任务，是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会晤作出安排。

病魔正折磨着身体虚弱的霍普金斯。当他同丘吉尔夫妇共度周末时，丘吉尔夫人对他关心倍至，快到晚上 11 时，便催他就寝：“我已经把你的床铺好、暖水壶放好。”女主人的热情关怀，使霍氏倍觉温暖。住在白宫时，他也经常得到罗斯福夫人母亲般的关怀和照顾（此时，霍是孤身一人生活）。

霍普金斯在访问期间又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协助他起草讲稿的昆廷·雷诺兹有意识地写了一些措词激烈的话，霍氏看后惊叫道：“该死的昆廷，你这不是把我弄到向德国宣战的地步了？！”“我们早就应该那样做了。”雷诺兹振振有词。霍自己动手对讲稿作了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我无论说什么，都将被解释为从罗斯福那里来的一个直接信息”；而来英之前，罗斯福曾对他明确指示：此次赴英，不得讨论美国参战问题。

尽管霍普金斯很注意讲话的分寸，英国对他的讲话还是作了大肆渲染。讲话稿被译成多种文字、印成小册子，空投到大陆各国，煞费苦心地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霍普金斯很可能是庞大的美国远征军的开路先锋。纳粹德国立即组织了反宣传活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把霍氏说成是西方野蛮主义的工具，正处心积虑地要让华尔街来奴役欧洲，把欧洲古老的文化降低到美国好莱坞的水平。这种宣传与反宣传，使霍普金斯被炒得名声大噪。

丘吉尔与霍普金斯商量后决定，他与罗斯福总统的会晤，定于 8 月在大西洋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举行。

1941 年 8 月 4 日黄昏，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巡洋舰前往会晤地点。鉴于德国潜艇活动频繁，巡洋舰在航行途中，暂时中断了无线电收发报，以免暴露目标。丘吉尔亦暂停日常工作，利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读小说、看电影——这些都是他的业余爱好。

为了罗斯福的安全，美方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罗斯福先乘游艇出发，装作出海巡游的样子，然后在海上悄悄地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前往会晤地点。而他的游艇继续在海上活动，并找了一个酷似他的替身不时地在游艇上晃动。

8 月 9 日上午，他们两人乘坐的战舰都驶进了普拉森夏海湾。罗斯福从望远镜中看到了丘吉尔矮胖的身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就见过丘吉尔，那是在英国，在一次宴会上。当时，丘吉尔已是闻名天下的英

国内阁大臣，而罗斯福只是小小的美国助理海军部长。丘吉尔对这次会见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而罗斯福却记得很清楚。

两艘战舰靠近了，乐队奏响了两国国歌，罗斯福在这边脱帽致意，丘吉尔在那边举手行礼。11时整，丘吉尔登上了“奥古斯塔”号军舰，罗斯福在舷梯口迎候，两位历史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终于见到您了，总统先生！”

“在船上和您相会，我很高兴，丘吉尔先生！”

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带嘴子的香烟和英国首相的长雪前，终于用同一根火柴点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英美两国首脑和官兵一道在“威尔士亲王”号的甲板上做礼拜。罗斯福来到甲板上，右手拄着手杖，在儿子埃里奥特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从甲板的一端走向另一端——这是他20年前患脊椎灰质炎以来最长的一次步行。丘吉尔和两国官兵1500多人，庄严地注视着罗斯福艰难的步履。罗斯福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丘吉尔对他产生了一种宗教般虔诚的崇敬感情。

礼拜仪式开始了。两位首脑坐在中间，两国官兵混杂着站在两侧和后面，合用着《圣经》。两国的牧师共同宣读丘吉尔预先挑选的祈祷文：“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宗教感情虔诚而强烈的罗斯福，听到这神圣的声音，眼睛湿润。他对儿子说：“上帝保佑，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是‘前进的基督教士兵’。”

罗斯福希望通过这次会晤，两国就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和原则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因为美国公众一直希望罗斯福政府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卷入这场战争？”有人甚至问：“我们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的殖民帝国吗？”罗斯福感到，只有阐明了战争目的，才容易争取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参战。为此，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已拟好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可罗斯福认为，为了防止丘吉尔起疑心，怀疑美国挖英国殖民帝国的墙脚，草案的第一稿最好出自丘吉尔之手。

丘吉尔本希望通过这次会晤，促使美国早日参战。现在，既然美国执意要求发表阐明战争目的的声明，他也只好同意。他很快就搞出了一份草案，罗斯福及其助手们提了一些意见，定下了作为讨论基础的正式草案。在讨论中，双方在关于世界贸易和原料以及国际组织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美国的韦尔斯说：自由贸易政策体现着美国力求实现的理想。丘吉尔反唇相讥：近80年来，英国坚持自由贸易政策，“所有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美国接连实行保护政策”。丘吉尔怒目圆睁，让韦尔斯惊慌不安。

值得注意的，在会谈中，丘吉尔很少直接与罗斯福展开激烈的争论。每当发生争论时，罗斯福总是非常老练地不让自己卷进去，避免弄得脸红脖子粗，从而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超然地位。丘吉尔虽容易动肝火，但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与罗斯福争辩，始终对罗斯福保持一种特殊的尊重，而对其余的美国官员，则决不客气，以致罗斯福手下的许多文官武将都对他敬畏三分。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全面地阐明了英美两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及所遵循的原则。这是大西洋会议

取得的重要成果。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收获，是罗斯福与丘吉尔彼此增进了了解和信任。这是他们在二战期间的一系列首脑会议中的第一次，由于二人都才智过人，都很自负，会前，霍普金斯曾担心他们会吵架，会为谁当“主角”发生冲突。然而，他们并没有吵起来，倒是相处得很融洽。从年岁上讲，丘吉尔比罗斯福大7岁多，资格老、出名早，但在职务上，却没有罗斯福的职务高：罗斯福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而丘吉尔仅仅是政府首脑。在实力方面，英国远不如美国，因而在这场战争中，英美合作更多地是英国有求于美国。此外，罗斯福以残疾之躯，肩负领导美国的重担，让丘吉尔心生敬意；而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英国孤军奋战，丘吉尔如中流砥柱，亦让罗斯福十分钦佩。总之，丘吉尔敬重罗斯福、罗斯福亦尊重丘吉尔。经过这次会谈，他们彼此加深了了解。丘吉尔发现，罗斯福是一个很精明而又高深莫测的人物，一个巧妙的规避者，很不容易在具体问题上逼他就范，很难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让他承担具体的义务。罗斯福则意识到，丘吉尔在追求某项目标时，态度坚决，不折不挠，有时表现得很顽固，或者说很倔犟。

8月12日，丘吉尔在一封电报中说：“我确信，我已同我们伟大的朋友建立了热情而深厚的私交。”

8月12日，大西洋会议结束，罗斯福下令前往冰岛的美国驱逐舰同丘吉尔乘坐的巡洋舰一起航行，起护航作用。为了掩护丘吉尔返航，他还坚持让自己乘坐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在海上多停留几天，以免德国人过早得知他们会晤的消息，派潜艇袭击丘吉尔乘坐的战舰。

非正式联盟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已经认识到，民主国家要想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就必须参战。可他同时也知道，美国的公众舆论仍然不赞成美国参战。有鉴于此，他决定在大西洋会议上闭口不谈美国参战问题。可是，丘吉尔却忍不住，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宁可要美国宣战和6个月内不向我们提供援助，而不要加倍的援助而不宣战。”

罗斯福解释说：他同国会的关系如履薄冰，如果要求宣战，国会将辩论3个月。他保证，美国将不宣而战，寻找一个证明参战合理的事件。为此，将在9月份公开宣布，美国海军将在从美国到冰岛的航线上为英国商船护航。

从纽芬兰回国后，罗斯福发现，美国公众对大西洋会议反应冷淡。民意测验表明，74%的人反对美国参战，以致他不得不宣布，大西洋会议并没有使美国更接近于战争。

这一举动让丘吉尔深感失望。8月27日，他给霍普金斯写了一封“最忧伤的信”，说明英国内阁对于美国总统的上述保证深感失望，如果在1942年到来时，英国仍旧孤军作战，他无法预言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显然，这封信多少带一点威胁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丘吉尔意识到，如果直接寄给罗斯福，打上两国政府首脑官方通信的色彩，就显得有些言重了。而寄给霍普金斯，就只是私人通信，同样能让罗斯福知道信的内容，又能充分地表示英国的忧虑。

其实，罗斯福是在等待时机。1941年9月4日，他总算等到了——一个机

会。这一天，在北大西洋上，一架英国飞机发现了一艘德国潜艇，立即通知了一艘美国驱逐舰“格利尔”号。接着英国飞机和“格利尔”号便跟踪德国潜艇，飞机首先对潜艇实施攻击，没有击中目标。德国潜艇便向“格利尔”号驱逐舰发射鱼雷，“格利尔号”也进行了还击，双方都没有击中对方，“格利尔”号便停止了追击。罗斯福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9月11日，他发表广播讲话说，一艘德国潜艇不发出警告，就首先向美国驱逐舰开火，这是海盗行为，证明纳粹德国蓄意破坏航海自由。自然，他有意省略了“格利尔”号事先追踪德国潜艇达几个小时的细节。他乘机宣布，美国海军将为所有国家的商船护航，如果轴心国家的军舰驶入美军的防区，美军“见了就打”。实质上，这是一种不宣而战的政策。民意测验表明，62%的人表示支持。

随后有证据表明，当时德国潜艇并不知道追自己的驱逐舰的国籍。孤立主义者攻击说，罗斯福的广播讲话歪曲了事实真相；可是对罗斯福来说，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不宣而战的目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由此开创了政府操纵舆论、以支持政府政策的先例。60年代，约翰逊政府也采取这种手法，制造北部湾事件，扩大了越南战争，此乃题外话）。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航线上的活动仍然很频繁。9月15日，助理国务卿伯利向罗斯福汇报说，开往冰岛的商船，如果没有武装，没有军舰护航，简直没有幸存的希望。丘吉尔也来信要求借用美国的商船和船员，帮助英国运输物资。罗斯福意识到，要让美国积极、全面地卷入大西洋战役，仅小打小敲远远不够了，必须进一步修改《中立法》。10月9日，他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关于不得武装商船的禁令。恰好10月16日，德国潜艇袭击了美国的“卡尼”号驱逐舰，造成11名美国水兵丧生，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怒。于是，第二天，众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修改《中立法》的议案。

罗斯福决定因势利导，把内容更广泛的《中立法》修正案提交参议院，并采取了继续操纵舆论的措施：他公开宣布，他已掌握了纳粹德国的一份秘密文件，该文件计划把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分割成德国的5个附庸国，废除所有的宗教。这一消息加深了美国公众的愤怒和恐惧。恰好在10月31日，德国潜艇又袭击了美国的“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造成115名美国水兵死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公众对纳粹德国的仇恨。于是，内容广泛的《中立法》修正案在参议院以50对37票获得通过。11月13日，众议院又补充通过了参议院通过的内容更广泛的《中立法》修正案。至于那份纳粹德国的秘密文件，罗斯福说，那是国家机密，详情不容泄漏。是否属实，只有他知道。

随着内容广泛的《中立法》修正案的通过，美国离正式参战已经越来越近了，英美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虽然美国尚未正式对轴心国家宣战，英美之间也没有正式签订互助协定或结盟条约，可是，英国的抵抗已经无法离开美国的援助、美国也愈来愈积极广泛地卷入了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有人把从美国《租借法案》通过，到美国正式参战之前这一阶段英美之间非正式、非全面的联盟关系，比喻为“非正式婚姻”。

新的《中立法》修正案通过后，罗斯福在欣慰之余，仍然清醒地注意到，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孤立主义者攻击说，修改《中立法》，是英国人策划的阴谋诡计，目的是让美国人去为英帝国送命。他们鼓动美国母亲联合会致电罗斯福说：“我们决心不让我们的儿子们离开美国，没有足够的集中营来收养他们的双亲。”

罗斯福认为，只有发生某种更重大的事件，才有可能把美国正式卷入战争。

第十二章 大联盟的序幕

丘吉尔：“我们当然要……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

罗斯福：“如果俄国人能够把德国人拖到10月1日，这对打败希特勒将产生很大意义。”

斯大林：“给我们高射饱和铝，我们可以打三、四年。”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

1941年6月22日凌晨，在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丘吉尔的秘书科尔维尔。电话是英国外交部打来的，科尔维尔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德国军队已经进攻苏联。

放下话筒后，科尔维尔决定等天亮后再告诉丘吉尔，因为首相早有交待：除非敌人打到英国来了，否则不得因别的事把他唤醒。

天亮后，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如释重负。自法国战败投降后，一年来，英国在欧洲一直是孤军作战，始终面临着巨大压力。丘吉尔本人虽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仅靠英国是不可能战胜轴心国家的。苏德战争的爆发，意味着苏联最终站到了反对纳粹德国一边。这自然相应地减轻了英国承受的压力。因此，丘吉尔说：“英国再也不是孤立的了。”他当机立断，要求通知英国广播公司，他要在当天晚上发表广播讲话。

对于苏德战争的爆发，丘吉尔并不感到突然。早在6月上旬，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德军正在加紧准备进攻苏联。到中旬，有关的情报已越来越多，英国情报部门相信，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6月21日，丘吉尔要求外交大臣艾登同他一道去契克斯度周末，以便遇有紧急情况时，及时交换意见。

早在6月9日，英国战时内阁已作出决定，假如苏联卷入对德战争，英国将援助苏联。不仅如此，英国还希望美国也采取同一立场。6月15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仍然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问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政治反应，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

6月22日白天，丘吉尔一直在准备讲稿。他必须向英国公众解释：英国为什么要站在苏联一边？鉴于十月革命以来英苏两国一直互不信任、英国对德宣战后苏联一直袖手旁观乃至站在德国一边，现在，自然会有一部分人对英国支持苏联表示不理解。可是，在反苏反共方面，有谁比丘吉尔本人更彻头彻尾呢？正因为如此，由他出面呼吁英国人民支持苏联，比任何其他入讲话更有份量，更能说明这样做的必要和正确（30年后，一直反共反华的尼克松出面改善中美关系，似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乃题外话）。

当晚，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我们只有一个宗旨，

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他指出：“这不是阶级的战争”，希特勒摧毁了苏联的力量后，会掉转头来大举进攻英国，“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当秘书科尔维尔对此有些不理解时，丘吉尔又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

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同意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阐述的对苏政策，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

罗斯福自收到丘吉尔6月15日的那封电报后，对苏德可能爆发战争十分关注。他指示正在国内的驻英大使怀南特，立即赶回英国，转告丘吉尔，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将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

怀南特于6月20日乘一架轰炸机飞往英国。在大西洋上空，飞机的一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怀南特并没有要求返航。最后，总算安全地抵达伦敦。6月21日，他赶往契克斯，向丘吉尔转述了罗斯福的上述立场。

在苏德战争问题上，最初，美国政府的态度不如英国积极；在美国内部，国务院的态度又不如罗斯福积极。6月21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如下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如果苏联不向美国提出要求，美国就不应当向苏联提出建议或出谋划策；如果苏联请求美国援助，美国应在保证自己的国防不受严重影响的前提下，放松对苏联出口的限制，允许它得到最需要的军事供给；美国不应过早地就援助问题向苏联作出保证。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个正式声明是由国务院发表的，调子比丘吉尔的讲话要低得多。6月24日，罗斯福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表明了态度。他保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又留有尾巴——说苏联尚未正式提出要求。至于《租借法案》是否适用于苏联，他拒绝正面回答。当被问到苏联的作战对美国防务是否重要时（这是实施租借法的前提条件），善于规避的罗斯福耍滑头说：“哦，向我提另外一类问题吧——例如‘安娜（他的女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虽然如此，他也初步采取了一些援助苏联的措施。6月24日，美国宣布对39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25日又宣布《中立法》暂不适用于苏德双方，以便让美国船只可以继续把货物运往苏联港口。7月6日，罗斯福要求日本承诺，不会乘机进攻苏联。7月10日，他接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乌曼斯基，表示苏联要求提供的军用物资，他将在10月1日之前运到苏联。他说：“如果俄国人能够把德国人拖到10月1日，这对打败希特勒将产生很大意义。到那时以后，德国就不可能同俄国进行有效的战斗。……”

苏联能顶住吗？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对苏联是否能顶住德军的强大攻势，英美两国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怀疑。6月16日，英国驻苏联大使克里普斯回国述职时，向英国战时内阁汇报说，驻莫斯科的外国使团的多数意见是，俄国

抵抗德国不可能超过三、四个星期。外交大臣艾登等人表示，希望苏联的抵抗能延长几个星期。克里普斯说，如果指望苏联的抵抗能超过六、七个星期，那就不明智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当一部分人从当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惨败的历史经验出发，猜想苏德战争可能出现的结局时，英美两国军方更多地是从1940年5—6月法国在40天内战败投降这一事实出发来考虑的。英国军方估计，三、四周内，苏联就会战败，德军向东线的转移只是暂时的，英国必须随时作好德军很快将调回西线，进攻英国的准备。“如果德国人在俄国的战役是闪电战的战役，例如说持续3至4周的话，那么把德国兵团重新部署到西线来，预期当在俄国战役结束后的4至6周。如果这一战役拖得更长，那就需要6至8周。”为此，军方认为，英国要在9月1日之前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应付德军可能发动的对英国的入侵。

美国军方亦认为，苏德战争的发展，“至少在一个月内，也可能至多在3个月内”解决。

英美政界的大多数人亦持同样悲观的看法，只有极少数人的看法比较乐观。美国的多萝西·汤普森回忆说，1941年7月27日，很多人到英国首相的别墅出席星期日午餐会，在谈到苏联战局时，大部分是悲观的论调，“1941年夏天访问伦敦期间，我会见过的人当中，只有爱德华·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领导人）一个人相信、俄国人有能力顶住德国人。”

在美国，有一个人比较乐观，他就是美国前驻苏大使约瑟夫·戴维斯，他预言，苏联红军的抵抗“将使全世界大吃一惊”。苏德战争爆发两周后，他又说：“俄国军队的抵抗，迄今比一般预计更为有效”，英美领导人“应当同斯大林直接对话”。

对于苏联的抵抗能力，丘吉尔和罗斯福也不无忧虑，但他们似乎比两国军方的态度稍为乐观一些。丘吉尔曾说过：“对于俄国的抵抗能力，我始终采取比我的军事顾问们更乐观的看法。”他也希望同斯大林直接对话，建立一种类似他与罗斯福之间的那种联系。然而，令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苏联对他6月22日晚上发表的广播讲话所作的反应，似乎不如他预期的积极和强烈。苏联只是在《真理报》上刊登了他的讲话的部分内容。

对苏联来说，苏德战争爆发意味着它的外交政策需要作重大调整，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此前一年多的时间中，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是同德国搞好关系、不刺激希特勒。不给他提供进攻苏联的借口。为此，苏联同英国的关系一直很冷淡。丘吉尔任首相后，曾为改善两国关系试探过，斯大林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现在，苏德之间突然爆发战争，整个格局完全变了，英国是否会同德国站在一起对付苏联呢？苏联不能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恰好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纳粹党的副领袖赫斯突然飞往英国。他到底肩负什么使命？赫斯飞英与希特勒进攻苏联有没有联系？这些不能不引起苏联的担忧。正因为如此，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英国的政策，苏联首先关注的是英国是否继续坚持抵抗德国。6月22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如果丘吉尔首相能声明，英国将把战争进行到底就好了。这表明，英苏之间首先需要消除长期形成的互不信任，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丘吉尔一次讲话就能一下子完全消除的。

此外，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德军的强大攻势，苏军的全线溃退，使斯大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焦头烂额，除了战场上的局势

外，他暂时没有心思顾及其他方面了，别说是答复丘吉尔的讲话，就连直接对苏联人民讲话，他也没有心思了，而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莫洛托夫。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同英国的关系，最初几天，主要由其他领导人及职能部门负责，斯大林暂时不想走到外交舞台的前台来。

英苏首脑建立联系

1941年6月29、3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分别会见了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和来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他说，英国援苏的最好办法，是加强在西线的军事行动，派军队在法国沿海登陆，尽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6月30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会见艾登时抱怨说，丘吉尔先生说要尽力援助苏联，但“至今什么也没有明确化和具体化。”7月3日，斯大林在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时，谈到了丘吉尔6月22日的讲话，并表示了感谢。两天后，莫洛托夫再次向克里普斯表示，希望英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丘吉尔认为，随着欧洲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英苏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建立直接联系。他从与罗斯福的交往中也感到，两国最高层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重要，而英苏领导人之间互不联系是不正常的，对加强双边合作也是不利的。为此，他决定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沉默局面，7月7日，他率先主动致电斯大林，对苏军的顽强抵抗“表示敬佩”，并表示，英国将给予苏联力所能及的援助，主要是空袭德国以及海军在北冰洋可能采取的行动（不是苏联所要求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并欢迎苏联派军事代表团来英国。

第二天，克里普斯向斯大林转交这封电报时，斯大林表示对英国有所不满，因为英国“只不过是发表一些准备提供援助的空洞宣言而已”。他建议，为了使两国合作具体化，两国应缔结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显然，斯大林不喜欢表面文章。

丘吉尔立即回电，表示同意斯大林的建议。英苏两国经过谈判，于7月12日缔结了《苏英两国政府关于在对德战争中联合行动的协定》，规定两国相互援助和支持，不得同敌人单独媾和。

然而，丘吉尔迄今没有收到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回信，使他感到失望。他当然不了解斯大林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和紧张状况。由于苏军对德国的进攻事先缺乏充分的准备，加之德军攻势强大，苏军几乎没有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每天，甚至几乎每小时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而且往往是不幸得让人难以置信。7月12日，斯大林抽空出席了《英苏协定》的签字仪式，接见了英国大使及军事代表团。可是，就在前半小时，他又得到最新战报：德军中央集群之一部，已推进到第聂伯河畔，德军约70个兵团，已准备好在斯摩棱斯克会战后向莫斯科进军。斯大林大吃一惊，由于心态失衡，在出席《英苏协定》签字仪式时，他只是机械地同英国人一一握手、冷漠地注视着协定的签署，心里想的却是战局的最新变化。

斯大林虽然没有及时给丘吉尔回信，但并不表明他不重视英苏合作。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德军的强大攻势使他看到了苏联的危险处境。他竭力争取让日本、土耳其保持中立，也非常希望得到英美两国的大量援助。可是，战场上的压力使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同丘吉尔抽象地谈论友谊与合作，他觉得，英国既然表示要尽力援助苏联，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而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

7月18日，斯大林终于给丘吉尔回了一封信，它没有丘吉尔来信中那种华丽的辞藻，而是像斯大林平时说话一样，简洁，毫不拖泥带水。他对丘吉尔两次来信表示感谢，同意丘吉尔的观点——英苏两国“已经在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结成战友”，并相信两国能够打败共同的敌人。此外，他希望英国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只有这样，“苏联以及英国的军事形势将会大大改善。……我相信，尽管有困难，还是应该开辟这个战场……现在是开辟这个战场的最适宜的时刻。”

丘吉尔认为，要求英国现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完全不现实的。7月20日，他致电斯大林，陈述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困难，委婉地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同时希望同斯大林保持密切的个人联系。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苏德战争爆发，极大地减轻了英国承受的巨大压力，而英国并没有给苏联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他回忆说：“我知道，在我们联盟的初期，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事很少，所以我想用礼节来填补这个空缺。”于是，他积极、主动、频繁地给斯大林写信。7月25日，他再次致函斯大林，除通报英国将尽快把200架战斗机、两三百万双短统靴等物资运往苏联外，再就是说奉承话：“我们正以敬佩和激动的心情注视着俄国的伟大战士”。7月28日、31日，他又接连两次致函斯大林，无非是为了“用礼节来填补”未能给苏联提供有效援助的“空缺”，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

斯大林似乎对这种缺乏实质性内容的通信不感兴趣，一封信也没回。丘吉尔大感失望。他后来回忆说：“我想尽一切力量，想通过频繁的私人电报，建立起像我同罗斯福总统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愉快关系”，可是，“有许多次，发出去的电报完全得不到答复，或是被搁置多日后方才见复。”

霍普金斯首访莫斯科

罗斯福与丘吉尔不同，他并不急于同斯大林建立直接联系，而是在援苏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由于各方面的障碍，7月份，美国给苏联的实际援助仅价值650万美元，为此，罗斯福不得不亲自过问援苏工作。7月21日，他指定专人（伯恩斯坦将军）负责援苏工作，并要求在48小时内提出一份可以立即运往苏联的军用物资的报告。7月23日，他收到一份价值2200万美元的货物清单，便指示秘书沃森老爹，在25日晚之前“把事情办好”。

此时，苏德战争爆发已一个多月了，苏军虽遭受重大挫折，却并未像英美军方估计的那样战败投降。那么苏德战争下一步会怎样发展？苏联红军最终能否顶住德军的强大攻势？对这个问题不摸底，英美就无法制定长期的援苏政策和计划。然而，仅靠英美两国驻苏联大使馆及一些低级代表团搜集的情报，是不足以对苏德战场的局势作出可靠判断的，甚至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

7月下旬，正在英国访问的霍普金斯突发奇想：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往莫斯科跑一趟，直接从斯大林那里了解苏德战争的情况，以便为罗斯福及丘吉尔制定对苏政策时提供依据。丘吉尔赞成他的想法，只是担心他身体太差，不能长途旅行。霍普金斯对此并不在乎，他被这个想法迷住了。半年之前，也是他主动请求罗斯福批准他第一次访问英国的，事实证明，那次访问很成功，对促进英美合作起了很大作用。与英国相比，苏联是一个更神秘的国度，唯其于此，也更有吸引力，若能从斯大林那里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冒

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霍普金斯主意已定，便于7月25日从伦敦致电罗斯福：“我有一种感觉，应当竭尽全力保证俄国人能保持一个持久的战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有可以多少影响斯大林之处，我认为便值得由你通过一个私人代表同他发生直接的联系。我想到利害关系如此重大，这是应该做的。关于这件事，我……在等待您的指示。”

罗斯福立即作出答复：“韦尔斯和我非常赞成莫斯科之行。”

丘吉尔向霍普金斯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对苏政策以及准备采取的援苏措施。他请霍转告斯大林，“英国今天只有一个抱负、一个愿望——打垮希特勒。告诉他，他可以信赖我们。”

当霍普金斯首先乘火车离开伦敦时，为他送行的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等人感到，仿佛正同一个即将飞往太空的人道别。那时，对美国人来说，苏联不仅很神秘，而且很遥远。

霍氏乘火车到苏格兰的因弗戈登，再转乘飞机前往苏联。由于战争，飞机自然不能走捷径横穿欧洲，而必须绕过挪威北角，先飞往苏联北部的阿尔汉格爾，然后转飞莫斯科。这是一条新开辟的异常艰苦的航线，沿途既可能遭受德国军队的袭击，还要饱受北极严寒之苦。霍乘坐的是英国空军的一架巡逻轰炸机，机上生活设备简陋。身体虚弱的霍氏经此长途颠簸，到达莫斯科时，疲惫不堪，但却兴奋得睡不着觉。

霍氏对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说：此次来访，是要弄清俄国的情况到底是否像美国陆军部所说的那样严重——完全抵抗不住。大使告诉他：任何稍有俄国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匆匆下结论说德国人会轻易取胜。当进攻时，俄国军队可能显得无能，但是，当他们去捍卫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都是极为出色的战士。

7月31日下午6时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霍普金斯。就像派霍第一次访英时一样，这次罗斯福总统又为霍写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介绍信：“霍普金斯先生应我的请求，前来莫斯科跟你个人并跟你可能指定的其他官员”讨论美国援助苏联的问题，“请给予霍普金斯先生以那种就像你亲自同我当面交谈时所感到的信任。”信中还对俄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英雄气概”表示巨大的钦佩。

霍普金斯对斯大林说，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决心尽快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他问：苏联最急需哪些物资，从长期作战考虑，又需要哪些物资？

斯大林表示，欢迎霍氏来访。他谴责希特勒连国与国之间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没有。对苏联所需要的各类物资，他都作了详细说明，在谈到长期作战所需的物资时，他说：“给我们高射炮和铝，我们可以打三、四年。”这一回答让霍普金斯感到高兴。在他看来，既然斯大林迫切需要属于长期作战所需的物资，说明他对目前的战局充满信心。

8月1日晚上6时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斯大林在谈到苏联战场上的局势时说，9月1日以后，就会开始下大雨，德军要发动进攻是很困难的。到10月1日以后，由于地面很坏，德国人将不得不转入守势。在冬季，战线将停留在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的前面。苏军最迫切需要的是高射炮，其次是制造飞机用的铝、第三是机关枪、第四是步枪。霍普金斯在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斯大林认为，美国总统和政府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仅靠英苏两国，要战胜德国是很难的，靠一个办法便能打败希特

勒，那就是美国对德宣战。他欢迎美军到苏联前线参加对德作战。

显然，斯大林对霍普金斯给予了较大的信任。霍氏也很信任斯大林，认为斯大林说话是负责任的。他们商定，在10月上半个月，召开一次美苏英三国军事会议，以便讨论决定如何分配美国生产的军用物资。通过两次会谈，斯大林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绝不重复。……他同我握手时，短促、坚定、而有礼貌。他热情地微笑着，没有一句话、一种姿势、一种格调是多余的，真像是在对着一个完全协调的机器——一部有才智的机器——说话。……他问的问题明确、简要、直率。……他的答复是现成的，不含糊的，好像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许多年，一下子便脱口而出。……当他站起来望着我离开时，谁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严肃、坚决、满脸皱纹的容貌……他保证，俄国肯定能够顶住德国军队的猛攻。”此外，霍普金斯还发现，斯大林享有巨大的权威，他手下的苏联官员，对在规定的议程以外的任何议题，都不敢轻易表态。例如霍在同苏军的雅科夫列夫将军会谈时，曾建议苏联应向华盛顿派遣一个常驻的技术代表团。雅科夫列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应向斯大林提出。

通过会谈，霍普金斯对苏联的抵抗充满信心，后来当美国驻苏联的一些军事观察员仍然对苏军的抵抗作出悲观估计时，霍普金斯表示愤慨。虽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美苏两国社会性质的巨大差别。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积极主张援助苏联。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无所忌惮的俄国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仅仅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主要歌星”之间的牵线人，也是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之间的牵线人。

8月1日，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从原路返回英国。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装药品的小皮包忘在了莫斯科，因而在返航途中，病得更严重。他的座机还一度遭到一艘国籍不明的驱逐舰的炮击，幸亏没有被击中。回到英国时，他已经疲惫至极、虚弱不堪，有人甚至怀疑他能否活到一周后在大西洋会议上向罗斯福和丘吉尔作访苏汇报。

口惠而实不至

大西洋会议期间，霍普金斯向英美两国的与会者汇报了访问苏联的经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他的汇报虽不能说使所有人消除了苏联可能战败的顾虑，但多数人对苏联的抵抗越来越充满信心。因而向苏联提供援助的一个主要障碍——苏联可能战败的前景已不再成其为问题了。为落实援苏政策，丘吉尔力促尽快在莫斯科举行一次英美苏三国会议，得到罗斯福的赞成。英国决定派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参加这次会议，美国原打算派霍普金斯参加，罗斯福鉴于霍氏身体欠佳，不同意再让他长途奔波，而决定由哈里曼出席会议。

大西洋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好了一封联名致斯大林的电报，于8月15日发出。电报说：英美两国目前“正通力合作，尽量提供你们最急需的物资。”“必须考虑到一项更长期的政策”，为此建议在莫斯科举行由三国高级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就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进行讨论。“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英勇而坚决的抵抗，对于击败希特勒主义是多么重要”，因此，必须迅速制订将来分配我们的资源的方案。

这就是说，英美向苏联大规模提供援助，在认识问题解决后还需要有一

个过程。这样一来，在 1941 年夏天，英美向苏联实际提供的援助很有限。

在援助苏联的问题上，丘吉尔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态度都很明确：应该援助苏联。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苏联“在不久以前对我们的生死存亡还是漠不关心的。”眼下，从反希特勒战争的大局出发，自然应不计前嫌。他在 6 月 22 日的广播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不过，对于苏联提出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他觉得太不切实际了，英国无法满足。同时，他也意识到，“所有援俄供应品都出自英国最需要的物资”，大量援助苏联，意味着英国所急需的各种物资的相对减少，他担心“为了我们的新盟友，对我们本身十分重要的安全可能失去保障”。对这种局面，他在 8 月 12 日的一封电报中，用诙谐而又恰当的话作了概括，“俄国作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应邀在围坐着一帮饿鬼的餐桌入席。”

由于英美两国迟迟没有给苏联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英国没有给苏联提供一线希望，当时，处在极端困难中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英国流露出一些失望情绪。8 月 26 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说：“目前，与其说英国是我们的盟友，反对希特勒德国殊死斗争中的战友，不如说是同情我们的旁观者。”8 月 30 日，斯大林在致麦斯基的一份电报中说：“实际上，英国政府是在以自己的消极等待政策帮助希特勒匪徒。希特勒分子正好希望各个击败自己的对手——今天是俄国人，明天是英国人。英国本身的消极态度恰好帮了希特勒分子的忙。英国向我们鼓掌，而用最粗鲁的语言咒骂德国人，这种情况是无济于事的。英国人是否懂得这一点呢？我想他们是懂得的。那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呢？我认为，他们是想削弱我们。”

显然，要消除英苏之间，乃至美苏之间长期形成的互不信任，并非能一航而就。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对立，苏联与英美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结成联盟，比英美之间要难得多。

8 月 29 日，丘吉尔再次致电斯大林，谈到了英美派高级代表出席莫斯科三国会议问题，谈到了英国正在采取的援苏措施，还谈到了驻军伊朗，保护中东油田和通往俄国的运输线。9 月 4 日，斯大林给丘吉尔回电——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次，表示感谢英国答应支援苏联飞机，但同时指出，最重要的是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从东线调走 30 到 40 个师，同时保证今年 10 月初运交苏联 3 万吨铝、每月至少援助飞机 400 架、坦克 500 辆。他说：“没有这两种方式的援助，苏联将不是战败，就是被大大削弱。”他坦率他说：“我深知这封信将使阁下感到沮丧。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验教导我要正视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是多么令人不快；也不要害怕说实话，尽管这些话是多么不受欢迎。”

麦斯基在转交这封函电给丘吉尔时，说话也很生硬。他说：过去 11 个星期内，苏联实际上是在单独抵抗德国的强大进攻，如果苏联战败，英国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呢？

这番话把丘吉尔激怒了，他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请记住，仅仅在 4 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为敌。的确，我们曾认为你们很可能会那样做。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确信我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你们站在我方或站在敌方。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你们做些什么，在所有的人们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备我们的。”

丘吉尔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如此大动肝火，反而把苏联大使给镇住了。麦斯基连声说：“丘吉尔先生阁下，请冷静一些吧！”这一次，麦斯基才真正尝到了丘吉尔的厉害（战时，罗斯福手下的不少文官武将也尝过丘吉尔的厉害，都对他敬畏三分）。

虽说丘吉尔对麦斯基大动肝火，却并没有因此影响他对局势作出理智、冷静的分析和决策。他当天给斯大林回电，婉转地表示，英国无力开辟第二战场，不过将尽可能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并表示，虽然斯大林是要求英国“出售”飞机给苏联，英国却“从没有想到要你们付款”，而准备按美国《租借法案》的方式，“根据同舟共济的原则”来提供援助，“没有以金钱计算的正式账目”。他还说，苏联所需要的飞机和坦克，一半由英国提供，希望另一半由美国提供。

第二天，他又赶紧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时附上斯大林9月4日的电报，解释他为什么要代表美国答应向苏联提供飞机和坦克。他扼要介绍了与麦斯基会谈的情况，然后说：“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可能单独媾和的印象，尽管他的谈话中没有一言半语足以肯定这种想法。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复电中提及可能给予的美援而感觉不快。我觉得，这可能是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只好尽力为之。”如果说对麦斯基发怒时丘吉尔像一头凶猛的狮子，那么随后他给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电报则足以表明，他同时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莫斯科三国会议

早已计划好的美苏英三国高级会议订于9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9月15日，哈里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到达英国。英美代表团将先在英国举行预备性会议，然后再前往莫斯科。

英国代表团由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任团长。在援苏问题上，他的态度非常积极，以致丘吉尔担心他向苏联作出过多的承诺，不得不事先给他敲警钟：“你的职责不仅是根据援俄计划的规定援助俄国，而且要保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被榨干。”

在预备性会议期间，比弗布鲁克试图控制英苏对美国援助物资的分配，由他安排一切，使哈里曼很反感。他威胁说，“这将可以免除美国人去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必要性了。”言下之意，既然你们英国人想包办一切，我们就不能去了。比弗布鲁克这才大吃一惊，赶紧说：“噢，不！不！不！我们必须一块去！”丘吉尔得知此事后，立即设宴招待哈里曼，向他表示歉意，以免事态扩大，影响英美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苏联代表正式表示，苏联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并不像丘吉尔那样急于同斯大林加强个人联系，他更善于把握时机。上次霍普金斯访苏时，他为霍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介绍信。这次哈里曼赴苏，他又利用这一机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首先介绍了哈里曼，然后又谈起霍普金斯访苏归来后的汇报，他说：“我无法向你形容我们大家因听到苏联军队英勇进行保卫战而产生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深信你们的军队必将最后战胜希特勒，我们决心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援助。”丘吉尔也为英国代表团团长比弗布鲁克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斯大林。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苏联自然谈不上要求美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因而，对美国的不满远没有对英国的大。此外，由于罗斯福同斯大林打交道时比丘吉尔似

乎更老练一些，更由于美国的地位比英国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因而斯大林对罗斯福比对丘吉尔更有好感一些。这种差别几乎一直没有改变。

9月28日，英美两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天晚上，斯大林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坦率地介绍了苏德战场上的军事形势，详细地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各种援助。他表示，苏军决心坚守莫斯科，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深受鼓舞。会谈从晚上9时持续到午夜，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英美两国代表对会谈很满意，比弗布鲁克甚至有点飘飘然地说，再谈一次就可以回国了。

第二天晚上，他们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他们一点也没有料到，仅一天之隔，斯大林的情绪和态度完全变了。他表示对英美的援苏政策很不满意，怀疑英美是否存心不良，他说：“你们的少得可怜的许诺清楚地表明，你们希望看到苏联被打败。”他在屋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抽烟，显得焦躁不安。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都很沮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问题也没有谈妥，他们只好要求再谈一次。

回到大使馆后，情绪容易波动的比弗布鲁克一直很沮丧，他担心会谈失败，回国交不了差。

9月30日晚上，斯大林同英美代表举行了第三次会谈。最初，会谈的气氛比较严肃，后来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此时，德国的电台已开始造谣说，英美苏三国会议已经失败。哈里曼说，最重要的是使这次谈判取得成功。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英美代表团拟订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援苏计划，斯大林同他们仔细审定了援助项目，对英美准备提供的援助表示满意。他从容地吸了几口烟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比弗布鲁克见气氛已缓和，问斯大林是否对英美提供的援助感到满意，斯大林莞尔微笑，点了点头。一直忙于翻译的苏联前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兴奋地叫喊说：“现在我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了。”

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哈里曼建议斯大林像丘吉尔那样，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同他谈重大问题，与他建立个人联系。斯大林回答说，以前自己一直不敢冒昧占用总统的时间，今后将乐于直接写信给总统。

比弗布鲁克建议斯大林邀请丘吉尔访问苏联。斯大林问：“他会来吗？”比氏回答说：“如果你邀请，他一定会来的。”

随后，他们围绕一些轻松的话题开了一些玩笑，尤其是对三国的几位大使评头品足了一番。比、哈二人同斯大林会谈时，一反外交惯例，没有让英美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和斯坦哈特参加，因为霍普金斯事先叮嘱过哈里曼：斯大林对这两位大使没有好感。而比弗布鲁克与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本来就不和。英美大使被排除在这次会外，十分不快，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买帐，瞧不起对方。哈里曼形容他们之间的相互攻击完全像女学生们之间的噱噱喳喳。

斯大林不禁问起苏联驻美国大使乌曼斯基表现如何。哈里曼说，乌曼斯基热心过了头，在华盛顿到处乱跑，到处诉说供应问题，讲得太多，不仅没有赢得同情和好感，反而惹人生气，不愿帮助他达到目的。

这次半开玩笑式的对话后不久，美苏驻对方的大使都被撤换了，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也主动要求离任回国去了。

这次会谈的议定书签订后，苏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斯大林亲自出席作陪。他在第一杯喝了一点烈性的伏特加酒，然后一直喝红葡萄酒。宴会上，

酒、菜、水果都极为丰盛，许多东西都是市场上买不到的，以致曾在英国呆了很久的哈里曼联想到了英国人在首相府举行的宴会。他发现，“丘吉尔经常注意遵守英国的配给制，而俄国官员的餐桌上却摆满了品种齐全的美味食品。”

在宴会上，斯大林谈起往事时说，英国人在慕尼黑会议期间没有和苏联商量，这说明张伯伦是想祸水东引。后来在 1939 年夏，只要英法苏三方迅速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还是有可能制止希特勒，避免战争的。但张伯伦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不是派一名部长，而是派了“一名文书”（即英国外交部的威廉·斯特朗，丘吉尔承认：“派出这样一个低级人物确实叫人生气”）与苏联谈判。他当时迫不得已，才与希特勒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比弗布鲁克回国前，托英国大使馆的官员约翰·拉塞尔帮他和哈里曼买 25 镑苏联特产鱼子酱，准备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包括首相丘吉尔。拉塞尔曾不经意地同一位英国记者提过此事，结果记者把这件事写到报纸上，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战时进口大量鱼子酱供首相个人享用。许多报纸把这作为一条重要新闻加以转载，弄得丘吉尔很狼狈。他把比弗布鲁克臭骂了一顿。比弗布鲁克窝了一肚子火，对拉塞尔发了一顿脾气。

大联盟拉开序幕

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回到伦敦，向丘吉尔汇报了三国会议的情况。他们说，斯大林决心打下去，丘吉尔“大为放心了”。

罗斯福对三国会议取得的成果也很满意。10 月 8 日，他致电丘吉尔说：“我也对莫斯科会议的成果表示高兴。现在，重要的是把物资运给他们。”

可是，苏联还没有取得享受美国《租借法》援助的资格。1941 年 8 月 5 日，美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 30% 多的人赞成对苏联提供租借援助，多数人持反对立场，其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说苏联没有宗教自由。

罗斯福决心消除这一障碍。一方面，他争取梵蒂冈教庭的支持，做美国宗教界的工作。他指出，说服苏联接受宗教自由是可能的，而纳粹分子却不然；另一方面，他又敦促苏联在宗教自由方面采取一些行动，做出一些姿态，“能给我国带来一些有关宗教自由的消息”，以争取美国公众舆论支持向苏联提供租借援助。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也为苏联的宗教政策说一点好话。有些人赞成援助苏联，但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却不以为然，认为总统没有必要为苏联的宗教政策辩护，“给他们枪炮、坦克、飞机，但还要坚持说一句，别跟我称兄道弟。”

到 1941 年 9 月下旬，苏联的财政十分紧张，难以继续通过输出黄金和原料的办法购买美国军火，出现了 1940 年底英国出现过的同样问题。积极主张援苏的霍普金斯很着急。他说：“我们作出了这么大的承诺，而现在，我的天呀，我们不能继续提供援助了……真他妈的扫兴！”

罗斯福通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把苏联列入《租借法案》的援助之列。10 月 30 日，他致电斯大林说。他已经批准了莫斯科会议议定书上所一致同意的全部军事援助项目，并已命令要加速运输。这批援助物资价值高达 10 亿美元，可以在《租借法案》项目下付款，于战后 5 年开始偿付，“不收取利息”。他希望斯大林作出特别努力，以帮助美国从苏联采购自己急需的原料和商品。信的结尾还说，斯大林如果遇有情况需要，随时都

“可以直接同我通信，而不必有所踌躇。”

11月4日，斯大林回电说，对于美国的巨额无息贷款，“苏联怀着诚挚的谢忱予以接受，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巨大援助。”并保证苏联准备尽一切可能迅速地供应美国所需要的原料和商品。他最后说：“总统先生，我完全赞成你的建议，任何时候遇有情况需要，我们之间建立直接的个人联系。”

11月7日，罗斯福公开宣布，给予苏联享受租借法援助的资格。他说，苏联的作战，“对美国的防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在苏德战争初期，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虽然通信不多，却开始形成一种彼此尊重的关系。相反，丘吉尔虽然与斯大林通信频繁（丘吉尔更主动积极），但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却很大。这是因为，在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方面，罗斯福财大气粗，相比之下，丘吉尔显得不如他慷慨大方。此外，英苏都是对德宣战的国家，一个位于西欧，一个位于东欧，客观上要求两国在对德作战时相互配合，焦点是斯大林迫切要求英国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而丘吉尔感到难以从命。这便成为双方互不信任的症结。美国当时尚未正式参战，美苏关系暂时不受这一问题的困扰。

9月15日，斯大林再次致函丘吉尔，希望英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如若不能，就派25至30师到苏联前线去，支援苏军作战。丘吉尔觉得斯大林有些想入非非。直到10月下旬，英国一直没有就斯大林的要求给苏联以明确的答复，苏联政府对此公开地表示不满。11月4日，丘吉尔才向斯大林建议，派英国的韦维尔将军访问苏联，探讨两国军事合作问题。斯大林担心韦维尔等人职权有限，在重大问题上不能拍板，不愿接受。11月11日，苏联驻英大使转交了斯大林给丘吉尔的答复，“词句尖锐，批评甚多”。丘吉尔亦很生气，对麦斯基态度相当粗暴。

苏联还多次要求就战后欧洲和平、边界等问题同英国举行谈判，希望英国承认苏联在东欧的领土要求，承认“东方战线”为苏联的西部边界线，对此，英国不能接受。

1941年11月中旬，有人提议让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苏联，以弥合英苏关系出现的裂痕。最初，丘吉尔表示反对。他说，我们手里有力量，足以同斯大林周旋，斯大林有求于我们之处，多于我们有求于他，除非莫斯科铺出红地毯，否则我就不去。

11月21日，英国战时内阁最终还是作出决定，派艾登访问苏联。丘吉尔没有执意反对，相反，是他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斯大林：英国政府授权艾登讨论与战争和战后和平机构有关的任何问题。斯大林表示接受艾登来访。

消息传出后，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很不安。他们担心英苏两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就战后欧洲领土、边界的变动等问题达成秘密协定，而把美国撇在一边，等到战后召开和会时再把它们拿出来向美国施加压力。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决不让这种历史重演。12月5日，即艾登动身赴苏的前两天，经罗斯福批准，美国国务院给驻英大使怀南特发了一封重要电报，指示他把如下电文当面念给艾登听：“我们对苏联恪守信义的检验，就是我们对……比弗布鲁克——哈里曼使团所作关于物资援助的承诺履行到怎样的程度。”美国政府的战后政策，已经“在大西洋宪章里勾划出了轮廓，今天宪章也代表着大不列颠和苏联的态度……由三国政府中任何一个……去承担关于战后解决的具体条件，都将是极不幸的，首先，绝不当有秘密

协定……”

两天之后，艾登带着英国战时内阁的期望和美国政府的警告飞往苏联。此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美苏英三国大联盟尚未正式建立，或者说仅仅拉开了一道序幕——一道好不容易拉开的历史序幕。

第十三章 援华抗日

斯大林：“日本人要是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他们要是想和解，那么也就和解吧。”

丘吉尔：“如果日本海军力量袭击我们的话，我们势将面临我们的海军无法应付的局面。”

罗斯福：“我们此时不能把日本逼得太紧，因为那可能促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

远东国际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性战争。如果说 30 年代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和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两个大的战场：即欧洲—大西洋战场（包括北非、地中海在内）和亚洲—太平洋战场。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战时活动的宗旨，不仅是要打败欧洲的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而且也要打败亚洲的法西斯日本。

早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日本已于 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活动，不仅仅是想独占中国，而且要称霸亚洲。它既威胁着美苏英三大国在华的利益，也威胁着它们在整个亚洲的利益。

英美苏三国在华和在亚洲的利益不尽相同。英国是一个最大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二战之前，在华拥有经济利益的欧美列强中，英国的利益最多。此外，它在东南亚、印度、大洋洲等地拥有巨大的殖民利益。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列强。从 19 世纪末开始，它加紧向远东扩张，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又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华的利益增长很快。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继承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攫取的权益、此外，它本身在亚洲有相当一部分领土，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

当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时，英美苏三国的利益便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但三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英国本身是一个欧洲国家，与它拥有的遍布全球的殖民地附属国构成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如果说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威胁的是英帝国的四肢，那么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威胁的却是它的核心。显然，德国对它的威胁更大一些。苏联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虽然它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但无论是起源，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欧洲部分才是它的中心，相比之下，亚洲部分，尤其是远东的西伯利亚，在其全国中的地位次要得多，日本在远东对它的威胁显然不如德国在西边对它的威胁大。对英苏两国来说，当它们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对付来自欧亚两个方面的敌人时，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是顺理成章的事。

美国则不尽然。它位于美洲大陆，与欧洲和东亚都是一洋之隔，只是与欧洲隔得近一些，与东亚隔得远一些。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它与欧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与欧洲的关系也更密切一些。不过，它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孤立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传统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即少掺和到欧洲事务中去。而这并不等于不参与东亚事务。事实上，快进入 20 世纪时，美国并不想完全孤守美洲大陆，而是积极地冲出美洲，走向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是走向东亚。抢占菲律宾，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都表明了这一点。一战后，它的外交政策在巴黎和会上陷入失败而在华盛顿会

议上取得成功，这一败一胜，更有助于它想孤立于欧洲之外而积极向东亚扩张。因此，当国际局势的恶化使它同时面临着分别来自欧洲和东亚的两场战争的危险时，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放在欧洲还是放在亚洲，就不像英国和苏联那样容易决择，即使一时作出了某种选择，也很有可能因局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而不一定像英国和苏联那样始终如一地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即使美国选择了欧洲为它的战略重点，它也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彻底地保重点而置亚洲于不顾。

就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而言，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中心。日本是本地区的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和东亚的争夺中占有地利，当欧洲国际局势恶化乃至爆发战争时，还会给它提供有利时机，日本侵华是这一阶段远东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此外，欧美列强也积极参加在东亚的角逐，从而使远东国际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从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直到 30 年代初，欧美列强在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中往往采取以下战略：当某个欧美列强（常常是与中国领土接壤的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在争夺中国的角逐中占有优势地位时，另一些欧美列强便支持东亚的日本去对付它；当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或在中国的角逐中占有优势地位时，有些欧美列强便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当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威胁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利益时，有些欧美列强会支持日本镇压中国人民；当日本在中国的争夺中占有优势甚至企图独占中国时，欧美列强又很担忧，有时也有可能支持中国抵抗日本；当欧洲国际局势恶化、欧美列强无力在东亚对付日本时，它们又想与日本谋求妥协。

斯大林积极援华抗日

1931 年 9 月，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以独占中国、称霸东亚为目标的扩张活动，远东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的侵略扩张成为英美苏三大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问题。三国在华和在亚洲的利益要求它们采取措施阻止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东亚，要求它们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甚至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可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妨碍了它们联合；欧洲国际局势的恶化，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以及三国自身在远东军事实力的不足，使它们都想通过与日本谋求妥协，避免在东亚卷入对日战争。于是，面对日本侵华的局势，英美苏三国的远东政策都陷入了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既想阻止日本独占中国，又想与日本谋求妥协。在处理这一矛盾时，三国彼此之间以及各国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做法不尽相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对局势的发展严重关注，当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是很强大，斯大林正加速推进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不希望苏联卷入对外战争中去。他在联共（布）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苏联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以免将苏联引入冲突与战火。为此，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1931 年 11 月 7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对中日之间的“满洲事变”采取不干涉主义。不仅如此，鉴于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中有人企图唆使日本入侵苏联，鉴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点离苏联边界很近，苏联迫切希望与日本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以保护苏联远东地区的领土安全，为此，大约从 1931 年底，苏联多次向日本提出了这一建议。无奈日本对此不

感兴趣。

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权益，主要是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当日本侵占东北，在东北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后，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成为引发日苏矛盾不断激化的因素之一。苏联为了不给日本侵略苏联提供借口，于1935年3月，以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卖给了日本（实际上是卖给了伪满洲国）。

当时，苏联把对日避战放在其远东政策的首要地位，对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除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除了在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中苏外交关系之外，没有给予中国实质性的援助。

苏联一方面尽力消除日苏关系中的一些隐患、在外交上小心翼翼，不给日本提供发动侵苏战争的借口；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其远东地区的防务力量，作好反击日本入侵的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开始向远东地区增兵。至1932年9月，向远东地区增派了3至4个步兵师。1932年4月21日，组建远东海军，同时开始修复荒废了6年之久的海参崴军港。1936年11月15日，苏联代理国防人民委员屠哈切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国防问题的报告时指出，鉴于德国正扩充军备，从西方威胁着苏联，而日本则从东方觊觎苏联，苏联必须在东西两个正面同时充实国防。1935年1月11日，苏联在远东海军的基础上，建立了太平洋舰队。据日本参谋本部估计，到1935年末，苏联在远东的陆军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至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有24万人，超过了当时日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1934年11月27日，苏联与外蒙古缔结了军事互助协定，1936年3月、进一步签订了《苏蒙协定》。此外，从1932年起，苏联开始了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工程的建设，从1934年起，开始在远东各地修筑伸向国境地带的战略公路。通过上述措施，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增强。

日本称霸亚洲的军事战略，包括占领中国、北进和南进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完成占领中国后，向北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向南进攻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中国是其建立亚洲霸权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既想北进，又想南进，北进和南进战略相互交织、渗透，但在不同时期，仍然有侧重点。大体上说，在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其军事战略重点放在北进方向。大约从1935年起，日军不断地在其控制的伪满洲国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边境地带挑起边境纠纷，武装冲突不断升级。1936—1938年，武装冲突达到230多次。1938年7月29日，日军在中、苏、朝交界处的张鼓峰（哈桑湖），向苏军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北进战略的第一次重大尝试，遭到苏军的迎头痛击，日军伤亡惨重，被迫于8月11日同苏联签定停战协定。然而，日军并没有放弃北进的企图。1939年5月11日，日军又在中蒙交界的诺门坎（哈勒欣河）地区向苏蒙军队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开始了北进战略的第二次重大尝试，再次遭到惨败，伤亡5万余人。1939年9月15日，日本被迫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斯大林一方面大力加强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坚决反击日军的挑衅行动。打击日军北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而，在其远东军事实力得到增强后，在日本侵华问题上，也改变了30年代前半期小心谨慎、保持中立、避免刺激日本的政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力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军的北进行动。1937年3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年9月，斯大林接见了访问苏联的中国代表团。从10月份起，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军

用物资，并派飞行员来华参战，同时派军事顾问协助中国抗战。1937—1939年，苏联先后3次贷款给中国，共计2.5亿美元，向中国提供了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000多挺机枪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向中国派出了大约1500名军事顾问、712名空军志愿飞行员和航空专家。在这一阶段，在援华抗日方面，苏联表现最积极。

总之，在30年代后期，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增强，使斯大林有能力粉碎日军的北进尝试。并不再顾忌日本的反对，积极援华抗日，其援华抗日活动，也是为了牵制日军的北进，1939年8月，斯大林对里宾特洛甫说：“日本人要是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他们要是想和解，那么也就和解吧。”

英美的软弱立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罗斯福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受到孤立主义势力的严重掣肘，丘吉尔尚处于在野地位。

日军的侵华活动，直接威胁到英美在华的利益。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宣称，应废除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已不再是指导亚洲经济活动的有效原则。日军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也开始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限制和排挤英美的在华利益。英美两国虽然对此强烈不满，但除了向日本递交照会，表示抗议之外，没有采取更强硬的反击措施。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它们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积极地援华抗日。

就罗斯福而言，主要是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使他不能采取强硬措施反击日本的扩张。1937年10月，他在芝加哥发表“隔离”演说后招致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击。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教训，他不得不谨慎从事。

日军在排挤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时，矛头更主要是对着英国的。可是，与美国相比，英国在远东的实力地位更虚弱。早在20年代，英国就制定了保护其远东利益的军事战略：修建新加坡海军基地，派一支主力舰队到远东。可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时，海军基地尚未建好，派主力舰队到远东的计划也无法落实。此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局势急剧恶化，也使得英国无力加强其远东的防务。1937年12月15日，英帝国国防需要委员会在一份关于国防问题的文件中规定，英国防务的优先顺序是保卫本土和贸易通道；保卫海外领上和防御盟国领土。英国潜在敌人的优先顺序为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但由于地中海是英国通向远东的重要贸易通道，防御意大利的重要性已有所强调。那时，丘吉尔虽然处于在野地位，但密切注视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已经意识到英国在华的软弱地位。1939年3月，他曾说过，英国没有希望保护它在华北的利益，“在这个地区我们必须忍受损失和惩罚，以待斗争的最终结局。”1939年7月24日，英同政府被迫与日本妥协，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既成事实。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法陷入欧战之饥，加紧排挤它们的在华利益。9月4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发表声明说：“日本无意介入在欧洲已经爆发的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第二天，日本要求欧洲各交战国，主动从日军在华的占领区内撤走军队和军舰。当时，只有英、法两国有这种军队和军舰，可见日军的矛头所向。丘吉尔后来回忆说：

“我们对日本的忧虑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无情地压在我们的心头。”

当时，丘吉尔已参加政府，出任海军大臣，一心扑在皇家海军的建设和对德国的海战方面，但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他自然也关注远东局势。他认为，“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有鉴如此，英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于10月3日宣布，从日军控制的长江水域撤走5艘炮艇。11月12日，英国陆军部又宣布，从日军控制的华北地区撤走大部分英国驻军。在决定撤军之前曾想寻求美国的帮助。如果英美能够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就会使它们在远东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然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尽管不断有人提出英美联合对日的主张，却一直没有变成现实。在1939年，英美在联合对日方面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1939年夏天，罗斯福意识到，日本人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矛头对准英国，没有拿美国开刀，是企图离间英美关系。此外，日本还假惺惺地邀请美国与日本一起努力防止欧洲爆发战争，是企图间接地要美国接受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他虽然不希望美国在远东卷入对日战争，但也不愿让日军在中国为所欲为，不愿接受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在1937—1939年，罗斯福虽然没有象斯大林那样积极援华抗日，但也没有像英国的张伯伦政府那样对日妥协。他曾对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说：美国绝不会迫于压力而退出中国。1939年7月初，他得知日军飞机对重庆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烂炸时，便指示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提出抗议。当英国于7月24日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滇协定》时，罗斯福则决定于7月26日通知日本，美国将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条约》。他甚至考虑把美国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调往珍珠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后因担心过于刺激日本才作罢，1940年3月29日，日军扶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奉罗斯福指示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用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诸一个邻国”，宣布美国拒绝承认汪精卫伪政府，继续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

日苏谈判

1939年8月，日军在诺门坎冲突中的惨败，使其推行北进战略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暂时解除了苏联的西顾之忧，使之有可能把更多的力量用于加强远东地区的防务，进一步动摇了日本推行北进战略的信心。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国宣战，因而无力顾及其远东的利益，从而为日本夺取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称霸亚洲的军事战略重点开始由北进转向南进。1939年12月28日，日本陆、海、外三相在《对华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指出，日本战略方针是，不介入欧战，停止北进，准备南进。

要准备南进，日本必须调整日苏关系，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

日本陆、海、外三相会议决定，要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日苏两国平静无事。对斯大林来说，纳粹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都对苏联构成了威胁，但由于德国实力比日本强大，也由于苏联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重要一些，因而德国是苏联面临的主要敌人。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同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其次要集中力量重点对付来自德国的威胁，虽然

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仅靠一纸条约是不足以保障苏联安全的，要避免两线作战和重点防止德国入侵，就需要缓和同日本的紧张关系。因此，日苏停战后，斯大林一方面下令继续加强苏联远东地区的防务，另一方面同意就改善日苏关系与日本谈判。

1939年10月27日，日苏两国同意释放被扣押的对方的渔船。11月6日，苏联驻日大使斯麦塔宁在离任16个月以后奉命前往东京任职。随后，日本提出愿意就改善两国关系与苏联进行谈判。

当时，日苏关系中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本拖欠购买中东铁路的欠款问题、日苏渔业问题、日本租借苏联库页岛问题、外蒙古与伪满洲国的边界问题以及苏联支持中国抗日问题，1939年11月，日苏双方开始谈判，12月31日签订了日苏协议，彻底解决了中东铁路欠款问题，部分解决了渔业问题。协议规定，日本购买中东铁路的最后一次分期付款必须付清；两国在缔结长期渔业协定之前，暂时把原有的渔业协定延长1年。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为此发表文章说，苏联十分重视日苏关系的正常化，愿意促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可是好景不长。1940年初，两国关于边界和缔结新的渔业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继续相互指责。1940年1月31日，日本外相有田对国会说，苏联“应停止干涉（日本）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北部办工业的特许权，应修改其支持中国抗日政权的政策，应进行合作以实现东亚的普遍和平。”3月22日，他重申，德、意、日三国缔结的《反共产国际条约》继续有效。无独有偶，3月2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苏虽然于1939年底解决了两国之间的部分问题，但苏联对两国关系并不满意。他谴责日本国会要求苏联把库页岛北半部和滨海省卖给日本的建议，相反要求日本把库页岛南半部卖给苏联。他说：“日本最终应该明白，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下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苏日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

当时，妨碍日苏关系改善的障碍之一，是苏联坚持援华抗日政策，而日本要求苏联放弃这一政策。当日苏两国开始谈判时，蒋介石提心吊胆，担心苏联在援华抗日问题上与日本妥协（也担心苏联要他对共产党让步才肯援华）。可是，当时斯大林并不知道日本战略重点已开始由北进转向南进，他仍然要支持中国抗日以牵制日军北进。虽然从避免两线作战和重点对付德国的战略出发，他也想改善日苏关系，但在1940年，苏德关系并不紧张（尤其是1940年9月份以前）；相反，日本在库页岛、滨海省、渔业等问题上的要求，直接损害苏联的利益。因此，斯大林改善日苏关系的愿望并不是很迫切，暂时还不想放弃援华抗日政策而去迁就日本。1939年12月，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祝贺他60寿辰。1940年1月18日，斯大林回电答谢，表示希望中国能战胜“一切敌人”，虽未挑明敌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指谁。这封回电使蒋介石很受鼓舞，日本人则很不舒服。

1940年3月22日，日本外相有田说，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及其报刊舆论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敌视态度，是妨碍日苏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可是，苏联并没有屈服日本的压力，而是继续援华抗日。1940年，它两次对华贷款2亿美元，继续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日本一度指望英法会出兵干预苏芬战争，对苏联宣战，从而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为此会满足日本的一些要求。苏芬战争以苏联的胜利结束，

日本的希望破灭。1940年3月，日苏恢复了关于伪满与外蒙的边界谈判，6月9日达成协定。1940年夏天，德军在西线取得重大胜利，荷兰、法国等国战败投降，给日本南进以大好时机，更加坚定了日本的南进决心。为了避免南北两线作战，日本决定“迅速调整日苏关系”，7月初，建议日苏两国缔结一项中立条约。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也有意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日本必须放弃在库页岛北部的特许权。

日苏双方很快开始了谈判，但不久日本内阁更迭，谈判暂停。新内阁成立后，任命建川美次将军为驻苏大使。此人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任乃木将军的副官。斯大林认为，由他出任驻苏大使是不祥之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盟约，虽明确规定三国与苏联的现有关系保持不变，仍不免让斯大林疑虑重重。

10月底，建川美次抵达莫斯科，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不是原先说的中立条约），把库页岛等问题放在缔约后去解决。当时，苏联对日本的企图并不摸底。11月12—13日，莫洛托夫访问德国时曾问德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确切界线划到哪里？日本到底打什么主意？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希望先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缓和日本公众情绪，这将有助于解决北库页岛问题，如苏联有意，德国可充当调停者。然而，苏联无意接受日本的建议，11月18日答复日本，表示只愿意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而非互不侵犯条约，并坚持同时解决北库页岛问题。双方立场差距很大，谈判陷入僵局。

在此期间，外界纷纷谣传日苏即将达成政治协议，蒋介石又提心吊胆。其实，苏联此时还没有放弃援华抗日以牵制日军北进的政策，莫洛托夫在柏林与德国人会谈时表示，苏德有责任关心解决中日冲突，但“一定要向中国保证是体面的解决……”。11月15日塔斯社否认了外电关于日苏已就亚洲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的说法，否认了苏联已同意不再援华的说法。12月5日，塔斯社再次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事实上也如此，1940年底至1941年初，中苏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1941年初，当中国迫切需要飞机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00架轰炸机和歼击机。仅1940年12月到1941年1月，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1941年1月15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告诉美国，苏联准备向蒋介石提供更多的军火。苏联坚持援华抗日政策，使蒋介石如释重负，也重视加强中苏关系。1941年2月22日苏联建军23周年之际，蒋介石率领高级文官武将去苏联大使馆表示祝贺。

丘吉尔与滇缅公路危机

1940年夏天，德军在西欧的胜利给日本以极大刺激，它决心抓住这天赐良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于是加快了“南进”步伐，趁火打劫。

1940年5月15日，荷兰战败投降，3天之后，日本要求荷印殖民当局向日本提供石油、橡胶、铁矾土等13种战略资源。6月17日法国战败投降，第二天，日本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属印支当局停止经由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军火。6月20日法国被迫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滇越铁路的关闭对中国打击很大。此后，境外提供的援华抗战物资只有经西北公路（通往苏联）、滇缅公路和香港与内地的交通线，其中后两条交通运输线都控制在英国手中。于是，日本又开始向英国施加压力，企图切断中国通往外界的这两条重

要通道，困死中国。

1940年6月24日，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封锁香港与内地的边界，为此在九龙附近集结了5000名日军，摆出随时进攻香港的架势，向英国施加压力。此时，丘吉尔已是英国首相。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一上任就忙于应付德军在西线发动的闪电战，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五飞法兰西、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一个个战败投降等重大事件的严峻考验。但他并没有忽视日本在远东对英国利益的威胁。问题在于，为了对付德军。他已是捉襟见肘，哪里还有力量来对付日本人呢？他别无其他良策，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美国，求助于罗斯福总统来对付日军在远东的扩张。5月15日，他在任首相后给罗斯福的第一封电报中，谈到英国“迫切需要”援助的项目时说：“我指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你们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言下之意，只要美国能让日本人在远东放规矩一些，英国在远东的新加坡海军基地可以任凭美国使用。

然而，罗斯福此时尚未下决心用武力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与日本妥协。当时，英日之间有天津白银问题、法币流通问题等悬而未决，双方断断续续的谈判一直没有取得突破。1940年6月，丘吉尔政府决定对日本让步。6月12日，即意大利参战两天后，英日签订了《天津协定》，通过出卖中国利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与上述问题相比，滇缅公路可谓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关闭它，对中国抗战会产生重大影响，丘吉尔不能不慎重行事。英国外交部与日本作了多次交涉，希望不关闭该公路，没有成功；求助于美国，罗斯福正面临大选，态度暧昧。英国军方认为，若在远东采取冒战争风险的政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很可能不支持英国。丘吉尔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英国抵制日本，在日本的报复中，英国便首当其冲。他要求弄清楚：一旦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美国会作出什么反应。

此时，美国显然无意与日本打仗。7月8日，日本向英国提出了最后通牒。第二天，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向政府建议，可以考虑暂时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在此期间英日应努力在远东促成实现全面公正的和平，否则，3个月后英国将自己决定是否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丘吉尔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7月17日，英日达成了协定，第二天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切断了香港通往内地的交通运输。

丘吉尔政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却得到日本的赏识。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认为，此举“表明丘吉尔承认了哈里法克斯等为代表的纯粹保守党的对日政策，对日本来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好机会”。9月4日，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解释说：“一场对日本的战争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在中东的战略。正确的路线应是……不使我们自己承担无可挽回的武力行动。”

滇缅公路关闭期间，英国外交部希望根据协定，解决日本侵华问题，在远东实现全面和平，“尽可能为在远东得到一个好的协定而努力”。丘吉尔却不以为然。他希望日军陷在中国战场上难以脱身，从而无法南进。7月17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说：“我确信所有这种关于‘公平而公正的协定’的谈论都是荒唐的空想……中国和日本结束他们的争吵肯定是不利于我们的”。7月20日，他在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重申这一观点：“我认为，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对我们是不利的。”

由于丘吉尔无心、日本人无意，在滇缅公路关闭期间，所谓远东全面公正的和平并未实现，3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丘吉尔决定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他认为，到了10月份，日本进攻在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的危险已经变小了，理由是：除非德国入侵英国成功，否则日本就不会在远东对英国宣战；而到了10月份，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缩小了。他回忆说，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英吉利海峡的波涛汹涌，危险莫测，德国“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如果日本军阀“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10月18日，滇缅公路、香港与内地的边界同时开放，海外的援华抗战物资又源源不断地经由这两条通道运往中国。

罗斯福左右为难

其实，丘吉尔决定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时，“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他仍然担心日本会对英国进行报复。他感到，要保护英国的远东利益，从长计议，只有美国下决心制止日本扩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决定利用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的机会，再次敦促美国带头遏制日本的扩张，把美国推向远东国际政治舞台的前台。10月4日，他致电罗斯福，通报了英国即将开放滇缅公路的决定，接着指出，9月27日缔结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恢复了1936年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且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他提出了威慑日本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然后指出：“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这对防止战争的蔓延将起重要作用。”

可是，罗斯福很为难。他想遏制日本的扩张，却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从而未能使美国在制止日本扩张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早在1939年夏天，罗斯福就说过，如果日本南进入侵印度支那或荷属东印度，美国就予以阻击。同年11月，他又说，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以20世纪文明人的态度讲话”，美国将考虑是否有必要同东京保持关系。二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在对日政策问题上，罗斯福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中国的蒋介石、美国政府中的摩根索·伊克斯、霍恩贝克以及75%的公众，主张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英、法两国及美国国务卿赫尔和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等人，反对经济制裁，他们担心经济制裁会促使日本进攻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罗斯福最后拍板时，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同意不进行制裁，但又让赫尔告诉日本人，不制裁只是“暂时的”。

1940年夏天，德军在西线进攻，日本在远东趁火打劫。5月中旬，罗斯福命令，刚刚在夏威夷海域演习完毕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留守珍珠港，而不回美国西海岸圣迭戈。这是他向日本施加压力的一种姿态。另一方面，鉴于欧洲局势的空前恶化，他又想在远东与日本达成妥协。5月底，他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打交道，设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6月10日，美日双方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没有取得成果。

当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丘吉尔再次向美国求援时，罗斯福仍然左右为难。他对日本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小人行为（日本自己有人承认，这

种做法给人“大有临终逼债之感”）很反感，很想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当摩根索提出禁止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建议时，他表示非常感兴趣。可是，他担心卷入对日战争会干扰英美对付德国的活动、会危害他第三次竞选连任的努力。当副国务卿韦尔斯说，禁止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会导致日本对英国宣战时，罗斯福准备放弃这一建议。

在财政部长摩根索、陆军部长史汀生等强硬派推动下，1940年7月25日，罗斯福又批准对所有石油和废金属的出口实行限制。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第二天，罗斯福又对记者说，他并没有实行“禁运”，只是把出口商品许可证制度推广到某些废金属和石油产品。这样一来，对日本的出口限制只局限于航空燃料、润滑油和高熔点的废金属。美国国务院对罗斯福的这一声明作了宽泛的解释，于是日本可以继续从美国进口适用于日本飞机的中级辛烷汽油。罗斯福对此亦无异议。他对摩根索说：“我们此时不能把日本逼得太紧，因为那可能促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正因为如此，1940年，美国向日本出口了大量石油产品。

罗斯福政府的这种政策，以及丘吉尔政府在滇缅公路问题上的软弱立场，自然不可能阻止日本实施南进战略。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加快了南进步伐。日军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法属印度支那。8月30日，日本迫使法国贝当政府原则上同意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9月22日，日军突然强行进入印支北部，并迫使法属印支当局允许日军修建空军基地。

日军的南进行动引起了美国不安。美驻日大使格鲁一向重视改善日美关系，反对制裁日本，此时态度发生很大变化。9月12日，他在一封给国内的电报中说，最近同日本外相的会谈令人十分沮丧，在他看来，对日本的扩张行为仅仅口头上表示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到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完全清醒过来，显示威力，并决心在必要时运用这种威力的时候”，才能维持住太平洋的现状“并保证我国今后的安全”。鉴于格鲁过去一直反对制裁日本，人们称他的这封电报是为制裁日本“开绿灯”的电报，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罗斯福很重视格鲁的这封电报，第二天，他要求财政部长摩根索找到一种制止向日本出口废金属而又不会中止向英国出口的办法。9月26日，他决定对各种等级的废钢铁出口实行管制。摩根索、史汀生、伊克斯等强硬派认为，由于没有包括石油禁运，这一措施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实施太晚了。摩根索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的意见是，对日本施加压力应在它进入印度支那之前而不是之后，我认为这太晚了，日本和其余的独裁者一定要嘲笑我们。实施这一措施的时间应是在几个月以前，那时候日本可能会停手，观望并听着点。”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矛头之一就是针对着美国的。10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如果美国拒绝理解日、德、意三国的真实意图，继续坚持自己的挑衅立场，……这就意味着，日本将被迫投入同它们的战争中去。”第二天，罗斯福收到了丘吉尔力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向美国求援，力促美国带头遏制日本扩张的电报。在政府成员中，摩根索、史汀生等强硬派主张立即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史汀生甚至要求派一支舰队去保卫荷属东印度。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的另一派反对采取这种措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也认为，目前是与日本发生摩擦“最为不利的时刻”，海军领导人甚至要求把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撤回到西海岸的圣迭戈。

罗斯福仍然左右为难，犹豫不决。10月8日，他在同海军部长诺克斯谈话时，拒绝把太平洋舰队撤回西海岸，并表示如果日本对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作出挑衅性反应，就对它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甚至可以考虑派美国舰队在西太平洋巡逻。10月12日，他在哥伦布纪念日发表广播讲话说：“任何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联盟，都不能阻挡我们在保卫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前进，都不能阻挡我们去帮助那些正在战斗，拼死抵抗独裁国家几乎是最后的一些自由民族。”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担心在东亚卷入对日战争会影响在欧洲支持英国抵抗德国，也担心对日战争会破坏他第三次竞选连任的前景。因而他最后决定不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也不派舰队去新加坡，不派舰队在西太平洋巡逻。

新的远东危机

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日本暂时没有对英国作出报复性反应。丘吉尔对远东局势开始由担忧转变为谨慎的乐观。11月22日，他在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的信中说：“只要有一支占优势的主力舰队驻在新加坡或檀香山，日本海军便似乎不敢贸然远离其本国基地。”在英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中，丘吉尔一直更重视加强地中海和中东的防务。把地中海和中东的重要性放在远东之上。为了让内阁成员和自治领政府领导人支持他的这种主张，1940年12月，他一再强调，远东局势没有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险。12月15日，他致信给自治领事务大臣说：“我并不认为远东的局势有急遽恶化的危险。”12月23日，他又致信澳大利亚总理说：“关于日本对英帝国开战的危险，在我看来，肯定已经比6月间法国垮台以后要小得多。”

不过，丘吉尔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仍然希望把美国推出来带头制止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为此12月8日，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则有意强调远东局势的危险性。他说，日本在远东扩张是英国1941年面临的危险之一。“看来很显然，日本正在穿过印度支那向南挺进到西贡和其他海、空军基地……这种形势如果继续发展，则我们今天在远东的兵力就不能应付。”

1940年底至1941年初，远东出现了一场新的国际危机。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一直存在领土纠纷。法国败降后，泰国乘机提出领土要求，双边关系急剧恶化，1940年11月底，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日本决定利用这场危机，乘机向印度支那南部扩张。1941年1月中、下旬，日本对双方（主要是法属印支当局）施加压力，促使双方在日本军舰上举行谈判，于1月30日达成停战协定。2月7日，冲突双方在日本东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日本向双方施加压力，企图乘机扩张日本的势力。它要求泰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倒向英美一边，要求法属印度支那不得与第三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合作，它还要求进一步获得在印度支那驻军、修建军事设施、使用空军基地和港湾的权利。

显然，这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新步骤，英美对此极为不安。1941年2月12日，丘吉尔在一封信中指出：“日本对我们采取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态度，它在最近显然有进攻我们的可能。”他一方面指示外交部向日本表明英国的强硬态度，指出日本的现行政策会把日本引向毁灭的道路。另一方面继续呼吁美国站出来带头阻止日本南进。2月15日，他致函罗斯福：“许多蛛丝马迹似可表明，日本准备在今后数星期或数月内对我们作战……我认为，我应

该让你了解，如果日本海军力量袭击我们的话，我们势将面临我们的海军无法应付的局面。……凡是你能使日本害怕……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消除这种危险。”

显然，丘吉尔把球再次踢到了罗斯福一边。罗斯福仍然左右为难。他收到丘吉尔来信的当天，还收到一份民意测验结果：59%的人赞成美国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犯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但只有39%的人支持为此冒战争风险。此时，他正全力以赴地争取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不愿让别的事干扰该法案通过。此外，从全局考虑，对付德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基于这些考虑，他既不算打算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也不准备派美国舰队去新加坡，或进行大肆张扬的海军作战演习。当然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毫无反应。

2月14日，罗斯福召见日本新任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声明，日本南进引起了“我国的严重关注”，如果再发生类似击沉“帕奈”号那样的事件，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激起……美国人民起来反对肇事者”。他不愧为一位善于演戏的政治家，说这番话时，显得感情冲动，接着又显出心情沉重的样子，哀声叹气地说：“希望野村上上将把这一切转达给贵国政府……这里每一个人都在尽他们自己最大的努力使事态平息下来……如果一旦堤坝决口，文明就完了。”3月份，他又派美国军舰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着又派海军军官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有英、荷、澳、新等各方参加的高级参谋会议。采取这些措施，显然是要让日本注意到，美国将加强与英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合作。

其实，在1941年初，日本尚未作好大规模南进的军事准备，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1940年底，日本陆军共有49个师团，其中9个驻在国内，2个驻在朝鲜，其余38个都陷在中国战场上（关内27个，东北11个）。此时，它也还没有做好与英美开战的军事准备。在这种形势下，它很快设法缓和了插手法泰冲突造成的远东危机。2月24日，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拜见丘吉尔，表示日本无意进攻新加坡或澳大利亚或荷属东印度，无意同英国或美国打仗。3月4日，他们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重光葵重申了日本的上述立场。通过这两次会谈，丘吉尔确信，除非英国即将被德国打败，否则日本“是不致向我们进攻的。我很怀疑，如果美国同我们联合起来，它是否肯加入轴心国一边作战。它要这样做，那确实是很愚蠢的”。

这场远东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英美的对华援助

1937—1940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阶段，以中日两国实力相差之悬殊，仅靠中国自身是不足以打败日本的，就像在欧洲仅靠英国自身不足以打败德国一样。可是，在这一阶段，在援华抗日方面，英美远不如苏联积极。

在1940年之前，美国几乎没有给中国提供过实质性的援助。只是在1938年12月15日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出口信贷。虽然在1939年9月，罗斯福曾表示要增加对华贷款：“只要不给别人抓小辫，便可尽力为之。”但实际上，并未采取行动。直到1940年3月，日本扶持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之后，美国担心蒋介石投降日本，才向中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在援华抗日问题上，英国更害怕得罪日本，迈出的步子更小。1938年，中国多

次向英国提出贷款要求，都遭到英国拒绝。直到这年的12月初，英国才同意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的出口信贷，且实行分期付款。1939年3月，英国决定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

在中日战争初期（1937年7月至1940年6月），英美在援华抗日方面之所以不如苏联积极，是因为它们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就美国而言，主要是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了罗斯福。至于英国，主要是受到欧洲局势的牵制，同时也是因为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虚弱。这样一来，英美都害怕同日本打仗，害怕得罪日本，不敢同它硬碰硬。苏联却不一样，30年代它一直重视加强远东地区的防务，在军事实力增强后，它就不再一味地避免与日本的正面冲突，而是勇敢地反击日军的挑衅。随着1938年张鼓峰冲突和1939年诺门坎冲突的胜利，以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斯大林更不怕日本了。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军北进，苏联便积极援华抗日。

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军的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南进，欧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受到直接军事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英美一方面自然希望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但同时也开始转向积极援华抗日，希望利用中国抗日以牵制日军南进，其中美国的转变更明显一些。1940年9月，罗斯福在得知日军即将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德意日三国即将结盟的消息后，指示紧急安排给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同年10月中旬，蒋介石要求美国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飞机和志愿空军人员。11月30日，日本与汪精卫伪政府缔结正式协定，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压力。为了防止蒋介石投降日本，12月1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罗斯福指示，这笔贷款必须尽快安排。他对国务卿赫尔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们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将爆发战争。”他还支持一项向中国提供远程轰炸机以攻击日本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该计划最后落实时，变为提供100架驱逐机以帮助保卫滇缅公路。12月10日，英国也宣布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的贷款。1941年1月，罗斯福派白宫高级助理劳克林·柯里访华，旨在帮助蒋介石解决经济困难。

早在1939年上半年，中国多次向英国提出，希望中英两国在远东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日本，英国对此不感兴趣。直到1940年10月份，英国才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实际上，此时英国是希望中国与它一起做美国的工作，让美国站出来带头，美英中三国联合抵抗日本的扩张。1940年10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提出一份中美英三国合作计划，提出中国对英国的要求，英国不能满足的，可以同美国商量以满足中国要求。蒋介石当然也很愿把美国拉进来。1940年11月9日，中国交给英国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可是，此时美国政府拒绝在远东与中英两国合作。第二天，英国外交部拟定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由于美国不肯明确承担义务，英国也不应与中国结盟；不能刺激日本；不宜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但可以任命一个驻华高级武官，扩大驻华武官处，以改善中英军事合作。备忘录还说：英国不能过高地估计中国军队可能给予英国的帮助，中国不可能承担比游击队更多的义务。

以丘吉尔为首相的英国战时内阁同意这些意见，中英美三国联合对付日本的计划流产了。

第十四章 通向珍珠港之路

斯大林：“苏联同英国一样。不愿同日本打仗。”

丘吉尔：一旦美日交战，“英国将接着在1小时内对日本宣战。”

罗斯福：日本可能会发动突然袭击，“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策略使他们打第一枪。”

《日苏中立条约》

1940年，日本实施南进战略，虽有进展，但成效不大。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坚持抗战，绝大部分日军陷在中国战场上脱不开身，使日本南进缺乏实力基础。其次，也是因为日苏关系在1940年没有重大改善，苏联迟迟不愿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南进存在后顾之忧。

日本感到，若不改善日苏关系，苏联一方面在北面牵制大量日军于中国东北，另一方面大力援华抗日，牵制大量日军于中国战场，必然使日本既不能打败中国，更不能集中全力南进。有鉴如此，进入1941年，日本下决心改善日苏关系，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1941年1月6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制订了《日德意苏交涉案要纲》，企图通过“四国协商”的途径，由德国出面周旋，促成日苏关系的改善。1941年2月11日，松冈洋右通知苏联驻日本大使：他应德、意两国邀请，准备出访柏林和罗马，并想顺道访问莫斯科。松冈耍了一点小滑头：掩饰日本希望改善日苏关系的迫切愿望，以免在谈判中苏联要价太高。

可是，苏联人并非傻瓜。苏联大使在给国内的电报中说：“他访问欧洲的主要目的是想会见苏联政府领导人。”

苏联在1940年日苏两国断断续续的谈判中态度一直比较强硬，截止1940年底——1941年初还大力援华抗日，不怕得罪日本，它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是因为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较强，特别是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武装冲突的胜利使它信心倍增；二是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苏德关系的改善，使德国对苏联的威胁显得不太严重。因此，苏联在同日本谈判时，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然而，进入1941年，苏德关系急剧恶化，德国入侵苏联的危险日渐迫在眉睫，从而削弱了苏联对付日本的实力。换言之，当日本为了集中力量南进，希望解除在北面的后顾之忧时，苏联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线德国入侵的威胁，也希望在东线解除后顾之忧。于是，在1941年春天，日苏两国相互妥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941年3月23日，松冈洋右到达莫斯科，第二天，斯大林会见了。早在1939年8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对斯大林表示，德国愿意帮助日苏两国实现和解。斯大林当时回答说，作为一个高加索人，他比里宾特洛甫更了解亚洲人。现在，斯大林注意到，眼前的这位日本外相，长得又黑又矮，蓄着八字胡须，戴着一副大眼镜，头发修剪得油光发亮。会谈中，松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斯大林静静地听着。当松冈要求苏联把库页岛卖给日本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这不是开玩笑吗？”

双方相互试探了一番，松冈洋右便去德国和意大利访问。此时，德国希望把英美的力量牵制在远东，迫使英国屈服，美国不能卷入欧洲战争，因此希望日本对英国宣战。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布“关于与日本合作的第

24号基本命令”，指出“必须以尽早促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为目标”，促使日本占领英国在远东的新加坡海军基地。不过，他并不信任日本人，不想把德国正准备进攻苏联的计划告诉日本，命令中强调：“千万别让日本得知‘巴巴罗萨’计划的消息。”

松冈洋右访德期间，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反复对他说，日本可以放心大胆地南进，完全不必担心苏联，一旦苏联从背后进攻日本，德国立即参战；日本也完全不必害怕美国，“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方面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松冈送给戈林元帅一幅日本富士山风景画，戈林半开玩笑说：“如果日本攻击新加坡，我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的真面貌。”松冈原指望德国出面调解日苏关系、向苏联施加影响，促成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可他发现，德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其实里宾特洛甫有意无意暗示过，苏德即将爆发战争，可松冈脑袋中根本就没有这根弦，因而没有领会出来。

4月7日，松冈洋右返回莫斯科，希望同苏联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表示，苏联无意同日本缔结全面的政治协定，只希望缔结一个范围较窄的中立条约。松冈提出，希望拜见诺门坎冲突中指挥苏军打败日军的苏军著名将领朱可夫——此时已是苏军总参谋长。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朱可夫：“松冈想同你认识认识，你要亲切地接待他。”

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松冈，问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们的谈话不涉及政治问题，只是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松冈像有些日本人一样，谁打败了他，他可能佩服谁。会见时，松冈说话不多，宁愿多听朱可夫说话，一睹这位苏联英雄的风采。会见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会见之后，朱可夫便打电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他告诉朱可夫：“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指不坚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松冈虽然在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双方在库页岛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松冈要求苏联把库页岛北半部卖给日本，斯大林不仅不想卖，而且要求立即取消日本在库页岛北半部开采煤炭和石油的特许权（日本于1925年从苏联手获得了这种特许权），并要求日本把库页岛南部卖给苏联（日本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库页岛南部）。松冈说，他既不愿意、也无权作这种让步。

松冈预定于4月1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直到4月12日，上述僵局仍未突破，松冈已准备空手而归。这时，斯大林从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威胁的角度考虑（此时，德国侵苏已迫在眉睫。4月上旬，希特勒已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凶相毕露，使斯大林蒙受屈辱——见第九章，貌合神离），决定让步。4月12日晚上，松冈去向斯大林辞行时，斯大林向他表示，苏联可以不要日本立即让出在库页岛北部的特许权。松冈也答应回国后说服日本政府在几个月之后放弃这些特许权，他表示愿意为此做出书面保证。于是，4月13日，双方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不得侵犯；如果一方与其他强国发生军事冲突，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西线局势的日趋紧张终于使斯大林在东线与日本达成了妥协。

还应指出的是，苏联为了消除东线的后顾之忧，甚至由原来的积极援华抗日转向不惜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日苏中立条约》签订时，双方还另有一份边界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对外蒙古承担同样义务。《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对松冈洋右的态度异常亲密。他们相互拥抱、合影留念。在随后的宴会上，斯大林一会儿亲手给

客人端菜，一会儿为日本天皇干杯。他亲切地对松冈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当天，松冈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回国。当列车快开时，斯大林又出人意料地赶到火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以及他对松冈异常亲密的态度，让松冈受宠若惊，亦让在场的外国使节和记者们大吃一惊。随着《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相比较而言，苏联更加把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到了欧洲，而将远东的防务置于更次要的地位，其积极援华抗日政策也被对日妥协政策所取代。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南进的北顾之忧。

英美确立“先欧后亚”战略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在军事战略上进一步明确了避免同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和坚持首先重点对付德国的战备原则。大约与此同时，英美也在考虑欧、亚两线作战以及远东在其全球军事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大约从1940年8月开始，两国围绕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这次磋商是以万一美国参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那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英国也没有对日本宣战，但德、意、日三国是英美的现实或潜在敌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万一美国参战，英国也对日宣战，英美两国的战略重点应放在哪电？这是两国进行军事磋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早已解决。在30年代，英国防务部门多次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英国潜在敌人的优先顺序为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指出意大利的重要性在加强。也就是说英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应放在欧洲。事实上已经是这样执行的。因此两国军事磋商更主要地是解决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重点问题。

1940年11月中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给海军部长诺克斯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把保卫西半球、防止英帝国瓦解、以及为此所要做的一切，作为美国的主要目标。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此持同样立场。实际上，在此之前，罗斯福已多次说过：美国“第一位的忧虑在大西洋”。1940年10月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重申了“欧洲第一”的战略思想。

1941年1月底，在华盛顿开始举行英美参谋人员的秘密会谈。英国代表团穿着普通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英国购买委员会的技术顾问”。马歇尔和斯塔克在会谈开始时强调，要严守会议秘密，任何走漏风声，都会危及《租借法案》在国会的通过。3月27日，两国参谋人员制定了一份被称为“ABC—1号”的联合战略计划。该计划规定，如果美国被迫参战，该计划将付诸实施，一旦战火蔓延到美洲和太平洋，英美同时跟德国和日本两国交战，大西洋和欧洲应被认为是决定性战场，必须集中力量首先击败德国，同时在德国失败之前，对日本进行牵制性消耗战，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后来，人们把战时英美两国实施的这种全球军事战略简称为“先欧后亚”战略。

苏联的军事战略与此有所不同，它坚持的是避免同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原则，而英美的“先欧后亚”战略是以它们同时卷入欧亚两线作战为前提的。两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即都把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欧洲，都坚持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的战略原则。所不同的是，苏联坚持避免同时卷入对日作战，而英美是把对日作战置于次要地位。就其都把欧洲放在它们军事战略中的优先地位，而把亚洲（实质上是东亚或远东）放在次要地位而言，苏联与英美的军事战略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都是“先欧后亚”战略。

“先欧后亚”战略原则的确立，对英美、尤其是美国的援华抗战活动有较大影响。《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罗斯福意识到，这意味着日本稳定了它的北部侧翼，因而南进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之下，德国在大西洋上造成的威胁更严重一些。就在当时，以史汀生、诺克斯等为代表的部分内阁成员要求把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只调往大西洋。起初，罗斯福很犹豫，担心这样一来太平洋防务更空虚，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但到1941年5月份，他还是不得不下令调走1/4的太平洋舰队。这便是执行“先欧后亚”战略的结果。

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蒋介石很紧张，外界有消息说，苏联将会削弱对华援助。罗斯福一方面决定把部分太平洋舰队调往大西洋，另一方面决定加强对华援助，以弥补苏联减少对华援助留下的空缺，防止蒋介石投降日本，让中国坚持抗日，以牵制日军南进。他为陈纳德上校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开绿灯。这支部队于1941年秋开始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对日作战，他们驾驶的飞机机首漆成鲨鱼头，两排白牙毕露，战果累累。中国报纸描述它有如飞虎一般。于是便得了个“飞虎队”的雅号（大约与此同时，“七·七事变”后援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开始撤回苏联，苏美两国空军援华人员的一退一进，是它们两国援华抗日政策向不同方向转变的标志之一，即苏联由积极援华抗日向消极援华抗日方向转变，美国则开始取代苏联成为积极援华抗日的主要西方大国）。此外，罗斯福以稳定中国财政为理由，坚持给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整笔贷款（而非分期付款）。他还亲自向宋子文保证，决心按《租借法案》的规定向中国提供物资。他公开承认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4月23日，他批准陆军部颁发价值4500万美元的武器启运证。5月6日又批准向中国提供300辆载重汽车，同时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不过，罗斯福的援华抗日政策也有一定限度。这个界线就是以不破坏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原则为前提。换言之，援华抗日只能在“先欧后亚”的框架内进行。当援华抗日与“先欧”战略发生矛盾时，援华就得为“先欧”让路。1941年5月，罗斯福准许白宫助理柯里积极同英美军方领导人商谈向中国提供飞机及其他物资问题。他叮嘱柯里，不要擅自对蒋介石的要求作出承诺，“这些要求只有经过研究我们的军事问题以及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最后决定。”

丘吉尔与罗斯福一样，在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原则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和坚定的。当时英国内部，对于把第一重点用于对付德国保卫英国本土，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于中东的埃及和远东的新加坡谁重要谁次要却有分歧。1941年5月6日，英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在一份文件中认为，就英国全球军事战略而言，“关系重大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所以联合王国的防御必须列为第一位。在先后次序上，埃及也不能列为第二位，因为作为最后的依靠，新加坡的安全应在埃及的安全之先，这已经是我们战略上一条公认的原财。”

丘吉尔对迪尔的观点很不以为然。5月13日，他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我揣测，你宁愿丧失埃及与尼罗河流域，……而不愿丧失新加坡。我却不以为然，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丧失新加坡。”关于埃及与新加坡谁更重要的问题，他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问题，正如要让你选择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将被杀死一样。就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生于马来亚的不测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抵得上丧失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1/5。”

正因为如此，1941年，英国全球战略的优先次序是：第一，保卫英国。

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作战。第三，在6月以后援助苏联。最后是抵抗日本在远东的进攻，不过，丘吉尔又表示，如果日本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可以牺牲在中东的利益去优先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见在丘吉尔的全球战略棋盘上，远东战略的地位是最次要的；而英国远东军事战略的核心是保卫新加坡，援华抗战只是为了牵制日军南进，只是其远东战略的一部分。丘吉尔的这种全球战略优先次序，以及英国有限的经济军事实力，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援华抗日方面起重大作用。实际上，他早已把在远东制止日本扩张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谁带头遏制日本？

大约以1941年3月起，美日之间为调整美日关系，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谈判。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决策层内部，再次发生了北进与南进之争。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北进，与德国一起夹击苏联。以日军总参谋长杉山元为代表的军方认为，苏联是不会轻易被击败的，目前日军大部分陷在中国战场无力北进。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继续向南方扩张”。于是，1941年7月下旬，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强占了西贡和金兰湾，从而迈出了南进的重要一步。

此时，罗斯福在采取对策时，始终是以“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原则出发的。7月1日，他说：“我们设法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对于控制大西洋是极为重要的。我简直没有足够的海军可以调遣——太平洋上每发生一件小事就意味着大西洋上少了一些军舰。”从这一战略目的出发，他认为，美国对日本采取的决策应该是，“放松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绞索再不时猛拽一下可能更好一些”，因而“不愿把绞索紧收”。7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此时，罗斯福还不想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可是8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事实上造成了对日本禁运石油的结果。而罗斯福于8月3日启程去参加大西洋会议，直到9月上旬才知道这一结果。他也无意再改变这一局面。

丘吉尔政府既担心采取强硬政策引起日军报复，又担心日本得寸进尺继续南进。7月26日，英国也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废除1911年缔结的《英日通商条约》，1934年签订的《印日通商条约》和1937年签订的《緬日通商条约》。

在8月的大西洋会议上，如何对付日本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前，丘吉尔始终认为，如果德国不进攻英国本土，日本在远东不会贸然对英国宣战。随着日军进入印支南部，他才感到日本南进的现实威胁。他对罗斯福说，只有英、美、荷兰等国向日本提出明确的警告，才能阻止日本南进。他草拟了三国政府分别向日本提出的警告的内容，大意是：日本的进一步南进将迫使三国反击，并可能导致它们与日本爆发战争；如果日本对三国中任何一国进行报复，另外两个国家将向第三国提供援助。丘吉尔认为，三国分别发表这种性质的声明，肯定能遏制住日本。

罗斯福同意英、美、荷三国向日本提出平行警告，但认为丘吉尔草拟的内容太强硬了一些，而主张把调子放低一些，并附上一个与日本谈判的建议。

他对丘吉尔说，他强烈地感到“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爆发同日本的战争”，另外，他认为对日本的警告不应仅仅局限于遏制日本向西南太平洋扩张，也应遏制日本在西北太平洋扩张，即阻止日本进攻苏联。

丘吉尔对罗斯福同意向日本发出警告感到高兴。8月15日他致电澳大利亚总理说：“总统答应我，用双方同意的措词向日本提出警告，……斯大林也许也要参加，荷兰当局也不会置身局外。如果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战线能够成立的话，我深信，日本将会老实一段时间。但要紧的是使用最坚决的措词和保持最坚强的联可是，罗斯福回到国内后发现，赫尔等人反对向日本提出严重警告，他便把商定好的警告内容修改一番，语气大为缓和。8月17日，他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照本宣科地把修改过的警告念了一遍，随后表示，他对改善日美关系很感兴趣，美国宁愿做日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罗斯福降低对日本警告的调子后，丘吉尔于8月24日发表广播讲话，也降低了对日本警告的调子。

可是，丘吉尔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让罗斯福出来带头遏制日本扩张的努力。他在广播讲话结束时表示，如果美国与日本寻求和平的努力失败，“英国将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一边”。8月29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重申了这一立场。9月21日，他托比弗比布鲁克带给斯大林的信中谈到，英国同情中国抗日战争，他认为英美苏三国“应当竭力继续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不致引起日本宣战”。他表示相信，占“世界人口2/3的英帝国、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并肩前进”（这似乎是三巨头中第一次并列提到四大国），就会取得胜利。10月20日，他又托访问美国的艾德礼带信给罗斯福：“我仍然认为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行动愈是有力，则维持和平的希望就愈大。”他再次表示，一旦美日交战，“英国将接着在1小时内对日本宣战。”丘吉尔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只要您罗斯福带头，我丘吉尔一定紧紧跟随：

苏联不愿同日本打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向中国表示，它的援华抗日政策不变。实际上，它不可能再坚持这一政策了。在日本侵华这一局势面前，欧美大国在远东是不可能做到对日妥协与援华抗日二者兼顾的。既然要与日本谋求妥协，必然会以牺牲对华援助为代价。对英美是如此，对苏联也是如此。1941年6月11日，日苏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并就德日贸易取道西伯利亚问题达成了协议。6月14日，苏联及外蒙古与伪满洲国就诺门坎地区划界问题谈判达成了协议，10月15日签订了议定书。苏联事实上停止了对华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虽有人主张北进，但最终还是南进主张占上风。不过，斯大林的确非常担心日本乘机在东线动手，直到通过苏联派往日本的最出色的谍报员佐尔格了解到日本决定南进后，苏联才从远东调了一部分军队到西线参加对德作战。

7月底8月初，霍普金斯访问苏联时，莫洛托夫对他说，一旦苏德战争出现对日本有利的形势，日本会进攻苏联。因此，苏联认为，制止日本扩张的唯一办法是由罗斯福总统向日本提出警告。他暗示说，警告应包括如下内容：一旦苏联遭到日本进攻，美国就要援助苏联。可见，苏联此时同英国一样，也希望由美国出面带头遏制日本扩张。

他们还谈到苏德战争对苏联援华的影响。莫洛托夫说，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援华工作。他希望美国能增加援华物资，以弥补苏联减少对华援助留下的空缺。

9月4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回信中，谈到了苏联的对日政策。他说：“苏联同英国一样，不愿同日本打仗。苏联认为不可以违反协定，包括与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在内。但是，如果日本违反这个协定而进攻苏联，它将受到苏联军队给予的应有的回击。”

美日谈判破裂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同时兼任陆相和内务相，东乡茂德任外相。日本加紧对外扩张的新动向越来越引起了各国的不安。苏联担心日本会进攻海参崴，请求英美向日本施加压力。泰国对日军在印度支那的集结感到惊恐，向英美发出了求救信号。10月20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日本的威胁“在过去几天似乎变得格外厉害了”。11月初，因日军大量地集结于印度支那，蒋介石担心日军进攻昆明，切断滇缅公路，为此向英美紧急求援，要求它仍向日本发出警告，同时敦促它们用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空军支援中国。丘吉尔乘机于11月5日再次致信罗斯福说，如果中国抗战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他赞成向日本提出警告，但又说，英国单独行动无济于事，英国愿意同美国站在一起，“不论你们选定何种方针。”

11月5日，美国政府召开会议，讨论了远东问题。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反对向日本提出警告，理由是：如果用更多的精力对付日本，“将大大削弱我们共同在大西洋反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的力量。”罗斯福同意这种观点。11月7日，他给丘吉尔回信说，他怀疑日本是否会马上进攻昆明。不过，他准备增加对华援助，加强在华的美国空军志愿队。他认为，此时对日本提出严重警告不会有好结果。

丘吉尔很能理解罗斯福的苦衷。他在11月9日致南非史末资将军的信中说，此时要求罗斯福参战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他在宪法上的困难。……只有国会才能宣战。”“美国舆论最近已有了进步，但是就国会来说，那完全是一个清点票数的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具有耐心，……”话虽这么说，丘吉尔自己心里仍然希望美国同日本尽早打起来。第二天，他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再次表示：如果美日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将在1小时内接着宣战。”此时此刻，丘吉尔唯恐美日打不起来。在他看来，只要美国正式参战，一切都好办。

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如果到11月25日，日美会谈还不能达成协定，日本就对美国 and 英国宣战。同一天，东乡外相通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同美国达成和解协定的谈判必须在本月25日前完成。他为野村准备了日本的最后建议，分甲、乙两个方案。

11月7日，野村会见美国国务卿赫尔，把甲方案交给了他。3天后又会见罗斯福，希望他对日本的建议尽快作出答复。罗斯福注意到，日本既无意从中国撤军，也不想退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因此，他拒绝对日本的建议作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说，谈判需要有耐心。

11月11日,日本东乡外相再次提醒野村,11月25日是谈判的最后期限,必须再作努力,让美国尽快作出答复。与此同时,日本又派职业外交官来栖三郎来美国协助野村进行谈判。11月16日,东乡再次致电野村:“谈判解决的截止时间已经确定了……请你务必了解这一点……”

11月17日,野村带着来栖三郎去见赫尔。来栖曾代表日本同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他给赫尔留下的第一印象就不太好。赫尔后来回忆说:“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欺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赫尔又带着他们去见罗斯福,仍然是话不投机。

11月20日,野村和来栖又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乙方案。11月22日,东乡告诉野村,美日谈判截止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1月29日。如果到那时还不能达成协定,“一切就会自然发生。”

罗斯福和赫尔研究了日本的乙方案后认为,“同意这些建议就意味着美国宽恕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同意日本今后的征服路线,放弃我们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则,背弃中国和苏联……”他指示赫尔提出美国的反建议——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定草案”,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日和谈不表示反对,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国”或任何南部地区增派军队,日军撤离印度支那南部,在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不得超过2.5万人。罗斯福于11月24日致电丘吉尔说:“在我看来,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项公平合理的建议,然而同意还是拒绝,实际上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我不抱很大希望,我们大家都必须有真正会出乱子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很快就会出乱子。”第二天,罗斯福又对军政官员们指出:日本可能会发动突然袭击,“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策略使他们打第一枪。而对我们又不会招来太大的危险。”

中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反对美国的“临时协定草案。”蒋介石指出:“现在同日本签订的任何‘临时协定’,将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信任,情形同封锁滇缅公路一样——此事已经使得英国的威望永远受到损害。”他指示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要坚决反对美国的这种企图,他还指示驻美的私人代表宋子文警告美国,允许日军留在中国必然会使中国抗战瓦解。丘吉尔也不赞成美国同日本达成临时协定。不过,11月26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话说得比较圆滑:“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担忧的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们的行动。”

11月26日上午,罗斯福又得知,日军5个师正准备开赴印度支那。他大为震怒,认为“这正是日本方面背信弃义的证据”。他认为,美国即使提出“临时协定草案”,也必然会遭到日本拒绝。鉴于多方面的因素,他决定放弃这个方案。

11月26日,赫尔会见野村和来栖,向他们提交了美国新拟定的备忘录,提出了美国的10点建议,其中包括:日本应从印度支那撤出其全部军队;美国和日本除了支持中国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其他任何政权;美日应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野村和来栖完全没有料到美国会提出如此强硬的建议。他们要求紧急会见罗斯福。11月27日,罗斯福接见了他们。他指出,“自4月会谈以来,美国始终以耐心谋求维持太平洋和平,日本当

局却表现得与和平背道而驰，……干扰了整个日美会谈。日美双方根本要求不一致，临时性协议将无济于事。”他和赫尔都认为，日本不会接受美国的10点建议。

果然，11月28日，日本外相东乡通知野村，日本不能接受美国的建议，“我将在两三天内发给你们关于帝国政府意见的正式记录——该记录表明，谈判事实上将破裂。”

罗斯福用过“苦肉计”吗？

其实，日本派往偷袭美国珍珠港的联合舰队，已于11月25日稍稍地启航了。12月1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12月8日为发动战争的日期。

美国海军的密码专家早已破译了日本国内与它驻美大使及其他机构来往的电报密码。这项截获和破译日本电报的活动被称之为“魔术”。日本外相东乡与野村大使的来往电报，关于谈判的最后期限，日本政府乙方案的内容等等，都被“魔术”截获并破译出来，对罗斯福及其政府掌握日本的动向有很大帮助。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把联合舰队已经启航的情况告诉驻美大使，因而美国人也无从截获这一情报，一直被蒙在鼓里。

11月28日，“魔术”又破译了东京发给日本驻美总领事喜多的密电：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和国际通讯联络被切断，东京将在每天的日语短波新闻广播中发出暗号：（1）如果日美关系处于紧急状态，暗号为：东风，有雨。（2）日苏关系：北风，多云。（3）日英关系：西风，晴。听到这个暗号后，请销毁所有密码文件。

此时，美日关系可谓战云密布。可是，谈判仍在继续，日本的使节们继续每天来到国务院，照样鞠躬致敬，目的是麻痹美国，以便使突然袭击准备得更完善一些。赫尔也耐着性子与他们周旋，目的是得到日本行动方案的线索。

11月30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又出了一个新点子：“我认为，有一项避免日本和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重要办法，始终没有使用过，那就是发表一份坦率的声明，不论是秘密的或是公开的都行，说明日本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会立即引起最严重的后果。”

罗斯福仍然在犹豫观望。他确信日本人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不能肯定日本人会在哪个方向能动手。是进攻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还是美属菲律宾、还是关岛或夏威夷？他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如果日军进攻英、荷在东南亚的属地，美国要不要参战？他是否应公开地或秘密地向日本发出警告？是否应把问题提交国会讨论？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得出结论：最好一直等到事态本身突然显示危险并引起反应时再决定。然后，他动身前往温泉，临行前对记者们说，日本的局势随时可能把他叫回来。

那几天，罗斯福内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无从查起。11月28日，他决定发一封私人信函给日本天皇，这将既是表达和平愿望的友好表示，也是一种警告。可随后，他又接受赫尔的建议，暂时推迟发出这封信函。

12月1日—4日，美日双方都没有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12月5日，在“魔术”破译的许多电报中，有一份12月5日发自东京的电报，命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的大多数人员，在两三天内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另一份是野村通知东京的电报：“我们已完成销毁密码的工作……”

12月16日，罗斯福又得知，一支大约有35艘运输舰、8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舰队，正从印度支那驶过暹罗湾，它既可能攻打泰国，又可能是攻打马来亚。于是，罗斯福当天决定给日本天皇发出信函。他在信函中说，唯有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才能谋求南太平洋的和平和驱散“乌云”，希望“恢复我们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并防止这个世界遭到进一步的屠杀和破坏”。这封信是用明码电报发出的，日本时间12月7日中午到达东京电报局。可是，日本军事当局为了确保局势按发动战争的既定方向发展，早已命令保密检查机关把所有电报扣压10个小时。因此，这封函电直到晚上10时30分才送到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格鲁大使于午夜零时15分把电报的抄本文给日本外相东乡，并求见天皇。东乡于12月8日凌晨3时（东京时间）把电报转呈日本天皇。此时，离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进攻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退一步说，即使东京电报局不扣压10小时，这份函电也很难刹住早已启动的战争车轮。

华盛顿时间12月6日（星期六）下午，“魔术”又截获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给驻美使馆的一份电报，它指示大使馆注意接收发自国内的重要电报——它是日本答复美国11月26日10点建议的照会，共14部分。

在日本大使馆作好接收重要电报准备的同时，美国“魔术”译电员们也作好了截获的准备。这份重要电报是用英文发出的，“魔术”又截获到了，晚上8时30分便译好，打印完毕。可是，日本人也很有狡猾，发完照会的13部分后，停止发最后的第14部分。东京通知大使馆说，第14部分的电文，以及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照会的确切时间，等候东京第2天清晨的消息。

当晚9时刚过，罗斯福已经看到了“魔术”破译的日本照会的13部分，虽然还缺最后的第14部分，罗斯福已不难作出判断。他对霍普金斯说：“这意味着战争。”

“战争无疑将在有利于日本人的情况下爆发，而我们不能先发制人来预防任何方式的突然袭击，真是太糟糕了。”霍普金斯为美国政府受国会牵制而不能主动对日宣战遗憾不已。

“不，我们不能那么干。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罗斯福回答说。实际上，他早已打定注意让日本人放第一枪，只有让美国先挨打，激起美国人民的愤怒，他才能顺利地把美国推向战争（这与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前夕的心态完全不同）。

当晚，罗斯福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打电话。可是，斯塔克到国家剧场看戏去了。罗斯福没有派人进一步到剧场去找他，而是决定第二天早上再说。当时，他还想到了找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可是霍普金斯告诉他，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在下班之后同总统保持联系。既然如此，而且又正值周末，罗斯福决定不找马歇尔了。他并不感到紧张，而是相信军方的头头脑脑们比他本人更了解局势，知道会怎么做的。再说日本照会的最后一部分还没有发出，等明天早上再议也不迟。此外，他虽然断定日本将发动战争，但并不确切知道日本会在哪个方向动手，在他看来，日军在东南亚（包括菲律宾）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更大。

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时间）清晨，“魔术”又破译了日本照会的第14部分。过了一会儿又破译了日本政府给野村大使的指示：于12月7日下午1时（华盛顿时间）将照会全文递交给美国国务卿，然后毁掉最后一台发报机。显然，这意味着日本将对美国宣战。

上午8时，美国海军部值班室。克雷默少校看到了上述电文，他又看了看时差表，发现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正是夏威夷时间早晨7时。他曾在珍珠港呆过，知道那时正是夏威夷的守军星期天吃早餐的时间。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直奔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办公室。

斯塔克花了好一会时间，才把日本照会14部分看完，又看了东京指示下午1点钟递交照会的电报。他本想给珍珠港的海军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挂个电话，可转念一想，自己11月27日已向珍珠港发出了“战争警报”，足以使他们保持警惕，再挂电话显得有些多余。另外，他觉得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先给罗斯福总统挂电话，可是总统的电话正占线。

大约同时，美国陆军部值班室。布拉顿上校读完了日本照会全文后有些茫然。过了一会，通讯员送来了有关日本大使将于下午2时递交照会的电报，他读后联想到下午1时正是夏威夷早晨7时，菲律宾黎明前夕，这正是宣战的好时机。他不禁大吃一惊，立即给马歇尔将军家里挂电话。

马歇尔将军有每星期日早晨骑马锻炼的习惯，当布拉顿的电话挂到他家里时，马歇尔正骑着他心爱的栗色马，沿着波托马克河畔慢跑。回到家里后得知陆军部来过电话，催他尽快赶到部里。他打电话问布拉顿，到底出了什么事？布拉顿已经急得快发疯了，可又不便在电话里谈“魔术”译电的事（当时，“魔术”活动极为机密，以免泄露出去，日本人更换电报密码），只是催马歇尔将军火速赶往办公室。

马歇尔不知事情的真相，便不慌不忙地洗了澡，更了衣，然后才干上午10时30分（另一说法是11时零几分）来到办公室。此时，布拉顿已急得浑身发抖。他把“魔术”破译的日本照会和递交照会的时间电报交给马歇尔。马歇尔没有先看递交照会时间的电报，而是先看照会。当他看到：“下午1时”递交照会时，才为之一振。他立即给太平洋地区所有陆军指挥部起草电报：“日本人将于今日东部标准时间下午1时递交可视为最后通牒的照会，并立即毁掉电报机。此一特定时间究竟含义如何尚待确定，但请务必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电报拟完后，马歇尔又想到是否要顺便通知太平洋各地海军的问题。他深知陆军与海军一向有很深的矛盾，可事关国家的安全，他还是给斯塔克挂了一个电话，颇费了一番功夫，才使斯塔克同意在电报后面加上这样一句：“通知海军。”斯塔克建议采用海军通讯系统发出这封电报，既快又可靠。马歇尔谢绝说，陆军通讯系统的效率也很高。此时离递交照会的时间还不到2小时。

布拉顿立即把电报稿送到陆军部电讯室。发报员看不清马歇尔的笔迹，花了好一会功夫才辨认清楚。可是，由于天气原因，华盛顿与夏威夷之间的陆军通讯系统并不畅通，发报员收不到夏威夷的信号。鉴于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他也不想把电报交给海军部发出，而宁愿通过普通商业电讯系统发出。结果，当夏威夷的邮电员还在把这封电报送往夏威夷陆军司令部的路上时，日军已经开始袭击珍珠港（日军偷袭珍珠港后7个多小时，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才收到这封电报。夏威夷海军司令金梅尔收到肖特转来的这封电报时，极为愤怒，他眼望着被击毁的美国军舰残骸，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珍珠港遭到空袭

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时间），罗斯福确信日本会对美国宣战。不过，他既不象法国败降后的丘吉尔那样紧张，更不象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的斯大林那样恐慌。当天中午12时30分，他接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谈起了他给日本天皇的信函。他说：“这是我争取和平的最后的努力。我担心这会失败”，如果到12月8日晚上还没有收到日本的答复，就把信函的内容公之于众。他还说，“那些家伙”（指日本大使野村及来栖）要求紧急会见赫尔，可能是要对美国11月26日的10点建议作出答复。他预料这样匆忙答复会是“欺骗行为”。他说他有一种预感，在48小时内，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也很可能在菲律宾，也许会发生某种严重事件。

12月7日早晨，日本大使馆收到了外务省发来的照会的第14部分和要求野村下午1时递交照会的指示。上午10时半之后，大使馆打电话给赫尔的办公室，要求赫尔在下午1时会见野村。赫尔已经得知“魔术”破译日本照会的情况，心中早已有数，同意会见野村。

东京给驻美大使馆的照会和电报是用密码拍发的，而且注明是“要件”，按规定应由专人翻译和打字，一般人员不得经手。由于这个原因，照会未能及时地翻译和打印好。野村只好请求赫尔把会见的时间推迟到下午1时45分。即使如此，打印的照会仍有不少错别字，可日本大使馆已经没有时间再修改了。

当天下午1时47分，罗斯福正在白宫与霍普金斯共进午餐，海军部长诺克斯打来电话：“珍珠港遭到空袭，这并非演习。”

“一定有什么弄错了。”霍普金斯脱口而出。他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进攻夏威夷。

罗斯福却毫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他说：“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情正是日本人惯于做的。”

下午2时零5分，罗斯福打电话给赫尔，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告诉他。赫尔说，野村和来栖刚刚赶到，正在接待室里等着接见。罗斯福指示说，可以接见他们，但不要提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事，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

过了一会，赫尔接见了野村和来栖，他对日本人利用谈判掩护偷袭的行为极为愤怒，拒绝与野村和来栖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座。两位日本使者显得很尴尬。野村把日本政府的照会递交给赫尔，并说：“我奉命应在下午1时向你递交这个答复。”他为自己迟到了1小时抱歉。

“为什么要下午1时交给我？”赫尔板着脸孔问。

野村说，他不知道，东京是这样指示的。野村和来栖显然还不知道日军已经开始偷袭珍珠港。

赫尔早已看了“魔术”破译的日本照会，可他装出事先根本不知道的样子，把野村递交的照会看了一会儿，然后对野村和来栖说：“在我担任公职的整个50年中，从未见过这样一种文件，满纸无耻谰言，颠倒黑白……恶劣透顶，我从未想到，在这个地球上竟然会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讲出这种话来。”说完后把手一扬，示意两位日本使节出去，只差没有说出一个“滚”字。

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终于烧到了美国的头上。

第十五章 伟大联盟

罗斯福：“苏联将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名次在某些实际上没有作出多大贡献的国家之后。”

霍普金斯：“把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

丘吉尔：“英美之间的完全谅解比一切别的事都重要。”

美英对日宣战

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共炸沉炸伤美国海军的战列舰 8 艘、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2 艘、各类辅助舰 5 艘、击毁击伤美军飞机 347 架。打死打伤美军官兵 4500 余人。幸好美军太平洋舰队的 3 艘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内而免遭攻击。日军仅仅损失了 29 架飞机和 5 艘特种潜艇。

与此同时，日军对英、美、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太平洋岛屿发动了一系列的突然袭击。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12 月 25 日，香港的英国守军被迫投降。12 月 8 日，日军同时开始进攻菲律宾，另一支日军在泰国南部登陆。12 月 10 日，一支日军开始进攻关岛，另一支日军进攻中太平洋的威克岛。同一天，日军击沉了英国东方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12 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另一支日军开始入侵缅甸。由于日军的进攻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且大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而英、美、荷等国对日本的军事冒险性估计不足，长期的对日妥协政策及先欧后亚战略又使它们在远东的战备不足，因此，日军最初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进攻几乎都取得了胜利。

然而，日军这一连串的突然袭击和胜利，却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英国时，正是伦敦时间 12 月 7 日晚上，丘吉尔与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负责租借援助的哈里曼正在契克斯乡间别墅度周末。大约半年之前，也是在这个别墅里，也是在度周末时，也有怀南特在一起，丘吉尔第一次获悉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兴奋不已。现在，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的消息，再一次让他以及其他国领导人激动不已。对于经历过一年多艰难的孤军作战的英国人民和丘吉尔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德国把苏联拖进战争、日本把美国拖进战争更让他们高兴的。艾登回忆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丘吉尔给他打电话时，“他自然激动极了。我也难以掩饰我心中感到安慰，……以前我们对结局是有信心的，但从来看不清过程如何，现在两者都清楚了。”

长期以来，丘吉尔一直非常关注美日关系的演变，一直敦促罗斯福在远东带头制止日本的扩张，一直希望把美国拖进战争中来。他多次说过，他宁愿不要美国的物资援助，只要美国参战就行（实际上，他二者都想要），而且多次表示，一旦美国同日本打起来，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对本国宣战。前一段时间，当美国想与日本签订“临时协定”想对日本让步时，丘吉尔很着急。现在，日本同美国打起来了，他无比地高兴。那天晚上，他又睡了一个好觉。

丘吉尔没有忘记他的诺言——美日交战后，英国将在 1 小时之内对日本

宣战。当美国还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时，他还有些不放心，生怕罗斯福不对日本宣战。他迫不急待地打电报问罗斯福总统，是否希望等美国采取行动之后，英国再对日宣战。

罗斯福完全明白丘吉尔的良苦用心，他已打定主意对日本宣战，既然挨打的是美国，他当然不希望丘吉尔抢在他的前面对日本宣战。他回电说：“我想最好照顾到这里的心理状态，等我发表演说之后英国再宣战。”

几个月来，罗斯福一直为远东国际局势焦虑不安。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动手？美国要不要派军队去保卫英国的海军基地新加坡？……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在国会有相当影响，以致他不敢首先对法西斯国家“放第一枪”。现在，美国先挨打了，虽然太平洋舰队的损失让他感到吃惊，可他反倒表现出那段时间中少有的宁静和沉着，在12月7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他显露出了“一种既紧张又镇静的脸部表情”。

12月8日，罗斯福再一次穿上了他当年任助理海军部长时的着装——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来到国会大厦。他特地邀请了罗斯福夫人和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出席这次国会会议。这一切显然是要唤起人们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他走上讲台，1933年初任总统时的那种危机局面仿佛又重演了。他镇定自若地对国会议员们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奇耻大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战争状态已经存在。”他简洁明了地列举了过去24小时内的突发事件，然后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国会立即进行表决，只有1票反对（是众议员珍妮特·兰金投的），便通过了对日宣战的决议。

在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努力后，罗斯福终于带领美国真正走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密切注视形势发展的观察家萨姆纳·韦尔斯说，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急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这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罗斯福本人后来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说过：“要不是日本人进攻，要使美国人民卷入战争是有很大困难的。”

紧接着，英国也对日本宣战。宣战书是丘吉尔亲自动笔写的；有人认为这未免有些过于拘泥于形式，丘吉尔却认为，“当你不得不去杀一个人的时候，客气一点，毕竟不会花费什么。”

最初，罗斯福只是对日本宣战，而没有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因为他感到很难对美国人民解释清楚：在远东挨了日本人的打，为什么要去欧洲同德国和意大利打仗。可是，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出发，他又觉得，美国不仅要与德国打，而且要把德国作为主要敌人来打。也就是说，即使挨了日本人的打，也应坚持先欧后亚战略。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希特勒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首先对美国宣战，美国自然也就与它们处于战争状态随着英美对日本宣战和德意对美国宣战，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巴拿马等20多个国家也对日本宣战，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德国的仆从国也对美国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打了4年多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随后又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具有世界性了。

坚持“先欧后亚”

美国在珍珠港挨打后，丘吉尔想起了 30 多年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对他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象是“一个巨大的锅炉，一旦点着了火，就会迸发出无限的能量。”现在，火已经点着了，美国的能量是将慢慢地迸发出来。自临危受命以来，美国参战是丘吉尔最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

欣喜之余，丘吉尔也下无忧虑：美国人会不会因为挨了日本人的打，而把全部或主要力量投入到太平洋方向？12 月 8 日，他一觉醒来，便决定马上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决不能让美国因为在太平洋上挨了打，就改变“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原则。

当时，英国军队的一位参谋长对此举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他说，当美国参战尚属可疑的时候，就放弃同狡猾的美国人打交道的谨慎方式，这是否明智？丘吉尔回答说：“哦！那是我们向她（指美国）求爱时我们同她谈话的方式。现在她已在闺房之中，我们同她讲话就完全不同了。”

罗斯福表示，欢迎丘吉尔来访。

赴美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皇家海军两艘先进的主力舰——“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破日军击沉，840 名官兵丧生，其中有丘吉尔的老同事东方舰队司令汤姆·菲力普斯海军上将，他非常悲伤。几十月之前，正是“威尔士亲王号”载着他去纽芬兰同罗斯福会晤的。他回忆说：“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十足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坎。”

这一插曲没有影响他的赴美计划。在他看来，“英美之间的完全谅解比一切别的事都重要。”12 月 14 日，他启程赴美，先乘“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大西洋，然后改乘飞机，于 12 月 22 日飞抵华盛顿。罗斯福在机场迎接他。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罗斯福安排丘吉尔住在白宫。这样一来，他们见面十分方便，几乎每天共进午餐，也经常共进晚餐。罗斯福经常亲自调配鸡尾酒，而丘吉尔则经常亲自为罗斯福推轮椅车，以示尊敬。有时，谁想找对方，可以不拘礼节地去对方房间里访谈。在与代大国首脑之间，象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关系密切融洽的例子，并不多见。

英美两国首脑的密切关系，两国官员及军队战时的密切合作，得益于许多重要因素，其中两国文化和制度相近。尤其是语言相通，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位历史学家对此作过精辟论述：“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么，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罗斯福与丘吉尔及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统称为“阿卡迪亚”会议（意为世外桃源）。丘吉尔在赴美途中已得知，美国举国上下对日本的偷袭行为义愤填膺，公众舆论愤怒的目标都指向了日本。在丘吉尔看来，这种状况使美国政府有可能违背“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而置英国在欧洲、北非和中东战场于不顾。另外，美国参战后，必然把大量装备用于武装美国军队，即使不把“先欧后亚”变成“亚洲第一”，也有可能变成“美国第一”，大量减少对英国的租借援助（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一度暂停对盟国的租借援助，不久又恢复了）。丘吉尔虽然曾多次

说过，只要美国参战，宁愿不要美国的物资援助。那只不过是争取美国参战的一种说法罢了。就象当初为了争取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他说只要美国提供物资，决不要美国参战一样。实际上，他既要美国参战，也要美国提供物资。英国未来的所有作战计划，都是以美国提供大量军用物资为前提的。

为了说服美国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并继续大量援助英国，丘吉尔事先想好了一大堆理由，却没有派上用场。在12月2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一开始就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美国政府将坚持如下观点——首先打击德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在双方参谋长们会谈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提出，英美盟国的一切作战计划仍然将依据1941年春天两国参谋会谈确立的原则：即“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大西洋和欧洲是决定性的战场。”他们表示说：“2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尽管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看法仍然是：德国还是主要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

罗斯福及美国军方领导人的上述表态，使丘吉尔极感宽慰。第二天，他致电英国战时内阁说：“这次讨论不是有点应否而是如何”实施大西洋第一的战略。

大联盟不能没有苏联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如果说丘吉尔主要考虑的是英美的军事战略及援助问题，那么罗斯福则更重视盟国的政治合作问题。早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英美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初步阐明了两国进行这场战争的原则和目标，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另外，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多次向英国提出了讨论战后欧洲领土边界变动的要求，引起了罗斯福及美国政府的警觉。此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又有20多个国家正式参战，如何加强所有反轴心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在阿卡迪亚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已意识到，为了加强所有反轴心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鼓舞各国军民的士气，防止战后冲突，迫切需要阐明盟国作战的共同目标。国务卿赫尔早已起草了一份宣言。大意是：反法西斯各国将承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保证在战时全面合作、不单独与敌人停战媾和等等。

在12月2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把这份宣言草案交给了丘吉尔。他希望采用拟定《大西洋宪章》的老办法：请丘吉尔在上述草案的基础上搞出一份较正式的草案，罗斯福自己也对赫尔拟定的草案作一些修改，然后把他们两人的意见综合在一起，揉合成一个较正式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英美存在一些分歧：英国战时内阁要求写进“社会安全”，遭到罗斯福拒绝，因为他担心这会引来美国国内保守派攻击他在全世界推行新政；罗斯福再三要求让印度在宣言上签字，丘吉尔和英国战时内阁却很不情愿；丘吉尔很想让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宣言上签字，遭到罗斯福和赫尔的反对。这些分歧基本上以英国的妥协让步获得解决。

对罗斯福来说，他在军事战略问题上满足了丘吉尔的愿望后，在政治合作问题上获得丘吉尔的让步自然是比较容易的。可在有关问题上，要获得斯大林的让步就不那么容易，如果这份宣言没有苏联参加签字，其意义就要大

打折扣。

苏联参加签字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它没有对日宣战，不想得罪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0多个国家跟着美国对日宣战，那么苏联是否也应
对日宣战？斯大林有些左右为难。若对日宣战，苏联将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
战，这正是希特勒求之不得的。也是苏联力所不及的。若不对日宣战，会
不会得罪美国和英国，以致它们停止援助苏联？此外，斯大林象丘吉尔一
样，担心美国把主要力量转移到太平洋而置欧洲的对德作战于不顾。

最初，苏联对太平洋战争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对美日两国发表的战报，
苏联报刊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报道，对日军获胜的消息，苏联报刊都不加
评论地予以转载。几天之后，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把美国与欧洲
战争联在了一起。此外各种迹象表明，日军目前仅限于南进，尚无北进迹象。
于是，苏联开始发表一些倾向于英美的言论。12月12日，《真理报》就太
平洋战争发表社论，调子是反对日本的，指出日本最后心败。同时暗示，打
败日本无须苏联援助，实际上为苏联不准备对日宣战造舆论。第二天，苏
联新任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说，苏联为自己成为伟大的美国的盟友而
骄傲和幸福，同时相信，有关苏美英三国各自应把最大精力集中在哪一个战
区的问题，会取得完全的谅解。实际上，他是希望美国对苏联不参加对日作
战能给予谅解。

当时，驻苏联的一些英美记者纷纷撰文指出，苏联不对日宣战，而集中
力量对付德国，是更明智的战略。鉴于打败德国的重要性以及当时苏联承受
的巨大压力，英美两国政府都没有要求苏联对日宣战、两国公众舆论要求苏
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压力也就减小了。于是，苏联在二战中赢得了一种特殊的
地位，在欧洲对德作战中与英美广泛合作、相互支持，获得美国大量的物资
援助；在远东，当中、美、英等国与日本打得头破血流时，苏联却继续与日
本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中美等国的对日作战，牵制了日军兵力，使之无
力北进，显然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这是斯大林战时外交活动中较成
功的一例。

在罗斯福看来，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情有可原，但若不参加盟国关于战
争目标宣言的签字，将使该宣言的意义大大减弱，甚至可能给英美与苏联的
关系留下隐患。12月25日，宣言的初稿拟定出来了。苏联研究后于12月29
日答复，它将不在该宣言上签字，而准备单独发表一项声明。主要原因是，
它没有对日宣战，想避免在意味着承担联合对日义务的宣言上签字，以免得
罪日本。

罗斯福不同意苏联这样做。为了照顾苏联的实际情况，他对宣言初稿作
了许多修改。如原稿中提到“战胜三国盟约的成员国及其附属国的斗争”，
后修改为“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诸如此类的修改，使斯大林得以避免
得罪日本。

苏联参加宣言签字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宣言中涉及宗教自由问题，苏联
有顾虑。当初，英美发表《大西洋宪章》，因为其中没有宗教自由的内容，
引起了美国公众舆论的普遍责难。因此，罗斯福决心把宗教自由的内容写进
宣言中去。李维诺夫表示，这项内容使苏联参加签字很为难。对此，罗斯福
专门邀请他、丘吉尔以及霍普金斯共进午餐，阐明了他的看法，又单独同李
继诺夫谈了一次。他说，按照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法则，宗教片面上的含义非
常广泛，包括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经他一番努力，斯大林最后同

意把“宗教自由”写进宣言中去。

罗斯福的这一番努力给丘吉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如果罗斯福在下次竞选总统时失败，他就向内阁和国王推荐罗斯福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国教的最高领导人）。

经过上述努力，苏联同意在宣言上签字。

《联合国宣言》

截止 1941 年底，向德意日宣战的国家有 20 多个。它们在宣言上签字的顺序也是阿卡迪亚会议期间讨论的问题之一，因为谁先谁后并不仅仅是一个顺序问题，而是关系到各国的地位和荣誉的问题。最初决定的签名顺序是这样的：第一至第六名分别为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其余国家（包括中、苏）均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即除美、英外，把英联邦的 4 个自治领放在重要位置，这个顺序反映出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初都有英美合作共管战后世界的想法。

12 月 27 日，霍普金斯对这一顺序提出了异议。他主张打破按国名的字母顺序编排的次序，“把象中国和苏俄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其余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正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另一类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

罗斯福接受了应把中苏排在前面的建议。他写信给赫尔说：“我有一种感觉，苏联将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名次在某些实际上没有作出多大贡献的国家之后。”最后罗斯福排列的签字顺序是：美、英、苏、中四国分列在一、二、三、四位，其余国家按字母顺序排列。于是，美、英、苏、中“四大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中。罗斯福及赫尔决心由美国“领导”世界，当仁不让地把美国排在第一名。丘吉尔对此没有异议，表明英国正式接受美国取代自己成为世界霸主。把中国与苏联排在前列，是对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认可，表明罗斯福是现实感较强的一位政治家。

有些小国代表对这种排列次序很不满。波兰大使的批评相当尖刻：“今天，我们是以那些有钱有势的叔叔伯伯不得不时时照顾一下的‘穷亲戚’的身份应邀前来签字的。”

宣言的内容和各国签字的顺序都定下来了，可是，宣言的名称却没有想好。罗斯福和丘吉尔想了一大堆名称，诸如“同盟国统一体的联合声明”、“联合的大国声明”、“联盟宣言”、“协约国宣言”等等，感觉都很俗套，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当时的情景，就好象孩子已生出来了，名字还没有取好。

12 月 29 日，丘吉尔启程去加拿大作短暂访问，对宣言文本最后修改润色和取名称的事落在罗斯福身上。他冥思苦想，突然想出了“联合国”这一名称。1942 年 1 月 1 日，丘吉尔已从加拿大返回华盛顿，宣言定于当天发表。罗斯福急于同丘吉尔把宣言的名称定下来，一大早就坐轮椅来到丘吉尔的房间，以征求他对“联合国”这一名称的意见。据说当时正在洗澡的丘吉尔立刻从浴盆里跑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还发出沐浴后的红润亮光，冒着热气。罗斯福显得很尴尬。连忙为自己冒昧地闯进来道歉。丘吉尔却说：“没关系，英国首相相对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不隐瞒的。”后来，丘吉尔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他同总统谈话，如果在浴室，起码也得围上一条浴巾，而不会一

丝毫不挂。当时，这则趣闻广为流传。无论是否属实，它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两国首脑之间的密切关系。

丘吉尔同意给宣言冠以“联合国家”的名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当天，美、英、苏、中等共有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它们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全部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来抵御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盟约成员国及其附庸国。每一政府保证同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保证不同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现正在或将可能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均可参加上述宣言。”

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伟大的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形成了，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附庸国已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丘吉尔的亲善外交

打败法西斯国家，有赖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合作。就丘吉尔来说，他更重视与美国的团结与合作。自大战爆发以来，他一直与罗斯福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他出任首相后，与罗斯福的联系更密切，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自大战爆发后，美国从最初保持中立到走向非中立（向英国提供50艘驱逐舰），再到走向非交战状态（通过《租借法案》），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执行“见了就打”的护航政策），直到最终参战，每前进一步都与丘吉尔的大力鼓动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英国的战争活动也越来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这次是丘吉尔战时第一次访问美国。他除了进一步加强与罗斯福本人之间的友谊外，还非常重视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促进两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抓住一切机会从事亲善外交。他本来就擅长从事这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而他母亲是美国人，他本人可以说是半个美国人，或者说是美国人的外甥，这种血缘关系对他在舅舅所属的国度里开展亲善外交上分有利。

1941年12月24日晚上，罗斯福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点燃圣诞树仪式，丘吉尔应邀出席。罗斯福虽然在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总统任期制度方面喜欢打破旧传统，但在对待圣诞节方面，乃至卧室陈设等传统习俗方面，却非常喜欢旧传统。在美国正式参战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许多美国家庭正准备挥泪送亲人上前线，罗斯福仍然希望美国人能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他下令在圣诞之夜取消灯火管制，并特意请丘吉尔出席白宫草坪上的点燃圣诞树仪式。

仪式开始时，罗斯福打开开关，顿时，一棵高大的圣诞树发出了五彩缤纷的光辉。罗斯福的致词说：无数美国人在问，我们怎样才能点亮今年的圣诞树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除了作好武器和战争物资的准备外，还必须作好心灵上的准备，把我们的心灵武装起来，准备去经受艰难困苦，去迎接我们前面的最终胜利。只要这样，我们就能意味深长地庆祝今年的圣诞节。

丘吉尔应邀发表了讲话。他说，虽然远离祖国，远离家庭，可又并不觉得远离了家乡。“不管是由于母来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共

同事业中所存在的崇高的感情关系，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感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这番话说得十分亲切感人，罗斯福不得不佩服丘吉尔的口才。

12月26日，丘吉尔又应邀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他来说，这是开展英美亲善外交的好机会，他十分重视这次演讲，认真地作了准备。当时，美国国会中，并非所有的议员都对英国持友好态度，也并非所有的议员都赞成美国援助英国。正因为如此，霍普金斯对丘吉尔去国会演讲能否获得成功有些担心。不过，当丘吉尔想到自己的母亲是美国人，外公家的一位祖先当年在华盛顿的率领下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时，他便对这次演讲充满自信，甚至感到比有时去英国下院演讲时还理会有信心一些。

这次演讲时，丘吉尔巧妙地选择了一个能打动听众，密切与听众感情的开头。他以一种深沉的语调和怀念之情，首先谈到他的母亲。他说，此刻，我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能坐在这里！“在我跨越人生岁月的长途中，我一直对她怀有至深的思念。我老是免不了有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相反的话，那我可能早已自己主动到这里来了。”这番话引起国会议员们的哄堂大笑，欢声雷动，使他们在感情上与丘吉尔一下了靠得很近了。霍普金斯听到这里，对他演讲成功已确信无疑了，丘吉尔演讲完毕，国会议员们都起立向他欢呼致敬，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英国副首相艾德礼和战时内阁为此专门致电向丘吉尔表示祝。12月30日，丘吉尔又对加拿大议会发表了演讲，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丘吉尔后来谈起这两次演讲时说：“在永不休止的行政工作进行中，要准备我的两篇越过大西洋去讲述而又传遍全世界的演说词，是一种极其辛苦的费力的工作。对于一位顽强的政界人物来说，讲演并不是一种重大的负担，但是在这样一种带电的大气中（无线电波），要选择什么是要说的话，什么是不要说的话，却令人们心和为难。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来准备。”丘吉尔的演讲稿，都是他自己写的。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对他心悦诚服。

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及两国的参谋长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攻北非的“体育家”作战计划，印度的前途等等。他们之间常常发生意见分歧，有时甚至分歧很大，但并不因此妨碍他们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福与丘吉尔两人之间彼此尊重，互谅互让，都具有胸怀全局的远大战略眼光。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异；两国军政部门之间有矛盾，上交到他们这里，便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阿卡迪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1942年1月3日，丘吉尔致电英国战时内阁说：“我们在这里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极其亲近和随便，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形成对总统最大的敬佩。他的目光之远大，他的决心和他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是称赞不尽的。”

罗斯福在会议结束时对丘吉尔说：“至死都相信我吧！”1942年2月初，他在给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中说：“与你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妙不可言！”

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不断加深的个人友谊，成为战时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重要纽带。

第十六章 第二战场

罗斯福：“我们是否有把握对斯大林先生说，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呢？”

丘吉尔：“我们无法在这方面作任何承诺。”

斯大林：“在欧洲没有反德国的第二战场，是大大便利了德军的地位。”

第二战场问题公开化

1941年11月6日，在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说：“在欧洲没有反德国的第二战场，是大大便利了德军的地位。”

苏德战争爆发后，当英国表示愿意援助苏联时，斯大林强烈希望英国在德国的西线——法国北部开辟打击德军的第二战场，以吸引苏德战场上的部分德军，减轻苏军承受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认为，历史上，德国人在两线作战总是失败，俾斯麦、毛奇和施利芬都害怕两线作战，尽早让希特勒陷入两线作战，是打败他的正确战略。可是，丘吉尔认为，当时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是不现实的，英国目前不具备这种实力。他多次婉转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同时表示可以通过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以及出动空军对德国进行轰炸的方式支援苏联。

美国正式参战之前，苏联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只是对英国提出来的。美国参战后，第二战场问题便成为苏英美三国之间，或行说是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三人之间相互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斯大林的上述讲话，使第二战场问题公开化。美国宣战后，罗斯福希望美军尽早投入作战中去，一可以鼓舞盟国士气，二可以赢得国民对政府的支持。问题是美军首先应投入哪个战场作战？丘吉尔在赴美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途中，也在考虑英美盟军1942年的军事战略问题。他认为，1942年，英美盟军应投入北非战场作战，至于派大批军队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应推迟到1943年。他为进攻北非的作战计划取了一个代号——“体育家”。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丘吉尔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使罗斯福相信，“在西北非洲和大西洋各岛先发制人，打击德国人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斯大林本来寄希望英美在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看来又要泡汤了。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罗斯福于1942年2月12日会见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向他通报了英美的决定，他把北非战场称之为第二战场。他说：“歼灭了那里的德意军队之后，就可以完全控制地中海并拟定在南斯拉夫和欧洲其他地方登陆的计划。”

英美的上述决定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2月23日，他在红军建军24周年的讲话中说：“现在红军和德国法西斯军队正是一对一作战。不但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前线还得到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的军队的直接支持，而红军目前还没有得到这类支持。”他仍然希望英美能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3月16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麦斯基会见丘吉尔，希望英美能把1942年而不是1943年作为对德战争的决定性的一年。狡猾的丘吉尔表示，英国保证加紧向苏联提供军事物资，保证最大限度地对德国进行轰炸，保证对西欧沿海进行骚扰性袭击，以牵制德军。至于开辟第二战场，条件尚不成

熟。他说，德军在法国西海岸构筑了一道“大西洋壁垒”，法国海岸大炮林立、布满了铁丝网、坚固火力点和地雷，难以攻克，“必须关心英美两国的青年，不能让他们的鲜血染红大海，不能让他们的尸体堆满海滩。”

对此，斯大林不同意他的看法。英美两国也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2月初、英国前驻苏大使，现已成为内阁大臣的克里普斯说，苏军抵抗德军，使英国免遭德国入侵，英国应不惜一切代价对苏联给予真正的军事援助。2月25日，一位议员在下院说：“我们早就应当开辟第二战场”。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也赞成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美国著名的政论家李普曼于3月1日撰文呼吁，反希特勒同盟成员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攻西欧，以支持苏军。

可是，丘吉尔的态度很坚决。坚持认为条件不成熟。斯大林无可奈何。既然英美不愿意，苏联一味苦求也没有用。有一阵子，苏联不再向英美提第二战场问题了。

欧亚战局与第二战场

1942年春天，战局的变化以及美苏英三角关系的发展，却促使罗斯福主动地提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首先，日军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的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对英美打击很大。日军继1941年12月先后攻占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之后，1942年1月2日又攻陷马尼拉。阿卡迪亚会议结束后，丘吉尔于1月15日启程回国。会议的成功使他满怀喜悦，等他回到英国时才发现，英国公众舆论的情绪低落，他的政府遭到了人们的攻击。主要原因是，英军在战场上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先是“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被日军击沉，接着是香港失守，接着是英军在北非作战失利。1月27日，英国下院就对丘吉尔政府的信任问题开始议会辩论。丘吉尔说，“我要求进行信任投票就是因为情况糟糕，而且更糟糕的还要到来。”“我在这时候要求给我非常的支持。”经过3天辩论后，投票的结果是，信任票464张，不信任票仅1张，丘吉尔大获全胜。罗斯福为此专门给他发了贺电，并说，他要求国会对日宣战时，“这里也有一个人投票反对我们。”

可是，丘吉尔在议会的胜利并不能阻止英军在战场上的挫折。在北非，隆美尔指挥的德军夺取了班加西。2月12日，3艘被围困在法国布雷斯特德的德国巡洋舰成功地穿越英吉利海峡，从英国海军和空军的眼皮下逃脱，溜回到了德国港口，使英国军队的声望受到很大打击。2月15日，被丘吉尔视为固若金汤的新加坡海军基地被日军攻占，守军8万余人投降。丘吉尔称之为“有史以来英国军事上最大的灾难。”此外，意大利潜水员操纵鱼雷成功地偷袭了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军舰。3月初，日军又攻陷了缅甸的仰光。英军被迫退守印度边境。这一切让丘吉尔非常沮丧。

日军对菲律宾的进攻也取得了很大进展。3月11日，麦克阿瑟在日军凌厉攻势下被迫逃往澳大利亚、至5月7日，驻菲律宾的美军向日军投降。罗斯福也受到了舆论的非难。

新加坡陷落后，丘吉尔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在谈到英国在东南亚遭到一连串失败时说，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珍珠港被炸了，美国的海上盾牌消失了。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在美国人听起来，英国失败的责任仿佛在美国海军身上，因而对丘吉尔的讲话很反感。可是，罗斯福却很

能理解丘吉尔的难处，他说：“温斯顿不得不说点什么呀！”2月19日，他又致电丘吉尔，安慰他说：“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你安下心来，因为我确知你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你知道，找时常想念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认为我干得了，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此时此刻，罗斯福的这些话，对丘吉尔的确是莫大的安慰。由此可见，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已达到了患难与共的程度。

英美盟国在亚太地区遭受挫折后，美国公众强烈要求实行“太平洋第一”的战略，要求把美国的全部力量用于对付日本，为此，可以不惜牺牲英苏两国在欧洲战场的利益。也就是要求变“先欧后亚”为“先亚后欧”。民意测验表明，62%的公众赞成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只有25%的人赞成集中力量打击德国。3月9日，日军攻占荷属东印度后，主张“先亚后欧”、“太平洋第一”的呼声空前高涨。

罗斯福却比较冷静。他又发表了一次“炉边谈话”，要求人们提防轴心国“分而治之”的老计谋，防止它们离间美、英、中、苏等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感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鼓舞英美盟国的士气，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经过精心策划，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派出16架B—25轰炸机，对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轰炸。这是在日本接连取胜，毫无准备，根本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对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击较大。罗斯福和美国公众却深受鼓舞。记者问他这些轰炸机是从何处起飞的？他不无得意而又神秘地说，“这些飞机是从我们在香格里拉的秘密基地上起飞的。”（“香格里拉”原是30年代一部著名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秘密的世外桃源，罗斯福以此搪塞记者、保守军事秘密。实际上，飞机是队650英里之外的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不过，罗斯福也意识到，要使国内的批评者保持沉默，仅靠空袭日本本土是不够的，必须使美国地面部队尽早投入战斗，采取更有效的军事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重新考虑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其次，美苏英三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也促使罗斯福重新考虑第二战场问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一直要求英国正式承认苏联1941年6月的边界现状——即承认“东方战线”为它的正式边界线。这涉及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大片领土，英国一直不愿就此作出承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闻知此事后，非常敏感，担心苏英撇开美国，在欧洲领土问题上做秘密交易，为此，多次向英国提出过警告。英国也一直以美国反对为理由，向苏联表示，英国实在难以接受苏联的要求。

可是，苏德战场局势的变化，使这个问题在1942年春又冒出来了。莫斯科大反攻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形势过于乐观。他要求苏军连续作战，从拉多加湖至黑海对德军展开全线总攻。他在1942年1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说：“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寇喘息的机会。”于是，苏军在莫斯科大反攻之后，接着组织了时德军全线总攻的冬季攻势。从总体上看，苏军在冬季攻势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在部分地区，德军被迫向后撤退，但苏联红军远没有取得斯大林所希望的重大胜利，如西方方面军仅向前推进了70—100公里。到1942年4月，冬季攻势结束，苏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还远远不如德军。正因为如此，1942年，希特勒在苏德战场上根

本不想放弃主动进攻。4月5日、他下达了新的进攻指令。对苏联来说，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英美两国对苏德战场的详细情况并不一定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即苏联红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英美双方在一份关于战争前景的联合情报分析中，谈到了苏德和解的可能性。英国国内，要丘吉尔迁就斯大林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丘吉尔也担心，如果斯大林对英美的意图缺乏信心，有可能同希特勒单独媾和。因此，他想通过英美对苏联未来安全作出某种承诺的方式稳住斯大林。1942年3月7日，他致电罗斯福：“我希望……你能够让我们不受约束地同斯大林签订他所希望签订的条约。一切情况都预示德国将在春季重新对俄国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而我们对这个唯一同德军浴血奋战的国家却爱莫能助。”

罗斯福对英苏两国达成任何秘密交易的可能性都十分敏感，而且坚决反对。他要求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转告斯大林，他本人完全同情战后苏联的安全措施，但在战时谈领土问题是不合适的，对美国舆论，对美苏合作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他向丘吉尔表示，英美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具体说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来减轻德国对苏军施加的压力。3月9日，他致电丘吉尔：“我对今夏在欧洲大陆开辟一条新战线的兴趣日益增加；自然这是指空袭与突击而言。”3月18日，他再次致电丘吉尔，答应不久将送去一份英美盟军在欧洲发动联合进攻的更具体的计划。

由此可见，为了减轻斯大林承受的巨大压力，丘吉尔希望在政治上对苏联作出让步，而罗斯福则开始重新考虑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便在军事上给苏联提供实际援助。

“围歼”与“痛击”计划

其实，美国军方最初对于阿卡迪亚会议确定的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并不热心，把它看成是罗斯福迁就丘吉尔的结果，为此对罗斯福啧有烦言。陆军部作战计划处的约瑟夫·史迪威抱怨说：“英国佬的话他总是听得进去，而我们总是靠边站，结果总是塞给我们成堆的坏主意和没有叫好地考虑的计划……。”陆军部长史汀生也认为，罗斯福急于增进英美团结，却“差一点给自己惹来麻烦”。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对“体育家”计划也不热心，而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给俄国战场以最大的支持。”

1942年春天，随着美国公众舆论要求，“太平洋第一”的呼声高涨，主张“先欧后亚”的史汀生、马歇尔等人很不安，他们要求立即在英国集结美军，作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准备。此时，罗斯福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认为这样做，对于减轻苏联承受的军事压力，改善英美与苏联的关系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1942年4月1日，史汀生和马歇尔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英美盟军在西欧发动进攻的作战计划，要求在英国集结48个师、5800架飞机，于1943年4月1日前后发动进攻，代号“围歼”。为此，在1942年初夏就应开始空袭和炮击。若苏军有崩溃的危险，盟军应于1942年秋天发动规模有限的紧急进攻，代号为“痛击”。

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一计划，他立即把计划内容电告丘吉尔，同时决定派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在伦敦跑一趟，以便同丘吉尔当面商谈。4月3日，他托

霍普金斯给丘吉尔带一封信。信中说：“哈里和乔治·马歇尔要对你讲的全部内容是经过我反复考虑的。”他说，英美两国人民都要求开辟新战场，以减轻苏联承受的压力，“目前俄国人消灭的德军和摧毁的军事装备比我们两国消灭的总数还要多。尽管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大目标也将能达到。”他还考虑让斯大林派特使来美国讨论上述计划。

4月8日，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到达伦敦，开始与丘吉尔及英国参谋长们举行会谈。丘吉尔对美国始终坚持“先欧后亚”战略表示高兴，但内心里不赞成美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计划，而希望首先实施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甚至主张在挪威登陆。总之，他希望英美盟军先在欧洲打外围战，逐步紧缩包围圈。可是，此时，为了防止美国人把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他不想得罪美国人。因此，他对美国提出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计划，采取了一种原则上接受，具体地反对，先表面接受，然后再设法拒绝的策略。

丘吉尔在听取了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对“围歼”和“痛击”计划的介绍后，当即表示完全赞成美国的计划，不管有多大困难，英国都准备干下去。丘吉尔如此爽快地应允，使马歇尔信以为真。他电告国内：盟军将在今年向德军展开反攻，1943年开始大举进攻。

霍普金斯与丘吉尔打过多次交道，不像马歇尔那么天真，丘吉尔答应得如此痛快，使他心存疑虑。他又亲自对丘吉尔强调说，美国提这个建议是严肃认真的。丘吉尔仍然彬彬有礼地表示，英国接受美国的建议。霍普金斯也就相信了丘吉尔。4月11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同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的会谈很顺利。

4月14日，霍普金斯和马歇尔与英国军政领导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开会。丘吉尔慷慨激昂地说，英国毫不迟疑地接受美国提出的开辟西欧战场的重要建议，“我们两国誓将以高尚的战斗情谊，在一场拯救受难民族的伟大讨伐进军中并肩作战，共同向欧洲挺进。”这番话给马歇尔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作为一个军人，马歇尔一般是不大相信政客的，但他认为，丘吉尔是值得信任的政治家。两个多月后，他才发现，丘吉尔与一般政客没有两样，甚至比一般政客更擅长花言巧语。

莫洛托夫的英美之行

1942年4月11日，罗斯福收到霍普金斯从伦敦发回的会谈很顺利的电报后，立即致电斯大林说，他正在考虑“极为重要的军事方案”，“我希望你考虑派遣莫洛托夫和一位你所信赖的将军，在最近几天内就到华盛顿来。”

丘吉尔继续耍花招，表面上支持罗斯福。4月1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你所提出的全部建议。”4月17日，他再次向罗斯福表示。“十分乐意接受你的计划，”英国赞成斯大林派特使访问美国。罗斯福回电表示“至感欣慰”。

4月20日，斯大林给罗斯福回电说，他准备派莫洛托夫来美国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说，莫洛托夫将先去英国，就苏联边界问题与英国协商。罗斯福对斯大林同意派莫洛托夫访美很高兴，但却想阻止英苏就边界问题做交易——这也是他主动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切衷之一。4月22日，他致电丘吉尔，建议让莫洛托夫“先来华盛顿，然后再会英国。”

丘吉尔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回电说，他觉得不能随意改变莫洛

托夫来访的先后次序。不过，他表示，英苏达成任何协议，都要等莫洛托夫访美之后才能最后签署。

当时，斯大林对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德军在苏联战场上仍然占有较大的优势，苏军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有鉴如此，苏联迫切希望英美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军承受的压力。只要英美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作出明确的保证，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这就是他当时同意派莫洛托夫出访的背景。

4月底，德军加强了对往苏联运送物资的船队的袭击，丘吉尔便决定减少援苏物资。最初，罗斯福担心这样做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希望不要向斯大林提这个问题，继续按原计划运输。丘吉尔说，英国力所不及，“请勿强人所难。”罗斯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于5月4日通知斯大林，英美的援苏物资将减少到“绝对必要”的限度。原因是“在北方航线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同时也是为开辟第二战场作准备。

当时，斯大林心想，只要英美早日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可以考虑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和牺牲。5月下旬，莫洛托夫就是抱着这一宗旨出访英美的。

5月20日，莫洛托夫抵达伦敦。最初，他要求英国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丘吉尔予以拒绝。他说，这样做违反英国1939年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违反《大西洋宪章》，同时也会遭到美国的反对——抬出美国压苏联。莫洛托夫从大局出发，同意与英国签订一个为期20年的一般性的同盟条约，不涉及边界问题。5月26日，英苏签订了这项条约。苏联让步的目的，是希望换取丘吉尔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采取积极的态度。5月28日，斯大林致电丘吉尔，表示相信英苏同盟条约对于今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苏联的让步并没有换来丘吉尔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他与莫洛托夫会谈时，提醒莫洛托夫“不要忘记越海进攻的困难。”5月27日，莫洛托夫启程前往美国。丘吉尔赶在他到达美国之前，急忙致电罗斯福说，他对1942年实施“痛击”计划持保留态度：他准备派蒙巴顿来美国，“对你说明1942年的困难”“我们决不能忽略‘体育家’作战计划。”收到这封电报后，罗斯福已经预感到，丘吉尔对进攻西欧的计划已开始打退堂鼓。

此时，英美苏三国之间，苏联手里握着的王牌是：如果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的压力，苏联就可能顶不住德军的进攻，如果苏联战败，对英美的后果也不堪设想。可是，这张王牌对丘吉尔也不起多大作用。莫洛托夫曾问过丘吉尔：如果苏军在1942年不能坚持下去，英国政府将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呢？丘吉尔回答说，苏联不能坚持下去，其后果对英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的命运是与苏联的抵抗休戚相关的。”不过，即使苏联万一失败，英国也将继续战斗下去。由此可见，想拿苏联战败问题压丘吉尔在第二战场上让步，也没有成功。

5月29日下午4时，莫洛托夫到达白宫，与罗斯福等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由于需要翻译，罗斯福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还是与英国人会谈时方便，爽快得多。他表示对英苏同盟条约不涉及边界问题感到高兴。莫洛托夫介绍了他与丘吉尔会谈的情况，又向罗斯福提出了第二战场问题。

5月30日上午，他们二人以及霍普金斯等人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罗斯福向美方其他与会者介绍说，英国对开辟第二战场还没有作出任何承诺，苏联面临的形势岌岌可危，他们要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便使德军从东

线抽调 40 个师到西线，他说，美国有责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苏联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接着，莫洛托夫介绍了苏德战场上的形势。他再次谈到了“红军可能守不住”的问题。他说，他丝毫无意缩小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所冒的风险，可是，当 1942 年苏联战线保持完整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等到 1943 年，苏联战线垮了，那时困难无疑要大得多。因此，他要求美国坦率地回答，英美是否准备开辟一个新战场？

罗斯福自己没有回答，而是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根据情况的发展，我们是否有把握对斯大林先生说，我们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呢？马歇尔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罗斯福希望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我们预料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

5 月 31 日，罗斯福召集他的参谋长们商量向英国施加压力的问题。他念了准备拍给丘吉利的电报草稿，其中谈到，他想到 1942 年 8 月开辟第二战场，让莫洛托夫带一点实际成果回国，“好向斯大林作有利于我们的汇报”。马歇尔认为，英国人会强烈地抵制这个计划，明确提 8 月份发起进攻有所不妥，罗斯福只同意把时间改为“1942 年”，改得含糊一点，而不想再作更多让步。

6 月 1 日，罗斯福与莫洛托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他提出，英美应继续减少对苏联的物资援助，以便腾出更多的船只用于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莫洛托夫却说：“只有第一战场仍然存在，第二战场才能更强大。”他还问，如果苏联接受削减援助，而到时候英美却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又该怎么办？罗斯福说，英美正在磋商，“我们期待着开辟第二战场。”

莫洛托夫获得了罗斯福的明确保证后，按原计划返回伦敦，与丘吉尔进一步举行会谈。由于来自罗斯福的压力，丘吉尔被迫硬着头皮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作出承诺。随后发表的英苏联合公报指出：“在会谈中，就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当务之急达成了全面谅解。”

然而，老奸巨滑的丘吉尔并不甘心。他一方面被迫作出了上述承诺，但同时又交给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其中谈到：“我们正在为 1942 年 8、9 月份在欧洲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然而……我们无法在事先断言那个时候的形势是否允许我们采取该行动。因此，我们无法在这方面作任何承诺。”备忘录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积极为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作准备，至于能否开辟，到时候再看，形势允许就开辟，形势不允许，就不开辟。实际上，他是打定主意拒绝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英苏联合公报，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已而同意的。备忘录是他有意为日后食言提供文字依据而炮制的，他耍了一个大滑头。

“火炬”计划出笼

莫洛托夫回国向斯大林报喜去了，而丘吉尔却在盘算如何推翻关于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1942 年 6 月 8 日，他致函英国军方领导人说：“执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条件不在于俄国人的失败，而在于俄国人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西线的士气低落。”也就是说，只有等苏联打了胜仗，德军士气低落时，才能开辟第二战场。这与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初衷大相径庭。

丘吉尔决心推翻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可是，这一决定是罗斯福作出的。罗斯福对 1942 年实施“痛击”计划热情很高。怎样才能把他争取过来呢？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来自往美国跑一趟。与罗斯福面谈一次。

其时，英军正在北非紧张作战。为了节约时间，及时赶回来，丘吉尔决定不乘军舰。而改乘飞机前往美国。这一次，他突然考虑到自己遇难的问题。如果自己万一遇难，由谁来领导英国继续作战呢？6 月 16 日，他致信国王，留下了他的遗嘱：如果在旅途中遭到不幸，建议由现任外交大臣艾登接替首相职务。

6 月 18 日，丘吉尔飞抵华盛顿，开始了他战时的第二次美国之行。第二天，他又飞往罗斯福的家乡——海德公园。罗斯福在机场迎接他，并亲自驾驶汽车带他到各处观赏风景。一路上，丘吉尔却在想，总统患小儿麻痹症多年，路都不能走，无法用脚踩车闸、离合器等，居然能完全靠一双手驾驶汽车，真了不起。罗斯福看出了他的心思，告诉他，自己的手腕特别有劲，能应付一切。丘吉尔对他又多了一层敬意。

6 月 21 日清晨，他们返回华盛顿。这时，从北非传来英军惨败的消息。罗斯福把刚收到的一封电报交给丘吉尔，丘吉尔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托卜鲁克（英军在北非利比亚境内的战略据点）投降，25000 人被俘。”（后来证明，实际上有 33000 人被俘）丘吉尔极为痛心。半年来，英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4 个月前，新加坡失陷，85000 多人对人数较少的日军投降。这一次，3 万多英军又向人数只有他们一半的德军投降。英国军队蒙受了巨大耻辱。丘吉尔也深感耻辱和痛苦。

罗斯福再一次安慰他，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当即问丘吉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丘吉尔表示，需要美国提供“谢尔曼”式坦克，并尽快运往中东。罗斯福立刻派人找来马歇尔。马歇尔说，谢尔曼式坦克刚投入生产不久，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发给美军。不过，既然英国急需，我们尽量想办法。他答应给英国提供 300 辆坦克和 100 门大型自动火炮。这批武器立刻装上了 6 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中东。在百慕大附近，装载坦克发动机（坦克尚未完全组装好）的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罗斯福二话不说，立刻下令把另一批发动机装上另一艘快船运往中东，同时下令派一个美军装甲师增援中东的英国军队，罗斯福的这一番举动让丘吉尔十分感激。他后来回忆这一插曲时说：“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丘吉尔这次访美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第二战场问题。6 月 20 日，他曾递交一份备忘录给罗斯福，其中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部门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 1942 年 9 月的作战计划。”他认为，1942 年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作战，英美“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在随后的讨论中，他再次重申，1942 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肯定导致灾难”，不仅帮不了苏联，而且将严重影响英美在 1943 年的军事行动。他保证支持在 1943 年开辟第二战场。至于 1942 年，他主张进攻北非，实施“体育家”计划。

当时，美国军方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已经制订了在英国大量集结军队和作战物资的行动计划，代号为“波利乐舞”。美方的史汀生、马歇尔等人强烈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认为这会破坏在英国集结军事力量的“波利乐舞”计划。他们说，即使英美全力以赴，“波利乐舞”计划也要到 1943 年春天才能完成，如果再分散力量，很可能 1943 年不能完成，那将严重影响

英美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认为，全力以赴地实施“波利乐舞”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打败德国的最佳战略。

罗斯福一方面很重视实施“波利乐舞”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从政治角度考虑，他更迫切希望让美军在1942年同德军作战，如果不能在西欧作战，也要在别的战区作战。由于托卜鲁克失守，丘吉尔不得不提前回国。英美双方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最后一致的意见。

托卜鲁克的失守，再次引发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丘吉尔回国后，英国下院再一次对其政府举行信任投票，结果，支持他的有473票，反对的有25票，丘吉尔政府虽然获得绝大多数支持，但这一插曲使他更加谨慎，不愿意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冒风险（他一直认为，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西欧，风险太大）。7月上旬，他再次致电罗斯福，表示反对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同时再三要求开辟北非战场，实施“体育家”计划。

马歇尔想起丘吉尔4月份在伦敦时答应得那么漂亮，自己当时那么信任他，在6月11日发表的英苏联合公报中他又作了明确的承诺，现在突然翻脸不认帐，不禁怒火中烧。其他一些美国领导人对丘吉尔如此不守信用也很反感。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想出了一个威胁丘吉尔的主意：如果英国不愿参加实施“波利乐舞”计划，无意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美国就把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变“先欧后亚”为“太平洋第一”，全力对日作战，不再管欧洲的事。

然而，罗斯福总统不赞成这种感情用事的主张。他对马歇尔说：“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恰恰是德国希望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采取的行动。”他表示，不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也不要“强硬手段”对付丘吉尔，不要给英国人下最后通牒。英美之间，要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他要求马歇尔、欧内斯特·金、霍普金斯立即去伦敦，就英美1942年作战的“明确计划”和1943年作战的“试验计划”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让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同敌人交战”，如果完全可能，他希望战场将选在法国，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在北非和中东作战。

7月18日，霍普金斯一行到达英国。丘吉尔派专人专列接他们去契克斯别墅与他共度周末，可马歇尔等人决定先去伦敦同已在英国的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以及英国的参谋长们协商讨论。这一下把丘吉尔惹火了，他打电话找到霍普金斯，大发脾气，责怪他们不给地面子。他说，来访者必须先来见首相（他同时兼任国防大臣），英国的参谋长们是受他指挥的。霍普金斯作了一番解释，说明他们并非有意对丘吉尔不尊重，乃是按罗斯福指示行事，可是不起作用。于是他只好赶到契克斯，准备当面领受丘吉尔的训斥。他去了，丘吉尔并没有训斥他，而是对他十分热情。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汇报这段小插曲时说：“温斯顿依然故我，好斗得很。”

在英美双方的会谈中，英国仍然反对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得知这一情况后，作出最后裁决：必须制订让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对德作战的其他计划，他优先考虑的是实施在北非登陆作战的“体育家”计划。为了防止拖延，罗斯福要求这一作战计划最迟必须在1942年10月30日执行。7月25日，英美双方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丘吉尔为他一心偏爱的北非作战计划取了一个更响亮的代号——“火炬”。

丘吉尔首访莫斯科

由于丘吉尔执意反对，罗斯福态度不坚决，英美在5月底6月初作出的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被推翻了，由此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英美的决定对苏联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向斯大林解释？此时，德军的夏季攻势已把苏军赶到了顿河以东和以南的地区，进而威胁到苏联南方的工业区和里海西岸的油田，苏军正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斯大林正迫切地等待着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吸引走一部分德军。然而，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刻，丘吉尔和罗斯福给他的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自5月份以后，英美的援苏物资急剧减少。7月中旬，英美给苏联运送物资的34艘商船中，有23艘被德国人击沉。丘吉尔便于7月14日致电罗斯福，建议暂时停止向苏联运送物资。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他说，丘吉尔对暂停北方通航的解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战争期间，重要的计划若要执行，无不冒风险、无不受损失”。他希望在苏联前线形势如此严重的关头，英美不会“赖掉”给苏联的军用物资。如果斯大林进一步得知英美已决定放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会不会由于对英美绝望而同希特勒单独媾和呢？丘吉尔对此又十分担心。他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会对苏联与英美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正因为如此，他觉得，通过电报把英美的决定告诉斯大林是不妥的，很难在电报中把英美的决定解释清楚。他决定亲自往莫斯科跑一趟，把这一重大而又不幸的决定当面告诉斯大林，亲自向他作出解释。至于能否获得斯大林的理解，他心中完全没底。8月5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他请罗斯福派负责对英国租借援助事务的哈里曼作为总统的代表与他一同赴苏联。

罗斯福深知，英美放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对斯大林无疑将是巨大的打击。他支持丘吉尔赴苏当面向斯大林作出解释，同意派哈里曼与他同行，此外致电丘吉尔特别叮嘱了一番：“你给斯大林的答复必须十分小心为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盟友的个性以及他所面临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形势。当一个人的祖国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从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朝望他进行战争。我想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他考虑问题。”

1942年8月上旬，丘吉尔先到埃及处理了一些军务，然后从开罗飞经德黑兰，于8月12日下午5时许飞抵莫斯科。一路上，他想得很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多次参与策划和组织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一直视苏联为英国的死敌；如今，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把苏联变成了英国的盟友；自苏德战争爆发后，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与斯大林一直有矛盾……他深知，自己这次赴苏的使命是艰巨的，能否成功，他没有把握。

丘吉尔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首先通报了英美不能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他说，英美目前既缺乏开辟第二战场的兵力，也缺乏登陆艇，但准备在1943年在欧洲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围歼”作战计划。他说完后，注视着斯大林忧愁的神色，又补充一句：“我恐怕我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

斯大林完全没有料到，当苏联承受巨大压力，一直翘首盼望英美答应好的第二战场时，英美居然会来这么一手。他愤怒地说，我对于战争有不同的

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我不明白为什么英国人这样害怕德军。

丘吉尔继续解释说，横渡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1940年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时，之所以没有入侵英国，也是因为如此。

斯大林驳斥说：“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国人民却会拥护英军。”

斯大林的这种愤怒情绪，早已在丘吉尔的预料之中。他事先已想好这次会谈的方式：首先向斯大林通报坏消息，然后谈一些斯大林感兴趣的问题，等气氛缓和后，再说出英美准备1942年在北非作战的“火炬”计划。

于是，在第二战场问题辩论得差不多后，丘吉尔把话题引到了轰炸德国的问题上。1942年，英美盟军多次派出空军轰炸德国本土，打击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斯大林对盟军的这类行动感到高兴。他说，苏联政府很重视盟军的这类行动，而且知道，盟军的轰炸正在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话题使会谈的气氛开始缓和。

于是，丘吉尔觉得是说出好消息——“火炬”计划的时候了。他说，我不认为法国是开辟第二战场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也可以考虑，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制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阁下。”随后，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英美盟军打算，1942年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斯大林怀着浓厚的兴趣听着，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他特别关心“火炬”计划实施的时间，丘吉尔回答说，不迟于1942年10月30日，力争在10月7日进行。“火炬”计划，使斯大林以及与会的其他苏联人都感到一丝安慰。

丘吉尔说：“假若今年能占领北非，明年就能给希特勒以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说，据我理解，“火炬”计划有4个优点：第一，它会在背后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德国人与法国人在法国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

斯大林如此敏锐的战略眼光和精辟的概括，简直让丘吉尔服了。多年后，他回忆说：“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但他却能在刹那间了解全部情况。”

会谈的气氛已经变得很融洽了。

8月13日，斯大林收到的前线战报说，南方战场的形势正在严重恶化，德军展开的夏季攻势正在向巴库逼近。斯大林深感不安。近两个月来，他一直寄希望于英美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现在看来，已经泡汤了。昨天，丘吉尔又说，英美准备在1942年开辟北非战场，实施“火炬”计划，过两个月会不会又泡汤呢？斯大林不能不担心。他决定抓住英美违背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大做文章，间接地试探丘吉尔对实施“火炬”计划的决心有多大。

当天晚上，斯大林与丘吉尔举行第二次会谈。他首先递给丘吉尔一份备忘录，指责英国拒绝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苏军处境更困难，并且破坏了苏军的作战计划，对苏联“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苏联认为，“1942年具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几乎所有的、而且是精锐的德军都被吸引在东线”。

接着，斯大林进一步指责英美粗暴地违背诺言，过分地害怕同德国人作战。他说，假如英美能像苏联那样试一下，就不会怕德国人。此外，他还抱怨英美没有兑现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的诺言。

丘吉尔完全没有料到，头一天晚上谈得很融洽，仅仅一天之隔，斯大林

的态度竟然变化这么大(后来,英美许多官员发现,苏联人会谈有一个特点,第一次态度较好,第二次大肆指责对方,第三次圆满解决矛盾,又非常友好。这几乎成了苏联人谈判的一种模式)。他反复地回答说,希望斯大林能理解英美的决定,责备是无用的,实施“痛击”计划不会成功。

斯大林进一步发起攻势,“英美在法国的瑟堡半岛登陆6至8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如果英军像苏军那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

丘吉尔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回答说:“斯大林阁下在谈到俄国陆军的英勇时说的一番话,我不计较。至于向瑟堡登陆的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吉利海峡的存在。”他慷慨激昂地说:“民主国家很快就要用行动来证明既不懒惰也不胆怯,它们准备像俄国人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我感到痛心的是,俄国人并没有认为西方盟国在共同的事业中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他越说越激动,而且生怕翻译员漏了他的话,希望翻译员把每句话都让斯大林听清楚。他一个劲地问译员,“你把这一点对他讲了吗?”“你把那一点对他讲了吗?”

看到他这种急于表白的样子,斯大林终于笑起来了,对丘吉尔说:“你的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我们不必再争下去了,我接受你们的决定。”他还说:“我喜欢听丘吉尔先生发言的声调”。现在,他确信,英美关于开辟北非战场的计划是认真的。8月14日,他又收到了英国针对苏联的备忘录提交的书面答复,其中谈到,1942年英美唯一可能实施的大规模的作战是“火炬”行动,它既能帮助苏联,又能“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道路,……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我们决心用一切切实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8月14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丘吉尔一行。他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愉快地交谈。斯大林说,若干年前,英国的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访苏时,曾谈起过究竟是劳合·乔治还是丘吉尔应对当年武装干涉苏俄负责,当时,我说,劳合·乔治是政府领袖,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

丘吉尔听到这里,插话说:“我是干涉你们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见斯大林满脸笑容,又问:“你已经宽恕我了吗?”

斯大林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8月15日晚上,丘吉尔来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辞行。他们就战局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当丘吉尔准备起身告辞时,斯大林突然又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丘吉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即跟斯大林来到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的女儿。斯大林请能喝酒的莫洛托夫来陪丘吉尔畅饮助兴。席间,斯大林和丘吉尔都拿莫洛托夫作为开玩笑的对象。这次家庭宴会,使丘吉尔的苏联之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丘吉尔的这次莫斯科之行,使苏联与英美之间避免了分裂,增强了它们战胜德国的信心。此时,也使丘吉尔与斯大林加深了相互了解,使丘吉尔消除了对苏德单独媾和的忧虑。8月14日,他致电英国战时内阁说:“他们从来没有不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对于胜利是深具信心的。”通过这次访问,他更具体地认识到了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同时也意识到,英美放弃实施“痛击”计划,加剧了苏联的困难。他随后给英国副首相艾德

札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我们必须充分体谅这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给予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斯大林吞下“苦药丸”

丘吉尔结束访苏后，致电罗斯福说：“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他建议罗斯福多给斯大林写信，多多安慰和激励他。

罗斯福便致电斯大林说，自己没有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深感遗憾。请相信我，美国正竭尽全力地援助你们，“美国人民懂得，苏联今年在作战中是首当其冲的，付出了最大的伤亡代价，对于贵国所作的杰出的抵抗，我们是充满着崇敬心情的。”

英美两国希望苏联不再提及关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然而，苏联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继续对英美违背诺言表示不满。1942年9月5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苏联领导人对丘吉尔的访问并不满意，老百姓和红军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在苏联与德国进行如此困难的斗争的时刻，英国的消极态度，当然会在苏联人民中间、在军内外引起不理解、失望和怀疑的情绪。”

9月18日，艾登会见麦斯基时指出，苏联报纸在第二战场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不适当的，可能会有损于盟国之间的关系。麦斯基说，苏联的报刊“仅仅是平淡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和红军的情绪。9月25日，他们再一次谈起这个问题。艾登说，当初莫洛托夫来访时，他本来是不赞成发表那种会谈公报的。只是考虑到美苏会谈公报中已经写进了第二战场问题，英国才不得不仿效美国。他说，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公报发表了，“现在只好自食这次不慎之举的苦果了。”他说他非常理解苏联人民和红军中的失望情绪，虽然如此，1942年谈不上开辟第二战场。9月29日，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对莫洛托夫说，希望苏联的报刊不再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

10月3日，苏联报纸报道了斯大林会见美联社记者克西吉的谈话。斯大林说，关于第二战场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头等地位。”“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同苏联吸引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小的。要扩大和改进这种帮助，只须做一件事。就是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这段时间，丘吉尔和罗斯福力援助苏联作出了一些安排，同时为实施“火炬”计划作周密的准备。10月9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把英美即将实施的“火炬”计划吹了一通，并介绍了为援苏已经做和将要做的一些工作。同一天，罗斯福也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类似的电报。

10月13日，斯大林给丘吉尔回电，电文简单得出奇：“我收到你10月9日的来电。谢谢你！”总共就这么两句话，弄得丘吉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等来自斯大林那里的更详细的消息。可一直等了10天，再没有收到斯大林的任何消息。10月24日，他实在忍不住，致电罗斯福寻问缘由。他

说，斯大林的电报使我困惑不解，确切地说，他的沉寂难倒了我，“我不知苏维埃这个动物内部出了什么事，使斯大林不能复封令人满意的信。”罗斯福也迷惑不解。

不久，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回国，斯大林托他带来了一封重要信件：“拖延回信是由于军务繁忙”，苏联急需更多的军用物资，特别是飞机。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才如释重负。罗斯福于10月28日致电丘吉尔说，“我对莫斯科是否给我们答复并没有感到过分烦恼。……我深信，俄军能够熬过今年冬季。”

1942年11月7日，又迎来了十月革命胜利25周年纪念日。整整一年之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地谈到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如今，一年过去了，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仍然是“八”字没有一撇。在苏联对德作战极为艰难的时刻，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食言，使斯大林吞下了一颗“苦药丸”。斯大林在11月7日的讲话中再一次指出：“假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欧洲有第二战场，……那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处境会怎样呢？不难猜想，他们的处境将是悲惨的。不仅如此，这将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末日的开始，……而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挽救了德国人。”

第十七章 战略转折

斯大林：“争取1942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年。”

罗斯福：“这次战争的转折点终于已经到来了。”

丘吉尔：“这不是结局，甚至不是结局的开端。但是，这也许是开端的结束。”

阿拉曼战役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各自统帅的英、美、苏三国军队，对德意日轴心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仗一个比一个打得漂亮。

丘吉尔自1940年5月临危受命后，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中，经受了一系列的军事挫折，军事失败乃至灾难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他回忆说：“多少灾难像瀑布似地倾泻在我们身上啊！达喀尔的惨败，我们从意大利手中夺得的沙漠地区已经丧失无遗、希腊的悲剧、克里特岛的失守、对日战争的令人难以宽解的挫败、香港的陷落、美英荷澳战区广大土地的被蹂躏、新加坡的灾难、日军占领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中的挫败、托卜鲁克的投降、被认为失败的迫埃普战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连串灾难和挫折中最令人痛心的环节。”

1942年6月，3万多英军在托卜鲁克的投降，使丘吉尔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人要求他引咎辞职，下院对他的政府又提出了不信任的动议，有人甚至挖苦他说，丘吉尔“在（下院）辩论时总是胜利，而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他虽然安全地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但失败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他害怕再遭受新的重大军事挫折，这也是他坚决反对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渴望胜利，迫切地希望英国军队早日给他送来胜利的捷报。

托卜鲁克失守后，丘吉尔早在7月初就想到中东前线去，改组英军的中东最高司令部，艾登等人花了很大力气劝阻住了他。8月初，他还是决定飞往开罗，以“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当时，他乘坐的是一架轰炸机，飞机上没有暖气，以致他不得不忍受“象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8月4日，他飞抵开罗，解除了奥金莱克的英军中东总司令职务，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代替他，同时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推荐蒙哥马利负责指挥在北非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奥金莱克成了托卜鲁克失守的替罪羊。

蒙哥马利脾气古怪，用兵谨慎。在他的流动指挥所里，挂着一幅画像，既不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首相丘吉尔的，也不是他父母或本人的，而是他在北非战场上的对手、德军优秀将领、“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蒙哥马利常常凝视着隆美尔的画像，总是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隆美尔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蒙哥马利带兵严格，到战争结束时，他手下许多身经百战的老部下老战士连续5年没有被准许回过一次家。可他很得部下的拥戴，很有威信，大伙都亲切地管他叫“蒙蒂”。

当时，丘吉尔求胜心切，催促蒙蒂赶快发动进攻，蒙蒂并没有屈服大权

在握的首相的压力，他直接了当地回答说：“如果9月份开始进攻，将会遭到失败；如果我们等到10月份，我可以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摧毁隆美尔的军队。我是否仍然要在9月份发动进攻呢？”丘吉尔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蒙蒂的计划。

英军的这次进攻地点在北非的阿拉曼。进攻前夕（10月20日），丘吉尔又一次致电英军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我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蒙哥马利即将进行的战役上。”的确，也许他再也承受不了一次重大的失败。

1942年10月23日，英军发动进攻，阿拉曼战役打响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果然没有辜负丘吉尔的殷切期望。10月24日，英军开始突破隆美尔的防线。到11月4日，隆美尔指挥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全线溃退。隆美尔不顾希特勒关于不得后退一步的命令，丢下意大利军队，急忙向西逃窜。英军俘虏了意大利军队3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德军4个师和意大利军队8个师已溃不成军。隆美尔的军队打得只剩下38辆坦克。

这一仗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丘吉尔头上的失败阴影。他回忆说，这一仗标志着“命运的关键”，“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

太平洋上的战略转折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上下，舆论大哗。罗斯福迫于压力，下令海军部长诺克斯到珍珠港调查，随后解除了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职务，不久又解除了斯塔克的海军作战部长职务。他任命尼米兹出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出任海军作战部长。

当时，美国举国上下，都要求对日本偷袭珍珠港报一箭之仇，美国海军更是决心报仇雪耻。新任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原本是一个酒色之徒，但却精于海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海战指挥才能，战功卓著，而且是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的创建人之一。他像马歇尔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得志，职务晋升很慢，曾因为酗酒而错过了一次重要的晋升机会。好在他同马歇尔一样，都有耐心，都等到了时来运转。为了雪洗珍珠港事件的耻辱，他发誓不沾烈性酒（此后，他只是偶尔喝一点葡萄酒，不过他从来没有发誓不近女色），他像海军的所有将士一样，盼望尽早对日作战，恢复美国海军的荣誉。

太平洋战场极为辽阔。各地的美军分别属于美国陆军和海军两大系统（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的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而美国陆军和海军一向矛盾很深，谁也不服谁，其矛盾很难化解。罗斯福作为总统，自然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但由于他曾任过助理海军部长，对海军更有感情。他在同下属谈话时，在处理陆海军之间的一些矛盾问题时，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在海军一边说话，让陆军方面的人很不满，有一次，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觉得罗斯福太偏向海军了，实在忍不住，便说：“总统先生，请您至少不要把陆军称做‘他们’，把海军称作‘咱们’”。

由于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也由于太平洋太辽阔，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区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1942年3月3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太平洋划为两个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陆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负责，总部设在澳大利亚；中部太平洋战区，由海军的尼米兹将军负责，

总部设在珍珠港。

1942年5月4日至8日，美日两国海军首次在珊瑚海展开激战，双方都只投入了航空母舰作战。结果是双方各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日军损失飞机77架、官兵1000余人。美军损失飞机74架，官兵500余人。双方基本上打成了一个平手。但这一仗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北部的威胁。

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成功地空袭了日本本土之后，日本决定报复。曾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企图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残部引诱到中途岛，然后一举歼灭之。美国的“魔术”截获和破译了日军有关这次作战行动的来往密电。尼米兹知己知彼，对太平洋舰队作了精心的部署。6月4日至5日，美日两国海军在中途岛展开激战，美军虽然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却大获全胜。日本海军参战的4艘航空母舰被摧毁，还损失了1艘重型巡洋舰，332架飞机，2000多人。美国海军只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307人。这一仗是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开始。

紧接着，美日双方为争夺西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展开了一场激战。1942年8月7日，美军1900多人在该岛登陆，日军为夺取该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从8月8日至10月26日，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空战和海战，各有胜负，日本在海军方面占优势，美国在空军方面占优势。11月12日至15日，双方海军展开激战，损失都很严重。11月14日至15日夜间，美国舰队借助先进的雷达设备，击毁了日本3艘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943年2月7日，日军被迫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至此，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完成了由战略防守向战略进攻的转折。

盟军在北非登陆

当英军在阿拉曼同德意军队激战、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同日军激战时，另一支英美两国军队组成的盟军正积极准备在西北非洲登陆，实施“火炬”作战计划。

中途岛之战和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局演变不可避免的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日军强加给美军的，或者说是美军根据太平洋战场的形势自行决定的。阿拉曼战役也是英军根据北非战场的形势自行决定的。“火炬”行动则与此不同，它是英美两国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苏联之间经过长期辩论后，由罗斯福直接拍板决定的。如果说中途岛之战、瓜达尔卡纳尔之战和阿拉曼之战只是一些战役行动，那么实施“火炬”计划、在西北非登陆却是英美盟军实施“欧洲第一”战略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此外，它还是美国地面部队第一次在西线投入战斗的军事行动。正因为如此，“火炬”行动的意义非常重大，其成败与否，对英美两国军民的士气、对苏德战争、对英美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巨头中，丘吉尔和斯大林不仅仅重视重大的战略问题，也很重视具体的作战问题，尤其是斯大林，几乎是事无巨细，什么都管，红军作战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得由他拍板。比较而言，罗斯福通常更多地是在重要的、战略性的问题上把关，而较少直接插手前线具体的作战问题。然而，在实施“火炬”计划的过程中，情况却有些例外，他并非像通常那样超然。这一次，他不仅极为关注英美盟军的军事行动，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频频插手。

西北非洲大多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战败投降后，维希政府仍然维持着

对北非的殖民统治，在法属北非的法军约有 20 万人，飞机 500 架。若能争取他们站在英美盟军一边，就可以绝对保证“火炬”计划的成功，在法属北非的军政首脑中，许多人痛恨法西斯德国，不愿为它打仗，争取他们站在盟军一边是有可能的。

法国战败投降后，美国政府一直同法国维希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法属北非的许多文官武将也与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罗伯特·墨菲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位法军将领对墨菲说：“假如你仅仅带 1 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 20 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法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有利于美国争取法属北非的军队倒向自己一边。然而，英法关系却很糟。由于丘吉尔积极支持被维希政府视为叛国者的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特别是由于英国海军夺取、袭击法国海军舰队，造成奥兰流血事件，不仅维希政府断绝了同英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许多法国人（包括军人）都仇视英国。这显然不利于争取北非法军倒向盟国一边。

为了保证“火炬”计划成功，争取北非的法军倒戈，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曾直接致函法国维希政府领导人贝当元帅，希望他深明大义，支持盟军在北非登陆。他还特意录制了一篇讲话，让登陆部队在登陆时播放给北非的法国人听，呼吁他们倒向盟国一边。鉴于许多法国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敌视情绪，罗斯福要求实施“火炬”计划时，尽可能掩饰英军的参与。早在 1942 年 8 月 30 日。他致电丘吉尔说：“我深信攻击的开始阶段必须由清一色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担任，而由你们的海军、运输和空军单位担任支援。”理由是，北非的法军对美军可能根本不会抵抗，但可能全面抵抗英军。

丘吉尔表示，英国一直同意北非登陆行动以美军为主，但不能同意把它说成是纯粹的美军的行动。他说。英国海军在登陆现场是难以掩人耳目的。可是，罗斯福比较固执，坚持把北非登陆行动作为一项纯属于美国的行动向全世界宣布，甚至要求把英国的飞机涂成美国的标记，要求英国部队穿上美军军装。丘吉尔对此很不满。

此外，考虑到 1942 年 11 月 3 日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罗斯福希望“火炬”计划在此之前付诸实施，以便有利于民主党人参加这次选举。8 月 30 日，他致电丘吉尔说：“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尽早发动攻击。时间是关键”，确定日期必须考虑“有较大成功的希望”，“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迟于 10 月 30 日。我仍然希望定在 10 月 14 日。”

有一天，马歇尔向罗斯福汇报“火炬”计划的准备情况。罗斯福听罢，伸出双手，祈祷似地说：“请赶在大选之前开始行动吧。”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对这种政治干扰军事的做法有些反感，只是干巴巴他说，尽力而为。实际上，英美两国军方已经认识到，“火炬”计划实施的最早日期是 11 月 7 日。马歇尔便说，英国第八集团军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在阿拉曼发动进攻，这或许会有助于民主党人的选举。鉴于英国军队过去一直打败仗，罗斯福说：“叫他们别动手！英国人总是吃败仗！”

马歇尔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政治干扰军事的作法，再说他也无权下令英国军队暂停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更不用说是桀骜不驯的蒙哥马利统率的英国第八集团军。此外，丘吉尔早已翘首等待英军的胜利捷报。因此，马歇尔没有出面阻止英军的进攻。

出乎罗斯福意料之外——英军这次在阿拉曼打了个大胜仗。不过，英军的胜利毕竟不能等同于美军的胜利。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似乎没有对美国中期

选举产生多大影响。直到 11 月 3 日选举开始时，“火炬”计划尚未实施，美军地面部队尚未在西线投入作战。民主党人在这次选举中遭到重大挫折，在参议院丢了 10 个议席，在众议院丢了 87 个议席，在国会中享有的优势降到了 1932 年以来的最低点，从而对罗斯福政府的立法活动构成了威胁。

罗斯福毕竟是政坛老将，度量很大，没有因民主党中期选举受挫而怪罪军方，这使马歇尔将军感到欣慰，对罗斯福多了一份敬意。可是，罗斯福手下的一些人却没有那么大度。11 月 8 日，马歇尔派手下的弗兰克·麦克锡去白宫通知罗斯福的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火炬”计划将在 1 小时之后付诸实施。厄尔利却大发脾气，破口大骂：“你现在倒跟我说起这个来了，你这个兔崽子！为什么你们不在一个星期之前动手呢？”

对罗斯福来说，“火炬”计划未能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实施固然是件憾事，可他更重视这项计划能否成功。只要美军能成功地在北非登陆，在中期选举中付出一点代价也算不了什么。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前几个小时，他一直焦虑不安。登陆行动开始后，陆军部打来电话，他伸手去接时，手在发抖。当得知登陆成功时，他连说两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然后又情不自禁地对周围的人大声宣布：“我们在反攻了。”

1942 年 11 月 8 日凌晨，英美盟军兵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三处登陆。阿尔及尔的法国守军在 24 小时内便停止了抵抗，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守军 3 天后也停止了抵抗。西北非洲的法国部队倒向了英美盟国，“火炬”军事行动一举成功。随后，英美盟军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在北非展开了长达半年的争夺战，到 1943 年 5 月 13 日，在北非的德、意军队全部投降，25 万人被俘。这是英美盟军当时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从 10 月 23 日英军打响阿拉曼战役到 11 月 8 日英美盟军成功地在北非登陆，接着是美军于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谓捷报频传。罗斯福喜不自禁，在 11 月 17 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在过去的两周中，我们得到许多好消息，似乎这次战争的转折点终于已经到来了。”另一方面，他还比较谨慎，认为不能高兴太早了，“这还不是欢欣若狂的时刻。”他谈到战争转折点时，用的是假设语气。然而，美国各大报刊都强调：“罗斯福说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来临了。”

丘吉尔也很兴奋，他在 11 月 10 日的讲话中说：“我们士兵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我们所有人都心情激动和高兴。”他在评价上述战役和军事行动的意义时，又冒出了一句妙语：“现在，这不是结局，甚至不是结局的开端。但是，这也许是开端的结束。”同样的局势，同样的事，丘吉尔常常比罗斯福概括得更妙一些。

英美盟军打的这几仗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罗斯福，尤其是丘吉尔完全有理由为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更鼓舞人心的消息还在后头。就在罗斯福的上述讲话两天过后（11 月 19 日），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攻，其战绩之辉煌，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更是大开眼界，也使英美盟军的上述作战行动相形见绌。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相比，斯大林对苏联红军军事行动的影响要全面、广

泛和深入得多，一切重大的战略计划和战役行动都得经他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英美苏三国军队都打败仗时，斯大林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要大；同样，当三国军队都打胜仗时，斯大林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功劳也要大一些。

在军事作战问题上，斯大林很喜欢进攻，而不太重视防御。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始终不忘让苏军采取进攻行动或者防守反击，有时甚至不顾条件是否允许和部分将领的反对，硬性要求苏军反攻。有时他抓住战机，使苏军反攻获胜；有时他盲目地下令反攻，使苏军反攻失利。1941年12月莫斯科大反攻的胜利是他一手促成的。随后，他又要求苏军转入全线总反攻。当时朱可夫反对这样做，斯大林却说：“我同铁木辛哥商量过，他主张在西南方向进攻。应当尽快消灭德寇，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当他打定主意时，朱可夫是无法使他改变主意的。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战役中，苏军夺回了一些地盘，但成果不是很大。1942年4月冬季战役结束，斯大林认为，德军在冬季战役中进一步遭到削弱，红军将会迅速地取得胜利，再过几个月便能结束战争。他在1942年5月1日要求全体红军，“争取1942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

其实，冬季战役结束后，德军在苏联战场上，在人数和装备方面仍然占有优势。1942年4月5日，希特勒签署了新的对苏作战命令——第41号命令，此时，他暂时放弃了占领莫斯科的目标，夺取列宁格勒也只是次要目标，而是把主战场转向了苏联南方：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推进到伏尔加河，夺取斯大林格勒，进而夺取高加索的油田。

1942年4月底，苏军在克里米亚的进攻遭到失败。5月8日，德军在克里米亚突破了苏军防线，重新占领了赤刻半岛，7月4日，又攻陷了苏军的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整个克里米亚落入德军手中。

5月中旬，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一带的进攻受挫，到5月17日，形势急剧恶化。苏军总参谋部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斯大林却不同意。两天后，局势进一步恶化，苏军几个集团军又面临陷入敌人重围的危险，斯大林这才同意下令停止进攻，但为时已晚。5月23日，苏军的第六、第五十七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的一部分以及战役集群等部队陷入重围，在经历了惨重伤亡后，一部分突围成功，大部分被俘。西南方面军一位副司令员、第六和第五十七集团军司令员、战役集群部队司令员等高级将领阵亡。

德军在获得了一系列胜利后，在苏联南方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权。于是，他们开始向伏尔加河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迅猛推进，7月底，占领了苏联南部工业中心顿巴斯。此后，德军进攻的目标指向了斯大林格勒。正如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格勒诱惑了希特勒，这座城市的名称就是对他的刺激。”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就可以切断苏联南部与中部的联系，切断伏尔加河这条极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命脉，苏军所需要的许多战略物资，包括大量的粮食和石油就无法从南方运往北方，而德军却可以放手夺取高加索地区的石油。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宣布，高加索的命运将取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

对斯大林来说，局势之严峻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大反攻之前。7月28日，他发布第227号命令：“不准后退一步！”“应该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处死。”这是一道铁的命令。

8月初，德军已推进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圈的外围。当英美决定放弃1942

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丘吉尔来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时，苏军正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从8月19日到9月13日，德军先后在斯大林格勒的北面和南面突破了苏军的伏尔加河防线，从9月13日起，德军开始攻打斯大林格勒。在此后的两个月中，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斯大林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9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一连几天不离开办公室，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求前线将领汇报战况。困了就在休息室里打个盹，并总是事先吩咐办公室主任：“你过两个小时叫醒我……”。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见他太疲惫了，让他多睡了半小时。斯大林不仅不领情，反而严厉地批评说：“原来你也是一个慈善家！让华西列夫斯基给我来电话。快！”因为长期缺少睡眠，他的两眼发红。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斯大林把他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干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派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同时要求他们不断地飞回莫斯科向自己汇报。9月12日，他要求这两位干将好好地想一想，苏军应当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保卫斯大林格勒，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研究了一整天，考虑了各种方案，最后向斯大林建议：苏军继续以积极防御来疲惫敌人，然后再发动一次特大规模的反攻，彻底改变苏联南部的战略形势。他们估计，这次大反攻至少要等到11月中旬才能开始。

斯大林一向更重视进攻和反攻，然而，朱可夫等人这次的设想太宏伟了，以致他不得不慎重对待。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朱、华二人作了解释。斯大林最后说：“对这个计划需要再考虑一下，要计算一下我方的资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守住斯大林格勒。”他要求朱、华二人返回前线进一步了解战局，又补充说：“关于我们的计划，以后再继续谈。在这里讨论过的问题，除我们3人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9月底，斯大林又把朱、华二人召回莫斯科，同他们详细地讨论了大反攻计划，又要求他们再一次到前线作现场调查研究，然后又把他们召回来进一步讨论。经过这样一番反复研究和讨论，斯大林才最终批准实施斯大林格勒大反攻计划，代号“天王星”。

斯大林对“天王星”计划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丘吉尔、罗斯福对“火炬”计划的重视。进入11月份，他几乎每天都要过问“天王星”行动计划的准备情况。11月13日，离预定的反攻时间（11月19日）只剩6天了，朱、华二人再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他们发现，斯大林的情绪很好。他认真地听取了汇报，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捋着胡须，一次也没有打断朱、华二人的汇报。为了确保这次大反攻万无一失，11月15日13时10分，他又致电朱可夫，反攻的日期“你可以自己斟酌决定，以后到了莫斯科再向我报告”。

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12个师，在苏军异常顽强的抵抗下，已经精疲力竭了。另有30个师被迫去掩护他们的侧翼。到1942年10月份，苏军仍然控制着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德军害怕的冬季又将来临，可希特勒还在做秋梦。10月14日，他在发布的命令中说：“俄国人在今年冬季战役中将不能像去年那样组织起那么多军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冬不会比去年更艰难了。他自然想象不到，斯大林的“天王星”计划正在给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布下天罗地网。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的大反攻开始。苏军分南北两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长达185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巨大的钳形攻势，仅用34天的时间，就将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共22个师约

32 万人紧紧地包围起来。此时，希特勒才如梦初醒。他下令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坚守阵地、不得撤退，同时派曼施坦因率军驰援。12 月下旬，曼施坦因的援军离保卢斯的部队只有 25 英里，保卢斯遵守希特勒的固守命令，没有率军突围。12 月 24 日，苏军一次新的反攻迫使曼施坦因的援军后退 60 英里，解救第 6 集团军的行动陷入失败，被围的德军完全靠空运补给作垂死挣扎。到 1943 年 1 月初，严寒、疾病和战斗夺去了他们 8 万人的生命。1 月 24 日，希特勒对被围德军大肆封官许愿，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希望他抵抗到底，不成功便成仁。这一切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1943 年 2 月 2 日，保卢斯元帅率第六集团军残部 9.1 万多人投降，其中包括 24 名将军，2500 多名军官。德国宣布志哀 3 天，举国上下敲响了丧钟。

苏军在 1942—1943 年的冬季作战中，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 170 万人，德军及其附从国军队共损失火炮 2.4 万门、坦克 3500 余辆、飞机 4300 架。苏军把敌人从伏尔加河至捷列克河一线击退了 600—700 公里，解放了 1942 年夏天被德军占领的全部领土。

斯大林格勒会战也让丘吉尔和罗斯福大开眼界。1943 年 2 月 2 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祝贺苏军取得的胜利。他说：“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2 月 5 日，罗斯福也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他称斯大林格勒会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2 月 6 日，斯大林给丘吉尔回电，预祝北非的英美盟军“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大获全胜，并预祝将德意军队早日赶出非洲”。

2 月下旬，斯大林给丘吉尔送去了一部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纪实影片。丘吉尔认为，“这是一部有极高价值的作品，恰当地纪录了东线战场战斗的光荣插曲”。此时描写英军阿拉曼战役的纪实影片——《沙漠大捷记》——正好制作完毕，丘吉尔便回赠了斯大林一部。

英美苏三国军队的上述作战行动，共同构成了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转折。

第十八章 卡萨布兰卡

斯大林：赞成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但遗憾的是，“届时我将无法离开苏联”。

罗斯福：“虽然斯大林不能与我们会晤，我仍然认为我们两人……应当立即设法会晤。”

丘吉尔：“欣然同意。愈快愈好。我至感宽慰。”

斯大林无法离开苏联

1942年12月31日，白宫。罗斯福和家人及朋友举行晚会，共度除夕。当午夜来临时，他举起香槟酒，首先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接着又“为联合国家的胜利干杯！”随后放映电影招待大家，片名是《卡萨布兰卡》，没有几个人知道总统为什么要挑选这部影片。

1943年1月9日，罗斯福秘密地乘火车前往迈阿密，然后转乘飞机飞出美国，本以为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实际上还是走露了消息。许多人以为他可能是去巴格达或西伯利亚某地同斯大林会晤。其实他要去的地点，已由除夕晚上放映的那影片作了暗示，即卡萨布兰卡。

随着英军在阿拉曼战役中的胜利，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以及美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的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已开始考虑英美盟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上述战役的实施以及英美盟军的胜利，加上苏联红军开始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使他们对战争胜利的前景更充满信心，同时对英美盟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也有一些新的考虑。在此之前，丘吉尔是坚决反对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即坚决反对实施“痛击”作战计划，现在，他认为不能因为在北非和地中海方面作战而取消原订于1943年实施的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围歼”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4日，他致电罗斯福说，“火炬”作战计划决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他表示，为了协调英美盟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如有必要，他愿意去华盛顿同罗斯福会谈。

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罗斯福本来比丘吉尔的态度要积极一些，可是，随着美军在北非登陆和在太平洋作战任务的加重，他感到不能让美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他给丘吉尔回电说，美国无意放弃“围歼”作战计划，但北非的作战必须予以优先考虑，再说“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承担了比我们几个月前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作战任务”。至于举行会晤一事，值此世界大战处于转折时刻，与其举行英美双边首脑会晤，还不如举行一次美英苏三国军事战略会议。“我有这种迫切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同俄国人围在会议桌旁边一起商谈问题。”他提议，三国会议最好在开罗或莫斯科举行。他所说的三国会议显然不是三国首脑会议。

丘吉尔立即回电，表示原则上赞成举行三国会议，但根据他1942年8月访问苏联的经验，除了斯大林外，苏联其他官员决定不了实质性问题。如果会议在开罗举行，苏联代表肯定事事请示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耽误时间；如果在莫斯科举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会前英美之间最好先协商，达成一致后再同苏联人谈。苏联人的要求不外乎要英美在1943年开辟一个强大的第二战场。此外，会议的级别低了也解决不了重大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最

高级人员的会议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结果”。而斯大林也曾表示愿意在今冬与英美首脑会晤。

罗斯福觉得丘吉尔言之有理，“只有你我和斯大林亲自会晤，才能圆满地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以适应军事情况的需要”。不过，他不赞成英美两国事先协商。他认为，英美之间，从社会制度到语言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或近似，而英美与苏联之间长期互不信任，隔阂很多，很容易互相猜疑；现在大敌当前，需要与苏联，尤其是与斯大林建立相互信任。他对丘吉尔解释说：“我不愿意给斯大林以这样一种印象，以为在和他会面之前，我们两人私下里已把一切都讲妥了。”他还建议，三国首脑会晤的地点，宜于选在北非的某个沙漠绿洲。

12月3日，罗斯福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

丘吉尔也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以示对罗斯福邀请的支持。同时他致电罗斯福，坚持英美应先协商，“不然的话，斯大林一见我们的面就会问：‘你们答应过我要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可是你们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定出计划？’”

罗斯福仍然不同意。

斯大林很快就收到了英美首脑的邀请。此时，正值斯大林格勒会战打得难解难分，他无法离开苏联，又不能要求英美首脑来莫斯科会晤。因为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的开会地点，有可能手涉到国家的尊严问题，1942年冬季，提出让英美首脑来莫斯科是不合适的，他们也不会来，而自己又脱不开身。于是，12月6日，斯大林回电说，赞成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但甚为遗憾的是，“届时我将无法离开苏联。”他建议，用通信的方式讨论问题。

罗斯福已同丘吉尔会晤过多次，却还没有见过斯大林。当苏军最终顶住了德军的强大攻势，显示出了巨大实力时，罗斯福会见斯大林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再次致电斯大林，建议把会期推迟到1943年3月1日左右，等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再举行。

斯大林回电说，军务繁重，无法脱身，即使3月初也无法离开苏联，深表遗憾，希望英美履行至迟在1943年春季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言。——果然不出丘吉尔所料。

斯大林一再拒绝，让罗斯福有些恼火。他致电丘吉尔：“虽然斯大林不能与我们会晤，我仍然认为我们两人以及我们双方的参谋人员应当立即设法会晤。”丘吉尔对同斯大林会晤本来热情就不高，他立即回电表示，“欣然同意。愈快愈好。我至感宽慰。唯有这样方能解决问题。”

于是，他们敲定于1943年1月中旬在法属北非殖民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晤。

“围歼”与“哈斯基”计划

1943年1月12日，丘吉尔先期到达卡萨布兰卡。过了两天，罗斯福也来了。他们都带来了一大批参谋人员。

在军事战略方面，会议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盟军下一步怎么行动？丘吉尔主张，盟军下一步的行动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地中海中部，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打击轴心国家的“软腹部”；其次，争取在巴尔干开辟一条新战线；最后，一旦德军受到严重削弱，

盟军应立即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欧洲大陆登陆。

丘吉尔带来的英国参谋班子精明强干。他们目标明确，意见统一，准备充分，在与美方的会谈中，为他们首相的主张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相反，最初罗斯福对英美盟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还没有形成很明确的意见，他与美国参谋长们的意见也不尽一致。罗斯福意识到，随着“火炬”计划的实施，原定于1943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实施“围歼”作战行动的计划可能会泡汤。关于英美盟军下一步的行动，他曾间接地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即在地中海方向展开作战。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却认为，下一步，英美盟军首先应集中力量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西欧战场，实施原订的“围歼”计划，至于在地中海方向作战，应放在次要地位。

其实，丘吉尔对“围歼”计划的关注和重视是很短暂的。他最初把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行动想得比较简单，对北非战局的发展也想得比较简单，认为盟军在西北非登陆后，从西向东打，英国的第八集团军从东向西打，两支大军夹击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在年底控制整个北非海岸”。基于这种预测，他认为，不能用“火炬”计划来代替1943年进攻西欧的“围歼”计划。当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由于“火炬”计划而可能再发动“围歼”计划时，一度很不高兴，说这个消息使他感到“十分吃惊”，而且“这对斯大林将是又一次重大打击”，这是他11月24日致电罗斯福要求讨论英美下一步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作战不顺利，1942年底显然控制不了整个北非，他确信盟军在1943年无力实施“围歼”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于是，他力主在地中海方向展开作战，打击纳粹德国的“软腹部”。

罗斯福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意识到，1943年盟军只能在地中海方向作战，但却又不希望地中海作战影响盟军在英国的集结，而主张同时为在1944年春天横渡英吉利海峡作好准备，强调只有从西欧发动进攻，才能给纳粹德国以致命打击。

面对双方的分歧，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丘吉尔劝他的参谋长们“不要急于或力迫对方同意，而要花时间；要有详尽地讨论的过程，不要不耐烦——‘滴水穿石’”。他凭经验认为，这种办法对付美国人容易奏效。

经过反复讨论，1月18日，双方取得了一致：美方同意，北非战役结束后，盟军向西西里岛展开进攻，代号为“哈斯基”计划。英方承认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西欧的重要性，保证为此作切实的准备，力促其在1944年实现，在地中海的作战不得妨碍盟军在英国的大规模集结。

关于在太平洋方向对付日本人的问题，美方主张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英国人担心这会使美国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太平洋，他们主张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静态的防御战。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只要不妨碍英美盟军1943年的对德作战，美军在太平洋方向可以继续保持攻势。

1月23日，会议通过了盟军1943年的作战计划，各战区的优先次序是：首先，确保大西洋运输线的安全；其次是援助苏联；其三是地中海作战；其四是美军在英国的集结；最后是实施太平洋及远东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受命挂帅

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另一项内容，是解决法属北非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

最初是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昵称“艾克”）将军做的一笔政治交易引起的。

最初，艾森豪威尔反对实施“火炬”行动计划，曾把作出这项决策的那一天——1942年7月22日、星期三——称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绝没有料到，正是这一天的这项决策，给他提供了名扬天下的历史性机遇。

1942年7月22日，英美双方决定，实施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计划，并一致同意由一名美国将军担任这一行动的指挥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首先想到了艾森豪威尔。7月31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建议任命马歇尔将军负责美军在英国集结的“波利乐舞”行动和“火炬”行动的最高指挥官，由艾克作他的副手和先行官，具体筹划“火炬”计划，而由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协助艾克。8月6日，罗斯福通知丘吉尔，同意任命艾克为实施“火炬”计划的总司令。

此前，丘吉尔已通知艾克，英国将派亚历山大将军协助他工作。8月6日，他又决定全面改组英军的中东司令部，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英军中东总司令，戈特将军为英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改派蒙哥马利（昵称“蒙蒂”）将军协助艾克筹划“火炬”计划。

对蒙蒂的任命，使艾克想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

几个月前，马歇尔派艾克和克拉克二人前往英国，就美军在英国集结问题与英方磋商。丘吉尔等人对他们二位很客气，几乎是有求必应，可偏偏蒙蒂对他们不买帐。

一天，艾克和克拉克去参观蒙蒂负责的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到了，主人蒙蒂却没有露面。过了一会，蒙蒂总算来了，当时，他正在视察英军的防线。为了接待美国客人，不得不中断视察工作，这使他很不高兴。见面后，他很不友好地说：“我忙得很，但奉命抽时间向两位先生介绍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就开始介绍。”他手执教鞭，走到军用地图前，开始作讲解。艾克一边听，一边抽起烟来。

蒙蒂讲了不到1分钟，突然停下来，嗅嗅鼻子，大声问：“谁在抽烟？”

艾克左右看了看，没有其他人抽烟，便回答：“我抽着呢，先生。”

“把烟掐掉，我不允许抽烟。”

艾克很尴尬地把烟灭了。

蒙蒂讲解完毕后，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就匆匆离去。另一位英国军官只好替他向客人们道歉。

没想到他们又碰到一块，而且艾克成了蒙蒂的顶头上司。实际上，一直到战争结束，蒙蒂都受艾克指挥。不过，艾克并没有给他小鞋穿，相反，自发生上次尴尬后，他再也不当着蒙蒂的面抽烟了。

8月7日，戈特将军还没有走马上任，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丘吉尔又改派蒙蒂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另派别人协助艾克。英方频繁的人事变动，给艾克开展工作造成了困难。但艾克很冷静。只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丘吉尔的军事助手伊斯梅将军：“英国人是不是认真对待‘火炬’计划？”

艾克虽然最初反对实施“火炬”计划，可一旦受命挂帅，便以其摆脱沮丧情绪和恢复高昂精神的突出能力，全力以赴地展开工作。他写信给马歇尔说，受命之后，“我对所属人员作出一项特别规定，指出，分析原来的决定是否妥当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们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订尽可能完善的计划……”。

实施“火炬”计划面临着许多困难。英美双方经过多次辩论，在登陆地点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即同意同时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3处登陆。这3处相距很远，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到阿尔及尔有将近800英里，如果遇上法国军队坚决抵抗，登陆部队在数量上将处于劣势。英美双方实施“火炬”计划，是以希望法军不会抵抗为依据的。这个希望能否变成现实，谁都不能打保票。艾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猜测……是正确的话，我们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如果猜测错误，差不多可以肯定，我们将一无所获，而且将失掉很多。”显然，实施“火炬”计划面临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军事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复杂的政治难题，包括英法矛盾、法国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矛盾、西班牙是否会卷入战争等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北非的法国军队是否会倒向盟国一边，对盟军在北非登陆不抵抗。艾森豪威尔对此没有把握。他说：“我们简直在险象环生的政治之海上航行，而在这样的海洋上，军事技巧和能力在制定安全航向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北非登陆是美军在西线进行的第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其成败与否，必然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主帅的艾森豪威尔自然深感责任重大。9月14日，他召集主要的美国军官们说：“‘火炬’的成败将作为评价个人能力的尺度。”这句话对他同样适用。丘吉尔谈到“火炬”计划时说：“这场战斗所下的赌注之大、天气变化之无常，所获消息之零碎，法国人态度之极端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之危险——所有这一切（且不说实际战斗之激烈），对这位司令官（指艾克）来说，无疑是一场极端严酷的考验。”

法属北非的政治风波

为了争取北非的法军不抵抗，罗斯福总统做了许多工作，艾森豪威尔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他们想给北非的法国军队物色一位统帅，此人自然应来自法国维希政权的旧军人中，必须是既愿意与英美合作，又有威望，能约束驻北非的法国军队，命令法军对盟军不抵抗。他们选中了吉罗。此人原是法国第七集团军司令。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2年4月越狱逃到维希。盟军派潜水艇悄悄地把他从法国本土接出来。艾森豪威尔寄希望于他能让北非法军不抵抗，答应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由吉罗做法属北非民政机构的首脑和北非法军总司令。

然而，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时，遇到了法军顽强的抵抗。吉罗于11月9日到达北非，可法军将领根本不听他指挥，有人甚至骂他是叛徒。艾森豪威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手的吉罗在北非法军中根本没有影响力，这一切与原来的估计完全相反。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盟军登陆前夕，维希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为了看望他的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来到了北非的阿尔及尔。盟军在阿尔及尔登陆时，他落入盟军手中，气得脸发紫。

在艾克等人看来，以达尔朗的地位之尊，北非法军无疑会服从他的命令，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就有希望让北非法军停止抵抗；

不过，达尔朗有投靠纳粹德国的可耻经历，是个法西斯分子、纳粹的热心合作者，是维希政府反犹太法令的主谋，而且强烈反英，是戴高乐的死敌。同这样名声狼藉的人做交易，无疑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鉴于登陆行动遇到了出人意料的抵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为了争取时间向突尼斯

进军，文克等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争取达尔朗的合作，与他做一笔交易。如果达尔朗下令北非法军停止抵抗，英美盟军就把法属北非的管理权交给他。

达尔朗也反复地权衡了利弊得失，决定与盟国合作。他以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北非法军停止抵抗，法军将领基本上执行了他的命令，停止了抵抗。于是，在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将领克拉克的安排下，1942年11月13日，盟军、达尔朗和吉罗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达尔朗任法属北非的最高行政首脑，吉罗任北非法军总司令，不准戴高乐的力量进入北非。此后，北非的法军开始与德军公开作战。

达尔朗是维希法国中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盟军与他做这笔政治交易引起了英美两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在美国，人们纷纷地指责说：“如果我们会在法国领土上同达尔朗作交易，那么我们也会在德国同戈林作交易，在日本同松冈作交易。”有人甚至指责艾森豪威尔是法西斯分子。英国人把贝当政府投降德国视为对英国的背叛，对法国维希分子恨之入骨，同情和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他们对“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持”义愤填膺，愤怒地直问：“难道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

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乘机煽风点火。被排除在“火炬”行动之外的戴高乐，也让他掌握的舆论工具乘机发泄不满。

这场政治风波搅得白宫和唐宁街10号不得安宁。尤其是丘吉尔背了黑锅，因为这笔交易是美国人一手搞成的，他事先根本就不知内情。而且他一向是反对维希政府支持戴高乐的。从减少士兵伤亡和维护英美团结的角度考虑，他对做这笔交易能理解，在公开表态时也表示支持，但私下里，他对美国人的做法也有怨言。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他说，这笔交易“引起了强烈的愤怒……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由于这件事涉及到英美、英法之间的微妙关系，“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面对公众舆论的批评，丘吉尔只好忍气吞声。当公众批评愈来愈尖锐时，他愈来愈愤怒，“对他们的这种鼠目寸光的看法有点蔑视”。12月10日，他实在忍无可忍，请求下院召开秘密会议，为艾克等人的举措作了一番辩解。他说，在战时，不可能一切都称心如意，当英法处于敌对状态时，美国却一直和法国维希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同样，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况下，艾森豪威尔那样做也是正确的。经过这番辩论，英国议会不再反对了，公众舆论不满的势头也大为减弱。

当美国公众舆论群情激愤时，11月14日，艾克给盟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了一封长电，慷慨陈词，他说，盟军登陆时，北非局势同原来估计的毫无相似之处，争取达尔朗是“有利无害的唯一可行的安排”，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对此很难有明确的认识。史汀生、马歇尔等人都支持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说，在登陆作战中，事先估计美军将损失1.8万人，而实际上只有1800人，这样同达尔朗的协议使美军少伤亡16200人。

罗斯福看到艾克14日的电报后，深受感动。他用富有感情的语调把电报对正在身边的顾问舍伍德朗读了一遍，以致舍伍德感到，总统仿佛是在历史的法庭上替艾森豪威尔作辩护。

罗斯福决定支持艾克。他给艾克回电说：“我对你的做法……给以百分之百的支持。”“你们办事我放心。”另一方面，他还是想平息公众的不满。

他对报界说：公众反对同达尔朗做交易，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目前的安排仅仅是作战需要的一种权宜之计”。他引用一句宗教格言来说明其必要性：“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脱离险境为止。”

罗斯福的态度使艾克深受鼓舞，却未能平息公众舆论的不满。这场风波搅得他很烦躁。有一次，戴高乐的两名代表来白宫拜见他，就这笔交易提出了抗议，一向城府很深的罗斯福忍不住喊叫道：“因为达尔朗把阿尔及尔给了我，我当然就同达尔朗做交易，如果赖伐尔把巴黎拱手让给我，我明天就同赖伐尔做交易。”

不过，发火归发火，他还是想尽量平息这场风波。为此，他决定邀请“战斗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来华盛顿访问。戴高乐对罗斯福政府一直同法国维希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颇为不满，但从法国抵抗运动的未来着想，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当他整装待发时，从北非传出了一个重大消息：达尔朗遇刺身亡。于是，罗斯福取消了戴高乐的访美计划。

达尔朗死后，公众的不满情绪本来趋于缓和，可接着又出了新的乱子。原来，达尔朗遇刺之前，曾经提出，原维希政府的内务部长、法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塞尔·佩隆东（也是个法西斯分子），曾在北非任职，熟悉北非事务，现闲居阿根廷，希望盟国当局允许他来北非协助自己工作。美国驻阿尔及尔领事墨菲请示国务院，国务卿赫尔表示同意。当佩隆东到达巴西，准备继续前往北非时，他在维希政府任职期间为纳粹德国效劳的可耻经历被记者们捅出来了。于是，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下令禁止他前往北非。赫尔得知这一情况后，又取消了韦尔斯的禁令。佩隆东最后还是来到了北非，1943年：月初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英美两国舆论新的抨击，人们对盟军为什么如此看中法西斯分子大惑不解，也十分不满。艾克再次成为攻击的重要目标。

艾克是一名职业军人，他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也弄得他心须意乱。他带着一肚子委屈和困感到卡萨布兰卡去参加了一天的会议。他汇报了盟军登陆的情况和北非战局的进展，同时对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想掩盖自己对欧洲政治的无知，因为战前我长期呆在远东的菲律宾。关于佩隆东，我只知道此人曾在北非任职，是一位出色的官员，至于其他的背景，应由美国国务院审查，可国务院起初说“可以”，后来又说“不可以”，最后又说“可以”。他接着激动地说：“我主张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可以不必请示本国政府批准之后再来做这些工作。如果犯错误的仅仅是一个将军，那可以取消他的命令，撤他的职，使他丢脸。但是，一个政府却不好把自己的行动取消，把自己撤换和丢自己的脸——无论如何，这在战时是做不得的。”

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艾克是否会被撤职。

实际上，罗斯福丝毫无意撤换艾克。他对霍普金斯说：“艾克似乎有点神经过敏。”他和马歇尔都很信任艾克，丘吉尔和英军的一些将领们也都信任艾克。自实施“火炬”计划以来，艾克不仅指挥有方，有大将风度，而且成功地协调了英美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这对盟军联合作战的意义重大。艾克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处理两国军队之间的纠纷时，严格地约束美军。他曾警告手下桀骜不驯的美军将领巴顿说：“我倒不介意某个军官把另一个军官叫做混蛋，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看法这样说。不过，当我一听到任何美

国军官把兄弟军官叫做英国的混蛋时，就马上请他滚蛋。”正因为如此，丘吉尔曾在英国下院为他美言说：“我对艾森豪威尔上将寄以很大的信心。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罗斯福不仅仅没有撤艾克的职，反而授予他第四颗星，晋升他为上将，使他得以和他手下的英军将领亚历山大、坎安宁和特德等人一样，也佩戴4颗星。

罗斯福和丘吉尔“逼婚”

艾克不再闹情绪了，可有关法属北非的政治问题尚未解决。为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还导演了一场“逼婚”戏。

英国政府早已同法国维希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转而支持戴高乐。美国政府却一直同维希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美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为止。罗斯福和赫尔等人对戴高乐很反感。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人便扶持吉罗将军和达尔朗掌握法属北非的军政大权，达尔朗死后，军政大权暂时由吉罗一人负责。可吉罗缺乏行政管理能力，用罗斯福的话说，“是一名头脑相当简单的大兵”。

英美两国，一个支持戴高乐，一个支持吉罗，这种状况对法国抵抗运动以及英美两国团结都不利。为此，美国的墨菲和丘吉尔派驻北非的代表麦克米伦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戴高乐和吉罗合作，共同管理法属北非。丘吉尔一直视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象征，劝罗斯福接受这一建议。罗斯福勉强同意了。他诙谐地对丘吉尔说：“我们把吉罗作为新郎，我把他从阿尔及尔找来，而你把新娘，也就是戴高乐，从伦敦请来，我们搞一次强迫婚姻。”

美国人很快就说服了吉罗。1月17日，吉罗来到了卡萨布兰卡，可戴高乐那边却卡住了。

戴高乐与吉罗虽同为法国军人，两人却有很大不同。戴高乐不仅富有军事才能，更富有政治才能。自1940年6月举起自由法国运动这面旗帜以来（后来改名为战斗法国），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他竭尽全力，顽强奋斗，使其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地位日益重要，影响越来越大。当然，他心里清楚，这一成就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不过丘吉尔与他的关系，远远不止是援助和被援助问题，而是既有援助、合作，又有矛盾、冲突。至于罗斯福与戴高乐，更多的是矛盾、冲突和彼此反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戴高乐虽身处逆境，却对法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虽寄人篱下，却决不甘心任人摆布，他在与英美领导人打交道时，毫无奉迎讨好的谦卑姿态，而是非常注意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地位和尊严，甚至常常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显示出与其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处境不太相符的孤傲，经常采取一些让英美很难堪的行动，惹得罗斯福对他很反感，也常常让支持他的丘吉尔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丘吉尔一直没有改变支持他的立场，而罗斯福却不想迁就他。

当英美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时，丘吉尔主张把这一行动计划告诉戴高乐，罗斯福坚决反对。戴高乐对英美瞒着自己在法兰西帝国领土上登陆窝了一肚子火。当盟军与达尔朗、佩隆东之类的维希分子做交易时，戴高乐怒火中烧，让他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进行反对宣传，在英美两国的那场政治风波

中推波助澜。达尔朗死后，罗斯福突然取消戴高乐的访美计划，使他感到受了屈辱，现在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晤，事先也瞒着他，一直到突然通知他去会晤吉罗，他才知道，他的民族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戴高乐感到，英美领导人根本没有把法国（戴高乐视自己为法国的化身和代表）放在眼里，想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布，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旦问题涉及到法国的地位和尊严时，他会变得很固执、倔犟（泰山压顶不弯腰）。1月17日，当他收到丘吉尔邀请他去卡萨布兰卡会晤吉罗的通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把召开这次会议的消息瞒着我？为什么不邀请我去做别的事情而只是会晤吉罗？为什么只是丘吉尔一人发出邀请而罗斯福不发出邀请？他认为，吉罗没有代表性，应归顺他领导的战斗法国。此外，他还担心去了后会受到英美首脑的巨大压力，被迫作出妥协。因此，他拒绝了丘吉尔的邀请。

1月18日，戴高乐拒绝邀请的回电到达卡萨布兰卡，正值丘吉尔与罗斯福呆在一起。戴高乐的拒绝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丘吉尔感到在罗斯福面前丢了面子，显得很难堪；而罗斯福却像成功地作了件恶作剧一样开心。头一天，他曾致电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我已找来新郎，新娘在何处？”现在，“新娘”不来了，负责牵线的丘吉尔一副窘态，罗斯福忍俊不禁。他觉得丘吉尔就像一个对淘气的孩子无能为力的父亲。他说：“您应该把你的成问题的孩子找来。”

“戴高乐趾高气扬，我没有办法让他离开伦敦。”

“谁给戴高乐给养？”

“是我们英国人。”

“为什么不停止供应？那样他也许就来了。”

随后，罗斯福又在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中说：“我们请来了新郎吉罗将军……然而我们的朋友却没有能够把新娘——反复无常的戴高乐“女士”找来。……看来他是不打算与吉罗上床。”

当晚，丘吉尔又以他和罗斯福两人的名义致电戴高乐（实际上是经英国内阁转交），说明邀请他是自己和美国总统两人的意思，同时威胁说，如果不来，后果将如何如何……。英国内阁认为，电报的措辞太尖锐，便作了一番修改，使语气缓和多了，然后才转给戴高乐。

戴高乐仍然想拒绝，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成员们劝他接受邀请，他才勉强接受了。1月22日上午11时，他飞抵卡萨布兰卡。在这块法国殖民地，当他看到机场和驻地周围都是美军岗哨时，他的民族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中午，吉罗将军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当他得知房屋周围的卫兵是美国人时，立即表示拒绝进餐，直到换成法国士兵为止。下午，他对丘吉尔抱怨说：“假如我早知道我会在法国的土地上被美国的刺刀所包围的话，我是决不会来的。”

丘吉尔没想到，这个寄人篱下的法国流亡者如此狂妄。他大发脾气，把戴高乐狠狠地掘了一通。戴高乐离去时，丘吉尔还余怒未息，对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戴高乐只是一个流亡者，但简直像斯大林，“说起话来像是拥有200个师。我对他相当不客气。我明确告诉他，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和他一刀两断。看来他根本不在乎。无论是套近乎还是威胁，他都没有反应”。

当晚，罗斯福会见了戴高乐。如果说丘吉尔演的是李逵，那么罗斯福演的就是宋江。他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一向孤傲的这位法国流亡者，可戴高

乐却不为所动。会晤的气氛相当冷淡，戴高乐注意小心翼翼，不顶撞这位大权在握而又对自己成见很深的美国总统。

为了促成戴高乐与吉罗合作，同时平息英美舆论的不满，罗斯福和丘吉尔为戴、吉二人此次会晤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为此忙到深更半夜，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同意盟国的原则；准备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管理战争期间的法兰西帝国，两人担任委员会的两主席。吉罗同意签字，戴高乐却拒绝签字。

丘吉尔觉得，戴高乐接二连三地不给他面子，使他这个堂堂的英国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受到了自己支持对象的嘲弄。他怒不可遏，再次对戴高乐厉声斥责和威胁，长期积蕴的怒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多年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这次狂怒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由于丘吉尔先生情绪不佳，我们的会谈十分尖锐。这是战时交锋最激烈的一次会谈。”

可无论丘吉尔怎么发火，刚强不屈的戴高乐就是不签字。

此时，罗斯福继续唱红脸。他和蔼可亲地对戴高乐说：“在人类事务中，公众必须有戏可看。在丘吉尔和我参加的会谈中，有了你同吉罗会晤的消息，如果这则消息还配上法国领袖们的联合公报——哪怕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协议——必将产生我们所需要的戏剧性效果。”

戴高乐让步了，同意与吉罗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但不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搞的那一份，而是由他和吉罗另起炉灶。

卡萨布兰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1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向消息灵通的记者们，在得知英美首脑已开会10多天而他们竟全然不知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喜欢追求戏剧性效果的罗斯福提议，他与丘吉尔、戴高乐和吉罗4人照一张合影。这次，戴高乐答应得比较爽快。摄影师们立即拍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罗斯福灵机一动，又提议，戴高乐应与吉罗将军握握手，戴吉二人照办了。记者们立即抢拍这个镜头，有几个记者没有来得及，戴高乐与吉罗又重复了一次握手动作。至此，这场“逼婚”戏才算演完。

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首次郑重地宣布，要让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任何条件都不予以接受。这一宣告，更坚定了反法西斯盟国胜利的信心。

“撒哈拉的巴黎”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虽然在“逼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紧张场面，但总的说来，会议开得比较轻松活泼。出席会议的麦克米伦回忆说：“会议是在既是度假，又是办公兼而有之中进行的。……在将近持续两个星期中，整个说来是巡游、夏令营和会议的混合物。布告牌上写着各级参谋人员开会的时间，活像是课程表，下午5点左右放学，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们就到海滩上玩沙砾、筑沙堡，消磨一小时时间。”

丘吉尔过得比较潇洒。虽然戴高乐让他难堪，惹得他大动肝火，但从总体上看，他过得比较愉快。“他一直大吃大喝，处理大事。打球玩牌，自得其乐。”一天早晨，霍普金斯来到他的住处，见他正靠在床头，以喝酒当早餐。问他为什么这样吃法，他说，他不喜欢喝脱脂牛奶，对酒却百喝不厌，已活到68岁，仍很健康。他觉得医生们的话通常都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他

不准备戒酒。

会议期间、罗斯福也过得比较轻松自在。陪同他出席会议的心腹顾问霍普金斯认为，会前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及其引发的政治风波，搞得他既紧张又烦躁，“总统要在非洲会见丘吉尔的原因就在于他想去旅行一下。”会议期间，他还在艾克的陪同下，视察了美军第五集团军，同两万多名官兵一道在露天共进午餐，很开心。

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准备动身回国，丘吉尔却玩兴未尽，怂恿罗斯福说：“您不远千里而来，要是不逛逛马拉喀什就回去的话，那就算白来一趟。让我们去那儿玩两天吧。我一定要同您共赏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的落日。”

盛情难却，罗斯福答应了。

马拉喀什离卡萨布兰卡 150 英里，是摩洛哥的南方首府，撒哈拉沙漠中一块远近闻名的绿洲，被丘吉尔称为“撒哈拉的巴黎”。这里有各种丰富的饮食，有算命的、玩蛇的，还有非洲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的妓院。几百年来，中非各地的商人，宁愿上当受骗，也要来这里享受一下放荡的生活。

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行来到这里，饱赏了白雪盖顶的阿特拉斯山的日落美景，年轻力壮的人还去一个大集贸市场逛了逛。晚上，他们一行十五、六人共进晚餐，大家兴高采烈，欢歌笑语。丘吉尔兴致勃勃，引亢高歌。罗斯福也加入了合唱，且雅兴大发，也想独唱一曲。部下担心他兴奋过度，有伤身体，劝阻了他。丘吉尔回忆说：“可惜有人拦住了他，因此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总统的歌声（指独唱）。”晚餐之后，罗斯福面有倦色。

第二天清晨，罗斯福动身回国。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同丘吉尔告过别了，可在第二天去机场前，他又再次去同丘吉尔话别。当时，丘吉尔还躺在床上，见罗斯福来了，连忙跳下床，穿了双拖鞋，加上一身睡衣，以“一身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扮”，送罗斯福到机场，而且一直送上飞机，照料罗斯福舒舒服服地坐好才离开。当时，他一面对罗斯福这样行动不便的人，为了战争而长途跋涉感到钦佩不已，一面为罗斯福所冒的危险而担心。

送走罗斯福后，丘吉尔在马拉喀什多呆了两天。自开战以来，他就一直没有时间绘画了，这次他特意带来了绘画工具，画了一幅风景画。这是他战时唯一的一幅画，后来送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在回国途中咳得很厉害，还有点低烧。丘吉尔回国后也头疼、发烧、咽喉发炎，经诊断，患了肺炎，便遵医嘱，暂停工作，静心养病。他便找了一本小说来消磨时光。

第十九章 “三叉戟”与“四分仪”

斯大林：我有言在先，英美继续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是危险的。

丘吉尔：“你现在对西方盟国的责备并不能打动我。”

罗斯福：进攻西北欧问题，迄今仍没有具体的计划，希望着重解决这个问题，以减轻苏联的负担。

斯大林怒火中烧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战略转折的一年，也是丘吉尔与罗斯福见面次数最多的一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于1月下旬结束，到了4月下旬，丘吉尔又要求同罗斯福会晤。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1月2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向他通报了会议内容。当时，斯大林正一心盼望着英美在1943年春季实施早已答应的“围歼”计划、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然而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决定不是进攻西欧，而是继续在地中海方向作战、进攻西西里岛、实施“哈斯基”计划。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感到，英美在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一再食言，难以向斯大林解释清楚。因此，他们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措辞很含糊，仅仅说到，英美准备拿下北非后，在地中海战区展开军事行动，至于斯大林很关注的开辟西欧第二战场问题，仅表示英美将“准备在切实可行的时刻重新进入欧洲大陆”。

电报发出后，丘吉尔猜想，卡萨布兰卡会议就英美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作出的决定一定会让斯大林大失所望，由于英美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承诺又不能兑现，斯大林收到电报后肯定会大动肝火。丘吉尔致电英国战时内阁说：“我想他接到这封联署信件后会感到失望和愤怒的。因此，我认为总统和我采取共同的立场是明智的。毕竟我们两人在一起就更有力量。”

然而，斯大林最初的反应是比较克制的。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英美已经决定放弃原定于1943年春季实施的“围歼”计划。1月30日，他在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报中表示，希望英美将1943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作战计划及实施日期告知苏联。

这下可把丘吉尔和罗斯福难住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在1943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因而谈不上具体的作战计划，更别说实施的日期。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同他商量如何答复斯大林，然后于2月9日给斯大林回电说，英美盟军打算在4月份结束北非的突尼斯战役，7月份或更早一点夺取西西里岛，尽量为在8月份横渡英吉利海峡加紧准备，也可能推迟到9月份、具体进攻日期取决于在法国领土上的德军的防御状况。

斯大林一看电报就认定，英美还在耍花招，搞拖延战术。原先说2月份结束北非战役，现在要拖到4月份，北非战役往后拖，进攻西西里岛也必然跟着往后拖，拖来拖去，最终就是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不能接受英美的这种做法，2月16日致电丘吉尔和罗斯福说：苏德战场上的形势紧张，要求英美提前开辟第二战场，必须在春季或夏初开辟，而不要拖到下半年。

2月22日，罗斯福致电斯大林，解释了北非战役进展缓慢的客观原因，同时保证，北非战役结束后，美军将尽早投入欧洲战场作战。丘吉尔因患肺

炎，拖到3月11日才给斯大林回电，仍然是老调重弹：如果可能，英美就在8月以前进攻法国；如果在法国境内的德军没有削弱。进攻就会推迟。

斯大林这才最终确信，英美原来答应的1943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又要化为泡影。他不禁怒火中烧，在给罗、丘二人的电报中，措辞激烈地说：从共同事业出发，我有言在先，英美继续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是危险的，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含糊其辞，使我不安，对此我不能保持沉默。

罗、丘二人认为，继续发电报去解释也无济于事，他们决定对斯大林保持沉默。斯大林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北非战役到1943年4月份尚未结束。这时，丘吉尔确信，关于第二战场，不仅8月之前开辟不了，1943年也开辟不了。北非战役结束后，下一步进攻西西里岛；这是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打下西西里岛之后，英美盟军再下一步怎么办？美国人的态度很含糊，似乎倾向于在英国集结军事力量，作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准备，此外，美国人似乎越来越重视对日作战，而英国方面却有不同的考虑。丘吉尔感到，如果不协调好两国的作战计划，就会给双方今后的军事行动造成困难。他在写给霍普金斯的信中说：“我感到还有严重的分歧没有谈清楚，如不加以调整，将在夏秋之间导致重大的困难并削弱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先行克服这些困难。”他坚决要求再次与罗斯福会晤。

罗斯福同意5月份在华盛顿举行英美两国军事会议。丘吉尔给这次会议取了一个代号——“三叉戟”。

三叉戟会议

1943年5月4日，丘吉尔一行离开伦敦，启程赴美。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医生不让他坐飞机，他便乘“玛丽王后号”运兵船前往美国。同行的除了一些私人乘客外，还有5000名德军战俘。有人担心这些俘虏会威胁丘吉尔的安全，丘吉尔却不以为然。这些战俘并不知道英国首相与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因为丘吉尔等人的舱位与战俘及其他乘客的舱位完全隔离了。为了迷惑德国人，船内上下通道都建有斜坡道，仿佛是为了便于推轮椅车修建的，同时故意放风说，罗斯福总统将乘此船来英国，意在告诉德国人，你们若想袭击这条船，等它从美国返航时再动手吧。这样一来，丘吉尔这次赴美航行反倒异常安全。

丘吉尔一行于5月11日抵达美国。当时，美国煤炭工人正在罢工，罗斯福总统在内政方面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为了不再给他添麻烦，丘吉尔建议，此次访美期间不再住在白宫，就住在英国大使馆内。罗斯福却不同意，坚持让他住在白宫。丘吉尔推托不掉，只在英国大使馆住了两三天，便住到白宫去了。

丘吉尔一行抵达美国后，第二天与罗斯福及美国参谋长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罗斯福致欢迎词后，请丘吉尔提出双方此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丘吉尔便滔滔不绝地谈开了。他从“火炬”计划讲到地中海作战，从支援苏联说到中国抗战，几乎无所不包。随后的讨论表明，英美双方对“哈斯基”行动计划完成后盟军在欧洲的作战重点和行动方向等问题存在分歧。

虽说是战时，可英美首脑的时间观念却远没有今天各国首脑们的时间观念强。丘吉尔每次出访，少则10天半个月，多则1个多月。苏联领导人与英

美首脑及其代表会谈时，时间往往安排得比较紧凑，而英美首脑举行会议时，往往是开会与游玩结合进行。5月15日，星期六，罗斯福邀请丘吉尔等人到他的“香格里拉”——建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山间别墅——度周末。他们同乘一辆大交通车前往，并为座位问题发生了争论。罗斯福夫人出于礼貌，主张让丘吉尔坐在罗斯福身旁，而丘吉尔却主张让总统和自己的夫人坐在一起。最后还是按丘吉尔的意见办。

当汽车经过著名的战场遗址——葛底斯堡时，霍普金斯想起了诗人惠蒂尔写的一首有关的诗。这首诗有近30句，霍普金斯背出了人们最熟悉的两句，再就不记得了。丘吉尔见车上再没有别人能背诵这首诗，便从头到尾地把它背了一遍，又补充说，他至少有30年没有想到过这首诗。车上的人无不对他的记忆力惊讶佩服。到达“香格里拉”后，罗斯福开始整理他的集邮簿，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旁边观赏了半小时。星期日，他们一起在一条森林小溪中垂钓，虽然没有钓着鱼，罗斯福却很快活。丘吉尔认为，总统具有成熟钓鱼者的首要品格——不以钓鱼多少衡量乐趣。

回到华盛顿后，他们又继续讨论军事计划问题。北非的突尼斯战役于5月13日结束，德意军队25万人被俘，英美盟军完全控制了北非。胜利是巨大的，但比事先预想的推迟了较长时间，现在看来，局势很清楚，1943年无论如何来不及在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这一点上，英美已经没有分歧。问题在于，美国方面坚持在1944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为此1943年下半年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在英国集结军事力量，实施“波利乐舞”计划，而英国方面对此缺乏诚意，倾向于一直在地中海战区打下去。丘吉尔及英国军方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引起了罗斯福及美国军方的不安。罗斯福强调说：关于进攻西北欧问题，已经议论了两年左右，但迄今仍没有具体的计划，他希望会议着重解决这个问题，以便英美盟军能正面迎击德军，减轻苏联的负担。

早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在放弃了原订1943年春季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围歼”计划后，同时决定成立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参谋部，由英国的雷德里克·摩根上将领导，负责制订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具体作战计划。“三叉戟”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作出决定，最迟在1944年5月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并为这次军事行动取了一个代号——“霸王”行动计划。显然，罗斯福的态度对这一决定的形成起了较大作用。丘吉尔后来说：“总统执意自己最后决定大问题……自始至终支配和影响参谋长联合会议的讨论过程。”

在讨论过程中，丘吉尔主张，盟军攻下西西里岛后，应接着进攻意大利。他希望美国为此作出承诺，这也是他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可是，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拒绝作出明确的承诺。丘吉尔很失望，但不愿就此罢休。他要求会议结束后，美国重要的军事决策人物之一马歇尔将军同他一起去北非，直接与当地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等人会谈。美方同意了这一要求。他们到北非后，与艾森豪威尔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如果盟军顺利地攻占了西西里岛，就进攻意大利；如果作战不顺利，后一步如何行动，要另作计议。

丘吉尔到达北非的消息引起了德国间谍的注意。他们正筹划谋杀丘吉尔，6月初的一天，在中立国葡萄牙的里斯本机场（从北非飞往英国的飞机一般都经过这里），一个口衔雪茄，身材矮胖的人走上了一架飞往英国的飞机。德国间谍认为，此人是丘吉尔，随后，德国战斗机击落了这架飞机，13

人丧生，其实，这是一架商业飞机，丘吉尔根本没有坐这架飞机。他得知这起悲剧时很痛苦。

英苏首脑唇枪舌剑

随着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被推迟到 1944 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老问题——如何向斯大林解释？“三叉戟”会议快结束时，他们为此绞尽了脑汁。苏联作出的巨大牺牲、承受的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多少有些内疚，鉴于此前已多次向斯大林作过解释，找了种种客观理由，他们感到，再解释不会起多大作用，于是决定不再给斯大林发出解释性的函电，而是通过一般的外交途径，给苏联寄去一份会议公报。

不过，为了不让斯大林作出偏激反应，他们在拟定会议公报时费尽了心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亲自动笔草拟公报，又反复修改，一直忙到凌晨 2 时，仍然没有定稿。丘吉尔回忆说：“我们起了几次草稿，都立即用打字机打出来。我们在打好的草稿上改了又改，直到它们被我们的笔迹涂抹得几乎不能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加入的，什么是应该删除的，我们都搞糊涂了。”他最后建议，由他在第二天飞往北非的途中继续整理。罗斯福也精疲力竭，就同意第二天，丘吉尔发现，头一天晚上拟的草稿一塌糊涂，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他决定把这份苦差事交给同行的马歇尔完成。2 小时后，马歇尔便拟出了一份新的公报草稿，不仅清晰整洁，内容几乎也无可挑剔，遣词造句也很有分寸。丘吉尔没想到，马歇尔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有远见卓识，公报经罗斯福过目后用电报发给了苏联。

在“三叉戟”会议前后，斯大林为了促进苏联与英美的合作，为了争取英美早日开辟第二战场，作出了一些对英美友好的姿态，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1943 年 5 月 1 日，他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中，热情赞扬英美盟军在突尼斯的作战和对纳粹德国的轰炸，认为这“预示着将在开辟第二战场。”他还间接地响应了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要求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的主张。此外，当罗斯福派特使戴维斯访苏，表示他希望与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 7 月 15 日同罗斯福会晤，即使战争紧张、使会晤延期，也不应超过两周。5 月 22 日，他又解散了共产国际，受到了英美的欢迎，此举被认为扫清了苏联与英美真正合作的道路。

然而，几天之后，他收到了英美“三叉戟”会议的联合公报，其中泛泛地阐述了英美两国的战略和作战计划，有关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只是在倒数第二段中说：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大陆的全面进攻，拟在 1944 年春季发动。这一消息使斯大林再一次感到失望和愤怒。6 月 11 日，他致函罗斯福和丘吉尔说：“已经从 1942 年推迟到 1943 年的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日期，这次又推迟到 1944 年春季”，这将使苏军孤军作战、几乎单枪匹马地对抗非常强大而凶恶的敌人，给苏联造成异常的困难。当苏联军民已作出了巨大牺牲，正翘首盼望英美盟军的大力支持之际，这一决定将会使他们灰心丧气。苏联政府没有参与决策和共同讨论，不能同意这项决定。“这项决定可能严重影响今后的战争进程。”

丘吉尔知道自己理屈，早已准备接受斯大林的“严厉申斥”。他向罗斯福保证，要以“完全好脾气”答复斯大林。可是斯大林的上述措辞强硬、略带威胁的来信，尤其是关于苏联被排除在决策和讨论过程之外的言论，使他

很生气。他心里想，多次请你们参加讨论，你们不来，怨谁呢？不过，他在给斯大林复电之前，想先听听罗斯福的意见，因为罗斯福刚派戴维希到苏联去了一趟，可能会有些新的信息。

丘吉尔了解到，罗斯福派戴维希赴苏，是希望安排他同斯大林会晤。丘吉尔心里清楚，罗斯福早就想会见斯大林，值此三国关系微妙时刻，不能让他们撇开英国搞越顶外交，于是6月19日，他致函斯大林，为英美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辩护了一番，同时建议，有必要举行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地点最好选在英国，不过即使选在其他任何地点，他也愿意参加。

其实，罗斯福是希望单独同斯大林会晤，而不让丘吉尔参加。他已经意识到，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矛盾太多、积怨较深，有他在场，不利于自己同斯大林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丘吉尔会碍手碍脚的。他让哈里曼转告丘吉尔他想单独会晤斯大林，理由是单独会晤是形成“亲切了解”的好机会，而这是三方会谈中不可能出现的，此外单独会晤斯大林也容易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

丘吉尔意识到，罗斯福是想把英国撇在一边，单独同苏联做交易。他坚决反对这样做。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如果英国不参加会谈，敌人会乘机大肆渲染，“这将会严重地扰乱视听，许多人都会因此感到为难和惊慌。……”

在那段时间，三巨头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斯大林收到丘吉尔6月19日的来电后，极为不满，英美一再食言，使他极为愤怒。6月24日，他回电说，他对英美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感到莫名其妙，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如此漠视苏联根本利益的决定，“这个问题不仅仅使苏联政府失望，而且使它对盟国的信心有所保留”。

丘吉尔也被斯大林的这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激怒了。6月27日，他给斯大林的回电措辞也很尖刻，他说，他一直对斯大林以诚相待，在1941年6月之前，英国曾孤军奋战（暗示当时苏联站在德国一边），而德国进攻苏联后，英国立即援助苏联，“因此，你现在对西方盟国的责备并不能打动我。”言外之意是，苏联根本没有资格来责备英国。

这封电报是他一气之下发出去的，事后，对于斯大林会作出什么反应，他又有点担心。果然，斯大林下令召回苏联驻英、驻美大使。不少人提心吊胆，担心斯大林会掉转头去同希特勒单独停战媾和。丘吉尔也不无忧虑，于是又回过头来向罗斯福表示，他同意苏美两国首脑先单独会晤。

丘吉尔的这一态度，正中罗斯福的下怀。其实，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决定，送给苏联的“三叉戟”会议公报，也是他们联名签署的。可是，当丘吉尔与斯大林在来往电报中唇枪舌剑时，罗斯福却很乖巧地一声不吭，从而使斯大林把矛头集中对准了丘吉尔。在战时三巨头的相互交往中，罗斯福一直是最圆滑的。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

1943年7月9日，英美盟军开始实施“哈斯基”作战计划，对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进展比较顺利。7月22日，盟军抵达西西里岛北岸，占领了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盟军的进攻引发了意大利政局的重大变化。7月25日，国王艾曼努尔三世发动政变，把墨索里尼赶下台并将其逮捕，由

巴多里元帅组织新政府。两天后，意大利法西斯党被解散，全国实行戒严，意大利战败投降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盟国面前。

盟国应该如何应付意大利局势的变化？英美盟军占领西西里岛后要不要进攻意大利？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西欧的“霸王”作战计划摆在什么地位？……丘吉尔和罗斯福迫切感到，需要举行新的会晤，就上述一系列问题作出决定。罗斯福提议，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丘吉尔表示赞成，并给这次会议取了个代号——“四分仪”，历史上又称之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

罗斯福非常希望斯大林也能参加这次会议，向他发出了邀请。斯大林拖到8月10日才回电，他说，因在前线视察，迟复为歉，值此苏联前线激战正酣之际，不能履行在夏季或秋季与总统会晤的诺言（指戴维斯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许下的诺言），很抱歉。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故意找借口不接受邀请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斯大林并不象罗斯福那样超脱，而是始终都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实行直接领导和指挥。此时正值苏德两军在库尔斯克激战方酣，他自然无法离开苏联。

8月4日晚上，丘吉尔一行从伦敦乘火车前往克莱德湾，第二天乘船前往加拿大。这一次，他的随行人员超过了200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和女儿玛丽——担任他的侍从官。8月9日，他们抵达加拿大，然后乘火车前往魁北克。尚不到正式会议开始的时间，8月12日，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前往美国，到罗斯福家里——海德公园——作客。途中，他们观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胜景。有记者请他发表感想，他说：“在你们出世之前，我就看过这个大瀑布了。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是1900年。”“它看起来和从前一样吗？”记者又问。“哦，原理看来是一样的，水仍然往下流。”记者们欢声大笑。

丘吉尔在罗斯福家里小住两天。正值酷暑时节，天气很闷热。一天晚上，丘吉尔热得睡不着觉，几乎喘不过气来，便走到屋外，坐在可以俯瞰赫得森河的一个悬崖上，一直坐到天亮。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英美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后下一步的作战重点及行动方向。丘吉尔认为，随着意大利政局的变化，在地中海战区（意大利和巴尔干），出现了有利于盟军扩大作战行动的好时机。他主张进攻意大利、出兵巴尔干，促使意大利早日退出战争，退出轴心国家同盟，为此，即使推迟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也在所不惜。

可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不同意丘吉尔的主张，他们赞成执行“三叉戟”会议作出的决定，按时或提前实施“霸王”行动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为此，盟军结束在西西里岛的作战后，重点应转向在英国本土集结力量，为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作好准备。

罗斯福有些犹豫不决。一方面他极力赞成实施“霸王”行动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西欧作战。他认为这是在欧洲取胜的捷径，并能获得苏联的赞赏，增强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他又不想错过在地中海战区出现的有利战机。

8月10日，罗斯福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举行会议，以确定美国在即将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的立场。刚访问英国归来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说，英国人口头上支持“霸王”行动计划，内心里是不赞成这个计划的。会议明确了美国在魁北克会议上应坚持的立场：盟军在地中海的作战行动是有限

的，只能使用地中海现有的兵力；“霸王”行动计划是英美共同努力的基本目标，为保证其按时实施，必须从地中海现有兵力中抽调7个师参加“霸王”行动。

从8月14日起，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已在魁北克开始了讨论。8月17日，罗斯福到达魁北克，双方举行了正式的全体会议。丘吉尔提出，盟军应扩大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英国参谋长们跟着他一唱一和。他们说，盟军应充分利用在南欧出现的有利战机，扩大作战行动，而不必考虑这样做是否会影响实施“霸王”行动计划。

以马歇尔、欧内斯特·金为代表的美国参谋长们态度非常明确坚定：必须坚决执行“三叉戟”会议的决定，按时实施“霸王”行动计划，即使在南欧出现了有利战机，也不能影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一次，罗斯福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的参谋长们一边。

英国人见美国人这次态度如此坚定、意见如此统一，便表示说，英国决心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但有必要让盟军先在地中海战区作战，以吸引西欧的部分德军，为实施“霸王”计划创造条件。

此时，马歇尔已经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天真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方的这种表态是“不老实的”，除非把“霸王”计划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否则这个计划就不会实现，或者只会成为“次要的作战行动”。

经过激烈的辩论，美方的意见占了上风，英国人勉强同意“霸王”行动计划是英美共同努力的首要任务，要加强人力物力。确保其按时实施。丘吉尔同时提出了保留条件；实施“霸王”计划时，在法国北部的德军机动师不得超过12个；德国战斗机的优势必须大大削弱；解决建造人造港的技术问题，言外之意。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就要推迟实施“霸王”行动计划。

意大利投降

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美双方讨论了在各个战区的盟军最高指挥权问题。本来，早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之间曾达成非正式协议：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的作战行动，由一名英军将领负责指挥；地中海战区的作战行动由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此后，丘吉尔在取得罗斯福同意后，已经提名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负责指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等到魁北克会议召开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对上述安排都不太满意。美方认为，英国人对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一直不热心，由他们指挥很难保证其按时实施，只有由美国人指挥，按时实施“霸王”计划才有保证。再说根据摩根等人制订的“霸王”行动的具体作战计划，实施这一计划所需的人力物力主要靠美国提供，因而由美国人指挥也更合适一些。

丘吉尔等人则认为，英国更重视地中海战区的作战行动，由英国人掌握地中海战区的作战指挥权，将有利于在这一战区发挥英国人的积极主动性。于是，他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主动提议，把“霸王”行动的指挥权让给美国人，而且建议由美军的马歇尔将军担当此任。美方见丘吉尔如此大度，也很愉快地同意把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让给英国人。于是双方各遂其愿。

然而，英方有一人对此不高兴，即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当丘吉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深感失望。的确，如果不是这次变动，后来指挥诺曼底登陆、名扬天下的就不是美国的艾克，而是英国的布鲁克了。

英美双方的每次军事会议，都难免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也不例外。有一次，双方参谋长们讨论一个问题时，会议主席请列席会议的双方低级参谋人员退场，这些人便退到会议室外面的会客室。过了一会儿，从会议室里传出了砍击声和美方阿诺德将军的呼痛声，外面的一些参谋人员以为里面打起来了，很担心。又过了一会儿，会议室里又传出了枪击声，外面一位军官惊叫道：“天哪！他们现在开枪了！”这些参谋人员都提心吊胆。

其实，会议室里，并非是双方争吵不休而大动干戈，而是在为一种特殊冰块当众做试验。这种特制冰块很坚硬。阿诺德将军被认为是在场的臂力最强的人，由他抡起一把砍刀，先一刀劈开了普通冰块，接着又去砍特制冰块。结果不仅没有劈开冰块，反而把双肘震得疼痛难忍。随后，蒙巴顿又掏出手枪射击冰块，普通冰块被击得粉碎，特制冰块却很坚硬，子弹击中后又被反弹到一边。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于8月24日结束，罗斯福直接返回美国。丘吉尔到75英里之外的一个雪湖垂钓休息了几天。8月31日，他在加拿大电台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9月1日又前往美国，仍然住在白宫。当时，他考虑到意大利局势随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他呆在美国是为了随时与罗斯福总统紧急磋商。

的确，当时意大利局势很微妙。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后，新成立的巴多里奥政府有意倒向盟国一边。8月17日，一位意大利使者秘密地向英美表示，意大利愿意反戈一击，倒向盟国一边。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充分利用这种形势，要求意大利接受盟国的投降条件。经过近半个月的秘密谈判，1943年9月3日，意大利与英美秘密地签订了停战协定。9月8日，意大利正式宣布投降。

此时，丘吉尔还在美国。9月6日，他应邀访问了罗斯福的母校——哈佛大学。罗斯福对这次访问较重视，专门打电话给哈佛的校长，希望在欢迎丘吉尔时，有穿着盛装的列队和富有特色的装饰。哈佛大学授予丘吉尔荣誉博士学位。丘吉尔接受学位后发表了演讲，主旨是加强英美两国人民的团结。他提出，英美两国人民应享有共同的公民权。许多听众认为，他的这个想法很新颖，但不切实际。

9月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两国部分参谋人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就意大利投降后的有关局势及盟军的作战计划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第二天，罗斯福回到他的家乡海德公园去了，临走前对丘吉尔说，你可以随意使用白宫，而不必客气。9月11日，丘吉尔又在白宫单独召集英美两国参谋人员开了一次会，俨然是白宫主人一样。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如此慷慨友好地给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是他的“一种光荣”。他希望英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不仅能维持到战争结束，而且也能在战后继续维持下去。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这种合作如果在战争一结束就被抛弃。“那将是一种最愚蠢和最无远见的行为”。

9月11日，丘吉尔一行乘战列巡洋舰“声威号”启程回国，直到9月19日才回到英国。此次外出长达40多天。

第二十章 先欧后亚

蒋介石：如果不能得到盟国的切实援助，“中国对盟国的信心将完全动摇”。

罗斯福：盟国“不应陷入对中国的崩溃负有责任的境地”。

丘吉尔：“总统及其左右……过份担心中国如果没有迅速的援助就会垮台。”

中国重要吗？

19U年，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美、英三国的远东战略必须依据新的形势加以调整。从总体上看，三国实施的都是先欧后亚战略，但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德军的进攻使苏联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此时苏联极为担心同时在东线卷入对日战争，便小心翼翼地维持日苏中立关系，停止对华援助，避免得罪日本。英美能理解苏联的处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在对日作战方面，没有对苏联寄予多大希望。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英美与中国走进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一个战壕里，从而为他们推行积极的援华抗日政策扫清了障碍——不用再顾忌日本的态度。不过，无论是英美的直接对日作战活动，还是它们的援华抗日活动，都必须受到先欧后亚战略原则的制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丘吉尔非常担心美国把“先欧后亚”战略改变成为“太平洋第一”战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美国去，与罗斯福总统举行阿卡迪亚会议，主要目的是要美国继续坚持先欧后亚战略。罗斯福毕竟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并没有因为在太平洋上挨了打，就改变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次序。这使丘吉尔十分欣慰。

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罗斯福比较重视协调英美两国军队的作战计划和行动，主张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马歇尔建议，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美、英、荷、澳四国军队应由一人统一指挥，以协调对日作战行动。丘吉尔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担心美国将领控制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权，限制英军的活动，而表面上却说，太平洋地区的盟军过于分散，不宜于由一人统一指挥，马歇尔坚持说，如果盟军要想有效地开展对日作战活动，统一势在必行。罗斯福比马歇尔更老练一些，他意识到，丘吉尔并不是反对统一本身，而是害怕美国将领大权独揽，于是指出，统一后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指挥官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担任。果然，丘吉尔立即转变态度，接受了统一建议。

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成立后，在实际作战中，未能有效地指挥协调四国军队的作战活动。此外，1941年底至1942年春，日军在东南亚的进攻接连得手，很快就攻占了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缅甸。由于战局失利和上述四国之间的矛盾，1942年3月，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被正式解散。

1942年4月初，日本海军出击印度洋，袭击英国舰队及其在印度洋上的军事设施，英国的东方舰队遭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守到东非沿岸，英国通往波斯湾、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航线受到巨大威胁。此时，西南太平洋上的制海权掌握在日军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亚太地区而言，便出现了中国大陆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并存的局面。这两个战场在战略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如何看待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援华抗日，便成为阿卡迪亚会议上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追随英美，正式对日本宣战，蒋介石向英美表示，中国愿为盟军的对日作战事业作出贡献，希望与英美结成全面军事同盟。罗斯福希望中国坚持继续抗战，牵制日军在远东的行动，对中国抗战比较重视。他安排中美英等国先后在重庆和新加坡举行军事会议，以便为阿卡迪亚会议提供作战计划。可是，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时，英国的韦维尔将军与蒋介石吵得不可开交。主要原因在于韦维尔对中国有偏见，怀疑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双方在如何保卫缅甸问题上有很大分歧，英军在缅甸设关卡，把援华物资据为己有。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怀疑中国能为盟国作出贡献。

罗斯福为了给蒋介石打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劝丘吉尔应重视中国的抗战。在提出设立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时，他还提议成立盟国中国战区，推举蒋介石为最高指挥官，辖区范围包括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实际上，在这个战区根本没有英美军队，蒋介石指挥的仍然只是中国军队，只是加了一个头衔。

丘吉尔对此不以为然。实际上，他同韦维尔一样，从一开始就怀疑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美国人“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他对此大不以为然，公开向罗斯福表示：“我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

罗斯福不同意丘吉尔的看法。他说，中国有5亿人，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上个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时又会怎样呢？

“我只是说当前的战争，目前要打下去已经是十分吃力的了。”丘吉尔说。他表示，他乐于帮助中国人，对中国人并无恶意，而是钦佩喜爱；对中国的政治腐败则感到遗憾，不过，“当我认为某一评价标准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话，千万不要指望我去采用它”。

虽然如此，罗斯福关于成立盟国中国战区和推举蒋介石作总司令的建议，既不涉及英国军队，又不损伤英国的利益，丘吉尔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美国走到援华抗日的前台

阿卡迪亚会议使丘吉尔有机会认真考虑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虽然不同意罗斯福及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地位和作用的估价，但也认为，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国是有益的。阿卡迪亚会议之后，他于1942年1月23日致电韦维尔将军，要求他与中国军队合作。电报中说，他对韦维尔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困惑不解”，他提醒韦维尔：“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的重要。……同时不要忘记，……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指中国倒向日本一边）……”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

国所获得的教训的话，那就是‘中国’。”随着日本迅速占领东南亚、出击印度洋，威胁到英国通往其东方殖民地各地的海上航线和印度的安全，丘吉尔更切身感受到中国坚持抗战的意义——把大批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1942年3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进一步威胁到印度和锡兰，丘吉尔希望日军“北上向重庆推进”，“结束中国的战争”，暂时不进攻印度。他认为，如果把印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就应当取得蒋大元帅很好的谅解”，“这一点是重要的。”

4月初，日军出击印度洋后，丘吉尔在给印度战区英军司令韦维尔将军的电报中坚持认为，日本正确的行动是北上进攻中国，“日本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抗战失败将会给英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不过，英国仍然不大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甚至认为分派作战物资给中国无异于浪费，还不如给保卫印度的英印军队。由于这种观念，加之先欧后亚战略的作用以及英国自身实力的限制，英国在援华抗日方面的作用很有限。

相比较而言，罗斯福对中国抗战更重视一些，美国在援华抗日方面的作用也更大一些。阿卡迪亚会议作出成立盟国中国战区的决定后，罗斯福立即通知了蒋介石，并请他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派美国的史迪威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以加强中国战区与印度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为了鼓舞蒋介石的斗志，罗斯福在电报中说：“作出这样的安排，将使你的意见和影响在制定指挥各战场的战略时能够起作用。”1942年2月7日，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无偿贷款。美国国会认为：“对中国财政及经济的援助可以增强中国反抗侵略势力的能力”，“保卫中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局势及远东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已经顾不上援华抗日了，英国既无意也无力在援华抗日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比较而言，唯有美国对援华抗日问题考虑最多，做得最多。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历史性地承担了援华抗日的主要任务。

美国之所以在援华抗日方面态度更积极一些，自然与美国所处的地位和实力强于英苏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美国人的心态有关。在他们看来，中国既非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也非英国那样的殖民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传播美国民主理想价值观的最好试验场，援助中国容易换取美国人的救世主心理。

此外，中国自1931年以来，坚持抗日，赢得了美国公众的赞赏。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对中国自1937年以来坚持抗日赞颂了一番，博得了国会议员们热烈的掌声。1942年5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30%的人支持斯大林，24%的人支持丘吉尔，23%的人支持蒋介石。这是美国公众对中国坚持抗战给予肯定的表示。

还应看到，在援华抗日问题上，罗斯福比丘吉尔更有远见一些。他认为，英美乃至苏联要顺利地实现“欧洲第一”的战略目标，需要中国在远东牵制日军，同时又不能给中国提供大量的作战物资。在这种形势下，多给蒋介石打打气是必要的。设立中国战区，让蒋介石当总司令，并没有使蒋介石的军权在实际上扩大多少，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目的是让他坚持继续抗战。

缅甸战场

1941年底至1942年春，日本在东南亚发动的一系列进攻打乱了英美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作出的对日作战部署。1942年3月9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提出重新划分盟国作战的责任范围和指挥权问题。他主张：1.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全部责任由美国承担，该战区的最高统帅由美国人担任，英国在这一战区除了提供物资援助外，不再承担其他任务。中国本土的作战由蒋介石指挥。2.从新加坡，经印度洋、红海，到利比亚的广大地区，都将直接由英国负责，所有军事行动均由英方决定，美国将继续向这一地区提供军火和船只。3.在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英美将继续共同负责。

上述建议提出后，英美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决定取消原来设置的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和战区盟军司令部，把亚太地区重新划成4个战区：即太平洋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印度战区。英美在分配作战物资时，其依据是各战区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其中，欧洲和地中海战区占有最优先的地位。在亚太地区，美军组成的两个太平洋战区又占有优先地位，其次才是中—缅—印战区。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在英美盟国的全球战略计划中，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平等的对待，丘吉尔尤其不把中国和蒋放在眼里。为此，蒋介石经常向罗斯福发牢骚。1942年4月，他曾抱怨说，在盟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组成问题上，以及在盟国作战物资分配方面，中国没有获得象英国和俄国一样的待遇。有时，他还向罗斯福施加一点压力。1942年5月，他致函罗斯福说，如果不能得到盟国的切实援助，“中国人对盟国的信心将完全动摇”，可能会全线崩溃。

罗斯福对付蒋介石的基本策略是以精神鼓励为主。他在回信中，对蒋介石提出的具体要求避而不谈，却毫不吝惜使用形容词。他称中国为“伟大的国家”，将来不仅应在东亚，还应在全世界为维护和平发挥大国作用。

蒋介石当然愿意听这些漂亮话，但更关心实际的物资援助。1942年6月，英军在北非的托卜鲁克遭到重大失败，美国临时决定把原先答应支援中国的轰炸机和运输机改派到中东，增援英国军队。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发脾气。宋对美国人说：“美国是否还有兴趣维持中国战场？委员长要求的‘是’或‘否’的明确回答。”

罗斯福要求蒋介石顾全大局，并保证美国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同时决定派劳克林·柯里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商谈对华援助问题。柯里访华后得出如下印象：蒋介石虽然希望盟国获胜，自己却不积极抗战，而是企图囤积军火，巩固自己的政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与盟国军队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是在缅甸进行的，1941年12月23日，中英两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1月，日军发动缅甸战役，根据中美英三国协商决定，中国远征军由滇西开赴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3月20日，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在东吁展开激战，战斗持续12天，给日军以重大杀伤。4月中旬，日军攻陷仁安羌，将英军2个旅、约7000余人包围。中国远征军奉命驰援，经过2天激战，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圈，与英军会师，收复了仁安羌。4月底至5月上旬，日军先后攻占了腊戍、曼德勒、畹町、八莫、密支那等地，切

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5月中旬，中国远征军撤出缅甸。两个师退到印度境内，其余转回国内。英国军队也撤到了印度境内，日军占领了整个缅甸。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随着缅甸的陷落，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此后，盟国的援华物资只能靠飞越“驼峰”的航线提供。

罗斯福派到中国战区来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于1942年3月3日到达中国，赶上了缅甸战役的后期阶段。缅甸战役表明，在协同作战方面英军与中国军队之间、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史迪威与缅甸的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之间，都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分歧。缅甸战役结束后，美国于1942年6月22日宣布成立中缅—印新战区，由史迪威任司令，以加强对缅甸作战的统一指挥。

史迪威力主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可是，英国人的态度不积极，他们认为，保卫印度比收复缅甸更重要，而且他们不赞成向中国提供作战物资，认为这是浪费，还不如把更多的作战物资交给他们的印度军队。此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是希望他象马歇尔全盘指挥美国军队那样来指挥中国军队，让蒋介石像他本人那样，只参与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不管具体的军队训练、作战等问题。而蒋介石视军队为自己的命根子，自然不会把军权交给一个外国人去掌管。这些因素决定了中英美三国在收复缅甸问题上必然矛盾重重。加上史迪威本人虽然是一员战将，却不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善于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不善于做外交工作，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1942年11至12月，随着盟军在各个战场上反攻的胜利，美国拟定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缅甸作战计划，提出由中英军队在缅北发起攻势，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联系；同时在缅南发动两栖战役，夺取仰光港。该计划预定于1943年春季实施。12月8日，罗斯福为此批准给史迪威增拨6.3万吨物资和6000名兵员。可是，英国的态度仍然不积极。12月7日，英军的韦维尔将军建议取消对缅甸北部的攻势，他说，“英国军队在1943年11月之前不打算认真干。”英方还表示，他们的海军力量不足以控制孟加拉湾，以及支援在仰光登陆。这两项行动又是蒋介石提出中国出兵参加缅甸战役的前提条件。12月28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说，他原先提出的盟军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和空军优势的条件没有兑现。罗斯福敦促蒋介石，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之前不要打退堂鼓。马歇尔亦要求史迪威“必须找到办法”确保该计划付诸实施。1943年1月8日，蒋介石不等罗斯福和丘吉尔开会磋商，就正式拒绝参加这次作战行动。他告诉罗斯福说：“假如（盟国）海军不足以控制缅甸海面”，缅甸战役最好推迟到秋季。

“安纳吉姆”计划

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以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为代表的美国海军力主1943年加强在太平洋上的作战活动，他们的兴趣主要是在对日作战方面。马歇尔将军也主张在1943年抽出较大一部分美军投入太平洋战争。最初，英国反对盟军1943年在亚太地区主动出击，理由是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实际上，他们担心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转向对日作战。他们主张，在对日作战中，在打

败德国之前，应以防御为主，即严格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原则。美方担心，这会使日本人重新在太平洋上夺走主动权。他们主张在不损害对德作战的前提下，继续在远东和太平洋保持攻势。

丘吉尔为了让美国人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开了一张不能立即兑现的“支票”。他保证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帝国的一切人力、物力都用来对付日本，并表示愿意为此签订一项协议。罗斯福心里很清楚，这只是一种姿态，他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美国人民是会相信一位伟大的英国绅士的话的。”

由于美国立场坚定，英国全盘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意在不影响对德作战的前提下，对日本控制地区四周发动一系列平行进攻，包括从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沿岸开始的进攻，在中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发动进攻、在缅甸发动进攻，英国还同意，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决定，将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单独作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利仅限于分配对日作战的补充兵力。

卡萨布兰卡会议也讨论了收复缅甸和怎样利用中国打击日本的问题。史迪威来华后，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激化，蒋介石对史迪威很反感，却与陈纳德的关系密切。陈纳德十分重视空军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主张大力加强空军的力量，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蒋介石意识到加强空军力量也有利于保卫重庆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因此，1943年1月8日，他在正式拒绝参加史迪威计划的缅甸战役的同时，希望盟国大力援助中国，加强在华的空军力量。他列举了空军发动一次进攻的惊人的潜力，认为空军的进攻有希望收到超过所付代价的成效。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决策者乃至罗斯福也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1942年下半年，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虽然连战皆捷，但由于日军反攻猛烈，美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马歇尔曾说，美国“再也无法经受另一次巴丹战役”。在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等人看来，如果能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加强空军力量，以空袭日本本土上的工业基地及其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运输线，并把中国军队装备起来，振奋精神去同日军作战，或许就不必让美国军队投到西南太平洋潮湿的岛屿丛林中进行缓慢、艰难、步步争夺、伤亡巨大的战争中去。罗斯福也重视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他在1943年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从南方进军，每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我估计要50年左右才能订到日本。”他认为，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这种逐岛进攻的办法太费时间，而以中国作为军事基地打击日本是更可取的办法。

要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基地，要加强在华的空军力量，要武装中国军队使其振作起来，都有赖于向中国运送大量的军用物资，仅靠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就要求收复缅甸。因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方力主实施收复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并就此向英国施加压力。马歇尔说，如果能让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处于守势，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上受到的威胁，腾出手来发动对德国的战役”，要不然，“太平洋上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种局面，迫使美国入不得不惋惜地撤销在欧洲战场上所承担的义务”。

英国对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一直不热心，面对马歇尔的讹诈，英方也不甘示弱。他们说，夺取仰光需要英国登陆艇，那就必须减少在欧洲战场上实施横波英吉利海峡作战计划中英国的任务。面对英国人出的难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表示，夺取仰光所需的登陆艇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提

供。于是，英美双方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达成协议，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日期定在1943年11月15日，最后的决定将不迟于1943年7月作出。

为了争取蒋介石同意派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也为了鼓舞中国的士气，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华与蒋介石会谈。代表团主要成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美国供应署署长萨默维尔将军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方代表约翰·迪尔爵士。

1943年2月4日，代表团到达中国，与蒋介石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阿诺德带给蒋介石的“见面礼”是：答应给飞越“驼峰”的航线增派137架运输机，同时向中国提供一批轰炸机。蒋介石对此表示不满。当时，日军的轰炸机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蒋介石希望陈纳德指挥的空军保卫重庆，为此提出了三项要求：给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当时陈纳德还受史迪威的指挥）：每月通过“驼峰”航线给中国运送1万吨物资；到1943年11月底以前给中国500架战斗机。阿诺德表示，盟国要满足这些要求，还有许多实际困难。蒋介石说，所谓实际困难都是借口，“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我得到三个要求的满意答复，否则我下能打这场仗，他也不要指望我派我的军队参加这场战役。”

阿诺德事后对史迪威说：“要是我把这些话报告总统，我就不是人。”他让迪尔去摸底，看蒋介石是否愿意参加11月份的缅甸战役。蒋介石表示愿意参加，但没有每月的万吨空运物资和500架飞机，他不能保证取得胜利。2月9日，他又致函罗斯福总统，重申他保证中国军队参加11月份的缅甸战役，并再次提出了他的三项要求。

1943年2月9日，中美英三国军方代表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了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有迪尔和韦维尔；美国有阿诺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会议决定在1943年11月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收复缅甸，三国将“以最大的努力”加紧进行准备。

改变“先欧后亚”的尝试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来看，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从局部来看，盟国遵循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对中国抗日战争显然是不利的。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政府试图促使美国放弃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1942年11月至1943年7月，宋美龄在美国访问和治病期间为此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宋美龄此次赴美，据说是由于患一种季节性皮肤病，要求到美国去住院治疗。由于她的身份和地位，美国政府对她此次来美比较重视。霍普金斯亲自开车送她到纽约的哈克尼斯的隔离病房。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到医院拜访了她。1943年1月，宋美龄带着两个护士和陪同她的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住进了白宫。罗斯福总统与她多次会晤。

如果说战时英国一直担心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那么中国却一直希望美国改变这一战略原则。在争取和拉拢美国的过程中，英国和丘吉尔自然有很多优势，不过，中国的影响也并非无足轻重。中国是最早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的国家，深受美国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中国没有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记录，颇得一部分美国人的好感。中国抗战打击的是偷袭过美国珍

珠港的日本，对许多美国公众来说，打击日本比打击德国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就宋美龄个人来说，她虽然没有丘吉尔那样的英国血统，也缺乏丘吉尔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有她自己的优势。自 10 岁到 19 岁，她一直在美国受教育，从思想到语言上可以说完全美化了。对许多美国听众来说，一位身着奇妙的中国旗袍、身材娇小苗条、举止镇定自若、讲着标准的美国英语且音色美妙的中国第一夫人，也许比有着英国贵族血统、身材矮胖，讲着标准的英国英语且略微有点口吃的英国首相更使他们感兴趣。

宋美龄逗留美国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1943 年 2 月 18 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国会议员们欣喜若狂。一位议员说：“真该死，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形。蒋夫人使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泪水。”《生活》杂志报道说，议员们“被她的风度、魅力和聪慧所吸引住了……完全倾倒了。”她还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对两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在好莱坞圆形竞技场 3 万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全国广播网中发表讲话，作横寄全美的募捐游说，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陪同她演讲的 194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说，美国人倾听她的演讲之入迷，“以致其他任何人的话都无法入耳”。一位历史学家说，在这次一直持续到 1943 年 7 月的访问中，“蒋夫人在公众场合引起了自林白飞越大西洋以来从未有过的赞扬和欢迎的浪潮。”

在宋美龄的一系列演讲中，自然免不了大谈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就象丘吉尔在美国演讲时大谈英美之间的友谊一样。她力图使普通美国人相信，中国与其说不同于美国，倒不如说与美国相似。此外，她演讲的主题之一，是敦促美国放弃先欧后亚的战略。她一到美国，就在这个问题上向霍普金斯施加影响。在会见美国其他军政要人时，总要不失时机地劝他们改变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1943 年 2 月 18 日，她在国会演讲时，在国会议员们长达 4 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重要，中国战场比太平洋战场重要，美国军队应该去中国作战，而不是在太平洋上花费那么多精力。她还说，中国经过 5 年半的抵抗，已经确信与其耻辱地接受失败，不如勇敢地去冒险。此时，掌声达到了最高潮。

由于宋美龄的演讲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英美有些军政要人开始感到担忧，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忧心忡忡地向伦敦报告说，美国国会在公众情绪的浪潮冲击下，可能会对中国作出一些英国“将很难实现”的许诺，诸如归还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担心宋美龄会诱使罗斯福改变先欧后亚战略。

在先欧后亚战略问题上，罗斯福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自然不会轻易改变这一战略原则。不过，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据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助手说，“总统……也拼命想让她离开美国。”

罗斯福想让宋美龄尽快离开美国，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先欧后亚问题上施加了压力，还因为私下的举止与她的公开形象大不相同，对她越来越不利，而且也会有损于罗斯福的援华政策。虽是抗战时期，宋美龄在美国的生活极其奢侈。她自己带了许多丝绸被单，每天都要换，如果睡午觉，一天就换两次。1943 年 2 月下旬，她要求白宫负责接待的人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长的私人秘书，要求财政部命令海关的税务人员，将刚刚为她运到纽约的一批特殊牌号的英国香烟免税放行。她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很特殊的要求，以致美国的一些服务员和保安人员很恼火，甚至她的两个外甥（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

也极其傲慢。罗斯福发现，宋美龄虽然外表温柔甜蜜，意志却“像钢一样坚硬”。在一次晚宴上他（她）们谈起约翰·刘易斯领导的一次矿工罢工，罗斯福问，中国战时如何对付可能煽动工人罢工的劳工领袖？宋美龄伸出一个手指，在脖子上一划，意思是“杀头”。罗斯福笑着问他的夫人：“埃莉诺，你看见这手势吗？”正由于宋美龄私下的这些表现，罗斯福觉得，她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有损于她的公开形象的报道会越多，会对她本人越不利。因而，罗斯福希望她尽早离开美国。

“三叉戟”会议上的远东问题

当中国试图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时，英国却设法让美国坚持先欧后亚战略。

虽然卡萨市兰卡会议作出了1943年11月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决议，随后中美英三国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时又一致同意要为实施这一计划加紧准备。但随后的局势发展表明，这一计划难以按时实施。英国军队曾在缅北发动过几次局部进攻，作为实施“安纳吉姆”战役的准备，却遭到失败。由此进一步动摇了英军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信心。

陈纳德和蒋介石仍然主张，把盟国能够空运到中国的军用物资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轰炸力量，对日本本土及其海外运输线实施战略轰炸，就能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不需要在缅甸丛林里进行代价高昂的地面战斗。史迪威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一旦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进行轰炸，侵华日军必然会占领这些空军基地。只有中国陆军强大起来，能同日军进行有效的战斗后，才能以中国为基地成功地对日本进行空中打击。要使中国陆军强大起来，必须先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物资。

丘吉尔一直不赞成收复缅甸。此时，罗斯福也觉得，“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与在欧洲准备开辟第二战场有冲突。他考虑更多地依靠陈纳德指挥的空军对日作战，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资。可他又不想完全放弃“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他向马歇尔明确表示，“仍然希望进行缅甸战没”，但在1943年应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空军行动上。根据他的命令，1943年3月11日，陈纳德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晋升为空军少将。

1943年4月，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被召回华盛顿，成为远东战局演变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命运等因素，使丘吉尔担心美国是否会放弃先欧后亚战略。这是他力主召开“三叉戟”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中缅印战区的司令官——英国的韦维尔、美国的史迪威和陈纳德——第一次参加了英美之间的这种高级军事会议。“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命运和对日作战的未来战略，有待于在这次会议上加以确定。罗斯福与美国军方虽然对采取什么手段有不同见解，但都想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基地。宋子文应邀与会阐述了中国的意见。他说，如果盟国不采取行动全力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中国就拟单独与日本媾和。罗斯福告诉与会者，他不认为这是大喊狼来了，盟国“不应陷入对中国的崩溃负有责任的境地”。

丘吉尔不认为中国会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不认为中国是对日

作战的重要基地。他认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才能解决给予日本致命一击的问题”。当他发现美国公众舆论更关心对日作战，更关心中国能否坚持下去，而对苏联的关注相对要少一些时，他感到很困惑，认为：总统及其左右……过份担心中国如果没有迅速的援助就会垮台。”

关于“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美国的马歇尔和金力主实施这一计划，收复缅甸，打通通往中国的地面道路，解除日军对中国的封锁。英国的韦维尔等人却不愿为此承担义务。罗斯福反对马歇尔等人的主张，赞成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加强飞越“驼峰”的航线上，赞成蒋介石—陈纳德提出的对日战略——重点加强在华的空军力量。英国军方更支持罗斯福的意见而不是马歇尔的意见。“三叉戟”会议决定：扩大和加强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加强陈纳德在华的空中作战行动，加强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袭击行动。至于收复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仅规定要继续作好准备工作，但仅仅是行政上而非军事上。实际上，这一计划被撇在了一边。在某种程度上，“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命运有些类似欧洲第二战场的命运，由于英国态度消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迟。

来自亚洲—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将军切身感受到，在“三叉戟”会议上，在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史迪威认为，这是因为罗斯福上了丘吉尔的当，站到了英国一边。他说，这种会议“结果必然是丘吉尔任意支配罗斯福。他们正在为英国寻找一个轻而易举的办法，一条捷径，因此，无论怎样都无法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上转移开去。英国佬对太平洋战争是不感兴趣的，而由于总统被迷住了，他们正交上红运呢”。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手下的人也抱怨说，由于确定了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丘吉尔把罗斯福放进了自己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丘吉尔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也说一些漂亮话，表示要积极支援中国抗战。1943年5月20日，在太平洋作战会议上，他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表示，“英帝国将尽一切人事之所能来援助中国。”实际上，他并不重视中国的抗战，至少比不上罗斯福对中国重视。

“三叉戟”会议期间，宋美龄正呆在美国纽约。罗斯福曾有意让宋与丘吉尔会晤。丘、宋二人也有此意，但在会晤地点上却不能取得一致。宋美龄希望丘吉尔来纽约会晤。丘吉尔却希望宋美龄来华盛顿会晤。谁也不愿意屈尊前去拜会对方。丘吉尔提出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中途某地会晤，宋美龄觉得这样讨价还价未免有点滑稽可笑，于是他们失之交臂。

对日战略中的苏联因素

1943年夏季，英美在如何估价中国在打败日本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国人认为，在对日作战中，中国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将是今后远程轰炸日本的基地；如果英美盟军不收复缅甸、打开通往中国的地面交通运输线，中国抗战将难以坚持下去，盟国也将失去其攻击日本的基地。英国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总的来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并无多大价值，英国不愿意为了支援中国而冒险在缅甸丛林中作战。

在1943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美双方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时间比讨论欧洲战略问题的时间还要多。美国军方仍然主张，利用中国作为轰炸日本本土上的军事基地，为此，必须首先在缅甸发动进攻，重新打通滇

缅甸公路。可是，丘吉尔和英国军方却认为，在缅甸丛林作战困难重重，而且会与盟军在欧洲的作战行动争作战物资，影响对德作战行动。此外，即使在中国建立了轰炸日本的军事基地，也容易被日军摧毁。丘吉尔主张，八太平洋上直接攻击日军在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建立的防线，夺取菲律宾，切断日本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运输线，然后逐渐开始对日本本土实行包围，等在欧洲打败德国后，盟国再集中力量进攻日本本土。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中国排除在打败日本的战略计划之外。

在 1943 年夏季及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期间，英美双方都开始考虑苏联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丘吉尔轻视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他重视苏联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早在“三叉戟”会议上，他就主张利用苏联的远东地区作为直接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这比利用中国更有效。他喜欢饲养动物，在阐述战略问题时也喜欢拿动物作比喻。他花言巧语地说，在缅甸丛林作战无异于“一口一口地嚼豪猪肉”，“杀死章鱼的唯一办法是打它的中间部位，而不是一个一个地砍掉它的触手……当我们从俄国轰炸日本本土时，我将喝道：瓢虫，瓢虫，飞回你的老家去。你的房子着火了，你的孩子没命了。”

罗斯福及美国军方也在考虑苏联在未来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43 年 7 月 7 日，罗斯福曾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他希望斯大林参加三国首脑会议，这样他便可以“从斯大林口里了解一些关于苏联有朝一日参加对日作战的真实想法”。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期间，霍普金斯带着一份题为《俄国的地位》的文件，它是从一份很重要的美国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录出来的。文件指出：“美国在对俄国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的进行。”

英美虽然都在考虑在对日作战中利用苏联的问题，但双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丘吉尔考虑利用苏联，是想否认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由此进一步否认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必要性。美国虽然正在考虑利用苏联，却不否认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至少在到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期间还是这样。

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国接受了美国的太平洋作战方案。会议决定，盟国在远东应开展进攻性的作战活动，计划在德国战败后的 12 个月以内击败日本，会议批准了美军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以便突进中太平洋的作战计划，同时还决定作好缅甸北部发动进攻以打通滇缅公路的准备。

在 1943 年夏天，丘吉尔从维护战后英国在远东利益的目的出发，开始认真考虑英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自 1942 年春英军在东南亚全线溃退之后，英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方面，在对日作战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亚洲大陆的对日作战主要由中国承担着，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任务完全落在美军肩上。英国虽然曾几次从印度派军队反攻缅甸，但作战规模都不大，且都以失败告终。截止 1943 年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丘吉尔在远东战略方面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防止美国人变先欧后亚为“太平洋第一”，阻止美国把更多的人力物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对日作战中去。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迟实施反攻缅甸的“安纳吉纳”作战计划，就象对待欧洲的第二战场一样。

然而，战前英国在远东毕竟有重大利益，尤其是在东南亚和香港有重大的殖民利益。丘吉尔并不想放弃这些利益。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前夕，他

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在对日作战方面“没有多少令人满意的情况可谈”，长此以往，必将不利于英国战后重返东南亚、重建其殖民统治。此时，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已很强烈。他回忆说：“因为在战争的现阶段，我最害怕的是，美国评论家们会说‘英国从我们这里取得了它所能取得的一切，我们帮助它打败了希特勒，但现在它却置身于对日战争之外，把我们丢在危险的境地不管了。’”

有鉴于此，他要求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必须对英军最高司令部的对日作战的整个问题进行检查”。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应当让英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会议明确在打败德国后英军在对日作战中的具体任务。他要求英国参谋长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主张英美盟军不应在缅甸作战，而应首先进攻东南亚，对苏门答腊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然而，不仅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不接受这一建议，连英国参谋长们也认为这是馊主意。此外，丘吉尔还力主成立一个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并由英国将领担任司令。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向他作了让步。会议同意任命英国的蒙巴顿为东南亚盟军司令，美国的史迪威任副司令。美国的戴维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成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背后动机，在于重振英国在东南亚拥有的势力，这是英国想要恢复其第一流大国地位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第二十一章 莫斯科—开罗——德黑兰

罗斯福、丘吉尔：“我们仍想再次强调我们三人共同参加一次会议的重要性……。”

斯大林：“关于我们三人举行会议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你和罗斯福先生的意见。”

莫斯科外长会议

魁北克会议决定，第二战场推迟到 1944 春开辟。不知斯大林对此会作出什么反应。罗斯福和丘吉尔很不安，他们迫切希望同斯大林会晤。1943 年 8 月 19 日，他们联名致电斯大林：“我们仍想再次强调我们三人共同参加一次会议的重要性，……看来目前是举行会议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也是战争的转折点。我们热切地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此时，苏联的处境已大大改善。经过 1943 年的夏季攻势，苏军已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国土的近 2/3，苏军在数量上比德军多 60 个师，作战能力大大加强，苏德战场上的主动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苏联手。斯大林充满信心地说：“红军已成了最强大和最有锻炼的现代化军队。”相反，德军已开始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有些苏联领导人认为，即使没有第二战场，苏联也能打败德国。斯大林也认为，苏联最危险、也是最需要第二战场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相反，英美现在迫切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样一来，斯大林同罗斯福、丘吉尔讨价还价的地位也大大增强了。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意识到，彻底打败轴心国家的任务还很艰巨，苏联还需要英美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也需要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此外，打败轴心国家之后，苏联在欧亚有一些领土要求，还有待英美承认。因此，苏联需要维护和巩固与英美的联盟。斯大林早就答应过，愿意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看来现在是时候了。8 月 25 日，他给丘吉尔回电说：“关于我们三人举行会议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你和罗斯福先生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三巨头的正式会议定于 11 月底举行。此前，三国外文部长先举行预备会议。斯大林提议，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丘吉尔没有意见，罗斯福却不同意。他说，美国国务卿赫尔年岁大、身体不好，又不喜欢坐飞机（赫尔对坐飞机有偏见，此前从未坐过飞机），为免除长途跋涉，会议最好在伦敦举行。斯大林坚持在莫斯科开，罗斯福作了让步。

这次，赫尔无论如何也要坐飞机了。不过，为了缩短飞行时间，他先从美国坐巡洋舰到北非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派总统专机飞到卡萨布兰卡，接赫尔飞往莫斯科。他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都是 10 月 18 日下午抵达莫斯科的。三国外长会议于 10 月 19 日至 30 日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缩短战争时间问题，这个问题是苏联提出来的，核心是英美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虽然英美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第二战场不迟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开辟，可斯大林仍然担心兑不了现。苏联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艾登无法答复，立即请示丘吉尔。丘吉尔回电说，1944 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存在“非常严重的缺点”，英国虽然承担了义务，但冒了很大的风险。根据丘吉尔指示的精神，艾登在会上反复强调实施“霸王”作战计划的复杂性。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英美作出的承诺不能兑现。他会见艾登时问：“霸王”作战计划是否要推迟？究竟要延期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艾登表示，这个问题有待三巨头会晤时决定。斯大林表示同意。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最关心的是签署建立战后安全体制的“普遍安全宣言”。鉴于30年的时间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怎样防止爆发世界大战，怎样维护世界和平，是美苏英三大国领导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以赫尔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建立世界性的和平组织，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可是，最初，英国和苏联不赞成建立世界范围的和平组织，而主张建立地区性组织，如欧洲委员会、太平洋委员会、美洲委员会等等。但美国的立场很坚定，坚持建立统一的世界性组织。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说，美国国内存在着要求他发表有关战后国际声明的巨大压力。鉴于美国的态度很坚定，英国和苏联都作了让步。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战后安全体制的“普遍安全宣言”，美国主张应由美、苏、英，加上中国共四个国家一起签署发表，也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在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而英国和苏联却很不情愿让中国作为这个宣言的发起国。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在魁北克会议之前，中国曾多次要求参加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均遭拒绝。魁北克会议期间，宋子文又致函赫尔，要求让中国参加盟国的一切联合机构。1943年9月15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都被拒绝了。虽然如此，美国却准备让中国作为战后的四大“国际警察”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同时也以此来安抚蒋介石。魁北克会议之前赫尔领导的国务院在起草普遍安全宣言时，便把中国列力四大发起国之一。

丘吉尔对此表示不同意。在中国问题上，1941年12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给了他很大的教训，此后每次访美，他都感受到，美国上上下下，同情支持中国的人很多，几乎难以抗拒。但他本人却很不情愿让中国与英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1942年10月，他对艾登说，他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方面肯定会不惜一切努力纠集力量以结束英国的海外帝国。”1943年3月，外交大臣艾登赴美国访问，关于战后世界安排是要讨论的议题之一。丘吉尔就此发表广播讲话，却只字不提中国。当有人向他指出这一遗漏时，他说，“把中国说成是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所以我不同意这样声明。”

艾登在美国访问时，针对美国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倾向，他觉得有必要作一点姿态：“特别强调一下中国的重要性，看来也是挺合适的”。3月26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美、英、中、苏四国必须在战时战后“共同行动”，“不能各自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其实，艾登同丘吉尔一样，也看不起中国，不同意赋予中国重要的责任。罗斯福曾对他说：“中国在远东协助管制日本方面，会成为非常有用的大国，所以他想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

艾登表示，“非常怀疑……中国能使本国稳定”，他“不太喜欢中国人能在太平洋上往来无阻的主张。”

罗斯福说，必须使中国同其他大国合作解决战后问题。艾登对此不以为然。罗斯福说，中国至少是潜在的世界大国，由于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将会产

生严重的灾祸，所以必须给蒋介石最充分的支持。“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内，并在全世界范围而不是区域基础上组织联合国机构，是极为重要的，”他明确指出，若要让美国公众承担国际责任，“必须是以全球观念为根据的”。他认为，西方可以利用中国作为对付苏联的平衡力量。他对艾登说：“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

鉴于罗斯福、赫尔强烈支持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丘吉尔没有执意反对，实际上，他希望由苏联人出面反对。他意识到，苏联人更不愿意让中国享有大国地位。

苏联确实反对中国参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斯大林显然不愿意看到在远东、在苏联的南面出现一个追随美国的强大的中国，再说日苏并未宣战，为了避免公开得罪日本，苏联也不愿支持中国。因此，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说，中国没有能力影响欧洲问题，在仅有苏美英三国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四国宣言，是不合适的。

赫尔说：“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重新实行各种各样的调整。”他暗示，如果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美国舆论会“四分五裂”，美国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地区，从而影响对德作战。

由于赫尔和罗斯福决心维护“四大国概念”，苏联作了让步，同意让中国参加《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签字。美国立即同中国联系，中国政府立即授权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美苏英三国外长一起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规定，四国将联合行动，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战后为缔造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合作，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是继签署《联合国宣言》之后，中国又一次与美苏英三大国一起签署重要的国际文件，对树立和确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有重要影响。

三巨头会议的地点问题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成功举行，为三国首脑正式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三国首脑会议的时间早定下了，可开会的地点却一直定不下来。

重要国际会议在什么地方举行，牵涉到国家的荣誉问题。战时盟国三巨头中，丘吉尔年龄最大，但美苏英三大盟国中，英国的买力最弱。因此，在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丘吉尔是三巨头中东奔西走、跑路最多的一位。罗斯福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也不象丘吉尔那样爱跑。斯大林介入组织指挥战争活动过多，总觉得自己脱不开身，不愿离开苏联或离苏联太远。这样一来，“跑腿”的任务更多的落在了丘吉尔的身上。德黑兰会议之前，为了会晤斯大林，他去了一趟莫斯科。为了同罗斯福会晤，他去过纽芬兰、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往华盛顿跑了3趟。相反，斯大林和罗斯福一次也没有去过英国。在三叉戟会议期间，丘吉尔不愿多跑路、去纽约同宋美龄会晤，但在整个大战期间，他不得不多跑路以便会晤罗斯福和斯大林。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希望他的这两位盟友给他一点面子，到英国来同他会晤，哪怕一次也行。因此，在考虑这次三巨头会议地点时，丘吉尔希望这次会议能在英国举行，表面上的理由是，美苏英三国之间，英国正好位居其中（丘吉尔的世界地理概念自然是以大西洋欧洲为中心的），早在1943年8月7

日，他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一要求。

然而，每次提到三巨头会议，斯大林就强调说，苏德战场上的局势紧张，他不能离开苏联或离开苏联太远。他给丘吉尔回电说：“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前线。”他建议在苏联西北面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或阿斯特拉罕举行。

罗斯福也不想去英国，而希望会议能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丘吉尔没有办法，便只好同意罗斯福的建议。8月19日，他们二人联名致电斯大林，提出在阿拉斯加举行。斯大林于8月25日答复说，苏德战场上的形势不允许他到阿拉斯加那样遥远的地方。

既然如此，丘吉尔仍然希望会议能在英国举行，为了英帝国的荣誉，他几乎开始乞求斯大林和罗斯福能给他一点面子。9月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首先表示“如有必要，我愿意前往莫斯科”然后又说：“我们原则上认为，由于位置居中，英国将是最方便的会晤地点，也许最好在伦敦以外的地方举行。……如果你同意在英国会晤，我将很高兴得到你对这一建议的支持。”

斯大林丝毫无意去英国。9月8日，他回电表示、会议地点最好选在伊朗，理由是，三大国都在伊朗有派驻机构，又离苏联不太远，便于他就近指挥苏军作战。

既然斯大林执意不来英国，丘吉尔只好让步。9月10日，他给斯大林回电，对斯大林的建议原则上表示同意，但略有异议。他说：“我为了出席这样的会议，去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冒什么风险都行。因此我准备前往德黑兰。”不过，他又提出“塞浦路斯或者喀土穆更好一些”。这两处均为英帝国的殖民地，丘吉尔的意图是，会议若能在英帝国范围内举行，多少也算是一种荣耀，但他并不强求，仍然表示，若斯大林不愿意，“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斯大林坚持会议在德黑兰举行，丘吉尔没有多大意见，罗斯福却不同意。他对斯大林愿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表示高兴，感到三巨头之间的关系“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希望会议最好在埃及的开罗举行，理由是，会议期间，正值美国国会开会，按美国宪法规定，国会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在10天之内决定是否签署，且须亲笔签署，否则便自动生效。他认为，会议在德黑兰举行，便不能保证他及时处理这类事务。

他向斯大林作了解释。可是，斯大林不愿意到比德黑兰更远的地方去。罗斯福觉得，自己的路程比斯大林的远10倍，坚持不到德黑兰。他象卖小菜一样同斯大林讨价还价。10月21日，致电斯大林：“我不能去德黑兰。”他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最后建议”：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举行会议（其实，巴士拉离德黑兰并不太远），并言词恳切地说，这次会议“对于子孙后代来说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你我和丘吉尔先生由于几百英里路程而不能共聚一堂，子孙后代将认为这是一场悲剧……。请不要在这次危机中使我感到失望。”

斯大林仍然不让步。他回电表示，希望把会议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他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他准备让莫洛托夫代表他到巴士拉参加会议。

当时，罗斯福比斯大林更迫切希望尽早举行三巨头会议，当他得知斯大林准备放弃举行会议的打算时，立即决定让步。11月8日，他给斯大林回电

说，美苏英三国目前已经形成极为融洽的感情，若趁热打铁，举行三巨头会议，将有助于巩固联盟，打击纳粹士气。为此，他决定飞往德黑兰。至于他承担的宪法义务。他表示，若有法案须要他签字，他将飞往突尼斯处理后再飞回来开会。

斯大林表示愿意前往德黑兰。 11月11日，罗斯福通知丘吉尔，如释重负地说：“我已听说约大叔将前往德黑兰……”

开罗会议

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感到，在美国，“有些人似乎为了赢得俄国的信任，不惜牺牲英美作战的协作”，他主张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先举行会议，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取得某些切实的相互谅解”。

罗斯福同意英美双方先在开罗举行会议，但他不想得罪斯大林，不想让斯大林怀疑他们事先商量好后再去对付苏联，因此，他要求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加一位苏联军方代表参加开罗会议。丘吉尔最初反对邀请苏联人与会，当罗斯福执意要请时，丘吉尔又坚决要求让苏联人晚来几天，英美代表团定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丘吉尔希望让苏联人“最早在11月25日到达”。11月12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解释说：“我自始至终认为……让约大叔觉得我们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让莫洛托夫和一名苏联军事代表与会，“对你我不会有有什么害处”。丘吉尔仍然认为，让苏联人与会只会坏事。

后来，还是斯大林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原来，罗斯福不仅邀请苏联人参加开罗会议，还邀请了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最初，他向蒋介石发出邀请时说，与蒋的会晤，或许安排在与斯大林举行会议之前，或许在此之后。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先同他会晤，否则，他宁愿暂时不同罗斯福会晤。于是，罗斯福请他先来参加开罗会议。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既然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便带有共同对付日本的明显色彩，而苏联尚未同日本文战，为了不破坏日苏中立关系，暂时不得罪日本，他决定不让莫洛托夫等人参加开罗会议，从而无意中消除了丘吉尔与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斯大林向丘吉尔明确指出：德黑兰会议应严格“限于三国政府首脑参加”，“应当绝对不准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言外之意，不能让中国人参加德黑兰会议。其实，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无意让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蒋介石自己也没有这种愿望。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虽然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被迫让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但并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待。其实，就连美国也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平等地对待。

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乃事出有因。盟国原答应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没有兑现，原计划从中国对日本发动空中攻势，也没有兑现。10月15日，罗斯福对马歇尔说，在对华问题上，“最糟糕的是我们每次都遵守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连一项诺言也没有履行”。此外，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的经济财政状况也很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希望让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给他打打气、鼓鼓劲，使中国坚持抗战。

最初，罗斯福准备让蒋介石晚几天来开罗，等他同英国谈得差不多之后，再让蒋介石来。后来，他改变了主意，特意安排好让蒋介石在他和丘吉尔到

达开罗的同时也到达。他还对美国参谋长们说，他希望同蒋介石的会谈“在同英国人会谈之前单独举行”。

丘吉尔不仅不想让苏联人参加开罗会议，也不大愿意让中国与会，不想让中国参与盟国的重大决策活动。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后，丘吉尔想把蒋介石晾在一边，等他们开完德黑兰会议之后，再回过头来同蒋介石在开罗会谈。他回忆说：“我们曾希望劝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并消遣一下，等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再说，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由于罗斯福比较重视远东的问题，对同蒋介石的会谈比较重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使丘吉尔有些不快。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耿耿于怀地说：“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

关于对日作战问题，重点讨论了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从卡萨布兰卡会议到第一次魁北克会议，盟国多次决定应收复缅甸，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中国负责缅北的地面作战，英国负责从南面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美国负责提供作战物资和空中支援。目的是重新开通滇缅公路，恢复中国与盟国的陆上交通联系。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一计划一再推迟，到开罗会议召开时，日军仍然控制着缅甸，盟国的援华物资，仅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运输。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说，“缅甸……是整个亚洲作战的关键……”日军必定拚命防守，他希望英美能够提供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用于缅甸作战，希望中美英进行协同的陆海空作战，希望英美经“驼峰”航线提供的援华物资每月不少于1万吨。

美国参谋长们也力主尽早收复缅甸，1943年未能实施的计划，应在1944年实施。马歇尔认为，要打败日本，第一步是必须收复缅北。罗斯福支持美国军方的主张。

然而，丘吉尔和英同参谋长们对缅甸作战不感兴趣，对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缺乏热情。每当英美双方会谈涉及缅甸作战问题时，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以及两国参谋长们之间，便话不投机。以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为代表的英国参谋长们极为傲慢，在谈到中国战场的地位时，极力贬低其重要性，对美国参谋长们的许多建议不屑一顾，使几位与会的美国人很生气。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建议，英国应出兵从缅甸援助中国，被布鲁克冷冷地拒绝了，金被布鲁克的傲慢神态气得脸色发青。美方的马歇尔、史迪威等人也很生气，史迪威后来回忆说：“布鲁克发怒了，而金也不是好惹的，差点儿窜过会议桌扑到布鲁克身上。天哪，金简直气疯了。我真希望他给布鲁克一拳。”史迪威一向憎恶英国人，他说：“我们让英国佬威风扫地，真叫人痛快。”

经过反复争论，仍然不能取得一致。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答应蒋介石，“在以后一两个月内实行渡过孟加拉湾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以配合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的进攻。丘吉尔仍然拒绝对缅甸两栖作战的规模和时间承担义务。

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置日本、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很关心收复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罗斯福答应得比较爽快。他建议公开宣布：“应当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攫夺和侵占的太平洋一切岛屿，应当把日本从中国窃据的一切领土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丘吉尔对此也表示支持。会议拟定了满足中国愿望的《开罗宣言》。蒋介石希望不要征求苏联的意见，但罗斯福仍然坚持把宣言的内容告诉斯大

林，然后尽快公开发表。

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罗斯福为了解除他的顾虑，答应争取斯大林同意支持《开罗宣言》。鉴于斯大林早就放风说，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有政治条件的，罗斯福表示，战后应把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蒋介石表示同意。罗斯福还提出，战后应使中国的大连成为国际共管下的自由港，以便让苏联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蒋介石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同中国合作（指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

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于是，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指出：“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一切领土如满洲、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还要将日本从它以暴力和贪婪所夺取的其他领土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还表示，战后世界组织成立时，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和制定该组织的一切决定。蒋介石自然表示开罗会议是战时盟国多次首脑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它是战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收复失地、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依据。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在离开开罗前夕，宋美龄代他给罗斯福留下了一封感谢信：“亲爱的总统先主：请您原谅我不工整的笔迹，因为我的眼疾尚未痊愈……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和正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他希望您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的确，在如何看待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在争取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方面，罗斯福比丘吉尔和斯大林对中国似乎更友好一些。不过，罗斯福“为中国所做的和正做的一切”，都是从美国当时和未来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的。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一针见血地说：“罗斯福希望满足中国的领土目的并保证它战后的安全和国际影响，但这种心愿并非出于对中国的情感上的关怀。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战时和战后利益。”

德黑兰会议：远东问题

1943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达巴库后，换乘飞机，于11月27日飞抵伊朗首都德黑兰，住进了苏联驻伊朗大使馆。随行的苏军总参谋联络官什捷缅科等人很快就在大使馆内挂好了苏联合战区的作战地图，并架好了与苏军总参谋部联络的通讯设备，以保证斯大林及时指挥前线作战。

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于11月27日飞抵德黑兰，分别住进了美、英驻伊朗公使馆。

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就在苏联大使馆隔壁，来往很方便，而美国公使馆离英、苏使馆有1英里多远，来往要经过狭窄的街道，很不安全。最初，丘吉尔邀请罗斯福住进英国公使馆，罗斯福怕斯大林起疑心，谢绝了。后来，斯大林又邀请罗斯福住进苏联大使馆。最初，罗斯福也想拒绝，他解释说，他已经拒绝过丘吉尔的邀请。现在住进苏联大使馆，就会得罪英国人。莫洛托夫说，据苏联掌握的情报，德国的间谍企图谋杀三巨头，还是注到苏联大使馆来更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接受了邀请。苏联大使馆专门腾出

了一幢小别墅，11月28日下午，罗斯福搬过来了。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论证了远东的对日作战问题及中国问题。11月2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向斯大林介绍说，在开罗，他曾同蒋介石就中国这一总题目有过一次有意思的谈话。斯大林说，中国人仗打得很糟，但是，他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

在当天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在介绍英美盟国在各个战场上的战争形势时说，美国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更为直接，美军正在太平洋战场上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海军设施的大部分在太平洋，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是以消耗战为原则的。他说，在太平洋的西面，盟国的重大目标是要中国继续打下去。为此，英美准备派一支远征军在缅甸北部作战，中国军队从云南省打过来，由此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向中国提供补给，使它继续打下去。此外，准备从中国境内派飞机轰炸日本本土。

早在1个月前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曾通过译员悄悄地对美国国务卿赫尔说：“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当时，赫尔听后非常激动，并于第二天通过电报向罗斯福作了汇报。现在罗斯福又谈到了对日战争。斯大林说，到目前为止，遗憾的是，苏联的力量还不能用于对付日本，因为苏联军队正紧张地忙于西线作战。他重申，一旦打败德国后，苏联的军队将调往西伯利亚，“我们将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11月29日下午，罗斯福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向斯大林概括地阐述了他对战后维护和平的机构的设想，其中涉及到了中国在这个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根据他的设想，应该设立三个机构，一个是由大约35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庞大机构（最后确定下来时为联合国大会）；第二个是执行委员会，由苏、美、英、中四国加上两个欧洲国家、南美、近东、远东和英帝国自治领各1个国家组成（后来变成联合国安理会）；第三个机构——也是罗斯福心目中最重要机构，即“四大警察”，由苏、美、英、中四国担任（后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机构将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任何突然事件。

斯大林对罗斯福的计划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对“四大警察”机构不以为然。他说，欧洲一些小国家下会喜欢“四大警察”机构，它们会对中国有权干涉它们表示不满。而且，斯大林本人也怀疑在战争结束时中国是否会很强大，是否有权充当世界警察。他建议成立一个欧洲委员会或远东委员会。在此之前，丘吉尔也主张成立一些地区性的机构。

罗斯福表示，美国不一定会参加一个纯粹是欧洲的委员会，要不是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紧接德国和意大利先向美国宣战，美国也许不会派军队到欧洲去。

他们对设立国际组织问题作了具体的讨论，斯大林仍然表示，对中国参加“四大警察”表示怀疑。罗斯福说，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目前的衰弱，之所以坚持让中国参加莫斯科四国宣言，是考虑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有4亿人民的国家，把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11月30日，三巨头共进午餐时，又谈到了远东问题。丘吉尔问斯大林是否看过准备发表的《开罗宣言》。斯大林说，他看过了，虽然不能作出任何承诺，但完全赞成，满洲和台湾、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不过，必须

使中国人打仗，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这样做。

丘吉尔和罗斯福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丘吉尔接着试探苏联战后获取不冻港的问题，他同斯大林谈到了黑海海峡和波罗的海的入口处问题，斯大林问：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表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想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说，苏联已有考虑，但也许等参加远东战争的时候再说比较好些。他说，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海参威只是部分不冻港，而且受到日本控制的海峡包围。罗斯福表示，可以考虑让中国的大连（不冻港）作为自由港。斯大林担心中国不会同意。罗斯福已经在开罗同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因此回答说：“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的主张。”斯大林说：“那将是不坏的。”

德黑兰会议：欧洲问题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还讨论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第一次魁北克会议虽然就这个问题作了决定，但丘吉尔提出了很多保留条件，会后态度仍然很消极。斯大林希望在德黑兰会议上能把这个问题敲定。

11月28日下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说，一直到魁北克会议时，英美才确定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的“霸王”行动在1944年5月1日进行，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考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怎样使用地中海的盟军。未来盟军在地中海的作战行动，也可能使“霸王”行动推迟1—3个月。

丘吉尔说，英美很早就认识到了横渡英吉利海峡战役的必要性，不过，现在离1944年夏季还远得很，应该很好地利用地中海的盟军，他希望首先攻占意大利首都罗马，此后还应让盟军进入巴尔干作战，为此，可能会使“霸王”行动推迟两三个月，在不了解苏联对这方面的看法之前，无法作出任何决定，因而也没有拟定任何具体计划，实际上，丘吉尔非常希望让英美盟军进入巴尔干作战，以便抵消苏联势力向巴尔干的渗透。

斯大林说，意大利战场是无法决定欧洲战局的，苏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经由法国的北部或西北部直捣德国的核心，甚至经由法国南部也行。他特别赞成让地中海的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以配合“霸王”战役，而认为把地中海的盟军分散到土耳其、亚得里亚海和法国有部等各战役中是不明智的。

显然，丘吉尔对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不热心，他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必须慎重，不要让美英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海水，或者让他们的尸体阻塞海滩！”罗斯福的态度也不是十分坚决。而斯大林则坚决要求英美集中力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

11月29日下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们再次讨论了“霸王”战役问题。斯大林问，谁指挥“霸王”战役？罗斯福说，还没有作出决定。

斯大林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他说，如果不是由一个人既负责战役的准备，又负责战役的执行，那个战役是搞不起来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此作了一点解释，但不能让斯大林满意。他要求英美必须给“霸王”战役规定一个日期，且不应当延期；主张地中海的盟军在“霸王”战役前两个月在法国南部发动一个辅助战役，以保证“霸王”行动的成功；还要求尽快任命霸王战役的总

司令。

罗斯福对这些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丘吉尔却表示，不赞成给“霸王”战役定下严格的时刻表。他再次强调，实施“霸王”战役必须满足种种前提条件，包括在法国西北的德军机动部队不应超过12个师等等。

斯大林很生气地说：我要问丘吉尔先生一个直率的问题：“英国是否真正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还是这样说说，好让俄国人放心？”

丘吉尔觉得斯大林的话很不友好，也怒气冲冲地说，当“霸王”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具备时，英国人将全力以赴，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列举了几项条件……

斯大林控制不住了，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啦。在前线，我们的事可不少……”

丘吉尔面红耳赤。罗斯福见气氛紧张，赶紧出来打圆场，建议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第二天上午开会，把“霸王”战役最后决定下来。他然后说，斯大林元帅今天作东道主，“我现在饿了，因此我建议暂时休会，好去赴宴。”

第二天上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霸王”战役作出了决定。下午向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汇报。具体的决定是：（1）“霸王”战役将于1944年5月发动。（2）在法国南部将进行一个支援战役。斯大林说、执行“霸王”战役时，肯定会遇列种种困难，为了不让德国人从东线抽调军队到西线去抵抗盟军，他保证苏联红军到时候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牵制住德军。罗斯福说，在三四天内或在返回开罗后，马上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

至此，第二战场问题总算最后敲定了。

战后如何处置德国，是三巨头讨论的议题之一。11月28日，三巨头共进晚餐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在短短30年里，德国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两场巨大的浩劫。在考虑处置德国问题时，三巨头的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怎样防止德国战败后东山再起、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罗斯福认为，必须使德国人从思想上根除“帝国”的观念。斯大林说，仅止如此是不够的，胜利的盟国还必须把防止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所必须的战略地位保留在他们手中。他认为，仅仅管制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是不够的，还应分割德国。

晚餐后，罗斯福退席，丘吉尔同斯大林又单独谈了一会儿。丘吉尔主张不让德国拥有航空工业，对德保留的工业进行经常的监督、完全铲除德国的总参谋部系统、分割其“帝国”的领土。斯大林认为，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他说，德国人是非常有能力和有才干的民族，不难在15年或20年内复兴，再一次威胁世界。第二天晚上，三巨头共进晚餐时，再次谈起这个问题。斯大林说，为了防止德国在15或20年内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必须处决5万名德国军官。丘吉尔表示强烈反对。罗斯福笑着说，如果5万人太多，4万9千人怎么样？丘吉尔认为，这句话并不幽默。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这时站起来，有点不知于高地厚地为斯大林的建议鼓掌。丘吉尔一气之下，离开了餐厅。斯大林立即跟出去，向他保证，他刚才说的话只是开开玩笑。丘吉尔气消了一些，回到了餐桌在12月1日下午的三方政治会议上，三巨头再次正式讨论处置德国问题。罗斯福问：究竟要不要分割德国。斯大林表示赞成分割。丘吉尔也表示完全赞成，但他首先关心的是把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的核心——同德国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这时，罗斯福说，几月之前，他已想好了把德国分成5部分的计划。丘吉尔说：“总统的口气真大极了”，

他似乎赞成把德国分成两部分。斯大林表示，比较而言，他更赞成罗斯福的计划。

丘吉尔强调说，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反对分割德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他关心的是“至少要使德国保持分裂 50 年”。斯大林说，德国重新统一是很危险的，而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战后的国际组织应该防止这种倾向，必要时应用武力防止他们统一和复活。

罗斯福说，当德国分成 107 个省时，它对文明的危险性就比较小了。丘吉尔希望单位能分割得大一点。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来仔细研究分割德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德国进攻波兰开始的。处置战败德国与战后波兰的重建有着密切联系。而波兰位于德国与苏联之间，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主要通道，因此，斯大林对战后波兰的重建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波兰是英国在东欧建立的遏制苏联“防疫线”上的重要一环，英国也是为了波兰才对德国宣战的，因此，丘吉尔对战后波兰的重建也特别关注。美国离波兰很远，但在美国境内有大约六七百万波兰裔人，而且是美国比较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罗斯福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不得不谨慎从事。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表示，波兰的边界应向西移动，西部边界应扩展到奥得河，苏联将为此而努力。11 月 28 日晚上，丘吉尔与斯大林单独交谈时说，英国政府已经承诺，要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关于波兰边界问题，他认为，苏联西部边界安全的考虑是决定性因素，他愿意看到波兰向西移动，正如士兵做操时做“向左靠拢”的动作那样。说着，他拿出三根火柴，以分别代表苏联、波兰和德国，把三根火柴分别向左移动了一下，以形象说明，他赞成苏、波、德三国边界向西移动，把波兰东部一部分领土割给苏联，然后把德国东部的一部分领土割给波兰。

12 月 1 日下午，罗斯福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说，1944 年，美国要举行大选，虽然我本人不想再参加竞选了，但如果战争还在进行，我也许不得不参加竞选，美国有六七百万波兰血统的美国人，我不愿失掉他们的选票。在波兰问题上，我个人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恢复波兰国家，同意波兰东部边界向西移，而西部边界甚至移到奥得河。不过，由于大选的原因，我暂时不能参与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目前不能公开参加任何有关安排，希望元帅谅解。

斯大林回答说，他能理解。

在随后举行的三方政治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希望苏联同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谈判、和好。斯大林对波兰流亡政府指责了一番。他还说，俄国人赞成牺牲德国来重建和扩大波兰，但把波兰流亡政府同波兰区别开来。他提出，波苏边界应是 1939 年 9 月底的边界，即确认苏联取得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也就是说，他准备接受寇松线作为苏联与波兰的边界线。波兰的西部边界定在奥得河。丘吉尔准备把这个建议带回伦敦同波兰流亡政府讨论。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建议没有表示异议。

“事实上的朋友”

德黑兰会议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也是三巨头首次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就年龄而言，丘吉尔最大，罗斯福最小，斯大林居中。论性格，丘吉尔爱激动，斯大林很冷静、罗斯福城府很深。论社会政治倾向，丘吉尔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保守党人；罗斯福一直生活于美国上流社会，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而斯大林出身于一个鞋匠家庭，是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争爆发后，丘吉尔与罗斯福交往频繁且关系密切，英美盟军在北非—欧洲战场上一直联合作战。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交往不多，苏军一直是独立作战，苏德战场自成一体（在第二战场开辟之前尤其如此）。就美、苏、英三国在战争中的地位而言，战争初期，英国曾孤军作战，功不可没，但越到后来，地位越不如美苏。苏联参战后，一直承担着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地位举足轻重。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地位显赫，它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亦非英国、苏联所能相比。在这些背景下，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斗心斗智，三者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

从打败轴心国家角度出发，丘吉尔希望美苏英三国密切合作，但从三国各自利益考虑，他又希望英美团结一致对付苏联。然而，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苏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罗斯福很清楚，没有苏联的合作，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的一些设想就不能变成现实。因此，在大同盟内部，罗斯福很注意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极力避免给斯大林留下英美联合对付苏联的印象。他坚持邀请苏联人参加开罗会议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宁愿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不住英国公使馆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要求与罗斯福单独会晤时，总是遭到罗的委婉拒绝。结果，罗斯福同斯大林单独会晤了几次，丘吉尔也同斯大林单独会晤过，只有罗斯福与丘吉尔没有单独会晤。

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更注意接近、讨好斯大林。斯大林与丘吉尔经常发生争执，罗斯福就在旁边看把戏，甚至为斯大林帮腔。出席会议的马歇尔回忆说：“斯大林始终把人力对准丘吉尔，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斯福先生还扮演了敲边鼓的角色。……斯大林对丘吉尔盯住不放，毫不留情，但他从不对罗斯福总统采取这种态度。”

不过，丘吉尔与斯大林并非总是吵架，也有友好的交往。11月29日下午，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举行了一个英国向苏联赠剑仪式。丘吉尔代表英国国王向斯大林赠送了一把“斯大林格勒之剑”，上面铭刻着这样一句话：“赠给坚强的斯大林格勒市民”。斯大林接过主剑，非常激动，在剑柄上吻了一下，从剑鞘里抽出宝剑，只见寒光闪闪。他走到罗斯福面前，把剑递给罗斯福看。罗斯福也深受感动，他说：“的确，斯大林格勒市民的意志犹如钢铁一般。”

在当晚的宴会上，丘吉尔说：“斯大林格勒本身是苏联人民勇敢精神和坚贞不屈的象征，同时也是人类灾难深重的象征。”他建议好好地保护这座城市战争废墟的原样，“永远作为人类坚韧不拔和苦难惨痛的特殊纪念性建筑物保存下来。它们将吸引世界各地来参观名胜的游客，而且告诫我们的后代……”他主张在旁边再造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

罗斯福赞成这个意见，同意保护这个遗迹以教育后代。但斯大林不赞成这种意见。

11月29日，罗斯福拒绝同丘吉尔共进午餐，丘吉尔很不高兴。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我要坚持一件事，我要主持明天晚上的宴会。我认为我说得上有一两个优先权。首先，无论是年龄还是字母顺序，我都是排

在第一。其次，我代表三国政府中最古老的政府。第三，明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11月30日是丘吉尔69岁生日，罗斯福给他送了一个名贵的卡香（伊朗地名）酒杯，斯大林送的是一顶羊羔皮帽子和一件细瓷雕塑群像。在当晚的生日宴会上，丘吉尔坐正中，罗斯福坐在他的右边，斯大林坐在他的左边，周围是三国的高级军政领导人。丘吉尔很兴奋，他说：“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他回忆英国从1940年孤军作战到眼前的这段不寻常的过程，感到非常欣慰。他提议为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健康干杯，罗、斯二人也祝他健康长寿。

在这种场合，大家都挑好听的话说。丘吉尔称罗斯福是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助者的事业的人，说斯大林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驾齐驱，堪称为“斯大林大帝”。斯大林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物资生产，盟国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罗斯福相信，这次会议使争取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得到增强。

罗斯福的心腹顾问、丘吉尔的朋友霍普金斯针对丘吉尔的权力之大，说了一段较幽默的话。他说，他经过长期的彻底研究，了解到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而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是没有具体规定的，由于研究的结果，“我认识到英国宪法的规定和战时内阁的权力，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随时要它们怎样就怎样”。霍说完后，大家哄堂大笑，丘吉尔也笑了。不过，他自认为，他的权力远不如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权力大。

德黑兰会议于12月1日结束。当天晚上，斯大林作东道主，主持了最后一次晚宴。宴会之后，三巨头握手告别。

显然，通过这次会议，美、苏、英三大盟国之间加强了团结，反法西斯联盟得到了巩固。三巨头之间，尤其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相互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随后发表的《德黑兰宣言》说：“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分手。”

第二十二章 红军解放苏联

斯大林：“红军光荣地完成了她的爱国天职，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们祖国。”

库尔斯克会战

斯大林洛勒保卫战胜利后，苏联军民欣喜若狂。斯大林也很高兴，但同时认为，过份乐观是有害的。1943年2月23日，他在纪念红军建军24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敌人的军队已经受到强大的打击，可是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败。”他号召苏联军民保持清醒的头脑。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惨败后，希特勒决定报复。1942年2月17日，他飞往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为德军打气鼓劲。2月19日，德军向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的苏军发动反攻，于3月中旬占领了这两个地区。这样一来，苏军控制的库尔斯克地区形成一个突出部。

德军决定围歼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这次作战行动的代号为“堡垒”。4月15日，希特勒在第6号作战命令中强调：“这次进攻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应速战速决，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今年春夏的主动权转移到我们手中。”为此，德军在这一地区集结了50个师约9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和大量的军事装备，他们计划从南北两面突击，合围苏军，然后向苏军后方进攻，进而再次威胁莫斯科。

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也在考虑1943年春夏两季的作战计划。在军事战略问题上，斯大林比较倾向于主动进攻，而轻视积极防御和主动退却，重视自己一方的主动性而轻视敌方的动向。他曾说过：“不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敌人的预测上。”可是，这一次，在制定苏军1943年夏季作战计划时，他一反常态，比较重视对德军的预测。

4月12日，苏联最高统帅部举行军事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在夏季，德军会在库尔斯克方向发起进攻，企图攻占苏军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尔后既可能向东发展胜利，也可能向北威胁莫斯科。会议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苏军主力，先在主动防御战中削弱敌人，然后转入反攻消灭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防御，以防德军突破苏军防线。

斯大林同意这个决定，但不无忧虑。苏军的防御能否顶住德军大规模的进攻？苏军的进攻能否粉碎强大德军固守的防线？莫斯科大反攻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都是在冬季作战中取得的，夏季作战会不会对苏军不利？

苏军总参谋部就防御过程中何时转入进攻问题向斯大林请教。这一次，他比较谨慎，回答说：“这个问题让各方面军根据当时的情况自己去决定。总参谋部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不要打乱协同作战，不要出现大的停顿，以免敌人在已到达的地区巩固下来。及时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5月初，苏军获得的情报说，德军可能在5月10—12日发动进攻。斯大林指示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旦有必要，就向部队发出预告。华西列夫斯基向有关的方面军发出了预告，然而，德军没有发动进攻。斯大林想改变计划，让苏军主动进攻。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5月19日，苏军又得到情报说，德军可能在5月19—26日这几天发动进攻。苏军总参谋部又一次通知苏军作好迎战准备。结果，德军仍然没有进攻。斯大林很不安。如此等待下去，会不会贻误战机？他意识到，1941和1942年，德军大规模的进攻往往是在6月份发动的，1943年是否也会这样？可是，6月份过完了，德军仍没有动静。斯大林开始烦躁起来，火气越来越大。有时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听说有飞行员反映苏军的“雅克—9”式飞机有质量问题时，他把有关负责人找来痛骂了一顿。

7月2日，苏军又得到准确情报：德军可能在7月3—6日发动进攻。7月4日晚上，苏军进一步获得情报说：德军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苏军早已作好了迎战准备。7月5日凌晨2时20分，苏军大炮首先轰击德军阵地，先发制人，打乱了德军的进攻部署。德军在比原计划推迟了2—3个小时后，强行发动了进攻，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打响了。

这次会战打得比较艰苦。7月12日，在普罗雀罗夫卡地区，进行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会战，双方损失都比较大。双方激战一周，德军完全看不到取胜的希望。7月10日，英美盟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7月13日，希特勒要求德军终止“堡垒”战役。然而，一旦打起来，再想终止，谈何容易。从7月12日起，苏军开始反攻，先在北面发动了以解放奥廖尔为目标的“库图佐夫”战役，接着于8月3日在南面发动了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8月5日，苏军收复了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斯大林非常高兴，决定在莫斯科鸣放礼炮和烟火以示庆祝，这是二战中苏联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庆祝胜利。

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忽略了德军预备队的投入，结果于8月11日被德军打了一个反突击，损失严重。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严厉地批评了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他说，这种错误是“在实施战役时反复犯过的不可容忍的”。不久，苏军击退了敌人的反突击，并于8月23日收复了哈尔科夫。库尔斯克会战到此结束。在这次会战中，德军损失了1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3700多架飞机，50万人被歼灭。斯大林对这次会战给予了较高的评什。他说：“如果说斯大林洛勒会战预示着德国法西斯的衰落，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面临灭顶之灾。”

强渡第聂伯河

库尔斯克会战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已经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只能采取防守和退却态势了。在此之前，希特勒严禁德军在其后方修筑大型防御工事，以防前线部队不坚守阵地而向后方退却。库尔斯克会战后，他取消了这一禁令。1943年8月11日，德军总参谋部决定，从莫洛奇纳亚河起，经第聂伯河、亨日河、奥尔沙、维捷布斯克、普斯科夫到纳尔瓦河止，构筑一条坚固的防线，号称是阻止苏军前进的“东方壁垒”，计划在11月15日之前完工。

与此同时，德军在撤退时，采取了野蛮的破坏政策。苏德战场上的德军接到命令：“防御时要残酷无情，退却时要摧毁苏联国土上的一切，只给他们留下一片荒无人烟的焦土。”1943年9月7日，希姆莱指示在乌克兰的德国党卫军和警察：“从马克兰各地撤退时，必须做到不留一个人、不留一头牲畜、不留一粒粮食、不留一根铁轨、不使一座房子完整无损，不使一口煤

井完好、每口井都放上毒……”

这一切自然瞒不了苏联政府。时间很重要，斯大林决定不止德军完成“东方壁垒”防线的构筑，也不能让德军肆意破坏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他要求苏军尽快解放这一地区。8月25日，即库尔斯克会战结束两天后，斯大林主持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确定了苏军的进攻计划。当时，朱可夫认为，承担向第聂伯河进攻任务的两个方面军在前一阶段作战中伤亡很大，需要大量补充人员和武器。他列出了具体的数目。斯大林把朱可夫所要求的数量压缩了30—40%，他说：“剩下的，等两个方面军到达第聂伯河时，最高统帅部就拨给。”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确：苏军一定要尽快强攻第聂伯河、收复顿巴斯和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

为了鼓舞部队士气，9月9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对强渡杰斯纳河有功的部队官兵授予苏沃洛夫勋章，对强渡第聂伯河有功的部队官兵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苏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德军迅速地溃退，开始撤向第聂伯河对岸尚未完工的“东方壁垒”防线，到9月21日前后，苏军各部队陆续推进到第聂伯河一线。

9月底，苏军在长达700公里的地段上强渡第聂伯河，一举突破了德军的“东方壁垒”防线，在右岸夺取了大小23个登陆场。在这次渡河作战中，共有1170名军官、1268名士兵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

10月12日至12月23日，沃罗涅日方面军（10月20日改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基辅战役，于11月6日攻克基辅。随后苏军又收复了乌克兰的其他一些中小城市。第聂伯河会战于1943年底结束，苏军把敌人完全赶出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并在右岸建立了两个战略登陆场和数十个战役登陆场，一举摧毁了德军的“东方壁垒”防线，为下一步完全收复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和解放白俄罗斯创造了条件。

在1943年这一年中，苏军向西推进了500至1300公里。包括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内，这一年中，苏军全歼敌军56个师，重创敌军162个师，击毁德军坦克7000余辆、飞机14000余架、大炮50000余门。苏军已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冬季战役

到1943年底，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及其附属国军队约有500万人、大炮545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400辆、飞机3000余架。此时，苏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已大大超过了德军，士气旺盛。

1943年12月，斯大林主持召开了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总结了军事形势，H·A·沃兹涅先斯基就经济和军事工业问题作了报告。斯大林介绍了德黑兰会议的情况和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他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赞扬了苏军取得的胜利。这时，华西列夫斯基对朱可夫说：那还用说吗，不久前，就在10月，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特利将军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建立像红军强渡第聂伯河那样的功绩。”与会者都笑了。

斯大林瞪了他们一眼，以示对他们开小会的不满，然后接着说：“罗斯福保证于1944年在法国开始一系列作战行动，我想他会遵守诺言的。即使他

违背诺言，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打败希特勒德国。”

会议开了好几天。朱可夫在会上提出，苏军应更大胆地对德军实施台围战役，以彻底歼灭德军。斯大林赞成这一意见，他说：“现在我们更强了，我们的军队也更有经验了。现在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对德军实施合围战役。”通过对局势的全面分析，最高统帅部决定，在1943年至1944年冬季，苏军应在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的战线上，对德军展开全线进攻。

在1944年冬季作战中，解放西乌克兰的战役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由瓦杜丁率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率领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进行了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这是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1月28日，苏军包围了德军10个师。德军为了免遭围歼，拼命突围。2月11日，被围困的德军与前来援救的德军相距只有12公里，情况很紧急。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负责协调和指挥这次作战，他命令瓦杜丁和科涅夫采取紧急措施，不让德军突围，并连夜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对局势极为关注。

就在那天夜里，德军企图利用暴风雪突围，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防线上推进了两三公里，占领了希尔基。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于2月12日清晨打电话给朱可夫，要求他核实后立即报告。当时，朱可夫正患感冒，发高烧，他立即打电话给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了解情况。瓦杜丁报告说，德军占领希尔基后，苏军阻止了他们继续前进。瓦杜丁与朱可夫商定了应采取的补救措施，朱可夫随后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斯大林听完汇报后，对参加围歼德军的苏联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作了调整，决定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分军队交给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指挥，让瓦杜丁率第一方面军的部分军队负责对付前来解围的德军。这意味着瓦杜丁指挥的部队不能直接参加围歼德军的作战行动，也意味着部分削弱了瓦杜丁的指挥权。

朱可夫认为，彻底围歼德军只是三四天内的事，没有必要作上述调整，然而斯大林坚持己见。

瓦杜丁有些想不通，接到上述命令后，立即挂电话给朱可夫：“元帅同志，别人不了解，而你是知道的，我接连有好几个昼夜没有合眼，竭尽全力来实施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为什么现时要免我的职，不让我把这个战役进行到底？我也是热爱自己方面军荣誉的，而且希望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战士们鸣放礼炮。”

朱可夫不便对他多作解释，只是说：“瓦杜丁同志，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和你都是战士，让我们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吧！”

2月17日，苏军发起总攻，被围德军只有一部分人突围成功，其余被全部歼灭。苏军在这次战役中击毙德军5.5万人，俘虏德军1.8万人。第二天，莫斯科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鸣成了礼炮，该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晋升为元帅。2月23日，斯大林称这次战役是第聂伯河右岸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在表彰活动中，没有提及瓦杜丁及其率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连朱可夫也觉得有些不太公平。

随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解放西乌克兰全部领土。参加这次作战行动的有乌克兰第一、第二和第三方面军，最高统帅部还从预备队中抽调第四坦克集团军给乌克兰第一方面军。2月29日，瓦杜丁司令员在视察部队途中，遭乌克兰匪徒袭击，身负重伤，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

救。3月1日，朱可夫接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3月4日，该方面军发起进攻，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越过了几乎无法通行的田野，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线。3月5日，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鸣放礼炮。这对躺在医院里的该方面军前司令员瓦杜丁是很大的安慰。4月15日，瓦杜丁因医治无效而逝世。

从1944年1月至4月，在解放西乌克兰的战斗中，苏军先后强渡了南市格河、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锡雷特河，向西推进了250—450公里。3月26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率先打到了苏联的边界线。到4月中旬，苏军已恢复了400公里长的国界线。1944年5月9日，苏军收复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5月12日解放了整个克里米亚。

从1944年1月14日至3月1日，苏军在西北方向也展开了进攻，进行了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参加这个战役的有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红旗舰队。苏军把敌人从列宁格勒城下击退了200—280公里，使列宁格勒在遭受德军围困900天后彻底解围。苏军解放了列宁格勒州的几乎全部领土和加里宁州的一部分地区，推进到了爱沙尼亚境内。

当南北两路大军分别在西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地区向德军展开全面进攻时，在西面，从涅韦尔到莫济里之间，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向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进攻，使之遭受重创。

苏军1944年冬季和春季作战，给苏德战场上的德军以沉重打击。德军在西乌克兰会战中失败后，希特勒气急败坏，曾把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从前线召回，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说：“根据空中侦察，发现敌人几辆坦克，德军整个部队就开始逃跑，防线不断后撤。”3月31日，希特勒解除了曼施泰因的职务。

随着1944年冬季和春季作战的结束，苏军已经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的3/4，整个国土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

白俄罗斯会战

1944年夏季就要来临了。苏德战争的头两年，夏季是德军对苏军猖狂进攻、逼得苏军迅速溃退的季节；而冬季却是德军停止大规模进攻，苏军打防守反击的季节。然而，从1943年夏季的库尔斯克会战开始，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都是苏军大规模反攻、大批地歼灭德军的大好时机。

1944年4月22日，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安东诺夫、装甲坦克部队司令员费多连科元帅、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上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马雷舍夫等人讨论夏季作战问题，他让每个与会者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及其对夏季作战的看法。他自己在会上说：“6月份，盟军终于打算以大批兵力在法国登陆。我们的盟国也着急了，他们生怕没有他们参加，我们单独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德寇最终将在两个战场上作战，这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坏。德寇终将无力回天了。”

朱可夫主张，苏军1944年的夏季作战，应集中力量粉碎德军的白俄罗斯集团。斯大林问安东诺夫：“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安东诺夫表示赞成。

斯大林又要通了正在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的电话，他说：“你能坐飞机

来商谈夏季作战计划吗？……你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带忙些什么？……那好吧，你就留在那儿，把你自己对夏季计划的意见亲自给我送来。”放下电话后，他对与会者说：“看看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后再说。给各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要他们汇报对各方面军最近时期行动的想法……”然后又对朱可夫说：“你和安东诺夫拟出夏季作战计划的初步方案。等你们搞好后，我们再讨论一次。”

斯大林已经为夏季作战建立了新的预备队，储备了大量的作战物资，但他要求知道内情的安东诺夫不要向别人透露，以免前线各方面军司令员争着向他要人要物资。他考虑的是，要重点保障那些进行决定性战役的部队的需要。

4月底，总参谋部拟定的夏季作战的初步方案上报到了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在“5.1”节讲话中，号召苏联红军彻底肃清入侵苏联的敌人，并把兄弟的波兰人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东欧其他国家的人民从希特勒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斯大林同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反复讨论了夏季作战计划。在5月上旬，总参谋部又拟定了作战计划的细节，并反复检查核实。5月14日，这项工作结束。20日，安东诺夫把详细计划呈送斯大林批准。总参谋部一直没有想好给这次作战计划取一个什么代号。显然，这次夏季作战可以说是把法西斯侵略者完全赶出苏联的最后一战，斯大林不由得想起了一百多年前俄国军队反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想到了那次战争中的俄军英雄巴格拉季昂，于是决定以这位英雄的名字来命名1944年的夏季作战计划——“巴格拉季昂”。

5月20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召去，以便最后确定实施这项作战计划的决心，同时还召集了有关的方面军司令员征求意见。这些工作完成后，斯大林最后批准了这项计划。在讨论中，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大将要求给他的方面军补充兵力，最高统帅部满足了他的要求。可他坚持再要一个步兵军，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坚决不同意，斯大林说情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悄悄告诉梅列茨科夫：“我再调一个步兵军给你。”

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在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传记中，客观地描写了斯大林为制定“巴格拉季昂”计划是如何呕心沥血地工作的：“斯大林为制定进军白俄罗斯的计划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征求了所有司令员的意见，时而单独讨论，时而共同商量。他频繁地同各个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进行联系，有时一天要给他们打好几次电话。总参谋部对计划作了具体的修改，每次修改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在局面已经扭转、红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似乎他作出了一项特别的决定，要求现在下要低估敌人而要格外地小心。他的心情也同样很急切，想把德国人赶出去，把他们消灭在德国的国土上。但是他不允许放松准备工作，也不允许那种会导致冒险行动的过分乐观情绪。”

1944年5月31日，最高统帅部给有关各方面军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再次派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指挥作战。6月初，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发起进攻，拉开了夏季作战的序幕，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来电后，立即回电说：“根据德黑兰会议的协议组织的苏军夏季进攻，将于6月中旬在战线的一个重要地段进行。6月底和7月，各个进攻战役将汇成苏军

的总攻。”

白俄罗斯会战的总攻定于6月19日进行。6月上中旬，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发现，运输兵力和作战物资的速度太慢，有可能影响作战计划。他们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立即指示有关方面加快铁路运输工作。有关部门立即修订了运输计划，提高了效率。但还是影响了作战计划，总攻由6月19日推迟到6月23日。

为了进行这场会战，苏军集结了4个方面军、共计240万人、36400门火饱和迫击炮、5200辆坦克和自行人炮、5300架作战飞机。这次会战与3年前德军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日期仅差一天，战场恰好是当年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的地方。现在，斯大林也要让希特勒尝尝“闪电”溃败的滋味。

1944年6月23日，白俄罗斯会战打响了。苏军在正面宽1100余公里、纵深近600公里的战线上，向德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6天之内，向前推进了80—150公里，7月3日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斯大林非常高兴，7月8日，他召见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听取汇报。此时，他心情很好，同两位战将说有说有笑，根据战局的迅速发展，他及时地向苏军提出了新的要求：彻底解放白俄罗斯，把德军从立陶宛和波兰赶出去！

在白俄罗斯会战的第一阶段，到7月11日，被围困的德军明斯克集团10万多人被全部歼灭。随后，苏军开始了这场会战的第二阶段，在正面宽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7月20日，先遣部队强渡西布格河，进入波兰境内。到8月底，白俄罗斯会战结束，苏军向前推进了550—600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立陶宛大部、拉脱维亚一部分以及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波兰领土，歼灭德军50万人。

在苏军进行白俄罗斯会战的同时，其他战线的苏军也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到9月初，收复了摩尔达维亚和西南乌克兰。9月22日，苏军解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10月13日解放了里加，到11月1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全部获得了解放。

在1944年这一年中，苏军解放了92.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德国侵略者被全部赶出了苏联国境。

孔采沃别墅的除夕之夜

在捷报频传声中，苏联人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十月革命节。1944年11月6日，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庆祝大会上，斯大林满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说：“红军光荣地完成了她的爱国大职，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们祖国。我们的国土从此永远摆脱了希特勒的妖孽。”

胜利来之不易！对苏联人民、对苏联红军来说，卫国战争的这几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对于斯大林又何尝不是这样？1944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斯大林邀请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在莫斯科的军队领导人去他的孔采沃别墅。他的办公室主任在邀请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什捷缅科、装甲坦克部队司令员费多连科等军方领导人时，特别叮嘱这次“不用带地图和文件”。这几位将领猜测斯大林这次召见他们的意旨，虽然想到了可能是为了欢度新年，可又不敢肯定。几年来，残酷的战争已经使他们早已忘掉了“节日”这个单词。

的确，斯大林是请他们来欢度新年的，那天晚上，他的情绪特别好。他发表了简短的祝词，祝苏联人民、苏联红军以及在座的全体同仁新年快乐。大家互相祝贺了一番。

斯大林一改过去严肃的面孔，干了几杯酒之后，不拘礼节，离开座位、抽起烟斗，开始与大家聊天。那些平时在斯大林面前毕恭毕敬、正襟危坐的军政领导人，见斯大林如此随和，最初的一点拘束感很快消失了，他们彼此交谈、放声说笑，屋里的气氛轻松活泼。布琼尼元帅拉起了手风琴，斯大林打开了留声机，几个人舞兴大发，跃跃欲试，可是只有一位女宾客在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妻子），没法跳交谊舞。斯大林又专门找了一张曲名叫“芭勒娘”的舞曲唱片，随着节奏鲜明的舞曲声响，布琼尼再也坐不住，独自跳开了，大家在一旁热烈鼓掌。过了一会，留声机里又响起了苏联红军歌曲，大家都跟着唱起来，欢快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直到凌晨 3 时，大家才同斯大林告别。

虽然战争已远离莫斯科，但莫斯科仍然实行着灯火管制，街上一片漆黑，街道两边房屋的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的，但偶尔也有一点微弱的亮光透出来。此时，对于这类违犯规定的情况，巡逻队已经管得不再那么严格了。

这一切都表明：战争已接近尾声。

第二十三章 盟军反攻欧陆

丘吉尔：“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非要我们这样做不可！”

罗斯福：“我总是记住我学的初级几何知识——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

谁指挥“霸王”战役

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确定“霸王”战役的指挥官。如果这一人选不定下来，斯大林会继续怀疑英美对开辟第二战场缺乏诚意。

自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决定由美国派人指挥“霸王”战役后，英美两国的绝大多数人都看好马歇尔。英国人对马歇尔很信任，丘吉尔认为，“霸王”战役的总指挥非他莫属。霍普金斯、史汀生等人也都持同样看法，许多记者也看好马歇尔。罗斯福本人也认为，马歇尔是最合适的人选。

几年来，马歇尔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协调者，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组织和指挥才能。美国的军事传统之一，是总统不直接介入具体的军事组织和指挥活动。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作战计划和军事组织方面，罗斯福管得很少，远没有斯大林所操的心多。这方面的任务，有相当一部分落在马歇尔肩上。到1943年秋，美国军队分布在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的广阔战线上，由于马歇尔坐镇华盛顿，组织指挥有方，保证了美军作战活动的顺利进行，马歇尔本人也因此享有很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有人想提名他做民主党1944年总统候选人，但遭到他的拒绝。还有人提议授予他陆军元帅军衔，罗斯福也有此意，也被他本人拒绝了。在他之前，美军中从未有人获过这一军衔，这可能是他拒绝的重要原因。他自己说，“马歇尔元帅”的短语听起来不伦不类。英语中，元帅（Mashal）与马歇尔（Marshall）读音相同。

不过，他倒很想得到“霸王”战役指挥官的职务。二战爆发后，他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远离战争前线，他希望有机会直接到战争前线指挥作战。再说他的年龄也不小了，战争打完后也该退役了，若能在退役之前指挥一场像“霸王”行动这样重要的战役，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自己也相信他能得到这一职务。

然而，罗斯福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项重要的职务究竟落在谁的头上，完全取决于他的决定。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罗斯福在工作上配合得较好，但私交并不深。罗斯福是一个政客，马歇尔是一个比较讨厌政客的军人，不喜欢阿谀奉承。早在1938年11月，马歇尔还是陆军准将、陆军副参谋长时，曾经顶撞过罗斯福。当时，许多人以为他得罪了总统，在华盛顿肯定干不长久。然而，罗斯福并没有给他小鞋穿。虽然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歇尔却对罗斯福保持着戒备心理，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1939年8月，罗斯福要挑选一个新的陆军参谋长，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一职务，其中有21名少将、11名准将，他们的地位资历都比马歇尔高。当其他人拼命拉关系，找人说情时，马歇尔干脆不动声色。结果，罗斯福偏偏选中了他。受命之时，他对罗斯福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

好，总统先生。我只是想提醒您，我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这个习惯常常叫人不痛快。”

马歇尔虽然对罗斯福选中自己很高兴，但并不想与罗斯福搞得太亲密。1940年，罗斯福从大选角度考虑，拒绝支持马歇尔提出的扩军计划，马歇尔私下抱怨说：“他们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愿输掉选举。”

虽然他们的私交并不深，但在工作上，罗斯福对马歇尔很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军事问题上，马歇尔几乎成了罗斯福领导美国进行这场战争的主心骨。正因为如此，在“霸王”战役指挥官人选问题上，罗斯福一直犹豫不决，他很想满足马歇尔的心愿，把这一任务交给他，可又舍不得让他离开华盛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另外几个人——海军作战部长金、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都不赞成让马歇尔去指挥“霸王”战役。他们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运转良好，与马歇尔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马歇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金海军上将说：“我们已经在华盛顿这里有了一个取胜的联合班子，干嘛要把它拆散？”

1943年9月16日，美国一战时的著名将领、马歇尔的老上级、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潘兴将军，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不赞成派马歇尔去指挥“霸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参谋长一职至为重要，非马莫属，“任何其他担任参谋长都无法同他相比”。

罗斯福一向很尊重潘兴将军，但此时，他仍然倾向于满足马歇尔的愿望。9月20日，他在回信中说：“如你听说，他无疑是最出色的参谋长。可你知道，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作战行动……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马歇尔的教名——引注）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了。我所能作出的最好解释就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假如把他留在此地，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人特别不赞成罗斯福的主张，此人就是先后指挥过盟军在北非登陆和在地中海作战的美国将领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美国国内以及英美盟军中，盛传着罗斯福要任命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而让艾森豪威尔回华盛顿去当陆军参谋长。对此，艾森豪威尔感到非常沮丧。他对部下说，自己的气质不适合当陆军参谋长，让他去干这份差事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还放风说，总统若让马歇尔指挥“霸王”战役，他本人宁愿留在欧洲、在马歇尔麾下指挥一个集团军作战，也不愿回华盛顿去当陆军参谋长。

1943年1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及两国参谋长们在开罗开会期间，艾森豪威尔多方打听罗斯福的意图。丘吉尔和金海军上将都告诉他，罗斯福总统似乎选中了马歇尔。丘吉尔表示，无论是由马歇尔还是由艾克指挥“霸王”战役，英国都欢迎。一天早上，罗斯福同艾克当面谈起这个问题，他说，他害怕失去马歇尔将军，但又觉得理应给他一个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机会，“艾克，你和我都知道南北战争后期是谁当的参谋长（亨利·W·哈勒克——引注），可是，军界以外的美国人却很少有人知道，而每个小学生都晓得那些前线指挥官的大名，格兰特自不必说，还有李、杰克逊、谢尔曼、谢里登等等。我可不想让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在50年后就湮没无闻。我之所以要乔治担任这项重要的指挥职务，这也是原因之一——他有资格作为一位伟大的将军名垂史册。”

艾克默默地听着。他知道，马歇尔之所得，正是自己之所失，他也明白

总统找他谈话的用意。作为一个军人，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然而，罗斯福一直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斯大林听说英美还没有定下“霸王”行动指挥官人选而表示不满时，罗斯福也没有说他已经选中了马歇尔。事实上，他一直很犹豫。潘兴将军和金上将等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再说，若让艾克回华盛顿当陆军参谋长，会造成一些让人难堪的局面：一是艾克会由马歇尔的下级突然变成上级，二是艾克会与他的死对头麦克阿瑟处于上下级关系，麦克阿瑟肯定会很反感。更何况艾克也不想接这份差事。可是，若不让马歇尔指挥“霸王”战役，他又觉得很对不起马歇尔。

从德黑兰返回开罗后，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他决定找马歇尔当面解决这个问题。见面后，他先转弯摸角地兜了半天圈子，然后以商量的口气问马歇尔：谁适合指挥“霸王”战役？如果马歇尔主动提出请求，罗斯福就准备满足他的愿望。然而，马歇尔的自尊心太强了，心里虽然很想得到这个职务，可就是不愿意开口。他向罗斯福表示说，希望总统依照最符合国家利益、最符合总统心意的方式处理这件事。

这一回答使罗斯福很满意。其实，他了解马歇尔的为人，已经料到马歇尔不会开口要这份差事，之所以找他面谈，就是要他当面表态——这正是罗斯福的狡猾之处。马歇尔作出上述表态后，罗斯福说：“唉！要是你不在华盛顿，我连觉都睡不安稳的。”马歇尔一听就明白：对他来说，指挥“霸王”战役的差事黄了。

第二天（1943年12月6日）上午，罗斯福口授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由马歇尔笔录：“总统致斯大林元帅：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电报发出后，第二天，马歇尔取回了电报底稿，抑制着内心巨大的失望，在这张电报底稿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开罗，1943年12月7日。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可能愿意把这张便条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匆匆写就的，总统马上签署了。乔·卡·马歇尔”

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英美两国将须们最羡慕的职务落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头上。正是这一职务，使艾森豪威尔成为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将领，也为他战后当选为美国总统奠定了最重要的进身之阶。

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一直把这张便条视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

进军罗马

随着“霸王”战役指挥官的任命，实施这一战役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根据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作出的决议，英美盟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之前或同时，地中海的部队应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以配合“霸王”行动。拟议中的法国南部作战计划，代号力“铁砧”。这一战役能否实施，取决于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能否尽早撤出来。

1943年8月17日，英美盟军攻占了西西里岛后，意大利于9月3日同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盟军渡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月10日占领了萨勒诺，10月1日占领了那不勒斯。

为了阻止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希特勒派德军公开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罗马，并于9月12日派伞兵把被软禁的墨索里尼营救出来，让他统

治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做德国的傀儡。到 10 月份，德军在意大利集结了 25 个师的兵力，利用卡西诺南边的险峻地形，构筑了一条横跨意大利半岛的坚固防线——古斯塔夫防线，以便阻止盟军的攻势。盟军发动了多次进攻，到 1943 年 12 月底，仍没有突破这条防线。意大利战场上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美国军方主张，为了保证按时实施“霸王”作战计划和“铁砧”作战计划，盟军应放弃在意大利的作战。然而，丘吉尔不仅不想放弃，而且主张扩大盟军在地中海的作战范围，进军巴尔干和罗得岛，从德黑兰返回开罗后，他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一主张，遭到罗斯福的拒绝。丘吉尔还希望为了地中海的作战，把“霸王”战役从原订的 5 月份推迟到 7 月份，罗斯福也没有同意。

丘吉尔总是想方设法地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德黑兰会议之前，他多次成功地说服罗斯福改变了既定的作战计划，使答应好了的欧洲第二战场一拖再拖。在德黑兰会议上，他虽然对 1944 年 5 月实施“霸王”作战计划及派军队在法国南部登陆作出了承诺，但很勉强。因此，会议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争取拖延实施上述计划的努力。不过，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倾向于恪守对斯大林作出的承诺，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听丘吉尔的话。虽然如此，丘吉尔软磨的功夫也并非完全不起作用。

丘吉尔一再拖延实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与他灵活多变、新点子多、不喜欢墨守成规的个性有一定关系。战局的千变万化，常常使他新想法层出不穷，为他改变既定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客观依据，也提供了借口。在一定意义上说，力主盟军在北非登陆，然后进军西西里、进攻意大利，是丘吉尔根据战局的变化随机应变作出的决策。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军未能突破意大利战场上的古斯塔夫防线、未能像原先预料的那样迅速地攻占罗马，为丘吉尔再一次提出随机应变的计划提供了客观依据。

在开罗与罗斯福分手后，丘吉尔于 1943 年 12 月 11 日晚上飞往突尼斯，第二天患上了肺炎，高烧一周，整天躺在床上。他的夫人克莱门蒂娜专程从国内赶来探望照顾。罗斯福亦发来慰问电，并开玩笑说：“请向克莱米（克莱门蒂娜的呢称——引注）致意。她能够同你在一起作为你的上级长官，我也就放心了。”

虽然患病，丘吉尔却很关心意大利的战局。12 月 18 日，他任命英国的威尔逊上将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地中海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想把英军的亚历山大将军从地中海战区“挖走”——同他一起去指挥“霸王”行动，丘吉尔坚决不同意，而是让亚历山大继续指挥盟军在意大利的作战。

为了打破意大利战场上的僵局，丘吉尔主张盟军在卡西诺继续对德军防线展开猛攻，同时派两个师在德军防线后面约 60 英里的安齐奥登陆——“包抄”计划。要实施“包抄”计划，需要坦克登陆艇。在地中海战区，有 56 艘英国的坦克登陆艇，原计划在 1944 年 1 月 15 日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以便准备参加“霸王”作战。丘吉尔和英国军方要把这批登陆艇推迟 3 周调往英国，以便发动安齐奥战役，为此，12 月 25 日，丘吉尔召集地中海战区的盟军高级将领在迦太基开会。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参加了这次会议。艾森豪威尔勉强同意发动安齐奥战役，勉强同意让 56 艘登陆艇推迟到 2 月 5 日移交给他。

由于发动安齐奥战役和推迟移交登陆艇牵涉到是否会影响“霸王”行动和“铁砧”行动，丘吉尔还必须取得罗斯福的同意。12月25日，他致电罗斯福，花言巧语地讲了一通发动安齐奥战役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只有等着1944年的地中海战役的彻底失败了。因此，我恳切地希望你能同意让这56艘坦克登陆艇延期回国。”

罗斯福对丘吉尔如此迷恋地中海作战有些恼火，但还是勉强同意了丘吉尔的请求。不过，为了防止丘吉尔借故拖延实施“霸王”战役计划，他在12月28日的回电中强调：“‘霸王’作战计划仍然应当是首要的战役，并将按照在开罗及德黑兰商定的日期进行。”

丘吉尔为他又一次让罗斯福接受了他的主张感到高兴。他当天给罗斯福回电说：“对于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我要感谢上帝……”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兴奋之情。

1944年1月21日，盟军两个师在安齐奥登陆成功，但由于没有把握住战机，作战并不顺利。2月中、下旬，德军在安齐奥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企图把盟军赶下海去。盟军背水一战，勉强守住了滩头阵地，双方伤亡都很大。丘吉尔忐忑不安，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曾为没有多少后退余地的滩头阵地捏一把汗。”

安齐奥作战的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的意料之外，他自己很形象地说：“我原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只是一条搁浅的鲸鱼。”与此同时，盟军在卡西诺对古斯塔夫防线的正面进攻亦没有取得突破，战局仍然僵持不下。

这样一来，又引发了新的矛盾：盟军是否应坚守安齐奥滩头阵地？若坚守，坦克登陆艇就不能按时移交给艾克，而必须留在意大利，这样一来，对“霸王”和“铁砧”计划会带来什么影响呢？美国军方感到忧虑，主张放弃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全力以赴地实施“霸王”和“铁砧”计划。丘吉尔主张坚守安齐奥，继续在意大利作战，为此要求取消“铁砧”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可以考虑推迟“铁砧”计划，但不能取消。罗斯福再次提醒丘吉尔：别忘了在德黑兰对斯大林作出的承诺。他说：“我认为，这时取消‘铁砧’计划，会产生很坏的心理影响。”他还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没有同苏联商量之前，不能废除自己承担的义务。他说：“我们曾（对他们）食言了，类似的事件最好不要重演。”

鉴于在意大利的作战骑虎难下，罗斯福只好同意推迟实施“铁砧”计划。为此，1944年5月14日，他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加以解释。他们说，由于准备“霸王”行动和在意大利作战，在实施“霸王”战役的同时不能实施“铁砧”计划。“我们准备早些时候采取这种进攻……”

斯大林比较开通，于5月15日回电说：“主要的当然是要保证‘霸王’战役的彻底胜利。”

5月中旬，盟军在意大利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成功地突破了德军防线，并于6月4日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丘吉尔喜不自禁。鉴于苏军在1944年冬季和春季作战中捷报频传，而盟军（以英军为主）在英国人负责的意大利战场上再一再受挫，让他一直抬不起头来，这次盟军攻占罗马后，他便于6月5日立即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喜讯。斯大林当天回电说：“对于英美盟军部队占领罗马的伟大胜利，我表示祝贺。”

罗斯福也为盟军攻占罗马而高兴。6月5日，他发表炉边谈话，宣告盟

军攻占了意大利首都，并说：“一个攻下了，另外两个也快了！”

诺曼底登陆

战争初期，英吉利海峡是保卫英国免遭德军入侵的一道天然屏障；战争后期，它却成为英美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一个巨大障碍。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商定，英美盟军应于1944年5月实施“霸王”作战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会议之后，英美盟军中，有人倾向于把“霸王”战役推迟到6月份进行。对此，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又发生了分歧。丘吉尔认为，为了确保“霸王”行动的成功，推迟一个月算不上违背对斯大林作出的承诺。1944年1月6日，他致电罗斯福说：“我认为6月的月圆期很可能是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我认为不论从那方面来说，我们都没有对他（斯大林）失去信用。”

罗斯福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英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多次食言，在德黑兰会议上当面向斯大林承诺在5月份实施这一计划，现在又要反悔，显然不妥。1月14日，他给丘吉尔回电说：“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当作出关于推迟这一战役的任何决定……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包括斯大林）对于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时间才不过一个多月。”

这个问题随后由具体负责指挥“霸王”战役的将领们解决了。原来，自卡萨布兰卡会议后，英国的摩根将军受命率领一批人制定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具体作战计划，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根据摩根等人制定的计划，盟军登陆时，最初阶段的攻击规模为3个师。1944年1月，具体负责指挥“霸王”战役的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等人在审查这项计划时认为，首批登陆3个师大少了，至少应有5个师。这样一来，要增加两个师，就需要有更多的登陆艇，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准备。因此，1月31日，他们决定把诺曼底登陆的日期从原订的5月初推迟到5月底6月初。

丘吉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年西线阵地战中文战双方的巨大伤亡记忆犹新，因而一直害怕在“霸王”战役中重演那种悲剧，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接进攻西欧的作战行动缺乏信心。随着“霸王”战役准备工作的全面展开，丘吉尔接触艾森豪威尔的机会增多，他们多次谈起“霸王”战役，丘吉尔常常流露出忧虑的情绪。有一次，他对艾克说：“当我想到诺曼底的滩头上挤满了英美两国的优秀青年时……我产生了怀疑。”1944年5月初，他曾含着眼泪对艾克说：“我和你一起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如果失败了，我们一起下台。”

1944年5月15日，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在古老的圣保罗学校开会，最后审查“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英国国王和丘吉尔应邀出席。蒙哥马利主持会议，这一次，他破例允许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在他面前抽烟。他介绍情况说，在法国的德军有60个师，由隆美尔指挥，此人最擅长发动破坏性攻击，他会竭尽全力阻止我们登陆。不过，蒙蒂本人对盟军登陆作战的前景表示乐观。

丘吉尔在讲话时说，勇敢、智谋和坚定是人类的优秀品质，比装备更为重要。

艾森豪威尔亦充满信心地说，在进攻之日，空中将有盟军的1.1万架飞

机，海军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舰队，地面部队只是登陆，给重要人物占据一些别墅。

这次会议使匠吉尔对“霸王”战役的信心增强了。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对这次战役的态度正在坚定起来。”

5月28日，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时间定在6月5日拂晓。从5月28日起，参加首批登陆作战的所有人员被“封闭”在军舰上或集结营地中，禁止收发一切邮件、禁止各种私人通讯联络，盟军进入了临战前的紧张阶段。

艾森豪威尔也很紧张，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好像生活在高压线上。”5月29日，盟军得到如下情报：德军正在对美国伞兵预定空降的地区加强兵力，利·马罗礼将军要求取消空降，他说，否则会坑害美军两个精锐的空降师——第82和101空降师。艾克左右为难。马罗礼的话显然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取消空降对整个“霸王”战役的影响太大。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他决定按原计划实施空降行动。

6月3日，刮起了西风，天气开始恶化，天空中阴云密布，英吉利海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气候条件显然对盟军不利。要想按计划定在6月5日拂晓发动进攻，必须在6月3日晚上决定是否让航程最远的美国舰队启航。当晚，艾森豪威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负责气象情报的斯泰格上校报告说，6月5日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风雨、风力5级，云层0至500英尺。他还说，天气变化很快，24小时以上的预报很不可靠。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利于盟军在6月5日登陆作战。然而，像诺曼底登陆这样大规模的作战，事先精心制定的计划，也不能轻易改变。艾克左右为难，最后决定，先让美国舰队启航，至于是否按计划定在6月5日实施登陆作战，留待6月4日上午决定。

6月4日上午，司令官们继续开会。斯泰格上校说，6月5日，海上的气候情况会略微好转，但仍然是阴天，空军不能出动。蒙哥马利主张按原计划登陆。负责“霸王”战役的副统帅特德以及利·马罗礼主张推迟。负责海上作战的拉姆齐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他不能保证海军完成任务，至于整个行动是否应推迟，他不表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登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军的空中优势，若空军不能出动，登陆太冒险了。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他决定，诺曼底登陆推迟24小时，通知已经启航的美同舰队返航。

6月4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再次召开会议。晚上9时30分左右，斯泰格上校报告了最新气象消息。他说，现在正在下的倾盆大雨，将在两三个小时内停止，接着会出现36小时的好转天气，风力中等。特德认为，这样的天气仍然不利于出动重型和中型轰炸机。看来似乎有必要再次推迟，但拉姆齐表示反对继续推迟。他说，如果决定星期二（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必须在半小时之内通知美国舰队启航；他们启航后，如果又撤回来，就不可能作好在星期三（6月7日）上午发动进攻的准备。“所以，再一次推迟将是48小时”，即推迟到6月8日。到时候，潮汐情况又未必会好。因此，实际上可能推迟到6月19日。

艾森豪威尔急得团团转。他用征询意见的目光盯住参谋长史密斯。史密斯说：“这是一场赌博，但这可能是一场最好的赌博。”艾克又问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回答得限于脆：“我要说：干！”艾克点了点头，又盯住特德，特

德再次表示，很危险。

时间不允许拖延。艾克决定，先让美国舰队启航再说。拉姆齐立即冲出门乡下达命令，其他人仍然在屋子里讨论。有人认为，气候条件低于所能接受的最低要求。另有人认为，不能再往后拖……艾克冷静地想了一会，最后说：“好，让我们干！”司令官们立即冲出门去，奔赴各自的指挥岗位。

艾屯虽然作出了决定，但心里却没有很大的把握。他随后草拟了一份供登陆行动失败后发表的声明，其中说道：“如果这次尝试有什么差错或过夫，责任完全在我个人。”

罗斯福亦很不安。诺曼底登陆前夕，他经常去白宫里的“地图室”（相当于丘吉尔的作战室），一边查看作战地图，一边提出各种问题。他虽然不像斯大林那样直接干预前线指挥官们的战略战术，但仍然喜欢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专门汇报，了解作战情况。6月5日晚上，他针对盟军攻占罗马发表了炉边谈话后，一直坐到深夜（注意：华盛顿与诺曼底之间的时差），等候诺曼底登陆的消息，在焦虑不安的等待中，他写了一篇祈祷文，其中说到：“万能的主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祈求您引导他们勇往无前，永不迷失方向……他们任重而道远，有些人将一去不回。主啊，祈求您伸出双手，让您的英勇仆从进入天堂。”

5月底，丘吉尔决定，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他将乘军舰前往观战。负责海上作战的拉姆齐上将已为此作了精心安排。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坚决反对。他担心丘吉尔万一有个不测，他负不了这个责任。

可是，丘吉尔只要想做事，总要去争取一番，总能找到一些借口。他同艾克狡辩说，你的权力是英美两国政府授予的，而不能反过来对英国政府行使权力，你无权决定英国军舰上的精确编制。如果我是一艘英国军舰上的编制年的人员，“你就没有权力阻止我乘船前进”。

艾克不得不承认丘吉尔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也辩不过丘吉尔。这个问题似乎按丘吉尔的愿望定下来了。可是，5月30日，英国国王又掺台进来了。国王听说丘吉尔要去观战，他也想去。第二天，国王自己又决定不去，而且认为丘吉尔也不应该去。他致函丘吉尔说，万一你遇上不测。“这时我个人以及对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丘吉尔仍然想去。6月1日，国王又当面劝他不要去。6月2日，国王再一次致函，劝他不要去。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只好取消观战计划。

诺曼底登陆时，丘吉尔像罗斯福一样忧虑不安。在登陆开始几小时后，他在向下院提出初步报告时，有人注意到，他“面白如纸”。显然，他担心会发生最坏的事情。

实际上，他所担心的最坏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由于盟军制定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德军一直以为盟军会在加莱登陆，因而重兵防守加莱地区。甚至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仍然认为这是佯攻，是为了掩护即将在加莱地区展开的主攻行动。因此，德军主力一直在加莱地区按兵不动，直到7月下旬，他们才意识到，诺曼底是盟军登陆的主攻方向。此时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到7月23日，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总数达77万人，英军和加拿大登陆部队共59万人。

诺曼底登陆成功，由此开辟了斯大林盼望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为英美首脑增了光，尤其是为丘吉尔争了面子，这显然有利于他同斯大林打交道。正因为如此，他迫不急待地于6月6日下午向斯大林通报了消息。6月7日

中午，他再次致电斯大林，详细地介绍诺曼底登陆的情况。

斯大林力诺曼底登陆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丘吉尔表示真诚的祝贺。6月6日，接到丘吉尔的来电后，他当天回电说：“我们同感欢欣。”6月9日，再次致电丘吉尔，向他和英美盟军致敬。两天后，他第三次致电丘吉尔，盛赞诺曼底登陆。他说：“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

“龙骑兵”行动

由于丘吉尔和英国军方的反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未能同时派军队在法国南部登陆，实施“铁砧”计划。

6月4日，盟军攻占罗马后，美国军方认为，盟军在意大利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应从意大利战场上抽调10个师到法国南部登陆，实施原订的“铁砧”计划，以配合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作战行动。6月17日，马歇尔在视察地中海战区时，提出了重新实施“铁砧”计划的问题。6月23日，艾森豪威尔建议，为了直接支援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的作战行动，地中海战区的盟军应尽快实施“铁砧”计划，为此应不惜放弃在意大利的作战。他说：“在我看来，英国和美国的资源力量不容许我们在欧洲战争中维持两个主要战场，而每一战场又各有其决定性的使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英国人却不想放弃在意大利的作战，他们主张让盟军继续在意大利作战，以便能渡过亚得里亚海、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入匈牙利平原，进入巴尔干。英国参谋长们认为，盟军在意大利的作战，可以最有效地配合在法国西北部展开的“霸王”作战行动，因而无须再在法国南部登陆，没有必要再实施“铁砧”计划。

矛盾上交到两国首脑那里，丘吉尔和罗斯福各自站在本国参谋长们一边，又出现了意见分歧。丘吉尔认为，盟军继续在意大利作战，不仅能配合“霸王”行动，而且有可能促使巴尔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化，有可能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投降。他说，“我们不要顾此失彼，为赢得一个战役而让另一个大战役失败。两个战役是能够双双取胜的。”由于英国在地中海拥有巨大的传统利益，丘吉尔一直十分重视地中海战区，加上这一战区现在又是由英国将领负主要责任，因此他对美国军方不顾英国的利益、坚持把军队从意大利拉回到法国南部去实施“铁砧”计划十分不满。6月28日，他致函罗斯福，字里行间流露出满腹牢骚。他说，实施“铁砧”计划，就需要把盟军从意大利抽调一空，“把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所有的大事全部搞垮，因此，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非要我们这样做不可！……我极诚恳地请求你对这件事详加审查。”

然而，在罗斯福看来，是否实施“铁砧”计划，不是美国有意同英国人过不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履行在德黑兰会议上对斯大林作出的承诺。他提醒丘吉尔说，盟国在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宏伟战略”，就是实施“霸王”计划和“铁砧”计划，这些计划是与斯大林一起商定的，得到斯大林赞成的，放弃它，就会破坏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他坚持认为，除非先同斯大林协商，否则就不能放弃“铁砧”计划。他根本不赞成让美军进入巴尔干作

战。他说，如果把美军调往巴尔干，“‘霸王’作战行动中如果有丝毫挫折，我也担当不起。”

对丘吉尔及英国军方所说的在意大利作战也能支援“霸王”作战行动的观点，罗斯福也不以为然。他说，“由于我们不应当把主要的力量分散到一个新的战场上去的理由，我不得不同意我的参谋长们的意见。……我总是记住我学的初级几何知识——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意思是说，队法国进攻，打击德国的心脏地带，是打败德国的最佳途径。因此，他强调“正确的行动方针是尽早发动‘铁砧’战役”。

由于罗斯福态度坚决，丘吉尔只好让步。7月2日，他指示地中海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英国的威尔逊将军，让地中海战区的盟军（主要是美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登陆，并将这次作战行动的代号由原来的“铁砧”更名为“龙骑兵”。

到8月初，离实施“龙骑兵”作战计划的日期不到两周，丘吉尔又想出一个新点子：要求把“龙骑兵”行动的登陆地点从法国南部改到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比斯开湾，认为在这里登陆作战更有利于配合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作战行动。8月4日，他为此致电罗斯福，“我请求你考虑，是否可能把‘龙骑兵’转向主要而又关系重大的战区去，……”罗斯福没有立即答复他。等了两天，丘吉尔又于8月6日致电罗斯福的心腹顾问霍普金斯，希望通过他“曲线救国”。这封信写得很长，言词也很恳切。他说，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英美两国在战略上还有分歧，“使我感到痛心”，他详细阐述了要求改变登陆地点的各种理由，此外，还特别要求霍氏向马歇尔解释，“因为他可能责备我，说我在德黑兰支持‘铁砧’，而后来却又表示反对这个计划”。

8月7日，他又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劝艾克支持他的主张，艾克没有答应。就在当天，霍普金斯给他回电说：虽然总统尚未对你的来电作出答复，“但我深信，他的答复将是否定的。……现在变更战略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8月8日，罗斯福亦给丘吉尔回电说，对你的建议，“难予同意。与此相反，我在考虑之后，认为‘龙骑兵’作战行动应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按计划发动……”

丘吉尔这才死了这条心。他回电说：“我祈祷上帝，祝愿你是正确的。我们自应竭其所能，来帮助你们成功！”

这是战时丘吉尔缠着罗斯福，希望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的事例之一。在战争初期，他的这种做法常常奏效。到战争后期，罗斯福对他的这种喜欢软磨的行为多少有些烦了。他曾对人说：“说真的，我已经累了！如果你们也像我那样，整整用了5个小时才用小推车把温斯顿推上陡坡，你们也会感到累的！”

在罗斯福和美国军方的坚持下，1944年8月15日，美国和法国的部队按时在法国南部登陆，实施“龙骑兵”作战行动，一举成功。至8月19日，登陆的部队已达到16万多人。同一天，希特勒被迫下令在法国南部的德军全面撤迟。8月27日，法国军队收复了土伦，第二天又收复了马赛，俘虏德军3.5万多人。9月3日，盟军攻克里昂。与此同时，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也迅速地向前推进，于8月25日抵达塞纳河一线。9月12日，南北两路盟军在蒙巴尔胜利会师。在盟军反攻的大好形势下，8月19日至24日，巴黎人民和法国国内的抵抗力量发动起义，解放了巴黎。盟军迅速地进军，到1944年11月，除阿尔萨斯和洛林等少部分地区外，法国基本上获得了解放，德军

被迫退守位于法德边境的齐格菲防线。到 1944 年底，德军基本上被赶出了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

第二十四章 大联盟的裂痕

罗斯福：“我坚信任何有待解决的问题都只能由我们三个人共同来解决。”

丘吉尔：“我们都应当一起行动，但是总得有人出面打牌……”

斯大林：“我担心恫吓和诽谤的方式如果继续下去，将不利于我们的合作。”

意大利政治风波

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越出苏联国界，进入东欧作战，英美盟军开始全面反攻欧洲大陆，盟国之间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矛盾和分歧逐渐减少。相反，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三大盟国在政治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多。这种分歧不仅仅存在于苏联与英美之间，也同样存在于英国与美国之间。显然，政治方面的分歧比军事方面的分歧更难以克服。三大盟国在战时建立的合作关系能否在战后继续维持下去，已经开始成为摆在三巨头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后，意大利国王艾曼努尔授权巴多里奥元帅组织新政府，这显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及其对外扩张活动，是得到国王赞成与认可的，因此，意大利投降后，国王及巴多里奥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在意大利内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部分政治派别要求国王逊位，要求改组巴多里奥政府，得到了美国政府及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然而，丘吉尔却主张意大利在战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保留国王，让保守派势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1943年11月，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等盟军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之后，再就意大利的政治前途问题作出决定。当时估计，盟军在1943年底之前可以攻占罗马。孰知德军加强了在罗马南部构筑的古斯塔夫防线，盟军久攻不下，向罗马的进军遭受挫折。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国内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政府的政治派别又加强了反政府活动，美国政府也重新提出了改组意大利政府的问题。1944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盟国意大利咨询委员会，要求让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逊位，并改组意大利政府。

丘吉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他又不便赤裸裸地坚持自己的保守政治主张，便从军事角度提出理由说，迫使国王逊位、改组意大利政府，可能不利于盟军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他坚持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等盟军攻占了罗马再说，罗斯福于1944年2月10日表示，接受他的主张。

然而，2月中下旬，意大利国内的6个反对派政党组成的委员会向盟国递交了一项政治改革方案，坚持要求艾曼努尔国王逊位、巴多里奥政府下台，让所有非法西斯政治团体参加内阁。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2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讲话，大肆嘲弄意大利反对派的上述要求，公开表示支持艾曼努尔国王和巴多里奥政府。可是，就在第二天，美国政府却表示支持意大利反对派提出的意大利政治改革计划。这样一来，英美双方的分歧公开化了。

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使丘吉尔“甚为不安”。他于3月8日致电罗斯福说：“在你我之间以及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发生明显的公开分歧，也是不幸的。”他还提醒罗斯福：当初盟军在北非登陆，美国同法国维希政府

的法西斯分子达尔朗做交易时，“我曾给你和国务院以忠诚有力的支持。”他希望现在美国政府能同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们反复地交换了几次函电。罗斯福在3月13日的电报中说：“如果以前的电文未说清楚，十分抱歉。我从未有意向你表示同意在占领罗马以前，暂不作出各项政治决定。……占领罗马仍然遥遥无期，现在必须采取重大的政治决定。”丘吉尔收到这封函电后很失望。

正当英美之间争论不休时，苏联又掺和进来了。3月13日，苏联出人意料地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意大利的巴多里奥政府。紧接着，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原先坚决要求艾曼努尔国王逊位、改组巴乡里奥政府。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从苏联回来后，转而支持巴多里奥政府，也暂不要求国王逊位。意共态度的戏剧性转变，削弱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反对派的力量。

不过，美国和意大利其他反对派仍然要求实行政治改革。4月12日，盟国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攻占了罗马，国王就逊位，由王储洪贝特任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所有的反对党都加入了内阁。

6月4日，盟军攻占了罗马。艾曼努尔国王传位给儿子洪贝特，洪贝特仍然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遭到一些政治党派的反对。6月9日，伊凡诺那·博诺米当选为意大利总理。丘吉尔对意大利政同的变化很不满，6月10日致电罗斯福，主张盟国不应承认意大利新内阁。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让博诺米政府尽快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丘吉尔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了美国的主张。

桀骜不驯的戴高乐

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让他们最难受的问题或许是如何对待法国桀骜不驯的戴高乐将军。

自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被“逼婚”之后，戴高乐将军开始着手统一法国所有的抵抗力量。1943年6月，法国抵抗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诞生了，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在1943年这一年中，戴高乐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改善，他手下的兵力由不到10万人扩充到40万人，这些部队战斗在从非洲到意大利的所有战场上。法国抵抗力量的壮大，与英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戴高乐的部队，主要靠美国人提供武器。然而，戴高乐本人决不因此而时时处处屈服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而总是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常常在许多问题上与英美首脑唱对台戏，让罗斯福和丘吉尔很不舒服。

1943年11月，美国支持的吉罗将军被迫放弃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职务，戴高乐成为该委员会的唯一主席，从而成为法国抵抗力量的唯一领袖。这一变化显然不符合罗斯福的心愿。

大约与此同时，法国的委任统治地黎巴嫩要求完全独立，遭到了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黎巴嫩总统、总理以及内政、外文和供应部长均被逮捕。戴高乐作出的这种反应，引起了英国、美国乃至苏联的抗议。11月19日，英国向驻贝鲁特的法国卡特鲁将军发出照会，要求他释放所有的黎巴嫩人，否则英国将动用军队去释放他们，并宣布军管。戴高乐破口大骂丘吉尔和英国政府，说整个事件是英国人为把法国人从地中海东岸地区排挤出

去而制造的挑衅。这一事件加剧了他同丘吉尔之间的成见。

1943年12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逮捕3个著名的维希分子：布瓦松、马塞尔·佩鲁东和弗朗丹，再次引起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愤怒。这3个人虽然是维希分子，但当盟军在北非登陆时和登陆以后，多多少少帮助过盟军，得到英美的支持。因此，丘吉尔得知逮捕的消息后，指责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是些气量狭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罗斯福也很生气，他愤怒地说，铲除戴高乐，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虽然有时都很痛恨戴高乐，但两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罗斯福打心眼里不喜欢戴高乐，而丘吉尔对戴高乐则是既恨他又爱他。熟悉丘吉尔和戴高乐的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麦克米伦说：“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感情如同一个同儿子吵过架的男人。他决心断绝儿子的生活费用，但内心里想的却是，只要浪子回头，他随时准备设宴欢迎。”

1944年春，盟军在法国登陆和作战的日子即将来临。显然，盟军在法国领土上登陆和作战，需要法国抵抗力量和法国人民的支持和配合，而法国抵抗力量是受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统一领导的。戴高乐准备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法国政府，罗斯福坚决不承认，丘吉尔左右为难。

在戴高乐看来，由他及其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来治理解放后的法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罗斯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战后应由法国人民自由决定由谁来领导他们，盟军在法国登陆不应把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他甚至相信，法国解放以后，会有其他党派崛起，以取代戴高乐在法国的地位。因此，他坚决拒绝把戴高乐领导的委员会视为法国的哪怕是临时政府。1944年3月15日，他给艾森豪威尔起草了一道命令，实际上主张由盟军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戴高乐则针锋相对，于3月26日公开地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法国临时政府。5月份，罗斯福对美国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政府。”戴高乐不甘屈服，5月26日，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也不甘示弱，他致电丘吉尔，表示同意在“霸王”行动中利用法国的抵抗力量，但不同意为此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作法国临时政府。

在这种局面中，丘吉尔左右为难，因而也想左右逢源。4月份，他试图安排罗斯福同戴高乐举行会晤，为此施展了各种外交手腕，可是，罗斯福不热心，戴高乐又很倔犟，丘吉尔的一番努力付之东流。可他没有放弃努力。5月份，他邀请戴高乐去伦敦讨论法国同盟国进行政治合作的问题，戴高乐接受邀请后，丘吉尔又希望罗斯福派斯退丁纽斯或相当级别的其他人来参加会谈，再次遭到罗斯福拒绝。

然而，无论如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和作战是需要法国抵抗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和配合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曾为此专门拜访过戴高乐，对他说：“我必须得到你的帮助，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一向受罗斯福、赫尔之类的美国人歧视而自尊心又特强的戴高乐，见艾克的态度如此谦逊和诚恳，极为高兴。他称赞艾克“真是男子汉”！

为了使盟军在西欧顺利登陆和作战，艾克计划在诺曼底登陆时向法国及西欧其他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呼吁他们帮助和支持盟军。艾克希望戴高乐以及其他国家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也发表相应的广播讲话，以示支持。

在丘吉尔的邀请下，戴高乐于6月4日早晨从阿尔及尔飞抵伦敦。在会谈中，丘吉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苦口婆心地劝戴高乐早日访问美国，早日会见罗斯福，劝他要同罗斯福搞好关系。戴高乐却不以为然，甚至很生气地说：罗斯福总统显然从来没有想要会见我，而现在却突然要我去同他会谈，“莫非你们认为我应向罗斯福索要我当法国领导人的资格？理由何在？法国已有政府，在这方面我既无求于美国，也无求于英国。”

丘吉尔见戴高乐如此不识好歹，也很生气。他大声说，美国和英国愿意让几十万人冒生命危险去解放法国。至于你是否去华盛顿，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美国决裂，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英国必然要站在美国一边。

当天下午，丘吉尔同戴高乐一起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商讨如何让法国抵抗力量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的问题。戴高乐对艾克即将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的内容不满，认为它没有尊重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因此他拒绝发表支持性讲话。此外，当他得知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即将发行盟军自己印制的军用法郎时，极为愤怒，认为盟军无权在法国发行货币，指责这种做法是把法国当作战败的意大利一样看待。会谈不欢而散。丘吉尔邀请戴高乐与他一起乘火车返回伦敦，并共进晚餐。戴高乐却不领情，宁愿同法国人一起坐汽车走。

直到6月5日（即诺曼底登陆前一天）下午，戴高乐仍然拒绝配合艾克发表广播讲话，艾克极为气愤。正为诺曼底登陆能否成功而忧心忡忡的丘吉尔，见戴高乐如此不顾大局，怒不可遏，在内阁会议上大发雷霆，猛烈地攻击戴高乐。在场的卡多根联想到丘吉尔、罗斯福及戴高乐之间的矛盾和态度，认为他们“一个个都像接近青春期的女孩子那样激动多语”。

当晚9时，丘吉尔喝了很多威士忌，像发酒疯似地大叫：“戴高乐必须在安排给他的时间和地点讲话，他必须让步……”那天深夜，戴高乐因为英美不承认他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仍然坚持拒绝为盟军登陆部队派出联络官。丘吉尔暴跳如雷，指示说：“去告诉比尔德·史密斯（艾克的参谋长），让戴高乐上飞机，把他送回阿尔及尔，如有必要，戴上镣铐，不许他重返法国。”到6月6日清晨，驱逐令已被取消。

6月6日下午，戴高乐发表了广播讲话（录音）：“决战开始了……它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战斗，也是法国参加的战斗……法兰西的男儿们……利用一切手段同敌人战斗……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所承认的领袖们发布的命令……拨开凝结着我们鲜血和热泪的浓雾，法兰西的伟大太阳即将重新闪光！”

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未来一段时期，盟军将在法国领土上作战，既需要法国人民的支持，又能对法国政局施加影响。这一事实使罗斯福想会见戴高乐，戴高乐也愿意会见罗斯福。可是，罗斯福又不想使会见成为美国对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因而不愿说是他正式邀请戴高乐，而坚持说是戴高乐要求访美。然而，戴高乐却不想给人以他有求于美国总统的印象，认为罗斯福的说法有损于法国的尊严。因此，当罗斯福在5月底表示愿意会见戴高乐时，戴高乐表示：等研究后再说。6月6日，罗斯福又致信戴高乐，建议他确定访美日期，戴高乐仍然缺乏热情，于6月14日答复说，他“真诚地希望环境允许他成行。”直到6月26日，戴高乐才通知罗斯福：他接受邀请。7月1日，罗斯福发表了他对戴高乐的看法：“这是个怪人。”

7月6日，戴高乐抵达华盛顿。私下里，罗斯福说戴高乐是“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对民主制度三心二意的、心胸狭窄的法兰西狂热分子”，认为戴高乐将会垮台，但表面上却很热情，试图施展他的魅力外交征服这位孤傲的法国人。戴高乐后来回忆说：“很难使人用任何绝对的语言来反驳这位艺术家、这位有魅力的人。”这次访问多少取得了一点实际成果：7月11日，罗斯福宣布，美国政府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事实上的权力机关，虽然不是对法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但多少有点进展。

罗斯福事先没有同英国打招呼就突然宣布了上述决定，使得英国人很意外、也很被动。他们认为，罗斯福此举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是他，而不是别人使我们（在法国问题上）摆脱了困境；而恰恰是他为了赢得克服困难的虚名而制造了困难。多么圆滑的政客！”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十分恼火。丘吉尔对他说：“总统把你们捉弄得够呛。”

波兰问题的缘由

如果说在意大利和法国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存在于英国与美国之间，那么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则主要存在于苏联与英美之间。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苏联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接着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将这一地区并入了苏联版图。据莫洛托夫1939年10月31日说：“过渡到苏联方面来的领土……共达19.6万平方公里，而其人口则约近13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700余万，白俄罗斯人有300余万，波兰人有100余万，犹太人有100余万。”

1939年9月底，波兰流亡政府在巴黎组成，1940年法国败降后迁往伦敦，苏联没有承认它。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政府改变了立场，在英国的斡旋下，经过谈判，于1941年7月30日与波兰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建交谈判中，波兰流亡政府要求恢复1939年9月战争爆发以前的波兰疆界，苏联则坚持保留已经合并到苏联版图中去的战前属于波兰的领土。双方互不让步，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没有影响双方建交。

1943年4月13日，德国宣布，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几千具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并说他们是在1940年春天被苏联枪杀的。苏联立即否认，驳斥德国是“恶意捏造”，说这起枪杀事件是德国人干的。根据这一情况，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与德国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调查，遭到苏联反对。4月25日，莫洛托夫向波兰驻苏联大使递交一项照会，指责波兰流亡政府已经“滑向同希特勒勾结的道路”，宣布苏联与之断绝外交关系。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通过谈判取得和解，斯大林对波兰流亡政府指责了一番。关于波兰的边界，三巨头一致同意波兰边界向西移动，把东部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苏联，再从德国割让一部分领土给波兰，以弥补它的损失。斯大林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依寇松线划定，西部边界为奥得河，丘吉尔原则上表示同意，答应把这个方案带回伦敦去同波兰流亡政府商讨。罗斯福实际上默认了这一点。

1944年1月4日，苏军进入西乌克兰的沃尔希尼亚地区作战。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苏联已进入了波兰境内，因为他们坚持战前的波兰边界，下承

认苏联合并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是合法的。为此，他们在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有权治理解放了波兰领土。

1月11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重申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合并到苏联版图是合法的，并公开提出，战后苏波边界可以大致以寇松线为界，而波兰西部边界应西移，即波兰可以从德国取得领土补偿。

所谓寇松线是1920年7月11日由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的。1919年至1920年，波兰在协约国支持下参加了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苏联红军在反击作战中，于1920年7月直逼波兰首都华沙，寇松线便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的停火线。它是依据波兰民族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地理分布线划定的。寇松建议在这个基础上谈判划定波苏边界。按这条线规定，波兰原则上只管辖波兰民族居住的地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都属于苏俄的范围。但当时苏俄没有接受寇松线。不久，红军作战失利，被迫后退到寇松线以东。1921年3月，苏俄与波兰签订里加条约，把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划给了波兰——这就是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前的波苏边界。波兰流亡政府要求恢复这条边界，实际上是要求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重新划给波兰；而苏联坚持以寇松线划界，也就是坚持让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留在苏联境内。

斯大林本来准备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谈判解决波苏边界问题。可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很固执，拒不考虑以寇松线划界的建议。苏联便决定不同这个政府谈判、再说它们本来也没有外交关系。

波兰人便去向丘吉尔求援。1月20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求见丘吉尔和艾登。丘吉尔早已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以寇松线划界，便劝波兰人接受寇松线，然后在西边从德国获得补偿。米科拉伊奇克拒不接受，丘吉尔便开始施加压力。他说，接受寇松线“不仅是波兰的利益，而且一切联合国家的利益都要求这么做。”他还说：“没有俄国人，这个仗是打不赢的。单靠我们的轰炸机是赢不了的。”波兰人仍不让步。

看来丘吉尔靠不住，米科拉伊奇克又写信向罗斯福求援。罗斯福的答复是，美国不能保证波兰的边界，并准备支持丘吉尔为重建波苏关系而进行的努力。

丘吉尔一方面压波兰流亡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苏联让步；另一方面劝斯大林继续同波兰流亡政府订交道，不要试图另立新的波兰政府，否则，“对三大国的团结一致很不利”。斯大林回答说，波兰政府必须“彻底改组”。否则是“不能指望会有圆满结果的”。罗斯福也要求斯大林不要使波兰问题妨碍未来的国际合作。斯大林回答说，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是敌视苏联的亲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分子，波兰政府必须“根本改组”。

这样一来，波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边界和政府改组两个问题。在边界问题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可是波兰流亡政府拒不接受寇松线，形成难以突破的僵局；由此又引起斯大林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敌视，而英美首脑（尤其是丘吉尔）非常担心斯大林撇开波兰流亡政府，另立一个完全追随苏联的新政府，把战后波兰完全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决心阻止出现这种局面。

为了让斯大林愿意同波兰流亡政府谈判，1944年2月21日，丘吉尔通知斯大林说，波兰流亡政府愿意接受寇松线作为谈判基础，波苏复文时，流亡政府只会包括决心与苏联合作的成员。他接着向罗斯福透露：波兰流亡政府

并没有真正这样说。其实，斯大林根本不相信丘吉尔的话。他们为此反复地争论，后来，丘吉尔威胁要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诸于世。斯大林根本不在乎。他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你发表这类内容的声明，我将认为你的行为是不公正和下友好的……。我担心恫吓和诽谤的方式如果继续下去，将不利于我们的合作。”

在这种局面中，罗斯福一方面安抚斯大林，另一方面劝丘吉尔不要在波兰问题上同斯大林争执。6月6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访问美国，罗斯福也劝他在寇松线问题上让步，劝他到莫斯科去直接同斯大林会谈，米科拉伊奇克感到很失望。罗斯福然后又告诉斯大林说，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同苏联合作，愿意访问莫斯科，他本人无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斯大林。斯大林对罗斯福的这种态度表示“非常赞赏”。

7月下旬，苏联红军在对德作战中越过寇松线，7月23日攻克波兰的卢布林，并在这里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又称卢布林委员会），作为波兰的临时行政权力机构，由波兰工人党掌握领导权。

7月底至8月上旬，米科拉伊奇克访问了莫斯科，同斯大林以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没有取得成果。

7月底，当苏联红军推进到维斯什拉河、直逼华沙时，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指示波兰地下军于8月1日在华沙发动武装起义。丘吉尔多次致电斯大林，请求他支援波兰地下军，遭到斯大林的拒绝。丘吉尔又鼓动罗斯福出面。8月20日，他们两人联名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向波兰华沙地下军空投紧急物资和军火，或者允许盟国飞机为华沙地下军空投物资后在苏联机场降落。斯大林把华沙起义说成是波兰流亡政府为了抢夺政权进行的一场轻举妄动的赌博，再次拒绝了英美首脑的要求，丘吉尔仍然希望罗斯福继续同他一起与斯大林文涉，遭到罗斯福拒绝。10月初，华沙起义失败。

巴尔干问题

巴尔干历来是列强争夺的战略要地。进入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越出西南国界，进入巴尔干作战，英国与苏联之间便展开了一场争夺巴尔干的斗争，美国也很自然地卷进来了。这是大战后期盟国进行的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1944年3月29日，苏联红军向前推进到1940年东方战线建立之后的苏罗边界——普鲁特河，随即渡河，进入罗马尼亚作战。鉴于巴尔干问题十分敏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4月2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无意吞并罗马尼亚领土，也无意“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

在巴尔干各国，尤其是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43年9月，意大利战败投降，促使丘吉尔考虑这一事件对希腊局势的影响。他回忆说：“意大利的投降，影响到希腊的整个力量对比。人民解放军能缴获意大利的大部分装备，包括整师的全部武器，因此，在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在德军撤退的情况下，共产党策动政变的危险现在已有实际可能，需要密切注意。”为此，1943年9月29日，他指示英国军队，倘若德军撤出希腊，必须派英军在希腊登陆。在丘吉尔看来，倘若共产党在希腊夺取政权，希腊就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1944年初，他得出结论说，在巴尔干半岛“我们即

将与俄国人摊牌”。

为了防止整个巴尔干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英国双管齐下，一方面阻止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另一方面试图与苏联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妥协。

1944年3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内解放区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他们否认希腊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坚决反对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回国。英国对此感到忧虑，于4月份促使希腊流亡政府改组，5月份，促成希腊各派政治势力在黎巴嫩举行了一次和解会议，同时设法加强保守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军事实力。

在南斯拉夫，英国劝国王彼得抛弃不得人心的米哈伊洛维奇，而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达成妥协，1944年6月1日，国王彼得接受英国的意见，任命伊凡·舒巴奇取代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相，6月16日，彼得与铁托实现了初步和解。

除采取上述措施外，丘吉尔还要求就巴尔干问题直接同苏联“摊牌”。1944年5月4日，他在写给外交大臣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英国与苏联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正日益发展，而在希腊尤为严重。……总的说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打算默认巴尔干半岛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要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侵略，就必须在军事形势许可的最佳时机，把问题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来”。

根据丘吉尔的这一指示，艾登从第二天开始，与苏联驻英国大使古雪夫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初步划分了英国和苏联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苏联的活动范围，希腊和南斯拉夫是英国的活动范围。

这一建议是英国主动提出的，苏联表示同意，但他们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多次表示，反对划分战后势力范围，因此，他们问英国人，美国对此有何看法，如果美国不反对，苏联就接受。

丘吉尔心里很清楚，英国要在巴尔干同苏联抗衡或达成妥协。心须取得美国的支持，至少应取得罗斯福的谅解。他在5月4日给艾登的指示中说：“我们必须先同美国进行磋商。”他也知道罗斯福反对划分战后势力范围，为此，他强调英国与苏联的上述妥协不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而是战时避免发生冲突的一种权宜之计。5月31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鉴于我们可能与苏联在巴尔干发生分歧，“我盼望你能对这一建议给予赞许。我们当然不希望把巴尔干国家划分成势力范围；如蒙同意，我们则应明确此项协议仅限于在战争期间实施。”他强调说：“为了防止我方同俄方在巴尔干出现政策分歧，上述协议堪称良策。”

美国从战后称霸全世界的目的出发，在战争期间，一向对英国和苏联可能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很敏感，也不赞成。赫尔对英国的上述做法表示强烈反对，用丘吉尔的话说，是“非常神经过敏”。罗斯福也不同意。

6月8日，丘吉尔又致电英国驻美大使，解释说：“并不存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我们都应当一起行动，但是总得有人出面打牌。……总的说来，我们英王陛下政府正在出面打牌，并且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俄国人协调一致来打，”然而，罗斯福还是不同意英国的做法。6月11日，他致函丘吉尔说，英国的做法最终“势必把巴尔干地区划分为势力范围”，他建议成立一个协商机构，以避免苏联与英美在巴尔干出现分歧和冲突。丘吉尔不同意他的建

议，认为这种办法太笨拙了。丘吉尔利用罗斯福的虚荣心，建议由他和罗斯福亲自处理这个问题，目的是撇开从中作梗的赫尔。他还提出，让英国的办法先试行3个月，若无效就放弃。

可是，美国国务院还在继续向英国提出抗议。丘吉尔对此很反感。他认为，美国经常在一些问题上撇开英国，直接同苏联打交道，因此，在巴尔干问题上没有资格指责英国。6月23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你把你同波兰人会谈的情况详细告诉约大叔，我没有获悉任何情况，但我对此毫无怨言，“对于我在处理希腊问题时的做法，希望你也会持同样的态度”。

3天之后，罗斯福委婉地向丘吉尔表示歉意：“看来我们双方似乎都曾出于无意在某个方面单独采取行动”，他同意英国与苏联作出的安排是一时的权宜之计。7月1日，苏联也直接询问美国对上述安排的意见。7月15日，美国答复说，同意按上述安排先试行3个月，但不应把它看成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美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将不受英苏协议的影响。

于是，1944年夏天，英苏两国在巴尔干都按上述临时安排的分界线行事。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反苏分子要求英国派军队去这两个国家同苏联红军抗衡时，遭到英国的拒绝。同样，1944年8月，苏联劝希腊共产党参加了英国支持的希腊帕潘德里欧政府。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军事战略（关于“铁砧”和“龙骑兵”行动）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使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在1944年上半年处于低潮，丘吉尔多次要求与罗斯福举行会晤，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都被罗斯福拒绝了。

1944年6月初，英美盟军攻占罗马，尤其是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使美苏英三大国之间以及三巨头之间有些变冷淡了的关系又开始升温，罗斯福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说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罗斯福反复做工作，斯大林还是不同意。

战争后期，三巨头之间，丘吉尔热衷于同罗斯福举行会晤，而罗斯福似乎更愿意同斯大林见面，而斯大林似乎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去同英美首脑举行会议。斯大林拒绝了罗斯福的请求后，丘吉尔再次要求举行英美首脑双边会谈。罗斯福初步同意到英国的苏格兰同丘吉尔会晤。然而，霍普金斯等人认为，“让他来找你比你去找他好得多”。于是，他们商定，9月中旬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会晤。自德黑兰会议到这次魁北克会议，他们整整有9个月没有见面，这是大战中他们8次会晤之间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

9月10日，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抵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第二于乘车到达魁北克，罗斯福比他早到一会。这一次，他们都带上了各自的夫人。

在这次魁北克会议上，在军事方面，欧洲战场上没有多少问题需要讨论，倒是的对日作战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英国未来参加对日作战的规模和性质。迄今为止，英国在对日作战中，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可丘吉尔决不想放弃英国战前在远东拥有的巨大利益。此时此刻，他担心战后美国会对英国恢复在远东的利益说三道四。他后来回忆说：“将近3年来，我们坚持了‘首攻德国’的战略。现在是解放亚洲的时候了……在战争的现阶段，我最担心的是美国在战后的年代里会说：‘我们在欧洲帮了你们的忙，而你们却让我们单独去收拾日本’。”他决定，

让英国海军舰队全面参加对日本的主要攻击，并在打败德国后，让英国空军也参加对日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对日）作战中起充分、对等的作用”。

然而，以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将领不想让英国人插手太平洋战争。他希望，完全依靠美国海军的力量打败日本，彻底洗刷珍珠港事件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耻辱。丘吉尔对此感到不安。他强调说，英国应当在对日的主要战役中起应有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在对德作战中给了我们极为慷慨的援助，为了报答这种盛情，大英帝国理应竭其全力帮助美国打败日本。罗斯福明确表示，欢迎英国舰队参加对日作战。会议预计，在结束对德战争后，打败日本大约还需要 18 个月。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讨论了美国对英国的租借援助问题。几年的战争使英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英国的战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租借援助维持着。对德战争结束后，美国向英国提供租借援助的理由将不复存在，若美国突然停止其对英国的租借援助，英国经济必将陷入崩溃。为了维持英国的经济稳定，英国希望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后，对日战争结束之前，美国继续向英国提供租借援助，并改变具体的租借政策，由主要帮助英国的战时生产改变为帮助英国恢复民用经济和对外贸易。丘吉尔说：这件事“关系到生死存亡，极其重要……，其理由显而易见，实在令人痛感其必要性。”

早在 1944 年 9 月 6 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就说过，战后英国经济将发生严重困难，他对此感到关切。在他的战后世界蓝图中，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英国在欧洲起稳定和平衡作用，因此，他同意在经济上帮助英国。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提出，从欧战结束到日本投降期间（预计 18 个月），美国将向英国提供 35 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另外提供 30 亿美元的信贷，用来帮助英国维持经济稳定、建立出口信贷。9 月 15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准备为此草签一份备忘录。签字之前，罗斯福老是讲掌故而迟迟不肯签字。丘吉尔生气地对他说：“你要我干什么呢？难道我要像法拉（罗斯福养的一条狗）一样，用两条后腿站起来摇尾乞怜吗？”据在场的摩根索回忆说，丘吉尔当时很激动，“有时他眼中含着泪花”。备忘录签字后，他很感激罗斯福。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战败的德国采取温和的政策，罗斯福最初却倾向于严厉地处置德国，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就流露出这种倾向。后来，他又说过：“我们不得不对德国采取严厉态度，我指的是对全部德国人而不仅仅是对纳粹分子。我们要么不得不把德国人全部阉割掉，要么你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置他们，从而使他们不能再繁殖希望继续走老路的人。”

根据他的这种指导思想，财政部长摩根索起草了严惩德国的计划，主张拆除德国的全部工业，只让德国发展农业，并把德国分割成若干个小国家。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最初不同意摩根索的这一计划，只赞成取消德国的军事工业。罗斯福提醒说，其他德国工业能在一夜之间由民用转为军用。9 月 15 日，他们草签的备忘录基本上接受了摩根索计划。

魁北克会议上还讨论了法国问题。1944 年 8 月 25 日，戴高乐威风凛凛地回到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巴黎，俨然是整个法国的主人一样。可是英国和美国都还没有正式承认他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继续流露出对戴高乐的不信任，用艾登的话说是，他们两人轮番大肆攻击戴高乐。罗斯福说，在一个之内，戴高乐不是成为总统，就是被投进巴士底狱。丘吉尔说，戴高乐本质上是英国的敌人，忘恩负义。不过，

无论哪方面，他都比吉罗能干，在公众中匀号召力，与其要一个共产主义的法兰西，不如要一个戴高乐的法兰西。他和罗斯福都不赞成马上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他们与戴高乐的恩恩怨怨，使当时的英法关系出现了一些不止常的现象，英国虽然没有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但在巴黎解放后，却马上向巴黎派驻了英国大使，以致担任这份差事的达夫·库珀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伦不类。

在这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答应，在 1944 年美国大选之后，他无论当选与否，都将访问英国——这是丘吉尔早已有之的愿望。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先回他的家乡——海德公园。过了两天，丘吉尔也偕夫人和女儿再一次到罗斯福家里作客。对丘吉尔来说，去罗斯福家里就像走亲戚一样。他与罗斯福之间，无论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有多大分歧，似乎都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交。

9 月 25 日，丘吉尔回到了英国。

丘吉尔再访莫斯科

大约在丘吉尔与罗斯福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苏联红军在巴尔干的攻势势如破竹，迅速地席卷了东南欧几乎所有国家。8 月底，苏军开进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9 月 5 日，苏联正式对纳粹德国的另一个附庸国保加利亚宣战，保加利亚见势不妙，于 9 月 9 日成立新政府，并对纳粹德国反戈一击，从而得以避免了与强大的苏联红军交火。9 月 16 日，苏军开进了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0 月 1 日，苏军继续向前推进到了南斯拉夫境内——5 月份英苏协议中划定的属于英国的活动范围。

丘吉尔从美国返回英国后，充分地意识到了东南欧的严峻形势：“在炮声隆隆的俄国战线背后，共产主义抬头了”，“这种影响从前是渗透进来的，现在又随着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而到来。”他感到，巴尔干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无论如何不能拖到 11 月美国大选之后举行三巨头会议时再解决。必须马上往苏联跑一趟。虽说是刚开完魁北克会议回来，难免旅途劳顿，而且年龄比美苏首脑部大，但由于英国的实力不如美苏，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也只好由他东奔西走了。

9 月 27 日，丘吉尔致函斯大林，表示希望在 10 月份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于 9 月 30 日回电表示欢迎。丘吉尔想带夫人同行，又想到斯大林早已丧偶，不知是否合适，经驻苏大使了解，得知苏方欢迎夫人同行。可他夫人自己又不想去。

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对英苏两国单独讨论巴尔干问题总是很敏感。为了不让他多心，丘吉尔于 9 月 29 日给他去电说，斯大林说他身体欠佳，只有呆在莫斯科才感到好一些，因此我正考虑尽快飞往那里。他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坚持要他参加对日作战；第二，争取对波兰实行友好的解决。”他透露说，还要讨论南斯拉夫和希腊问题——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目的，其实这才是他急急忙忙去莫斯科的主要原因。他还说，希望罗斯福派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协助他，或者派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或马歇尔来。

丘吉尔的这封电报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罗斯福对英苏首脑单独会晤的疑虑。值此苏军攻势迅速地席卷东南欧之际，罗斯福不能不担心英苏首脑会在

东南欧划分势力范围，因此反应比较冷淡，在给丘吉尔的简短的回电中，没有说一句热情支持的话，仅同意让哈里曼给予协助。

丘吉尔在接到斯大林的邀请后，为了让斯大林重视他的这次访问，又于10月4日致电罗斯福，希望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说他赞成这次访问。

罗斯福当天给他回电，同意按他的要求去做。为了防止英苏首脑对美国搞越顶外交，达成对美国不利的妥协，他说，哈里曼虽然可以协助丘吉尔，但“不能代表美国承担任何责任”，他表示，不同意丘吉尔同斯大林讨论有关安理会的表决权问题。他还说，等美国大选结束后，随时可以举行三巨头会议，因此英苏首脑的这次会议，只能作为三巨头会议的“一个有目的序幕”。实际上，罗斯福是在设法限制英苏首脑的莫斯科会谈。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得更明确：“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确实没有任何问题是美国不关心的，……我坚信任何有待解决的问题都只能由我们三个人共同来解决。”此外，他指示哈里曼，不能代表美国承担任何义务，以便他能“保持行动的完全自由”。

然而，在纵横 阖的世界外交舞台上，丘吉尔和斯大林也是久经炮火考验的，不是罗斯福想限制就能限制住的。10月5日晚上，丘吉尔等人乘飞机启程，在意大利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9日下午飞抵莫斯科。此时苏联的形势比他两年前第一次来访时有了彻底的改观。当时，苏军正被德军的强大攻势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正追得德军仓惶逃窜。正因为如此，苏联人对丘吉尔接待也更周到，态度也更友好。在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时，丘吉尔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此时，苏军已牢牢地控制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推进到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境内，而英国只在希腊和南斯拉夫有军事联络代表团，再就是对两国流亡政府的影响。显然，苏联在巴尔干的势力已占居巨大优势，不过，它并没有忘记5月份与英国达成的谅解，苏军在进入南斯拉夫作战时，苏联曾于9月29日发表声明：“苏军在完成其作战任务后将南斯拉夫撤退。”

丘吉尔在会谈中能面对这种现实。他说：“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90%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

当译员翻译这段话时，丘吉尔在半张纸上写下了英苏等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

罗马尼亚——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致）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各占 50%

匈牙利——各占 50%

保加利亚——俄国 75% 其他国家 25%

写完后，他把这张纸递给斯大林。斯大林看了一眼，用铅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勾，以表示同意，又把它还给丘吉尔。如此复杂的国际问题解决得如此之快，以致丘吉尔本人感到有些内疚。他对斯大林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致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

“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英苏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就这样划定了。可见，解决国际问题有时比在自由市场上买小菜还要容易。

显然，丘吉尔和斯大林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受罗斯福的限制。不过，为了让罗斯福在白宫睡得安稳，10月10日，他们两人联名致函罗斯福介绍第一次会谈情况时，绝口不提巴尔干百分比问题。10月11日，丘吉尔在单独致函罗斯福时，还一个劲地保证说：“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在处理一切事情时不会使你受到约束。”

丘吉尔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还讨论了波兰问题，并把英国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和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的代表也请来一起会谈。事实表明，波兰问题是英苏首脑莫斯科会谈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在会谈中表示，战后波苏边界不能以寇松线划分，而只能根据1939年以前的边界作较小的调整；波兰政府改组后，在新政府中，卢布林委员会的人只能占1/5的席位。以博·贝鲁特为首的波兰卢布林委员会的代表在会谈中表示，他们完全同意以寇松线作为波苏边界，在波兰新政府组成后，伦敦流亡政府的代表只能在其中占1/4的席位。显然，波兰两派的立场尖锐对立。

丘吉尔在会谈中劝米科拉伊奇克接受寇松线，并接受卢布林委员会更多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他说，战争形势变化很快，波兰统一问题最好在战争结束时实现。言下之意，是免得夜长梦多。斯大林在会谈中指出，米科拉伊奇克的方案有两个缺点：一是忽视了卢布林委员会，二是不接受寇松线。他希望卢布林委员会与流亡政府作为平等的伙伴一起组建波兰新政府，并坚持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

莫洛托夫在会谈中透露，苏美英三大国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曾商定以寇松线作为战后波苏边界。这个消息对米科拉伊奇克打击很大，因为他一直寄希望于罗斯福支持流亡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现在看来，三巨头早已串通好了，但他最初仍然不接受寇松线，斯大林在边界问题上也毫不让步，直到莫斯科会谈的最后，米科拉伊奇克才作出了一点让步，希望波苏边界从寇松线往东稍微移开一点，让利沃夫及附近的油田留在波兰。斯大林仍然不答应。会谈没有达成协议。

10月14日，斯大林陪同丘吉尔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一场芭蕾舞、一场歌剧和苏联红军歌舞团的精彩表演。随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了苏联出兵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说，打败德国之后，红军要花3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才能对日本发动进攻，美国必须帮助红军在西伯利亚聚集大批作战物资。他还说：“俄国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的，我们对日宣战有一定的打算……”早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就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再一次提出，是为了让英国和美国人考虑能够为苏联对日参战付什么代价。10月15日，斯大林在与艾登以及美国大使哈里曼的讨论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一些政治性问题能够澄清，苏联就准备在打败德国后3个月左右对日作战。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完演出的那天晚上，丘吉尔突然发起高烧来，他手下的人都吓了一跳。那段时间，丘吉尔东奔西走，也许是太累了。他的私人医生莫兰担心他患了肺炎，好在他很快就恢复了。10月19日，他离开莫斯科经开罗回国。

丘吉尔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是有收获的。除了波兰问题外，双方“在

其他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他认为，苏联决心对日作战，“这对整个战争的缩短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所作的安排，我确信是再好不过了”。斯大林也对这次会晤比较满意。11月7日，他在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的讲话中说，这次同英国领导人的会谈“应该看作是联合国阵线十分巩固的一种更为显著的标志”。10月27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说：“我们同苏俄的关系从来没有比目前这样更密切、更亲近和更热忱了。”

第二十五章 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过去三年间，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更大的变化还在将来。”

丘吉尔：“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像这次会议上那样感到我的责任是这样沉重。”

斯大林：“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下结成的联盟将在战后巩固和发展。”

矛盾加剧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和丘吉尔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只是暂时缓和了三大盟国之间的矛盾，而没有完全弥合大联盟的裂痕。1944年来至1945年初，大联盟的裂痕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进一步扩。1944年10月初，英国军队在希腊登陆。10月中旬，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了雅典。10月底，德国军队全部撤出希腊，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着全国广大地区，他们是希腊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中的主要力量。美国认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治理下的希腊有效率、有秩序，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丘吉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为了阻止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夺取雅典，1944年12月5日，丘吉尔命令驻雅典的英军司令斯科比将军，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镇压，他指示说：“行动不要犹豫，要像在一个已被征服而正在爆发叛乱的城市里那样，如有必要，可以用屠杀来守住或统治雅典。”于是，英国军队对希腊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英军的这种行为以及被记者披露出来的丘吉尔的上述命令，引起了美国舆论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不得不出面提醒丘吉尔，表示美国政府对希腊事件的关注。12月13日，他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部分地出于美国的传统政策，部分地出于日益增长的我国公众舆论的不利反应，……美国政府不可能在目前的希腊事件中同你们站在一起。”

除希腊事件外，意大利的政治风波对英美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1944年11月26日，意大利的博诺米政府辞职，第二天，博诺米组织新政府，决定让卡洛·斯福扎担任外交部长，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斯福扎曾长期流亡美国，被美国人认为是坚强的反法西斯斗士，1943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曾向丘吉尔许诺，战后将继续支持意大利的君主立宪政体，回到意大利后没有履行这一承诺。丘吉尔认为他言而无信，因此，11月28日，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斯福扎出任意大利外交部长。英国的这一做法却引起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被认为是粗暴的，反民主的行为。美国公众舆论甚至怀疑和批评美国政府站在英国政府一边。

为了表明美国政府与英国的做法无关，12月5日，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发表声明：“我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意大利政府的组成纯粹是意大利人的事，除了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之外。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美国对斯福扎伯爵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希望意大利人民……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问题。……”这份声明既使英美之间的分歧大白于天下，又实际上指责了英国干涉意大利内政。丘吉尔怒不可遏，给罗斯福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函电：“美国国务院企图利用与斯福扎伯爵关

系上产生的意见分歧，公开谴责意大利国王陛下，这使我非常恼怒。在当前军事局势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在公开的辩论中张扬这一……意见分歧，那是极其可悲的。我不记得国务院关于俄国和任何其他盟国发表过的意见有哪一条类似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职时所发表的那种文件。”舍伍德说：“这也许是在他们之间所有的历史性通讯中最为怒火迸发的一封电报。”

然而，丘吉尔并没有完全解气。12月8日，他又在下院的讲话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我们正沿着一条艰难痛苦的道路前进。可怜的老大的英国！……我们不得不肩负起最吃力不讨好的重任，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往何处去，知道路的尽头，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一时间，英美关系变得比较紧张。

在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关系中，波兰问题则变得越来越突出。波兰流亡政府中的多数人坚决反对接受寇松线为战后波苏边界，米科拉伊奇克便再次向罗斯福求援。最初，罗斯福出于竞选的考虑，根本不想管这事。大选获胜后，罗斯福也不肯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相反，希望波兰、苏联及英国三方能就波苏边界问题达成协议。11月20日，美国前驻波兰大使要求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向苏联施加压力，罗斯福很不耐烦地说：“你要我同俄国人打仗吗？”

米科拉伊奇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44年11月24日辞去了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职务。斯退丁纽斯赶紧提醒罗斯福：苏联会利用这一机会使卢布林委员会成为波兰唯一的政府。12月16日，罗斯福致信斯大林，希望在三巨头会晤之前苏联“不要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政府”。斯大林于12月27日回电说：“如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就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来推迟给予承认。”12月30日，罗斯福再次致函斯大林说，如果苏联正式承认波兰的另一个政府，而美英却继续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将会产生极端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再次要求苏联暂缓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他表示相信，三巨头开会时能够解决波兰问题，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这一要求。

1945年1月4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1月6日，苏联不顾美国和英国的一再劝告，正式承认了波兰临时政府。而英美仍然继续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三大盟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

苏联与英美的分歧，还表现在如何建立战后国际组织方面。自1943年10月中、美、苏、英四大国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问题开始提上四大国的议事日程，其中美国对此尤为积极。1944年4月，美国国务院起草了“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经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详细讨论后，于7月18日交给中、苏、英三国政府。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苏、英三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9月29日至10月7日，中国代表与美、英代表进一步作了讨论，但无实质性内容），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

三国代表一致认为，战后国际组织成败的关键，是如何保证三大国之间的合作。三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其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其一是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三大国都同意，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应拥有否决权。英美代表提出，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即使是常任理事国，也不能在安理会审判这一争端时参加投票，理由是一个国家参

加审判它自己的案件，违反公正原则。苏联代表不接受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坚持大国一致的原则，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所有问题上参加投票并行使否决权。9月8日，罗斯福曾为此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同意美国的建议。斯大林在回电中悦，苏联“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某些无稽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妨碍对苏联采取真正客观的态度”。实际上，苏联担心英美操纵安理会的投票活动，在涉及苏联的一些问题上作出对苏联不利的决议，因而坚持包括苏联在内的四大国对安理会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能行使否决权。会议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哪些国家应成为战后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美国坚持要把6个没有对轴心国家宣战的拉美国家包括在内，引起了苏联的不满。苏联代表不难想象，若同意了美国的要求，那么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英国有英联邦成员国支持，美国有拉美国家支持，唯有苏联会比较孤立，投票时肯定对苏联不利。针对这种局面，8月28日，苏联首席代表葛罗米柯要求把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列为创始会员国。正好在1944年2月，苏联宪法曾作过修改，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直接建立关系、签订协定、以及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从而为苏联的上述要求提供了法律依据。罗斯福得知苏联的上述要求后大吃一惊，对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退了纽斯说：“我的上帝！告诉葛罗米柯，我们决不能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可能使一个国际组织得到美国参议院认可和被美国人民所接受的机会化为乌有”。他感到，这是一个富有爆炸性的建议，传出去会危及建立国际组织的整个计划，于是下令对此严加保密。8月31日，他急电斯大林磋商此事，斯大林于9月7日回电，强调了苏联的要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协议。

美、苏、英三大盟国之间，除了在上述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外，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此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也有待明确。

在世界大战开始向战后和平过渡的关键时刻，上述各种问题若处理不当，各种矛盾若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危及战后世界和平。正因为如此，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却产生了一种忧患意识。1945年1月8日，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目前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要比上一次更加令人失望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过了21年，人类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1945年1月，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说：“上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我们的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获得更有利的和平的希望，因为我们在一个公认的不完美的世界上没有勇气去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情况重演，否则我们又将走同样的悲惨道路——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通向雅尔塔之路

由于美、苏、英三大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对德战争）中的突出地位，由于三巨头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因而在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关键时刻，三巨头再次举行会议，以解决战争引起的各种问题，协调三大盟国之间的关系、为战后世界和平作出安排，便显得非常必要，而且也刻不容缓。

1945年1月5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针对苏联准备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情况，他说：“我十分清楚最好的办法是由我们三人在一起会晤，就这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不只是把这些问题看作孤立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战争和过渡到和平的整个世界局势来讨论。”

早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罗斯福就有意举行一次新的三巨头会议。1944年7月19日，他致函斯大林：“既然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顺利，我认为，您，首相和我应尽快举行会晤。”他建议三巨头于9月中旬在英国的苏格兰北部会晤。斯大林原则上不反对举行三巨头会议，但提出了一些具体困难，主要是前线战事紧张（此时苏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会战）。“使我不能指望有可能在最近举行这种会晤”。

有鉴于此，9月份，丘吉尔与罗斯福举行了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会后丘吉尔顺便去了一趟美国），10月份，丘吉尔又来莫斯科举行了英苏首脑会谈。

然而，再多的双边会议也抵不上一次三巨头的全体会议。因此，在英苏首脑的莫斯科会晤之后，三巨头仍然希望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最初决定于1944年11月举行，后来罗斯福要求干脆推迟到美国总统就职典礼（1945年1月20日）之后再举行。于是这次会议便推迟到1945年1月底2月初。

关于会议的地点，既然斯大林不愿意到英国去，罗斯福便提出在地中海周围找一个地方，或是雅典、或是马耳他、或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和萨洛尼卡港、或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丘吉尔建议在耶路撒冷、或塞得港或亚历山大港举行。总之，最初他们两人也不准备去苏联同斯大林会晤。而斯大林坚持要在黑海海滨的某地开会。对此霍普金斯对罗斯福谈了他的看法：“头等重要的事是召开这次会议”，按照苏德战场上的局势，要斯大林离开苏联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又是徒劳无益地交换一番电报，倒不如一开始就下决心至少到俄国的某个方便地点去——最好是克里米亚。罗斯福认为言之有理，接受了这一建议。

丘吉尔虽然一直希望美苏首脑来英国举行一次会议，但他知道他没有多少手段能强迫罗斯福和斯大林去英国。因此早在10月22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就很明智的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双方愿意在什么地方开会我都愿意奉陪。”

于是会议地点便定在黑海之滨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具体地点定在雅尔塔。当时，雅尔塔正流行斑疹伤寒，臭虫很多。1月下旬，丘吉尔对来访的霍普金斯说，根据我所得到的关于雅尔塔的情况报告，即使我们花上10年功夫去找，也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坏的会议地点。

丘吉尔和罗斯福计划先到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会合，然后乘飞机去克里米亚。象德黑兰会议前夕一样，丘吉尔希望在三巨头会议召开之前，英美之间能先就某些问题商协一致，为此他希望罗斯福到马耳他后“住上两三夜”。然而罗斯福对这种做法一直很谨慎，以避免给苏联人留下他同丘吉尔合伙对付斯大林的印象。因此，他答复丘吉尔说，可以让英美两国参谋人员提前去马耳他举行会谈，但他本人不想在马耳他停留一天以上。罗斯福的这种态度，总是让丘吉尔失望。

1945年1月30日，丘吉尔乘飞机抵达马耳他。2月2日，罗斯福也到达这里，他是坐军舰来的。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已在这里就军事问题讨论了两天，罗斯福和丘吉尔听取了讨论情况的汇报。当天夜里，他们动身飞往雅尔塔。

2月3日，星期六，丘吉尔和罗斯福乘坐的飞机先后抵达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莫洛托夫等人在机场迎接，在机场上，英美首脑检阅了苏联仪仗队。与一般的检阅仪式不同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一个坐在吉普车里、一个在地毯上走着检阅了仪仗队。然后，他们乘车前往雅尔塔。罗斯福及美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利瓦吉亚宫。为了照顾他行动不方便，全体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丘吉尔及英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下榻于沃隆佐夫宫。

斯大林是2月4日清晨到达雅尔塔的，他是乘火车去的。自上次去德黑兰开会乘飞机在高空冻伤耳朵后，他再也不愿意乘飞机。斯大林下榻于约索波夫宫。当天下午3时，他失去看望了丘吉尔，然后去利瓦吉亚宫看望了罗斯福。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罗斯福说，在来雅尔塔旅途中，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曾多次打赌：是苏军先攻入柏林还是美军先进入马尼拉？斯大林笑着说，把赌注压在马尼拉的会赢（果然，美军在第二天攻下了马尼拉）。罗斯福又说，来雅尔塔的路上发现，克里米亚受战争的破坏很严重。斯大林告诉他，同乌克兰相比，克里米亚受到的破坏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德军从克里米亚撤退时已来不及执行原定的破坏计划，而在乌克兰，他们象虐待狂一样破坏了一切。

德国的前途

2月4日下午5时，三巨头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利瓦吉亚宫举行。斯大林提议，由罗斯福总统担任会议的常务主席，主持全体会议。丘吉尔表示同意。罗斯福在宣布会议开幕时说，“三大国领导人相互都已十分了解，相互谅解也在增强。大家都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建立巩固的和平。”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由三个层次的会议组成，即三国首脑会议、三国外长会议和三国参谋长们研究具体军事问题的会议。三种会议有时同时举行。整个会议期间，三巨头会议举行了12次，其中8次是正式全体会议，其余是午餐和晚餐会，此外，罗斯福还与斯大林单独会晤了3次。在8次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只有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军事作战问题，其余的各次会议讨论的都是政治问题。

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是三巨头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鉴于德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也鉴于它在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对战后欧洲和世界和平有极大影响。历史的经验表明，处置战败国有时比打败它还要难一些。

早在德黑兰会议，三巨头曾就如何处置战败德国的问题交换过意见，三人似乎都倾向于分割德国，但没有就此作出最终决定。会后成立了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分割德国的问题。在这个委员会中，英国提议把德国分力3个占领区，由美、苏、英三国分别占领，柏林由三国共同占领。到1944年7月底，三国就3个占领区的划分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草拟了德国投降的条款。

分区占领只是临时的管制措施，而不是最终处置办法。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同意处置德国的摩根索计划，包括把德国分割成若干个国家。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发现，以霍普金斯、赫尔和史汀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人反对摩根索计划，他只好放弃这一计划。1944年10月20日，他在给赫尔的备忘录中说：“我不喜欢对我们还没有占领的一个国家制订详细

的计划。”细节要“取决于我们进入德国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发现了什么情况”。

在雅尔塔会议上，在讨论军事问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丘吉尔提议：下次全体会议讨论政治问题，首先讨论德国的前途问题，“如果德国有某种前途的话”。

斯大林说：“德国会有前途的。”

2月5日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仍然由罗斯福主持。他说，讨论德国问题，应涉及将来处置德国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有法国想参加对德占领和参加对德管制机构的问题。他认为占领区同永久处置德国无关。

斯大林提出，应该讨论如下几个问题：要不要分割德国？如果决定分割，又该如何分割？他还建议讨论德国的赔偿问题。

丘吉尔表示，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但认为不能在四五天内作出最后决定，需要长时间研究，他本人不能承诺任何明确的分割德国的计划。他建议先讨论法国参加占领德国的问题。

斯大林仍然希望先就分割德国的问题作出决定。丘吉尔坚持说，这个问题需慎重研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罗斯福这时表示，他个人赞成分割德国，主张把德国分割成5个或7个国家。

丘吉尔再次强调说，我们正在决定8000万人的命运，30分钟是不够的，委员会大概要用一个月时间来详细研究才能作出决定。

罗斯福建议，由三国外长会议研究分割德国的最佳方案，向全体会议提出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丘吉尔也同意在德国投降条款中提到分割德国的意图。会议最后通过的议定书指出：三大国对战败后的德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此乃未来和平与安全所必需。

雅尔塔会议之前，美、苏、英三国已就分区占领德国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三国的占领区已经划分好了。现在，英国又提出，让法国参加对德占领，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

为了避免苏联反对，丘吉尔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可以从已经划给英、美的占领区中划出一部分让法国占领，完全不影响拟议中的苏联占领区，斯大林担心这样一来会给其国家开先例。

丘吉尔阐述了英国主张让法国参加占领德国的理由。他说，占领德国可能是长期的任务，英还没有把握能长期单独肩负起这一重担，而法国也许能够提供帮助。

斯大林进一步问：若让法国参加占领德国，是否也应让它参加管制德国？丘吉尔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认为，那将使管制德国变得复杂化。丘吉尔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由：他说，法国在未来的欧洲中将起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长期同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对管制德国可能有很大帮助。他还不知道美国军队战后能在欧洲呆多久。

罗斯福说，美军在欧洲最多不会超过两年。丘吉尔立刻想到，如果美军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他感到英国远远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从而更坚定了让法国参加占领德国的主张。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看到法国强大，但现实情况是法国对战争毫无贡献可言，对德管制必须由坚决抵抗德、牺牲最大、贡献最大的苏、美、英三国来承担。丘吉尔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法国确实对战争没有给予多大帮助，

但它是德国的近邻，英国需要它将来在德国左边站岗。斯大林表示，不反对在英美占领区里划出一块给法国占领，但不赞成让法国参加对德管制。罗斯福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艾登和丘吉尔说：不让法国参加管制，它是不会参加占领的。的确，他们非常了解戴高乐将军的脾气。斯大林仍不让步。

在私下，霍普金斯也劝罗斯福接受英国人的意见，加上丘吉尔和艾登“拼死拼活地为法国人力争”，罗斯福改变了看法，在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表示，赞成法国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斯大林也同意了这一点。

雅尔塔全议上还讨论了德国赔偿问题。

苏联要求以拆迁德国工厂、机床和铁路车辆等国家财产和每年支付实物的形式，从德国取得总额100亿美元的赔偿，丘吉尔承认苏联遭受的损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但他说，苏联根本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赔款。上次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也曾异想天开，到头来只是一种神话。假如你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意思是不能对德国太严厉。

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话是对的，但应提防这匹马会不会转过身来踢你。

每当这时，罗斯福往往说一些左右逢源的话，一方面他表示支持苏联对赔偿的任何要求，另一方面又说，应该允许德国人活下去，从而不致使他们成为世界的一个负担。

丘吉尔说，他赞成如下原则：我们每个国家按需分配，而德国要尽力赔偿。斯大林说，另一个原则比较好：按功分配。苏联要求德国赔偿总额应为200亿美元，其中50%应付给苏联。

在2月10日的第七次全体会议，艾登和丘吉尔仍然不同意苏联的赔偿方案，坚持认为，不要规定赔偿数额，斯大林很生气地说，如果英国觉得俄国人完全不应该接受赔偿，那还是坦率地说出来比较好。

眼看讨论要陷入僵局，霍普金斯给罗斯福递了一张字条：“在这个会议上，俄国人已作了这么多让步，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叫他们失望。”罗斯福原则上接受了这个意见。会议一致同意在莫斯科设立一个赔偿委员会，由它考虑德国赔偿的数额。

波兰的命运

波兰问题是斯大林和丘吉尔最容易动感情的问题，也是会议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问题。丘吉尔曾说过，波兰问题是“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最迫切的理由”。

在2月6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首先发言，他说，三大国中，美国离波兰最远，来自远方的观点是有益的。他赞成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但希望苏联能把该线以东的利沃夫市及附近的油田让给波兰，同时又说，这个意见仅供参考，他并不坚持。他还希望由波兰各主要政党组成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此外，波兰必须同苏联保持友好与合作关系。

丘吉尔接着说，他一贯支持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尽管在国内受到议会和保守党的指责。“我经常这样想，俄国既然在抗德卫国战争中遭受许多苦难，并且在驱逐德寇解放波兰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的要求不是建立在武力而是建立在权利上的。”但他又说，如果强大的苏联对弱小的波兰表现出宽宏大度，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一定会受到欢迎和称赞。他说，他更关

心波兰的主权，英国冒着很大的风险对德宣战，正是为了波兰的自由和独立。这是一个关系到英国荣誉的问题。

斯大林说：“对苏联来说，波兰问题既是一个荣誉问题，又是一个安全问题。波兰同我们接壤，历史上曾是进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30年内，德国曾两次通过这条走廊进攻我们。”德国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通过波兰，是因为波兰太弱了。仅靠苏联从外部封锁这条走廊是不够的，波兰自己必须强大起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强大和民主的波兰，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大林接着说，有必要提醒丘吉尔先生，寇松线不是俄国人划的，而是寇松（英国外交大臣）和克雷孟梭（法国总理）最初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是违反俄国人的意愿的，我们难道是连寇松和克雷孟梭还不如的俄国人吗？不坚持寇松线，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待。因此，对于调整寇松线的建议，苏联不能表示同意。我们宁愿多流血、继续打下去，以便让波兰在西部从德国取得领土补偿，也要坚持寇松线。

斯大林也谈到了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他说，丘吉尔先生主张在这里、即在会议上建立一个波兰政府，我看是失言吧！没有波兰人参加，怎么能建立一个波兰政府呢？波兰政府只有在波兰人参加并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我希望被红军解放的国家在红军作战的后方保持安宁。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对这项任务履行得不错，而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代理人却干了不少坏事，……

时间已很晚了，罗斯福提议休会，第二天接着开。丘吉尔却憋不住，说道，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代表三分之一以上的波兰人，英国政府不能承认它。

罗斯福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五百多年来波兰一直是造成麻烦的根源。”

丘吉尔又忍不住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格外尽力来根除这些麻烦。”

随后在2月7日、2月8日的全体会议上，波兰问题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苏联作了一点让步，在坚持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的同时，同意在苦干地区对波兰让出5到8公里。另一方面坚持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划到奥得河—西尼斯河。

罗斯福认为，苏联同意对寇松线略加调整，表明会谈取得了进展。丘吉尔不同意把波兰西部边界移至西尼斯河，认为这超出了波兰能够妥善管理的范围。他说，“如果把波兰鹅塞进那么多的德国饲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而死亡，那将是可悲的。”罗斯福也不同意把波兰边界划到西尼斯河。

关于波兰政府问题，罗斯福建议，先建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波兰总统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着手建立波兰新政府，然后举行立宪会议选举，选出波兰的永久性政府。丘吉尔说，波兰的华沙临时政府在绝大部分波兰人中不受欢迎。

斯大林再次阐明了他的看法：红军解放波兰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波兰人民的心理状态。多少年来，波兰人憎恨俄国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沙皇政府曾三次参加瓜分波兰。苏军解放波兰后，旧的怨恨情绪消失了，代之以善意。关于波兰政府问题，他说，华沙临时政府在波兰享有很大的威信，与戴高乐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再者都未经选举产生。但是，我们还是同戴高乐来往，为什么对波兰政府的态度却不同呢？他认为，改组临时政府比企图建立一个新政府要好办得多，与其建立一个总统委员

会，我们宁可同意扩大波兰临时政府。

会议最后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在波兰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改组波兰政府，吸收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建立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该政府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

关于波兰边界问题，会议决定：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以寇松线为界，在若干地方作出对波兰有利的5—8公里的调整，其西部边界留待和会最后解决。

根据这一决定，战前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和奥得河以东的一部分领土将划给波兰，莫洛托夫试图在会议的决议中为这一变动提供一点历史依据，要求增加一句：“归还波兰在东普鲁士和奥得河的古老边疆。”

罗斯福问：这些地方多久之前曾属于波兰？莫洛托夫说：很久以前。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地说，照这么说，英国也可以要求把美国归还给大不列颠。斯大林便站出来帮自己的外长说话：这受到海洋的阻隔。丘吉尔自然力罗斯福帮腔：如果提出的问题是要求归还古老的领土，那就无从谈起。

会议没有采纳莫洛托夫的意见。

为对日作战开价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在2月8日下午3时30分，单独讨论了远东问题，没有让丘吉尔参加。参加这次会谈的除了两国各一名译员外，只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苏联的莫洛托夫参加。

罗斯福早就希望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军方也希望如此。1945年1月2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说：“俄国按照它的进攻能力尽早参战（对日作战），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在下妨碍我们对付日本的主要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将尽可能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斯大林是不会白白地让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他早已多次放风说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政治条件的。为了摸清斯大林的“要价”，1944年12月14日，哈里曼曾同斯大林举行过一次会谈。当时，斯大林提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给俄国，他在一幅地图上，在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中国辽东半岛的南部画了一个圈，并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哈里曼说，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让苏联租借这个地区。

“这可以讨论”，斯大林表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以及从大连到哈尔滨的铁路，当然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他还说，唯一在德黑兰没有谈到的问题，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在雅尔塔，美苏首脑在2月8日单独会谈时，斯大林又重提上述要求。显然其中的一部分涉及到中国的民族利益。罗斯福表示，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给苏联，不会有什么困难。至于苏联在南满铁路终点获得一个不冻港的问题，他还没有同蒋介石讨论，不能代表中国讲话，看来与其由苏联租借大连，还不如让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为好。至于满洲的铁路，他希望由中俄联合经营，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

斯大林便施加压力说，除非满足他的要求，否则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俄国要对日本作战。如果满足了他的政治条件，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

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罗斯福强调说，他尚无机会与蒋介石讨论此事。

斯大林说，暂时还没有必要去找中国人谈，他希望在会议结束前把他的建议写成文件，并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罗斯福表示同意。斯大林还说，我认为，当苏联能够从西线调 25 个师的军队到远东时，再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显然他是想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上述条件。

2 月 10 日，苏联拟定了它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草案。哈里曼看后，代表罗斯福提出了 3 条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铁路应由中俄共同经营、所有协议须经中国人同意。

在当天的正式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接受后两条修正意见，也同意大连港作为国际自由港，但坚持把旅顺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还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现状。罗斯福接受了这些要求。并承诺：一旦斯大林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和蒋介石商议。

关于远东问题的谈判，一直没有让丘吉尔参与。只是到了 2 月 11 日，才通知他，让他在《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最后文本上签字。这时，当着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面，丘吉尔与艾登发生了一场争论。艾登反对丘吉尔签字，而丘吉尔坚持要签字，谁也说服不了谁，又请英国前任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来调解。卡多根站在艾登一边。丘吉尔仍不让步。他认为，不论英国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英国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最后，丘吉尔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他后来回忆说：“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罗斯福以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斯大林同意出兵对日作战。斯大林对此是比较满意的。据葛罗米柯回忆。会议期间的一天清晨，斯大林同他谈起罗斯福在远东问题上的让步时说，罗斯福是为美国恢复名誉，“因为他们在 1905 年是同情日本的，……那时，美国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从俄国手中夺走了它的领土”，“罗斯福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好。”停了一会，他突然问葛罗米柯：“您说，据您看，罗斯福是个聪明人吗？”葛说，从他能第三次连任总统来看，“罗斯福是个非常聪明和能干的人”。

1943 年 9 月辞职的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曾就《雅尔塔秘密协定》评论说：“把沙俄政府前此通过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而支配满洲的权利交还给俄国，以及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将使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全然不可能行使在满洲的完全主权，而鉴于中国没有出席作出这些决定的雅尔塔会议，它们也就更加显得要不得了。”

国际组织问题

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三大国为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所作的一项重要安排。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设想很可能前功尽弃。如果战争结束时连这样一个国际组织都不能建立起来，那么各国人民对战后世界和平的信心必将受到很大打击。

2 月 6 日下午，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上述

两个问题。罗斯福首先发言，谈了各国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愿望：“我强烈地感到，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至少在今后50年内能消除战争。对于永久和平，我并不那样乐观，但我相信50年的和平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

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核心是大国否决权的使用范围。苏联曾坚持大国在所有问题上都应该行使否决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持大国一致；而英美要求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范围。这是三大国分歧的焦点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斯退丁纽斯在会议上代表美国提出了新的方案：在实质性问题，即需要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或其他制裁手段解决的问题上，常任理事国可以行使否决权；可以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的问题，争端当事国不得参加投票；程序事项，即某项争端应不应该提到安理会来讨论，应以11票中的7张可决票决定。他解释说，这一全部程序，既能保持大国一致，同时又能让小国在安理会上倾诉重大的屈辱。

丘吉尔接着说：“世界和平归根到底要依靠三国政府的友好和合作。但要是下让小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公正的，那就会显得好象三大国想要统治世界，而我们的愿望恰恰是要拯救世界，使世界免于重演这次战争的恐怖。”

鉴于在此之前苏联一直坚持大国拥有全面的否决权，而丘吉尔把丁让小国发表意见上升到“统治世界”的高度，斯大林觉得他言过其实，他反问道：是哪些大国想统治世界？是美国吗？不是，它不想这样。是英国吗？也不是。那么苏联想统治世界吗？（全场大笑）或者可能是中国想统治世界吗？（全场大笑）显然，关于统治世界的说法毫无意义。

在把丘吉尔驳斥了一番后，斯大林就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问题阐明了他的观点：要为来来的一代建立一个至少能够保证50年和平的组织，最重要的是防止将来三大国之间发生争吵，保证三大国团结一致，新的世界组织的盟约应当以此作为其主要任务。最大的危险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三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必须拟定一项防止这种冲突的盟约。

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安理会的任何决议没有三大国的同意不能通过。

斯大林担心任何冲突都有可能破坏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丘吉尔说：“我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完全消除大国的争端，外交仍然要起作用。”

罗斯福说，大国团结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大国间不幸出现分歧，那么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投票程序，总会被全世界知道。他认为，在安理会进行充分和友好的讨论，决不会妨碍团结，相反只会显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大国对自己政策的公正的信任。

经过讨论和解释，斯大林同意美国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建议。

关于国际组织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苏联放弃了让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成为创始会员的要求，但仍然希望除苏联外，再接纳三个或至少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为创始会员国，它们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

当莫洛托夫提出上述请求时，罗斯福对斯退丁纽斯说：“这不太好。”在随后发言时，他围绕一些枝节问题高谈阔论，想回避苏联的上述要求，斯大林显得很不耐烦。罗斯福很为难，他说：“如果我们给予某个国家一票以上的表决权，那我们就违反了每个成员国只应有一票表决权的規定。”他最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由外长们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倒是苏联的要求给予了很大的同情。他说，他能理解苏联的要求，认为这个要求下会被否决，不过他还需妄同英国战时内

阁讨论。2月8日凌晨2时，他在给副首相艾德礼的电报中说：“我们有4个或5个席位（英联邦成员国），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6个，而俄国却只有一个，……鉴于他们已经作了其他重要的让步，而且有些让步还悬而未决，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对俄国作出友好的表示。他们除了主要席位以外还要两席，这不能算要求过份……”

在外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英国的艾登便积极支持苏联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告诉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既然英苏都有强烈的要求，他也同意苏联的提议。于是，苏联在联合国实际上拥有3个席位，即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针对这种结局，出席会议的美国战时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提醒罗斯福，在离开华盛顿前，罗斯福曾对一部分参议员说过：“如果斯大林提议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会员国，我应坚持让美国的四十八个州都成为会员国。”霍普金斯也劝罗斯福，坚持美国至少也应有三个投票权。

罗斯福也感到，若不增加美国的投票权，他将难于向美国舆论作出解释。于是，他在2月10日致函斯大林：“我有点担心，有人会指出，美国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因此，如果我要保证，我们加入这个世界组织……能为国会和人民全心全意地接受，或许就必须要求增加在大会里的表决权，以便给美国同等地位。”

斯大林倒也很慷慨，于第二天答复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因为苏联的票数被增加到三票，……美国的票数也应予增加。”丘吉尔也表示同意。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邀请所有1945年3月1日以前对“共同的敌人”宣战、并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宣言》的国家参加会议。

为和平而团结

雅尔塔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战后和平即将到来的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是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三位历史巨人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聚会。

为了避免让斯大林起疑心，从在利瓦吉亚宫安顿下来后，到会议第五天为止，罗斯福一直避免单独与丘吉尔见面，相反，却很乐意与斯大林单独会涉，而且常常在斯大林面前公开地谈论他和丘吉尔的分歧，并且不止一次地取笑丘吉尔对大英帝国怀有的那种过时的感情。不过，斯大林似乎并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有一次，他问与会的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罗斯福？他是真的不同意丘吉尔的立场还是一种策略手法？”葛罗米柯回答得含糊糊，斯大林又自言自语他说：“不排除美国和英国已互相分配好了角色。”由此可见，斯大林仍然有些怀疑美英首脑一个演红脸一个装白脸。

丘吉尔仍然是三巨头中最容易动感情的人。在2月9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汇报当天上午三国外长会议讨论的情况，谈到筹备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时说，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先对托管和属地事宜进行磋商。丘吉尔听到这里，以为这是要向英帝国开刀，勃然大怒，很激动地打断斯退丁纽斯的话，说道，我对这个托管报告一个字都不同意。直到现在，既没有跟我商量，也没有向我报告过。无论

在什么情况下，我决不同四十到五十个国家商谈让他们染指大英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只要我当首相一天，就一天也不让出英帝国遗产的一小片。

罗斯福赶忙说，希望首相听完国务卿的讲话。丘吉尔仍然怒气冲冲：“假如我们被一脚踢开，我自然无话可说，只要飘扬着不列颠国旗的每一块土地被人们拖到被告席上，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反对。”

斯退丁纽斯连忙解释说，设立托管机构不是针对英帝国，而是针对敌国的，比如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岛屿。

丘吉尔的怒气这才消了一些，但仍然要求最好还是写明托管与英帝国无关。

当丘吉尔大动肝火时，斯大林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笑着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曾对葛罗米柯说过：“丘吉尔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觉得丘吉尔发脾气时很有趣，有时甚至故意逗他发作。

丘吉尔见斯大林在旁连看笑话，便诘问：“如果有人建议克里米亚应予国际化，作为避暑胜地，斯大林元帅会怎么想呢？”

斯大林知道，丘吉尔是指望自己说“反对”，可他偏不顺着丘吉尔的逻辑回答，而是说，“我乐于把克里米亚作为三大国会晤的场所。”

不过，争吵归争吵，取笑归取笑，斯大林在内心里还是比较佩服丘吉尔的。打败德国后，丘吉尔将面临大选，斯大林一直相信他会必胜无疑。在2月10日的晚宴上，他说：在大选中首相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有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

同样，斯大林也赢得了英美领导人的钦佩，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出席这次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啊，如果让我这个积30年形形色色国际会议经验的人，挑选一个出席会议的班子，我第一个就挑斯大林。”

2月8日晚上，斯大林在约索波夫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英美首脑及三国的其他官员。三巨头所致的祝酒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彼此之间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斯大林在评价丘吉尔时说：“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贴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称丘吉尔是“一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并强调他所说的是，“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丘吉尔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话显然有点华而不实。

斯大林在评价罗斯福时诚恳地说，我和丘吉尔先生都是在各自的国家、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相对说来，下决心比较简单，而“这里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还未受到侵略的严重威胁，也还没有濒临即时的危险，他就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广泛考虑，锻造了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在这场战争中，总统最突出和关系最重大的成就就是租借援助”。

罗斯福在讲话时，没有直接评价斯大林和丘吉尔，而是从三国关系，从过去谈到未来。他说：“我觉得这次宴会的气氛亲如一家人，我愿意用这种语言来着重说明我们三国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年间，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更大的变化还在将来。”

站在雅尔塔会议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三巨头展望未来，都有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斯大林说：“没有这个联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一致并不太难，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更为困难的任务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联盟。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下结成的联盟将在战后巩固和发展。”

丘吉尔说：“在这场战争中，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象在这次会议上那样感到我的责任是这样沉重。现在，……我明白我们正在登临顶峰，面前展开一片宽阔的远景。然而也切勿低估我们的困难。……”

也许正是三巨头这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决定在雅尔塔会议公报的最后一节，用上这样一个小标题：“象为战争而团结那样为和平而团结”。

第二十六章 胜利时刻

丘吉尔：“我对斯大林竟然给你这样一个侮辱美国和英国荣誉的电报而感到惊骇。”

罗斯福：“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斯大林态度的含意和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斯大林：“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互不信任

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英三大盟国之间，主要是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在战争压力下结成的联盟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45年3月，苏联红军与英美盟军都已攻入德国境内，彻底击败德国已是指日可待。面对这种形势，丘吉尔极力主张英美盟军集中优势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尽可能抢先占领德国首都柏林，以便随后好同苏联讨价还价。3月11日，他致函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苏军进入了维也纳，“现在再加上我们要把柏林拱手让人，……可能会使俄国人较前益发自信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们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毕竟是军人，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盟军的作战行动。他不赞成丘吉尔的主张，相反根据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有关协议，3月28日，向斯大林通报了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不向柏林前进，而是向更南边的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一带推进。斯大林欣然同意，称这个计划与苏军的计划正相吻合，“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性”。

丘吉尔得知艾克的这一举动后，极为恼火，于4月1日致电罗斯福，仍然力主让盟军抢占柏林：“我坦白地说，柏林仍然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英美盟军“应该尽量向东深入德国。”然而，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支持艾克。丘吉尔无可奈何，只好认输，4月5日，他致函罗斯福，引用一句拉丁文成语了结了这场争论：“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罗斯福虽然没有支持丘吉尔的上述主张，但美苏关系中的有些问题也让他很不满。3月份，雅尔塔会议上决定让苏联在联合国拥有3个席位的消息被捅出去后，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不满，使罗斯福很被动，他只好说，苏联和英国也同意让美国在联大拥有3个投票权。这一消息不仅没有平息舆论的不满，反而激起了对政府更强烈的反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人们对雅尔塔会议上建立的三大国合作关系开始失去信心，并且怀疑罗斯福政府可能在雅尔塔会议上还干了别的秘密勾当（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会议上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这件事使罗斯福狼狈不堪。

此外，罗马尼亚问题也引起了他对苏联的不满。1944年8月下旬，罗马尼亚获得解放，成立了多党联合政府。1944年12月组成了以拉代斯库将军为首的新内阁。针对这个政府反对进行土地改革，1945年2月24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50万人的游行示威，要求拉代斯库政府下台，遭到血腥镇压。苏联赶紧派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去布加勒斯特，要求罗国王罢免拉代斯库，任命农民党领袖格罗查为总理。3月6日，格罗查新政府成立。美国对苏联干涉罗马尼亚事务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波兰问题仍然是影响三大关系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会议后，英美驻苏大使加上苏联的莫洛托夫与波兰各派代表就改组波兰政府问题举行谈判，到3月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丘吉尔要求罗斯福同他一起出面直接与斯大林交涉，罗斯福觉得暂时不宜出面。丘吉尔不甘心，3月13日，又致电罗斯福说，在波兰问题上，英美正面临失败。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我不能同意说我们已面临雅尔塔协议的破产。”

3月中下旬，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丘吉尔再次怂恿罗斯福与他一起直接同斯大林交涉，他在3月27日的电报中说：“据我看来，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他主张他们两人向斯大林提出“尽可能强烈的呼吁”。罗斯福也认为“现在时机已到”。3月29日，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把在波兰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归咎于苏联政府“对于克里米亚决议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这封信中，他的语气很强硬，“我必须向你说明清楚，任何解决办法，如其结果仅仅是薄薄一层伪装下面的华沙政权的继续，那是不能接受的。”

罗斯福出面后，丘吉尔的劲头也来了，于4月1日致电斯大林，同罗斯福一唱一和，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他说，他事先已看过罗斯福发出的电报，表示“衷心地赞同”，如果三大国不能在波兰问题上达成协议，他将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向议会承认这个事实”。

4月7日，斯大林给他们回电说，完全是英美驻苏大使在谈判中把波兰问题“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了”。是他们没有贯彻雅尔塔会议的精神。他提出了让波兰问题走出死胡同的建议，并表示，如果英美能接受，就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罗斯福于4月11日致电丘吉尔：“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斯大林态度的含意和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希望丘吉尔暂时不要把这个问题捅到议会中去，在采取行动之前，两人应先商量一下。

大约就在上述各种矛盾不断加剧的时候，英美背着苏联同纳粹德国秘密谈判，严重地加剧了苏联对英美的不信任。

1945年2月，驻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同美国在瑞士的情报机关进行了接触。3月8日，沃尔夫来到苏黎世，与美国在瑞士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会了面。3月中旬，驻意大利的英美盟军司令部派代表到瑞士的伯尔尼会晤了沃尔夫，谈了驻意大利的凯塞林指挥的德军向英美投降一事。苏联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求参加谈判，遭到英美的拒绝。3月16日，莫洛托夫致函英国驻苏大使，对英国拒绝让苏联参加表示难以理解，主张停止在伯尔尼业已开始的谈判。英美试图掩盖这一事件的真相，遭到了苏联政府的驳斥，英美试图把这件事说成是误会。苏联答复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

在此期间，德军在东线对苏联红军的抵抗异常顽固，而在西线对英美盟军的抵抗却松弛下来，因而苏军的前进非常缓慢，而英美盟军却进展迅速。这一形势加剧了苏联对英美的不信任，3月24日，罗斯福出面致函斯大林，试图消除“误会”，双方你来我往，交换了好几封信函，仍然未能消除互下信任感。当时，丘吉尔一直保持沉默。4月3日，斯大林致函罗斯福，对英美的行为进行了谴责：由于英美与德国秘密谈判的结果。“目前在西线上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对英美作战，而与此同时，德军对俄国……却继续作战。”他说，这种局面对苏美英之间的信任“是绝无好处的”。

罗斯福似乎很冤枉，在4月5日的回电中，继续否认在伯尔尼进行过谈判，并强调说，在胜利到来之际，“让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缺乏信任，来损害我们的整个事业，那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在信的结尾，他愤怒地表示，对斯大林手下的那些告密者对美国的“这样卑劣的诬蔑，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

当美苏首脑唇枪舌剑、罗斯福怒火迸发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丘吉尔乘机火上浇油，于4月5日致函罗斯福：“我对斯大林竟然给你这样一个侮辱美国和英国荣誉的电报而感到惊骇。英国政府诚恳对你的答复表示拥护……”4月6日，他又致电斯大林说：他之所以在前一阶段保持沉默，是因为决定“对这种肆意侮辱而又毫无根据的谴责不作任何答复，置之不理。……但是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为这通来电感到震惊的，……”

4月7日，斯大林给罗斯福回电，一方面表示，“我从未怀疑到你的诚实和值得信赖”，另一方面解释了苏联的观点，坚持说，英美的代表会见德国人而不让俄国人参加“是错误的”，他手下的情报人员是可靠的，他还把这份电报的副本送了一份给丘吉尔，另附信一封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图。”

罗斯福觉得，争吵到此可以结束了。他在4月1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感谢你对苏联的观点作了坦率的解释，“这件事现已似乎成为陈迹……无论如何，不应该有相互怀疑，今后此类性质的小误会也不宜发生。”

然而，要做这一点谈何容易。就在当天，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一方面表示，“我想把一般性的苏联问题尽量缩小”，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务必坚定”。他比较重视同苏联合作的，尚且是这种态度，丘吉尔就更不用说了。他在4月5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主张：“我们两国在这个紧要关头应该采取坚强的和直率的立场。”显然，这是一种准备同苏联摊牌的架势。

三大国之间发生的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斯大林对英美的不信任。3月底，他同朱可夫谈起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气氛中，3月中旬，斯大林以莫洛托夫要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为理由，决定不派他出席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而让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柯率团参加。这一消息使罗斯福极为不安。建立一个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是以他为首的美国政府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安排，所有其他创始会员国都派外交部长出席会议，若苏联例外，仅派一个大使出席，必然引起美国乃至世界舆论对盟国战后合作的议论和怀疑。鉴于此，罗斯福反复地要求，劝说斯大林派莫洛托夫与会，哪怕只是参加一个开幕式也好。然而，斯大林主意已定，没有商量余地。

罗斯福逝世

当美、苏、英三大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正需要三巨头慎重对待和解决、三国在战时建立的合作关系正需要三巨头用心地维护和发展的关键时刻，从华盛顿传出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大约从1943年冬季开始，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显著地恶化了。德黑兰会议之后，当丘吉尔在北非患上肺炎时，罗斯福不久也患了感冒。1943年12月

31日，他致电丘吉尔时说：“我因患感冒已经躺了两三天，但病情却不严重。”其实，他并不完全了解他的病情，感冒后他又患上了支气管炎，身体越来越差，偶尔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在谈话时睡着了，还有一次在签署一封书信时突然昏厥。1944年3月底，他被送往医院检查治疗。在海军中服役的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博士为他作了检查，发现他患有心脏扩大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血管系统的状况很不好。医生没有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他，他也不想知道。鉴于他的病情（自1937年起，他还患有高血压），医生要他少抽烟，少喝酒、多休息，他都答应了，医生让他服一些药，他照服不误，从不问药的名称和功效。1944年4月初至5月初，他到南卡罗来纳州休养了一个月，体力稍有恢复。

1944年是美国的又一个大选年。罗斯福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再一次参加竞选。这年年初，他对一名顾问说：“上帝知道我是不愿连任总统的，但我可能感到连任是必要的。”

4年之前，他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根深蒂固的连任总统不得超过两届的传统。而这一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一次，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是42岁的纽约州州长杜威。他竞选的策略之一，是在罗斯福的健康问题上大做文章。在这方面，罗斯福的确有很多“把柄”可抓。当他去南卡罗来纳州休养而一直不露面时，报界开始谣传他患了中风，有的甚至说他已变成了痴呆者。7月份，他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演讲时拍的一张照片显得形容枯槁、目光呆滞。共和党人便把它印出来在全国各地散发。杜威在竞选中，攻击罗斯福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头子”。

这的确是一个不太好反驳的问题。自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他已经当了11年的美国总统。即使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也会感到很累的，何况他还是一个残疾人，他的确也觉得很累。5月15日，他同总统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谈到即将来临的竞选活动时，由衷地说道：“比尔，我实在不愿意再参加竞选了，但战事的发展很可能使我再次成为一位候选人。”他的一些部下也觉得他很累。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总统的身体情况很不安。”

然而，罗斯福毕竟是一位竞选高手，杜威的那两招难不倒他。9月23日，他对卡车司机国际兄弟会发表演讲时，很巧妙地谈到了“累坏”的问题：“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听众们欢声大笑。罗斯福的寥寥数语，很巧妙地使他们想起了11年前共和党的胡佛政府留下的那幅经济不景气的乱摊子，想起了罗斯福新政的巨大成就。

11月份，大选投票的结果是，罗斯福再次当选。连续4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不过，大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健康状况的好转。1945年1月20日，参加过总统就职典礼仪式的斯退丁纽斯，发现罗斯福在典礼仪式上“全身发抖”，珀金斯发现“他脸色不好”。2月2日到达马耳他时，两周没见到他的金上将被他的健康状况之差吓了一跳。2月3日坐飞机到达雅尔塔时，丘吉尔发现他“看起来很虚弱和不健康”。在雅尔塔生病时，斯大林探望他后对葛罗米柯和莫洛托夫慨叹：“为什么老天爷要惩罚他？”雅尔塔会议之后，

2月15日，在停泊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昆西”号军舰上，丘吉尔最后一次见到罗斯福，他后来回忆说，“总统似乎沉静而虚弱，我觉得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在回国途中，不顺心的事接连发生。先是霍普金斯重病，在阿尔及尔上岸，与罗斯福分手了，这一走，竟成永别。不到两天，一直追随在罗斯福左右的军事秘书沃森老爹突然病逝，对他打击很大。那两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地去世，包括母亲、路易斯·豪、马文·麦金太尔、利汉德小姐，以前，每一次他还能强忍住悲伤。这一次，沃森老爹逝世后，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之情了，很伤心地向左右的人诉说了一番。大家联想到他的健康状况，不免惶恐不安。

回到美国后，3月1日，他在向国会汇报雅尔塔会议情况时，说话吐词不清，右手发抖，只能用左手笨拙地翻阅讲稿。许多国会议员感到，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

3月底，罗斯福来到佐治亚的温泉休养，他想在这里休息两三个星期。但并不可能完全静下心来，每天不得不签署各种文件、电报。4月上旬，为了波兰问题，为了解释伯尔尼事件，为了争取成功地召开旧金山会议，他没有少操心。

1945年4月12日这一天，罗斯福签署了一些电报和文件，包括最后一次给斯大林的和丘吉尔的电报。中午时分，他安静地坐着看文件，一位画家正给他画像。突然，他垂下头，说了一句“我的头痛得厉害”，便昏迷过去，两小时后离开了人世，经诊断，是脑溢血致死。

罗斯福只活了63岁。如果不是第三次、第四次当选为总统，他也许能多活几年，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也许不会谋求第三次当选。他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对战后世界秩序也有很多设想，可惜他只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没有听到庆祝胜利的礼炮。

胜利与悲剧

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苏联后，斯大林立即召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他握住哈里曼的手约有半分钟之久，默然无语。随后他在给美国新总统杜鲁门的唁电中，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为了维护和加强美苏合作关系，斯大林在会见哈里曼时宣布，他准备派莫洛托夫去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4月13日，丘吉尔惊悉罗斯福去世的噩耗，感到身上仿佛受了一次打击，“一种深沉而无可换回的损失之感把我压倒了”。他在给罗斯福夫人的唁电中说：“这也是英国和全世界各地自由事业的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一种亲爱而宝贵的友谊。”4月17日，他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颂扬罗斯福的长篇讲话：“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

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丘吉尔本想立即去华盛顿参加葬礼，更重要的是想去会晤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但被内阁成员们劝阻了，由艾登代他去。

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副总统职务是没有多大实权的。副总统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他搭当的

总统是否重用他。杜鲁门虽然是罗斯福的副总统，但并非是罗斯福的心腹干将。他没有参与一些重大决策的作出，也不了解一些重要的内幕，作为副总统的他甚至不知道美国当时正在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他不了解罗斯福的外交战略思想，也不太熟悉外交事务。艾登到达华盛顿后，罗斯福的心腹顾问霍普金斯于4月15日对他强调说，丘吉尔这次不来美国也罢，因为杜鲁门对世界事务一窍不通，会把他吓坏的。……

显然，杜鲁门虽然接任了罗斯福留下的总统职务，却不能扮演罗斯福在三巨头中扮演的角色。

罗斯福的去世，让希特勒高兴了一阵子。当时，苏军和英美盟军的强大攻势，逼得希特勒快要发疯了。4月的一天晚上，戈培尔给他念《腓特烈大帝史》，其中讲到，在18世纪中叶的7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一度处于绝境，却宣称2月15日之前局势不好转就服毒自杀。果然伊丽莎白女皇于2月12日死了，继任者是腓特烈大帝的朋友和崇拜者，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戈培尔读这一节时，又用星象图预卜：1945年4月中旬，德国将出现奇迹，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戈培尔立即打电话给希特勒：“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罗斯福死了！……这是出现奇迹之日！”

然而，他所希望的奇迹并没有出现。4月16日凌晨，苏军向柏林发起了强大的攻势，经过5天激战，突破了德军的近郊防御圈。从4月20日起，又向柏林市区发起了最后攻击，27日突入柏林城区、29日进攻市中心。大约在4月中下旬，英美盟军迅速地向前推进，4月25日在易北河的托尔高与苏联红军胜利会师。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开枪自杀。5月2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柏林。

1945年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军的约德尔将军在莱姆斯签署了德军全部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书。5月8日晚上12时，在柏林又举行了一次更正式的德国投降仪式，德军的凯特尔元帅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9日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在战争胜利之际，丘吉尔却忧心忡忡。他回忆说：“正当伟大同盟的各国人民对……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时，我的内心却因为迅速展现在我的视野之前的新的和更大的危险而感到忧郁。”在他看来，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苏联红军解放东欧东南欧和中欧的广大地区，“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但是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

于是，这位常常在正反两方面都走在时代前列的风云人物，又一次悲剧性地走在了冷战时代的前列。在欧洲各国人民高唱胜利进行曲时，丘吉尔发出的却是一种极不和谐的变奏曲调。1945年5月4日，他在致艾登的信中说，如果在美国从欧洲撤退之前，有关波兰、德国和东南欧的一系列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我看……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希望也极微小”。他主张“及早和迅速跟俄国摊牌”。在欧洲胜利日的讲话中，他却向英国人民发出“警告”：如果胜利后的欧洲“竟由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来取代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分子一伙的罪行便没有多大用处了。”5月12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第一次使用了著名的“铁幕”一词，称苏联军队“将在前沿地区拉下一道铁幕”。5月11日，他在给艾登的电报中，又谈到了“再来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丘吉尔强烈要求美国军队暂时不要从事先协议划给苏联的占领区内撤退、以便同斯大林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他还强烈希望尽早举行一次新的

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希望在三国会议召开之前，杜鲁门总统先访问英国。5月11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上述要求。显然，没有杜鲁门的支持甚至带头，丘吉尔自己是远远不足以同斯大林抗衡的。

然而，杜鲁门刚上台不久，究竟应该怎样同斯大林和丘吉尔这样的历史巨人打交道，他还没有探出深浅，因而暂时还不想完全对丘吉尔言听计从。他回电说，最好由斯大林主动提出召开三国会议，让英美驻苏大使“劝诱他作此提议”。他自己不想在三国会议之前先去伦敦，而且应与丘吉尔分别前往参加会议，以避免英美“结成一伙”的嫌疑，等三国会议结束后，是否去英国，再看情况而定——在避嫌疑这一点上，他倒颇象罗斯福。

丘吉尔很失望，但仍然希望尽快举行三国会议。

5月下旬，杜鲁门派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来伦敦商谈三国会议问题。戴维斯一向对苏联有好感，用英美的观点看，是一个亲苏派。对这样一位人物，丘吉尔很难产生好感。而戴维斯带来的消息更让他失望：杜鲁门准备在同丘吉尔会晤之前，先在欧洲某地会见斯大林。

丘吉尔对此极为惊讶，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他看来，英美之间共同点多，而与苏联的分歧很大，英美相互协商乃天经地义，杜鲁门却要避嫌，而且使用“结成一伙”“那样轻蔑的措词。他要避嫌，倒也罢了，现在居然要先去会见斯大林而把他丘吉尔撇在一边。为什么对斯大林要避嫌疑而却不对他丘吉尔避嫌疑？丘吉尔很气愤。为了让杜鲁门慎重地对待这一问题，他写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与其说是备忘录，还不如说是一份带有抗议性质的照会）交给戴维斯：“必须了解，英国政府的代表除非一开始就以平等的伙伴身份参加，（否则）就将不参加任何会议，这样做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首相不了解有什么必要提出对英国、英帝国和英联邦如此有伤感情的问題。”几年后，他回忆这件事时，仍然余怒未息地说：“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我国的迹近侮辱，即使出于无意，我也不能同意。”

丘吉尔龙颜大怒，初出茅庐的杜鲁门被镇注了，单独会见斯大林的计划胎死腹中。

在那份备忘录中，丘吉尔还以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的口气“教训”美国人：“必须记住英国和美国在这个时候是团结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苏联政府则有不同的哲学。”

显然，正当欧洲各国人民欢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满怀喜悦地迎接和平到来之际，丘吉尔已经吹响了冷战的号角。

波茨坦会议

杜鲁门出任总统后，深刻意识到，如何处理英美与苏联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又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他知道苏联在战后经济重建方面有求于美国，也意识到美国有求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丘吉尔一个劲地怂恿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提醒他别上了丘吉尔的当。1945年5月19日，他正式决定派霍普金斯出访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就波兰问题、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三大国会议问题等等同斯大林磋商。他告诉霍普金斯，“可以用外交语言，如果认为适用于斯大林，也可以用棒球棍。”

5月25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在英美高级官员中，斯大林对霍氏比

较信任（这也是杜鲁门派他而不是别人去的重要原因），因而热情地欢迎他的来访。他们总共会谈了6次，涉及到了双边和三国关系中的许多敏感问题。

霍普金斯表示，三大国在改组波兰政府问题上的僵局引起了美国的忧虑。斯大林表示，苏联只希望有一个友好的波兰，而英国却想恢复对苏联的封锁线，这是苏联不能容许的。在这个问题上，会谈取得了进展。不久成立了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并于1945年7月5日得到了英美的正式承认。

在会谈中，斯大林指责美国削减对苏联租借援助的方式。对德战争结束后，美国突然下令取消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甚至让已在前往苏联途中的船只返航，斯大林说，这种做法使人遗憾，甚至是蛮横的，给苏联的印象是，打败德国后，美国不再需要俄国人了。霍普金斯对此作了一些解释。

斯大林还向霍普金斯表示，苏军将不迟于1945年8月8日对日作战。

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趋紧张的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关系。6月1日，杜鲁门通知丘吉尔说，斯大林同意7月15日左右在柏林附近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丘吉尔反复要求提前举行。杜鲁门告诉他，最早的日期是7月15日。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这是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不到半年内，三大国首脑的又一次会晤，只是罗斯福已被杜鲁门所取代，丘吉尔开了一半的会议后，回国听选举结果，再也没有返回波茨坦。通常所说的战时盟国三巨头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自始至终参加了波茨坦会议。

丘吉尔于7月15日到达波茨坦，当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了美国总统杜鲁门，7月18日，又同杜鲁门单独共进午餐。他们交谈的范围极为广泛。杜鲁门表示，希望能同丘吉尔建立一种象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的亲密关系，丘吉尔为之感动。他觉得，杜鲁门的许多看法，正符合英美关系一向发展的路线。

斯大林来到波茨坦后，也于7月17日中午拜访了杜鲁门。杜鲁门说：“我这次来是想与您建立友好关系，并直接与您就国务问题进行接触，目的是就这一或那问题立即作出‘是’或‘否’的决定，因为我不是一个外交家。”

显然，这是一种与罗斯福完全不同的外交风格。杜鲁门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他无法替代罗斯福在三巨头中扮演的角色。在7月17日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他被推选出来担任会议主席时，他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代替了一个无法代替的人——已故的罗斯福总统。我很乐意，哪怕是部分地，有助于你们内心保留着的对罗斯福总统的怀念之情，我很愿加强他和你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友谊……”

事实上，杜鲁门不可能象罗斯福那样巧妙地处理美、苏、英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此时，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使他多少变得有些狂妄起来。丘吉尔也希望利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讹诈。

1945年7月17日，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来到丘吉尔房间，把一张字条递给丘吉尔，上面写着：“孩子们满意地出生下来了。”意思是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第二天早晨，从美国国内送来了更详细的报告。杜鲁门立即请丘吉尔去讨论。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原子弹来尽早结束对日战争，为此，不再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几天后，丘吉尔在给艾登的信中说：“事情十分清楚，美国现在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

他们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以便起到威慑作用，但又“不要让他

知道任何细节”。为此，他们为告诉这一消息的时机和方式煞费苦心。7月24日，全体会议结束后，斯大林起身朝门口走去，杜鲁门拦住他，单独交谈起来。丘吉尔知道杜鲁门要说什么，在离他们大约5码远的地方，密切地注意着斯大林的反应。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美国制造了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我们打算对日本使用这种武器。”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既不吃惊也不想知道细节，杜鲁门很失望。

随后，丘吉尔急切地问杜鲁门：“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斯大林没有向我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明确解释的问题，他仅限于对这一通报表示感谢。”他们对斯大林不了解原子弹的厉害感到失望，以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原子弹。

其实，苏联早已知道英美在秘密地研制原子弹，苏联自己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制工作，斯大林心里早已有底。因此当杜鲁门装出很神秘的样子同他谈这件事，而丘吉尔故意在一旁注视着他的反应时，斯大林知道，他们是想吓唬苏联。于是，他也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让他们大失所望。

不过，斯大林内心里还是有些着急。当天晚上，他致电给在莫斯科的贝利亚，要求给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创建人、第一任所长伊·瓦库尔恰托下达指示，加快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既有一些礼节性的相互交往，比如共进晚餐，边吃边聊天，能从晚上8时半持续到凌晨1时半，都有话说；另一方面，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一直到7月25日丘吉尔回国等候选举结果为止。当时，他的打算是“如果象一般预料的那样，选举人要是重新选我的话，我打算在这一连串的决议上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在会议临了的时候，预备摊牌……”

丘吉尔下台

战时的英国议会是1935年普选产生的，到1940年11月已届期满，本应改选，由于战乱，议会各党派达成妥协：让这届议会任期延长，每次延长1年，直到战争结束再举行大选。

1944年秋天，胜利似乎即将到来，各党派已开始为大选作准备，联合政府中，各党派成员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强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而变为竞争权力的敌手了。”1944年10月31日，丘吉尔要求让议会任期再延长一次。他说：“据我看来，除非所有的党派决定把现在的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时为止，我们惟有以反纳粹战争的结束作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指针。”

随着德国战败投降，英国议会改选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丘吉尔希望把选举推迟到打败日本之后，但据早先估计，欧洲战争结束后，打败日本还需要18个月。联合政府显然不能维持这么长久，尽快大选势在必行。工党希望选举在1945年10月进行，这样工党可以有几个月的时间为竞选作准备。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则主张6月份大选，以便充分地利用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的显赫地位和声望。

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向国王递交辞呈，联合政府解体。国王授权丘吉尔组织“看守”政府。6月15日，议会解散，大选定于7月5日进行。因为军队分布在海外作战，计票工作比较困难，选举结果将于7月26日公布。

5月28日，丘吉尔在首相官邸举行茶话会，款待退出联合政府的大臣们。

他老泪纵横地说：“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他宣布，为了保证在保守党选举失败的情况下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建议工党领导人艾德礼陪同他一起出席波茨坦会议。

随后，丘吉尔与工党的艾德礼——战时联合政府的副首相，开始了角逐首相宝座的竞选活动。丘吉尔乘专列在全国各地奔走，有时离开专列。乘敞篷汽车到各处竞选，极为显赫张扬。艾德礼的竞选活动搞得较为朴实，由夫人开一辆旧汽车带他周游全国，所到之处，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見，举止谦和。

在竞选演讲中，丘吉尔对昨日的战友——今天的竞争对手——工党大肆进行攻击。他说，如果工党获胜，“起初无疑会非常人道，转而会求助于某种盖世太保的统治形式”。这种攻击给人一种翻脸不认人的感觉。

相反，艾德礼的反击却很高明，也很理智。他说：“昨晚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丘吉尔先生讲的，思想却是比弗比鲁克勋爵的。”

在竞选中，保守党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丘吉尔个人威望上。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合·乔治也是利用他战时首相的威望赢得了大选胜利。现在，保守党想重温旧梦，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丘吉尔的身上。他们在全国各地张贴丘吉尔的巨幅照片，并加上标语：“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人们感到，保守党在竞选中除了丘吉尔的照片以外，拿不出更多有吸引力的东西。

工党却不同。1945年4月发表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简单明了地提出了该党的施政纲领。

选举投票后，因为要3周后才能计算出票数，丘吉尔便于7月15日到波茨坦开会，并把工党领导人艾德礼也带去了。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也许当不上英国首相；现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能否保住首相宝座呢？英国国内外舆论一致看好保守党，认为丘吉尔必胜无疑。保守党人自我感觉良好，其最后估计是，至少可得56%的多数票。《每日快报》甚至认为可得60%的多数票。斯大林也一直相信保守党将赢得大选胜利。在波茨坦会议上，他和杜鲁门都相信，保守党必胜无疑，丘吉尔马上会返回波茨坦。

丘吉尔本人也对这次大选充满了信心。7月6日，他致电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时，相信保守党能赢得多数。一直到选举结果公布前夕，他仍然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我继续工作，我希望有可能按照新下院的比例来重组全国联合政府。”他相信不久又会返回波茨坦，因而离开时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以及行李都留在波茨坦。

7月26日，即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一天清晨，丘吉尔便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一刀似地猛醒过来，我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

中午，选举结果出来了，竟同他预感的完全一样，他领导的保守党失败了，而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悲痛万分，一句话也说不出话来……他已经失去了返回波茨坦“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的资格。

当晚7时，他来到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辞呈，请国王授权艾德礼组织新政府。鉴于他为英国和英帝国作出的贡献，国王要给他颁发嘉德勋章，丘吉尔谢绝了，他不需要这种安慰。当晚，他发表辞职声明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战争……”

事实上，对于在胜利刚刚到来时就被英国人民所抛弃，丘吉尔一直耿耿

于怀。

日本投降

日本还没有投降，可战时盟国三巨头中，罗斯福已经去世了，丘吉尔也下台了，唯有斯大林还坚守在苏联卫国战争的领导岗位在波茨坦会议的最后阶段，斯大林的英美对手已经变成了艾德礼、杜鲁门了。他们在竭力维护英美利益方面与丘吉尔、罗斯福是一致的，但个性、风格、处事方式等等却有很多差别。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在波茨坦会议的后一阶段，“艾德礼越来越粗率无礼。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变得粗暴”。虽然会议达成了很多协议，实际上苏联同英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日本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波茨坦会议之前，美国和英国一直竭力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估计，“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 50 万美国人的生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认为，进攻日本本土，仅美军就要损失 100 万。然而，自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英美似乎觉得不必要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和丘吉尔认为“不等俄国人插进来日本就会完蛋”。杜鲁门说：“一旦曼哈顿（美国原子弹试验计划代号“曼哈顿”）出现在他们国土上空，我想他们就会这样做的（指日本人投降）。”

早在 1945 年 4 月 5 日，苏联已经宣布废除 1941 年 4 月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准备同中国一起以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签署的同一天，美国送给苏联代表团一个副本“备查”。苏联代表团抱怨英美没有同苏联商量此事，要求推迟 3 天发表，让苏联参加，却得到通知说，这份公告已经发出去了。斯大林特别恼火。

7 月 29 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向英美提出建议，希望由美国等盟国正式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杜鲁门拒绝了 this 建议。他后来解释说：“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是我还是懂得不应该让俄国人在日本享有任何控制权”。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天，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如果日本不投降，还要在其他城市投原子弹。8 月 8 日夜，苏联对日本宣战，150 万苏联红军向集结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精锐的关东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8 月 9 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大反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

8 月 13 日，美国宣布，整个日本是美国军队的受降区，斯大林于 8 月 16 日写信给杜鲁门，要求让苏军参加在日本北海道的受降和占领，遭到杜鲁门的坚决拒绝。结果，苏军只是强行占领了日本北方的 4 个小岛——国后、择捉、色丹和齿舞岛。

8 月 9 日，在美国向日本扔第二颗原子弹时，杜鲁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感谢上帝让原子弹落到了我们而不是到了敌人手中”。东欧“将

不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后来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斯大林显然意识到，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接连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看的。他敏锐地感到了苏联的脆弱性，召集了5名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出苏联的原子弹。

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时，战后的世界和平却被核武器的阴影笼罩着，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正悄悄地拉开序幕。

